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当代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世界当代史是讲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世界历史。它是世界通史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的历史。众所周知，这一过渡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相当长而曲折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共处，相互竞争。故此，世界当代史也属以第一次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世界现代史范畴，是世界现代史的第二个时期，即二战后时期。但是，由于二战后 40 多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近年来，学术界一般都把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对待，称之为世界当代史。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需要发展。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当代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各国政府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与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斗争，成为世界当代史的中心内容。

本书是北京师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为本系本科、夜大、函大的学生编写的专业课教材之一，也适合于所有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以及其他关心世界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读者。

本书是编著者在总结以往教学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并吸收其他有关最新研究成果编写而成。它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世界当代历史发展总的进程和具体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论述。为此，本书在总的结构上作了新的探索。全书分两编 15 章：第一编（第一至六章），主要从宏观和横向方面分专题论述当代各种全球性历史问题的发展状况；第二编（第七至十五章），主要从微观和纵向方面分别论述这一时期世界各地各个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这种编排和写法，似可更为全面地展示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图景，以弥补国内已出版的《世界当代史》著作尚无关于宏观和全球性历史问题专题论述的欠缺。当然，由于编写者水平所限，这一新的探索以及全书还会有不少失误，尚需不断改进和完善，祈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执笔人及其负责编写的章节如下：

段炳麟：第五、六、九、十、十二、十四章。

张宏毅：第三、四、七、十一、十五章。

黄安年：第一、二、十三章。

卢文璞：现任本校文科教学督导员，应邀写前言和第八章。

金相春、冯月华、杨宁一、孙平参与了本书大纲的拟订工作。

世界当代史

第一编

第一章 当代新技术革命及其世界性影响

第一节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

从 18 世纪中叶以来的 200 多年间,人类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历时一个世纪,导致了人类社会在先进地区由封建主义制度为主阶段跨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经历了 60 年左右,导致人类在先进地区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社会跨入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为主阶段,个别国家则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开始的则是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即新技术革命,迄今仍在向纵深和横广两个方面发展,导致在发达地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为主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主阶段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则兴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

首先是原子能技术的利用和发展。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49 年 8 月苏联也宣布试制原子弹成功;1952 年 10 月 31 日,美国又制成了氢弹,从 1953—1964 年间英、法、中相继宣布试制热核武器成功。与此同时,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开始兴起,1947 年美国发明同步回旋加速器,1945 年苏联建成第一个原子能电站,1957 年苏联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下水。到 1986 年,世界 26 个国家已有 376 所核电站,占全球发电量的 13%。

其次是空间技术的利用和发展。1957 年 10 月 4 日、11 月 3 日,苏联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1 号和 2 号,从而开创了空间技术发展的新纪元。1958 年 1 月 31 日,美国发射了重量小于苏联但质量很高的“探险者一号”人造地球卫星。1959 年苏联的“月球二号”卫星成功地击中月球,成为最先把物体送上月球的国家。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接着 1962 年 2 月 20 日,美国约翰·格伦也乘“友谊七号”卫星遨游太空。同年 7 月,美国又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从 1961 年 5 月—1972 年 12 月,美国成功地实施了规模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7 月 21 日—25 日,奥尔德林·阿姆斯特朗等 3 名宇航员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70 年代以来开始了空间技术由近地空间为主转向太阳系行星和宇宙空间的探测研究。1973 年 5 月 14 日,美国的“天空实验室”进入太空,1971—1977 年间,苏联先后发射“礼炮号”、“联盟号”、“进步号”、“宇船号”空间站。1981 年 4 月 12 日,美国第一个可供连续使用的哥伦比亚航天飞机试飞成功,于 4 月 15 日凌晨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安全降落,历时 2 天 6 小时 25 分 52 秒,它身兼火箭、飞船和飞机三种特长,是宇航事业的一项重要突破。其后,美国又有“挑战者号”、“发现号”、“大西洋号”、“奋进号”等航天飞机升空。1988 年 11 月 15 日,苏联第一架航天飞机“暴风雪号”也顺利升空。80 年代,美苏的“空间实验室”接待了多批宇航员,并一再创造了在太空停留一年以上的记录。在世界各国发射的卫星中,美

苏两家占 95%以上，美苏发射的卫星有 70%用于军事目的，此外，还有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卫星、导航卫星、测地卫星，科学卫星等。

第三是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问世的美国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ENIAC）和通用电子计算机（EDVAC），标志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诞生。1958 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运算速度每秒在 100 万次以上，高于第一代的 200 倍，1964 年，运算速度每秒在 300 万次以上，称为电脑。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70 年代以来又发展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第四代计算机。大体上，每隔 5—8 年运算速度提高 10 倍，体积缩小 10 倍，成本降低 10 倍。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1980 年，全世界拥有 1000 万台微型计算机。80 年代以来，美日更竞相研制第五代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科技手段现代化、国防技术现代化、家庭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情报和信息手段现代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三大标志外，还有人工合成材料的发展、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遗传工程的诞生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二战后，六大纶即锦纶（聚酰胺纤维）、涤纶（聚酯纤维）、晴纶（聚丙烯晴纤维）、丙纶（聚丙烯纤维）、维纶（聚乙烯纤维）、氯纶（聚氯乙烯纤维）占合成纤维的 99%，而前三纶占 90%；产量从 1950 年 7 万吨增加到 1980 年的 1048 万吨。1952 年，美籍德人德尔布吕克领导的加州理工学院一个小组实验证实 DNA 是遗传信息的真正载体。1953 年 5 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标志分子生物学的真正形成。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推动了遗传工程的兴起。1948 年出版申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同年出版维纳等的《控制论》以及 1968 年出版贝塔朗费的《普通系统论的基础，发展和应用》和 1972 年出版的《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则分别标志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

二、7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

首先，信息技术已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它突出反映在电子技术、微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器的结合，以及广泛推行工业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遥感等接受技术、光纤等通讯传递技术。电子计算机则巨型、微型、网型、智能型同步迅速发展。

其次，生物工程的新突破。它突出表现为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遗传工程）、酶学工程和发酵工程（微生物工程）的发展。70 年代以来在加州出现了“生物谷”。80 年代在英、法、日等国出现了遗传工程公司。生物工程广泛应用于医疗诊断、制药工业、食品加工、化学工业、能源、农业、采矿、冶金、石油、环保等领域，并正蕴酿着新的技术突破。

第三，新型材料工业技术的兴起。它包括：传递、记录或存储的信息材料；新高温结构陶瓷、非晶态材料和超导材料的新能源材料，特别是超导材料 80 年代中期以来有突破性进展；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和新型合金材料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结构材料和新功能材料，如高效能的陶瓷材料，有机氟材料，高功能的黏合剂等。

第四，海洋工程的崛起。70 年代以来出现了以海底石油、天然气开采为主的海洋开发的新阶段。1980 年世界海洋开发年产值 1100 亿美元，海上产油占世界石油产量的 22%。海洋生物开发还包括捕捞技术现代化、海洋农牧

化及海洋植物的综合利用。近年来，利用波浪、海流、潮汐、水温度及盐度的海洋能源开发工程正在兴起。

第二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和兴起的原因

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

当代新技术革命具有不同于先前科技革命的明显特征。首先，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具有加速趋势。这是因为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继承性；生产的能力在加速发展；科学实验的手段越来越进步；科研探索的领域也不断开阔。目前人们认识的化合物有 400 多万种，而 1950 年只有 100 万种。科研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大大缩短，专门知识的服务周期也在缩短。

其次，科学和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具有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趋势。科学技术转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目前的世界强国、经济强国也是科技强国。现代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技的发展，科技先行、科技先导已经成为战后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第三，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分工愈来愈细，研究愈来愈深入，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当代许多新兴学科的出现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第四，科学技术对世界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具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

二、新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原因

当代新科学技术发展有着深厚的一般社会原因。这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经济大国的实力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手段，军备竞赛的加剧和追逐垄断利润的刺激，国际经济竞争的空前激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重视科技的组织管理，即有人概括为四 M 系统工程（人才、机器、材料和资金，每个英文字首均为 M）。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强化对科技的干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协调基础科研和应用科学研究，建立专门机构领导或指导科研的规划、研制和开发，特别是通过并实施了推动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其中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有以下一些：

第一，组织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世界发达国家政府是科研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科研经费的提供者。科研经费的分配关系到科研发展的主攻方向。美国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成功，1957 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领先于美国，以及苏联在电子计算机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法国发展科技的一度受挫，都说明了科研经费分配对发展科技的重要性。战前美国政府的拨款只占全部科研经费的 20%，战后增加到 50—60%。1945—1971 年间，美国政府的科研拨款主要用于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家宇航局三个部门，其它部门只占总数的 7.4%到 15%。1958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向总统提交了题为《基础研究——国家的资源》调查报告，把基础研究看作国家的资源。报告说：“一个依靠国外输入新基础知识的国家，它的工业发展步伐将会缓慢下来，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也会衰退。”

第二，发展科研组织的多轨制度。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的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基金会的研究机构多轨协调，有利于几方面积极

性的调动和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也有利于科研和生产的相互促进。发达国家还十分注意通过合同制来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美国，合同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临时性措施并限于军事目的，战后成为固定措施，50年代起又由军事工业推广到民用工业。它向承包单位提供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稳定的市场，它实行分层负责赏罚分明的制度，有利于庞大研制计划的完成。

第三，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奖金制和引导及保障科研的基金制度。西方普遍推行的专利制坚持新颖、技术水平和实用性原则，推动科技的发展和普及，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研制。诺贝尔奖金制迄今仍是自然科学成就的重要象征和科学家的崇高荣誉。各类基金制度则对于引导科研方向和保障研制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全方位教育制度和突出智力开发的人才选用和引进制度。美、日、德、苏等国的教育兴国政策对科技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重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强化人力资本是发达国家立足21世纪的关键问题。战后近半个世纪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人才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趋势，这与发达国家的重视人才的全球引进是分不开的。改革全民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广泛引进专门人才、公开选拔人才、健全学位制度等都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第五，加速折旧和税收优惠制度是利用税收手段保障科技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六，保障科技发展和知识产权的科技立法制也逐步引起各国的注意。

特别要提到的是，80年代以来各国都把发展高科技放在立国之本的战略地位。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发表了关于国防开支和防务技术的演说，提出制订战略防御计划的设想。1985年1月3日，白宫公布了总统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项以高科技为中心带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防全面发展并凭借技术优势来谋求战略和政治目标的计划，集多种学科交叉之大成，几乎囊括当代所有高科技和前沿学科。它在战略上要以制宇权来夺取霸权；在政治上以退为进迫使苏联在其它领域作出让步；在经济上实现一石三鸟，振兴美国，夺回主导权，拖垮苏联，拉大差距并制服西欧及日本；在军事上以确保生存战略取代相互摧毁战略并发展新一代的主战兵器。美国计划在30年间，投资1—2万亿美元，虽然它一开始就遭到来自国内外的强力反对，但是里根、布什政府坚持不放，在实践上这一计划已初见成效。由于苏联解体，美国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困扰，1993年春，克林顿总统宣布放弃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7月，西欧国家在法国的倡议下组织了尤里卡计划即欧洲技术复兴大纲。该计划涉及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技术、材料技术、加工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环境保护以及交通技术等领域。这一计划适应了西欧各国开发新技术，振兴欧洲竞争能力，迎接新世纪挑战的需要，反映了要求联合的强烈愿望，符合西欧政治经济实际，有利于西欧经济和军事防务的发展。

在日本，1986年底通产相公布了《人类新领域研究计划》即第五代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计划，为期15—20年，耗资约1万亿日元。它涉及开发显微操作技术、生物细胞培养计划、蛋白质主体结构研究、生物体运动机能计测技术研究、生物体无损伤计测技术研究、生物体系统动态结构研究等高新技术研究领域。

在苏联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宇宙开发计划也引人注目，苏联已拥有世界先进的实用卫星拦截技术。一般说来，苏联在军事技术、宇宙开发、核聚变和激光研究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则落后于西方。

近年来，我国开始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并在个别项目中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三、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论的兴起

随着新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发表了各自的见解，从而兴起了以宣扬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和科学中心论为代表的科技发展论。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 1973 年美国丹尼尔·贝尔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统治人物是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取得方式是专业技术和教育。1980 年美国阿尔温·托夫勒出版的《第三次浪潮》认为和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同，第三次浪潮是依靠全新技术、全新材料兴起的新文明，是多样化、个体化、小型化，是信息革命。1990 年他又出版了《权力的转移》，认为人们正处于一个权力转移的时代，世界将形成一个“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知识的作用日益重要，最快速者得生存。1982 年美国约翰·奈斯比特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新技术革命带给人类的深刻影响。1983 年美国汤姆·斯托尼出版了《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及同年美国约翰·霍肯出版了《下一个经济》，强调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经济将居于核心地位，智能将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结构将发生根本变化。1980 年法国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的《世界面临挑战》出版，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前景是信息社会，向信息化转变是“刻不容缓的”。1982 年罗马俱乐部出版论文集《微电子学与社会》，认为微电子学通过微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并冲击着生活的许多方面：劳动、家庭、政治、科学、战争和和平。1977 年美国赫尔曼·卡恩出版了《今后 200 年——美国和世界蓝图》，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是将人类社会导向灾难，而是导向繁荣和富裕。

科技发展论唤起了人们注意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等高技术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指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了新技术革命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揭示了在当今相互依存和竞争共处的世界中“全球观念”的意义。但是，它们的共同弊端是过分强调科技和科学家、工程师的作用，否定了阶级和所有制的作用。

第三节 新科技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当代新科技革命就其深度和广度及其对全世界的极其深刻影响而言，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首先，它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现代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主要不是依靠提高劳动强度，而是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和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的改进。例如，美国利用卫星拍摄的照片来估产小麦，使美国每年得益 2 亿美元，美国 1977 年估计苏联小麦的产量同苏联官方公布数字的误差只有 1%，而时间提前了半年。英国 24 万平方公里面积，过去普查要动用 6000 人工作 6 年，1976 年，利用地球卫星只用了 4 人工作 9 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过去绘制地图一次要费时 1 年，现在只需 10 分钟就告完成。1983 年西方国家先后走出滞胀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新科技的发展。1977—1984 年间，美国的高技术工业年平均增长 14%，比 1950—1977 年间高出 1 倍。高技术工业的比重由 1977 年的 6.1% 增加到 1984 年 12.9%。1976 年，美国化学工业的营业额中有 50% 是 1966 年前不存在的新产品，仅在宇宙空间研究过程中研制的新产品有 12000 种也是 1966 年前所没有的。1983 年 2 月里根宣布“在今后数年里，高级技术将使我们的工业发生巨变，并使我们的经济复兴”。以超导技术的应用为例，不久在电子通讯、航天、医疗等领域会出现廉价的超导输电线、超导储电装置、高效率的超导磁流体发电机和超导电动机、超导磁悬浮列车等。超导输电的实现，将使美国一年可节省价值 100 亿美元的电力。1987 年 4 月，里根总统在珀杜大学发表演说强调美国政府要把“重点放在能直接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科学领域，有助于确保下一个世纪美国在科技领域据领先地位，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同年 7 月，他在超导商业应用会议上说：“超导体的突破是把我们带到新纪元的开始”。

其次，它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并酝酿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战后由于一系列新技术工业的兴起，使发达国家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为之一新。表现为：（1）三大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化。在发达国家中，第三、第四产业兴起，而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据 1977 年材料，美、日、英、法的第一产业占 2—3%，第二产业占 30—38%，第三产业占 68—60%。

（2）信息产业及其它新兴产业的兴起。1973 年以来，美国的“朝阳工业”每年以 20% 的速度递增，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产业、海洋开发方兴未艾。由于微型计算机体积小，价格便宜，重量只有几十克，可以放在火柴盒内，运速一般每秒 10 万次，比 30 吨重的电子管计算机还快 20 倍，价格只有几十美元一个，这就使工业生产过程的全盘自动化成为可能。由于计算机可以进行逻辑判断、信息存储、数据处理、高速运算，结果十分精确。生物学领域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就是由于采用电子计算机对晶体结构进行大量计算的结果。一些尖端课题如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航天飞机、卫星等都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机器，桥梁，汽车等设计可以运用电子计算机取得最佳方案。新技术革命使能源消费结构、就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资本和商品流向发生相应变化。

（3）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各阶层的巨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从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三部分组成变为包括控制机四部分。与此同

时，出现了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并存的趋势。1987年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召开了浪潮 2000 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集中探讨了新科技革命导致的世界性影响。日本前文部大臣永进道雄认为：“计算机和通讯所带来的变化将超过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弗里曼认为，目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如何适应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和制度上的问题，它包括：教育与培训制度，管理与公司结构，流行的管理模式，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公共、私人和混合投资形式等”。由于科技的发展，大大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4) 推动部门经济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它加速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趋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当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使一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充分适应和利用世界经济的变化。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大提高，从 60 年代起美欧日等国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也出现了现代化和贫困化共生现象，推动福利保障社会化的发展。

第四，它推动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由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一体化和集团化趋势；导致了经济大国地位的调整和不平衡发展的加剧；并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国际化趋势表现为各国经济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加强。一体化在当前集中表现为地区集团化趋势的强化，如以欧共体为中心的欧洲，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集团，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经济圈。在当今世界，爆发世界军事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科技竞争却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竞争本质上归结于科技竞争，科技地位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科技立国，科技兴国，科技强国日益成为许多国家的国策。科技水平成为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加剧发达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因素。西方主要七国 1987 年的经济实力占全世界的 60%，而人口只占 12%。195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差 23 倍，1980 年扩大为 40 倍，1985 年又扩大为 44 倍，1990 年更扩大到 56 倍。人们已不怀疑，新技术革命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对于美、日、西欧来说，这是争当第一流强国还是沦为二、三流国家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避免科技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在经济上免遭处于更不利地位的问题。

第五，它促进了武器的急剧变革和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常规武器而且战术和战略核武器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军事战略也相应发生决定性调整。一般说来，在本世纪初做出重大应战决策要几个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要几天，现在往往只需几个小时。80 年代以来，美苏核战略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是和军事科技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

第六，它也推动文化艺术和教育现代化的急剧变化。由于文化艺术引入现代化手段，使得文化艺术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传统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教育手段从掌握知识为主发展到以培养学习能力和发展新知识能力为主。由于学科界限渐趋消失，要求专业设置与综合性发展相适应。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高度结合，要求大学与产业部门密切结合。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兴起，要求优先加快教育

改革的步伐，加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以适应结构性调整，提高劳动力和民族素质的要求。

最后，它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泉，新技术革命既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它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情况、新形势下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发展，如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生产力理论、国民经济结构理论、失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理论、现时代特征理论等。

第二章 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

第一节 全球性的发展与改革趋势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潮流。当代世界的大发展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发展表现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当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它的发展趋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它突出反应在通过改革调整、科技革命，来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全球性改革浪潮

从战后初期至今近半个世纪这一潮流持续不断。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欧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浪潮中十分活跃。在美国有1945—1953年的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1953—1961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现代共和党主义”，1961—1963年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和1963—1969年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的社会改革”。在日本有1945—1955年的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和1956—1973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强化政府干预，实行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经济体制的政策。在西欧表现为：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政策是70年代以前英国实行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1946—1948年艾德礼工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60年代后期，威尔逊工党政府的又一次推动国有化浪潮。英国还以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自诩，40年代末实行了一系列福利国家措施。60年代福利国家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在法国实行了经济计划化措施和国有化政策，从1947—1970先后实施了五个计划，采取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计划的市场调节经济，以图消除自由放任下市场机制的弊端和高度集中下国家控制经济的缺陷，推行传统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间的有限计划的协商经济模式。在联邦德国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初期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60年代以来又向强化干预凯恩斯主义式的方向发展。

50—6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政策进行了改革性探索。30年代开始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以行政管理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主导模式对战争年代和战后苏联初期的经济重振，和对新兴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形成僵化模式，妨碍了和平和经济大发展时期的改革和发展。1953—1964年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调整，在冲击旧有模式方面的勇气上具有开创性，但基本上是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偏差，在维持原有结构基础上的局部改革。1965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实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以行政管理经济为主的，有限利用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它既对斯大林时期的经济模式有所修正，又是在苏联走上霸权扩张条件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持续低速发展。在东欧有1948—1949年南斯拉夫反对共产国际情报局错误决定的斗争和1950—1970年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改革，匈牙利1957—1964年的局部调整政策和1965年以后的以工业

为主的全面经济改革，以及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等。

60—70 年代，东亚“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崛起是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政策和推动经济起飞举措分不开的。海湾地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石油致富国的兴起和拉美地区的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都和推行开放改革政策有密切关系。

70 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滞胀和 1979—1982 年、1990—1993 年经济危机的困扰，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改革。在美国有 1969—1974 年尼克松政府的新联邦主义政策，1977—1981 年卡特政府的反滞胀经济政策，1981—1989 年里根政府的振兴经济政策，1989—1993 年布什政府的稳定发展经济政策和 1993 年上台以新政继承人自居的克林顿改革。与 70 年代以前相比，70—90 年代初的经济改革面对经济滞胀要着力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难题；出现大社会，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模式态势；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强调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功能；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兼顾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并转向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又兼顾后凯恩斯主义。70 年代以来在英国出现了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的经济改革，实行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税收，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推行企业民营化，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控制社会保障制度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在英法出现了企业民有化趋势，这反映了在所有制领域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的相互关系调整；反映了在政治领域内保守主义的抬头；反映了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的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兴起；也反映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和迄今私有制形式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影响。7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强化了主导型管理体制的混合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主兼顾内需的贸易、金融立国政策。

在中国，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基本路线，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特别是 1992 年初邓小平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重要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出现了世界少有的迅速发展势头，开始了经济腾飞。

在苏联则发生了历史性的曲折变化。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当政和契尔年科的短期掌权，并未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而且面临难以解决的四大矛盾，即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实践上在与资本主义竞争共处中的劣势扩大、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实践上的社会霸权扩张主义的推行、理论上的民族团结与自治和实践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及严重的民族问题以及理论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苏共领导和实践上的苏共领导层特权腐化严重丧失先锋性。1985—1987 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大幅度的改革设想，强调苏联已建成的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根本改革；提出加快发展战略，要由粗放式经营转到集约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技杠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论；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实践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强调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相配合。1987 年苏共中央 6 月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的总体方案，其后又有几个立法和十多个配套措施。1988 年 6—7 月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

联改革发生急剧变化：在经济改革受阻情况下，要求先行政治改革，取消党的领导地位，仿效西方多党制，推行总统制。在苏共党内政治力量决战中，1991年8·19事件、1991年底苏联解体和苏共被解散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失败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挫折。

在70—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出现徘徊和曲折。波兰的工潮和社会动荡推动1982—1986间波兰的社会经济改革；匈牙利继续进行改革探索，捷、德、保、罗、南、阿在改革中徘徊。由于东欧国家未能通过改革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把经济搞上去，加上长期以来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西方世界和平攻势的加强和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大幅度改变，终于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

在越南、朝鲜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出现政策调整的趋势；在亚非一些新兴国家实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践纷纷受挫，但社会主义思潮在新兴独立国家中的影响仍很强大。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改革出现了发展和扩大的好势头。

二、当代世界发展改革潮流的特点

首先，是多元化、民族化和开放性的趋势。

这突出表现在，西方国家已从单纯应付危机型改革发展发展到结构性调整型改革。

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已不只是为防止生产过剩危机或滞胀危机，而且是为保持繁荣和稳定，解决丰裕社会中的相对贫困和富民强国问题要不断调整和改革。西方国家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功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借鉴东、南、西、北的经验为了中国化。世界银行发表的1990、1991、1992、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分别专题报告了世界发展、贫困、环境、建康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对方发达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借鉴。

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苏联模式框架下局部调整的苏化型改革到东欧国家注意开始结合本国国情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从西化、苏化型到开始探索符合本国特色型的改革道路。既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也不按苏联模式行事，从而从出现民族化发展趋势。在西方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西欧，它的强化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经济管理体制，以世界经济为动力，推行灵活外向型兼顾内需的贸易、金融立国、兴国政策、它的西方民主政治与日本特色的兼容、欧美文化与东方文明的结合、弘扬日本文化、吸收新儒学和西方文明等均富有日本特色。美国以引导世界新潮流自居，但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具有美国特殊性，即使英国也不能照搬。

从封闭性的经济，或两个平行市场经济到对外开放转型与世界市场接轨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的一大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脱贫道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发展外向型，全方位开放，把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普遍重视国家和市场在改革发展中的互补功能。

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发展中是概莫能外的。从战后前 25 年到 70 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改革显示由国家强化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到控制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则从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国家适当干预模式。当代发展中国家重视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发展模式，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前言中写道：“当政府能对市场功能起到补充作用时，最有可能成功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而当国家和市场作用相冲突时，经济发展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由单一的经济改革逐步发展为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

战后初期，各国的发展改革以单一模式偏多，70 年代以来逐步向兼顾政治和社会改革方向协调发展。在苏联出现过早先时期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模式，又有政治改革领先的模式，但都没有处理好相互关系未获成功。在波兰、捷克、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受到苏联控制的干扰，从而严重影响协调发展。东亚一些国家的改革，强调政局稳定的前提，在稳妥和逐步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时，着力进行发展经济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而像伊朗巴列维国王那样不顾本国国情，全盘西方的政治民主化政策却导致了失败。在中国既有文革那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带来了全国性大动乱和大倒退、大破坏的惨痛教训，也有近年来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协调发展，从而出现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大好形势。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展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表明，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政局稳定优先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在发展和改革中协调公正和效率相互关系和协调富裕和贫困共生现象。

如何协调公正和效率、富裕与贫困是当代世界各国发展中普遍遇到的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程度不等的福利国家政策。以英国为例，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是一百多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持阶级斗争所取得的一种权利，也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其他受雇人员间的一种妥协，又是资产阶级政府以社会保障形式实行的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和政局稳定的收入再分配。美国则在步入丰裕社会时推出了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政策。70 年代以来，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布什政府都注意更好地协调两者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十分注意克服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端，强调提高效率，近年来更明确提出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平等。这对于避免出现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十分重要。1990 年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减轻贫困。尽管社会制度和问题性质及严重程度不同，然而，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富裕与贫困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关注的重大课题。

最后，发展与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和决策者能否及时捕捉有利机遇相关。

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二战后急剧变化的形势，在发展战略上及时调整，采取了重要的改革调整措施，而社会主义国家战后一段时期深受苏联僵化模式

的影响，不仅改革停滞不前，而且对突破苏联传统模式的举措横加指责，阻碍改革的进程，从而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共处中处于不利地位。战后日本的崛起，充分利用了美国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战对日本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联邦德国的崛起也利用了美苏冷战时期的有利时机发展自己。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则利用了当时中国内乱和封闭占领中国的传统市场。布什竞选的失利和克林顿竞选的成功则在能否抓住发展经济这个选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比 1992 年初邓小平关于抓紧难得的有利国际形势，扩大改革开放步伐讲话前后的中国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力地表明了领导者的决策对于发展与改革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节 经济现代化和全球性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当代世界的生态环境恶化，人们日益关注如何协调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大气质量恶化和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趋势的发展。其二，严重的水污染和水质资源匮乏，这将成为世纪之交人类社会面临的头号环境问题。其三，森林、草原等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加剧，耕地面积锐减。其四，世界野生动物和稀有资源的急剧减少。其五，城镇地区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环境质量恶化。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片面认识及其对自然界过量索取；经济现代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以至牺牲生态环境现代化的目标，忽视宏观控制和全球协调，先污染后治理，环境国策被置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各国以邻为壑甚至于转嫁污染；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发达国家对全球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

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在发达国家开始兴起了环境保护浪潮和新保护主义运动。美国和日本是突出代表。1969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大法，强调：“恢复和保持环境质量对于人类的普遍幸福和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这前后，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水资源、大气、固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立法或行政命令。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四大公害”，导致1967—1974年间经三次修订的《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的颁布。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80年代以来这股环境保护浪潮推向全球，兴起了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1971年成立的以“拯救地球”为己任的绿色和平组织，到80年代已拥有250万以上成员。美欧日的绿党在大选中已显示实力。进入90年代，环境保护更成为各大国内外政策的重要课题之一。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11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和政府代表出席，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三个文件，以及《气候变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两个条约。中国政府的环保主张引起各国的浓厚兴趣。中国主张：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应该实行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国际合作要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保护环境和发展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处理环境问题应当兼顾各国现实的实际利益和世界的长远利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理论，除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外，还有通过经济“零度增长”或“有机增长”来控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以及从长远看，经济增长不受环境问题困扰的乐观见解。

二、经济增长与世界人口问题

当代世界的人口问题，尤其是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另一个严重问题。1930年世界人口为20亿，1950年达25.13亿，1960年达30.27亿，1976年人口突破40亿，1987年7月1日人口达50亿，1990

年为 53.98 亿。预计 2000 年将突破 62 亿人。本世纪上半叶，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0.8%，而 1950—1980 年的 30 年间年平均增长率达 1.9%，其中 60 年代高达 2.09%。在发展中国家，1950—1980 年间人口净增了 99.8%，其中，拉丁美洲国家地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2.65%，非洲地区为 2.6%。当代世界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激增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由于粮食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受制约，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马尔萨斯新困境”，经济成长的成果被人口增长所吞没。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反常的落后现象”，即尽管工业发展较快，但仍然扩大了人均产值的差距，尽管就业人数增加，但仍然出现失业人数增多现象，尽管都市化迅速发展，乡村人口密度仍然增大，尽管识字人口增加，但不识字的绝对人数仍然越来越多，从而加剧贫困现象。世界人口的激增也会加剧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对人口素质及人类健康造成影响。

除世界人口激增外，还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四大问题：

第一，世界人口的迁移呈现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1992 年世界发展报告显示，1965 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占 36%，1990 年则增加到 50%，其中发达国家由 72%增加到 77%，低收入国家由 18%增加到 38%，中等收入国家由 42%增加到 60%。80 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人口向乡村倒流的趋势，这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饱和带来了住房拥挤、地价昂贵、环境恶化等严重负担，又由于科技发展、交通和通讯现代化、城乡差距相对缩小。所有这些对国民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二，当代世界国际人口流向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趋势有增无减，出现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迄今移民总数已近 2000 万人，其中 2/3 来自非洲和东欧。导致当代世界新移民潮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日趋完善，“世界变小”；国际经济和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出入控制的放松，生活习惯相对缩小；主观上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促使部分居民的劳动力国际转移；战乱和政治动乱形成大批政治难民和流民。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流向发达国家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对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社会政治和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在人口结构上出现发达国家老龄化和发展中国家年轻化趋势。老龄化加剧问题是发达国家在二战以来的普遍趋势，60 和 60 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0 年英国占 16%，法国占 16.7%，美国占 12.2%，挪威占 13.8%；1990 年 65 岁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英国 15.1%，法国 13.7%，美国 12.3%，挪威 16.65%。整个发达国家为 12.9%，而低收入国家只有 4.5%。老龄化的发展带来了赡养老人费用的增加和劳动适龄部分人口物质负担的加重；人口流动性的相对削弱和劳动效率的相对降低，结构性变化的适应性下降；还带来了储蓄能力的下降，消费结构的相对稳定和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减少。所有这些，同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化趋势突出表现在 1992 年全世界 0—14 岁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32.3%，其中该段人口发达国家只占该类国家的 19.9%，而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却占 42.5%（中国和印度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 46.4%，中东和北非占 43.3%。这种情况既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就业安排、教育等问题的巨大压力，也为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活力。

第四，在人口素质问题上的极端不平衡。人口素质涉及作为人口素质核心的文化素质、作为物质基础的身体素质和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素质。文化

素质涉及成人的识字率（即文盲和半文盲），1990年发达国家为4%，而除中国和印度外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高达40%，萨哈拉以南非洲为50%，南亚占53%，中东和北非占47%。在高校入学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人口比例，发达国家由1965年的21%增加到1989年的42%；而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只由1%增加到4%，撒哈拉以南国家由1%以下增加到2%。身体素质涉及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口死亡率以及平均身高、体重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也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上述情况表明，人口素质高低和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大体相适应的，它又对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解决棘手的人口问题，有关方面于1954、1965和1974年举行了三次世界人口会议，1984年又在墨西哥举行国际人口会议探讨人口对策。当代世界各国的人口政策大体上有两种：即鼓励人口增殖政策和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据联合国1978年统计，世界上倾向于鼓励人口增殖政策的有36国，人口5亿，占世界人口的13%。多数国家实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大多是在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公开申明人口增长过多过快，要加以控制；还有一些国家由不明确到明确宣布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主张控制人口政策的国家已超越了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界限。据70年末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统计，在123个国家中已有77个国家制订了计划生育的正式计划，另有52个国家向人民提供避孕服务。无论鼓励还是控制人口政策，都涉及到：要用立法程序来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和其他有关婚姻法和家庭的条例；许可或禁止堕胎以及自由出售避孕药品；实行对无子女或多子女者的税收和奖惩政策；在社会福利、住房待遇、医疗保健等方面给予优惠或限制；利用大众媒介进行宣传。

三、经济增长与全球性资源问题

广义的世界资源包括人口、粮食、自然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含矿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等。生态环境和人口问题已经论及的不再涉及，这里重点论述自然资源、粮食和海洋资源。当代世界的资源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全球性资源危机加剧。无论是能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还是生物资源都趋紧张并多次危机告急。特别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1980年开始的两伊战争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波。

第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源的掠夺。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原料生产国，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占3/4以上。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市场，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原料价格，扩大剪刀差，掠夺发展中国家。1960—1972年间由于这种不等价交换，发展中国家蒙受的损失，估计在1000亿美元左右。

第三，发达国家迄今控制或垄断全球性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扩大。在矿物资源中，石油占中心地位。它占世界出口的1/3和商品吨位的1/2以上。其中亚、非、拉丁美洲地区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80%，产量占60%，而销量只有20%。相反，发达国家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9%，产量占21%，销量高达67%。在主要原料生产和销量方面，很大程度上仍为发达国家控制和垄断。西欧、日本、美国的矿物产量不到1/4，而销量却高达3/5以上。在粮食问题上，1960—198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3%，人均粮食由285公斤增

加到 322 公斤，一方面发达国家“粮食过剩”，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1981 年发展中国家人均产量 200 公斤，发达国家为 700 公斤，美国 1400 公斤。

第四，西方发达国家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了维护资源主权的斗争。1964 年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以来，联合开展了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特别是 1973 年围绕石油资源的联合反霸斗争，结束了帝国主义掠夺廉价石油的时代，沉重打击了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的霸权地位，打破了超级大国和西方列强长期以来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加强了产油国的经济实力，出现了石油致富国，扩大了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 70 年代经济形势。它还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主权、海洋资源和维护原料生产国资源合法权益的斗争。为了反对国际垄断资本操纵国际市场，协调出口贸易政策，争取和维护原料出口的合理价格，70 年代以来，一大批全球性和地区性专业性组织，纷纷涌现。

第五，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解决全球性资源危机的必由之路。本书另有专节对此加以论述。

第三章 当代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

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护、打破和重建都是由一定的国际力量进行的。而由国际力量的配置所形成的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并决定国际秩序的性质。国际秩序的更迭是由国际力量的消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直接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动而造成的。因此，在考察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时，不能不考察国际社会的力量构成。又因经济实力是“力量”的第一要素，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归根到底是由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所决定，而有什么样的经济格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格局。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考察时把眼光首先移向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与经济秩序的确立上来。

第一节 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确立

二战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由于二战的结果和美国执当时兴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之牛耳，美国不仅最先掌握和垄断了核技术，在电子计算机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整个实力地位空前增强。当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 53.4%（1948）、出口贸易的 32.4%（1947）和黄金储备的 74.5%（1948）以及世界谷物收获量的 1/3。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西方一些历史学家说，占世界土地和人口约 7% 的美国，比世界其余的地方加在一起还要富有，恐非言过其实。正是当时美国在世界科技经济领域所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促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作为第一步，它试图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还在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就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办法，打算从金融、投资和贸易三方面进行对外扩张。它从美国拥有大量黄金储备并处于大债权国的地位出发，主张建立一个权力很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在其中充当起主导作用的世界经济霸主。1944 年 7 月，有美英苏中等 44 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就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的。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文件与 1947 年 10 月于日内瓦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标志着以多边协定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 35 美元等于 1 盎司黄金，把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使美元享有高于其他货币的特殊地位，从而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美国利用其在上述机构中的优越地位，操纵了国际金融，建立了在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美国有恃无恐地在战后初期积极推行称霸全球的战略。由于美国把苏联看作是它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的最大障碍，其攻击的矛头始终不忘对准苏联，与此同时，加强对西欧的控制，扶植世界各地反动势力，与各国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作斗争。1947 年宣布的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 1949 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最重要的“三步曲”，也是开展对苏“冷战”的实际步骤，从而拼凑起一个帝国主义侵略阵营。加上 1949 年“第四点计划”的推行，支持中国蒋介石反动政权发动内战、扩大侵朝战争以及环绕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庞大的多边和双边军事联盟等等，都表明美国正千方百计地将其建立“美国治下的世

界和平”的梦想变为现实。

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行存在的还有一个新生的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尽管苏联在二战期间在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中遭受最为严重的损失，但却一跃而为欧洲最强的国家。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1949年8月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国范围而在东欧和亚洲一系列国家建立，使得苏联认为有可能以社会主义联合的力量来对抗美国的经济政治霸权。

早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苏联为了反对美国的控制而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机构。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苏联于1949年1月策划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加强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合作。同时也试图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在此前后苏联于1947年9月建立了具有国际政治组织性质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55年5月与除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各国签订了军事性的华沙条约。当时，斯大林还从理论上提出了两大对立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个平行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的问题。这个理论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既有其历史意义，又有其历史局限性。

由此，战后初期形成了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两种彼此对立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两大阵营和以美苏两极冷战格局为特征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

第二节 战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演变

战后确立的上述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就美国方面而言，它为了追求与维护其对全球的统治，不惜拼凑侵略集团，扶植反动势力，发动侵略战争，这不仅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而且消耗掉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使其国际地位最终自 60 年代后期起无可挽回的处于相对衰落之中。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电子计算机、核能、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掌握和运用，从而打破了美苏两家的垄断地位。日本、西德等西欧国家依靠先进技术，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却长期深陷越南战争而不能自拔，其国力的鼎盛时期到 60 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所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美国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到 1970 年降为 37.8%，比 1948 年时下降了 15.6 个百分点。此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则由 1950 年相当于美国的 30% 上升为 1970 年的 60% 左右，而且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明显地追了上来。上述情形，迫使美国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承认国际格局已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的地位与二战结束后初期相比，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或完全占支配的地位。1971 年美国出现了自 1893 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1971 年 5 月又发生美元的第三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于 1971 年 12 月与 1973 年 2 月，被迫两次宣布美元贬值。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浮动汇率，不再承担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终于瓦解。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急剧衰落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逐渐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这一切都表明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正逐步走向瓦解。

及至 80 年代，尽管美国里根政府提出“重振国威”和“复兴经济”两大目标，仍无力从根本上扭转相对衰落的趋势。在决定美国国际权力中心盛衰的三项关键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和市场控制能力上，都发生了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变化。1985 年，美国从 1914 年以来首次沦为净债务国，1986 年技术产品贸易也第一次出现逆差。虽然美国一些文人墨客正起劲“批驳”相对衰落的论点，但是他们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

就苏联方面而言，高度集权的封闭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苏、东国家自 50、60 年代起曾掀起改革浪潮，但它们始终未能正确解决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品化问题，未能唤起企业的活力与生气。到 70 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从一开始苏、东经济关系就没有真正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办事，而是搞不平等交易，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利益。苏联这种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其进一步恶性发展则是步美国之后尘，在全世界推行霸权主义，乃至到 70 年代末向阿富汗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陷进了如美国曾在越南深陷的那种战争泥潭。由于片面发展军工生产而牺牲民用产业，又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社会矛盾，预伏下导致苏联解体的种种因素。

从 80 年代中期起，苏联国力进一步急剧下降，内外政策根本转向，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一批人积极推行“西化”政策，把苏联面

尼克松在 1971 年 7 月 6 日在美国堪萨斯城的讲话。

临的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一古脑推到苏联的过去和社会主义制度头上，以致走到基本上否定苏联 70 年历史，并决定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内外路线的地步。它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强制东欧各国这样做，这正好与西方积极推进的“和平演变”政策相合拍。正是由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从外部施加压力与进行破坏的合力，导致了 1989 年东欧各国的剧变和 1991 年底苏联的解体。使得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歧路。

在战后初期形成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时，苏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当时只有它能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力量。现在苏联解体，两极中一极已不复存在，终于导致战后存在了 40 多年的两极格局和旧的国际秩序的最终崩溃。

在促使战后两极格局解体的因素中，我们不可忽视第三世界的力量。在东西方长期处于“冷战”状态时期，第三世界逐步崛起而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包括中国在内的 100 多个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战后摧毁了旧的殖民体系，而且早在 50 年代就对两极格局和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发起了冲击。50 年代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原则。60 年代以后，第三世界国家更通过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组织，开展了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尽管第三世界未能根本改变两极格局和旧的国际秩序，但却给予了旧秩序以严重打击。

从战后国际格局和秩序的建立到崩溃的过程，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削弱特别是苏联的衰落、解体是造成战后两极格局和秩序解体的直接原因。这种削弱或衰落又直接根源于两国的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任何试图依靠霸权而确立自己在世界秩序中地位的做法，不仅是此路不通，而且最终将给霸权主义者本身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所谓国际“力量”的消长，已从过去被许多人普遍接受的军事、政治力量而转为经济力量、物质力量。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依靠军事力量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60 年代以来世界由两极逐渐向多极转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点。

第三，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对旧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瓦解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世界就单个国家来说其实力是相对弱小的，但是它们的团结斗争却成了美苏两霸推行旧的国际秩序的严重障碍。

亨利·基辛格在匈牙利访问时对《人民自由报》记者的谈话，见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3 年 3 月 8 日报道。

第三节 围绕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斗争

基于对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邓小平从1988年9月开始多次向外国政治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由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与国际格局的变动密不可分，因之，在考察如何建立新国际秩序时，需要了解这次国际格局变动与本世纪前两次格局变动的不同之点。首先，它是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国际格局的形成不像“凡尔赛体系”和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那样短暂和干净利落，而要经过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要通过各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才能逐步实现，是一个拖泥带水、曲折反复的过程。其次，形势发展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前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已成定局。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也使新旧格局交替的进度不可能同步。德国为两德统一后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所困扰，整个欧洲为前南斯拉夫的战乱所惊吓，特别是亚太地区，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始终是多元结构。上述因素以及由于新旧格局交替的渐进性，使这一过程中出现类似海湾战争对格局交替进程的干扰和影响，也是大有可能的。近几年来，旧格局的瓦解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一些西方报刊指出当今世界格局的特征“是一种同样残酷而且可能更血腥的混乱。”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尖锐地摆在世界人民面前。在这种情况下，破除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

但是，由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牵动着不同国家不同集团的利益，很自然的也就存在着各种性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主张。

自1990年海湾危机以后，美国朝野人士多次就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发表主张。他们既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削弱或衰落乃是两极格局解体的直接原因忘得一干二净，眼睛只盯着苏联的解体而不去认真正视自身的问题；又把经济实力的消长是决定国际格局演变的基本原因忘了大半，陶醉于在海湾危机中打赢了冷战结束后第一场热战的胜利之中。宣称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世界的领导地位非它莫属。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因此而大声疾呼：“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其急切之心情溢于言表。但是，美国打赢的是一场在特殊时间、特殊地点进行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特殊战争，而且美国开创了打“摊派战争”的先例，即由自己出人打仗，由他国分摊战争费用。由此，美国争当新秩序领导者的表演招来了阵阵奚落和批驳。伊朗副外长马来基称，在美国“实力渐弱”、“世界新的极点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再让它来主宰各国命运已变得不可思议。”英国前首相希思则明确指出美国所说的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只不过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西方其他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各有自己的侧重。日本首相海部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英国一面强调欧美一致，一面强调坚持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主张建立“从大西洋延伸到乌拉尔甚至更远的民主大联盟”。法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而不

见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1993年2月17日文章：《论新的国际混乱》。

路透社华盛顿，1992年2月5日电。

新华社伦敦1991年2月3日电，希思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是由某一个或几个超级大国主宰国际事务”。德国提出“世界和平秩序”主张，强调平等“伙伴关系”，主张推广“欧共体”和“欧安会”模式。他们的主张不能不与美国处于矛盾之中。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共同的地位使它们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有许多相同的要求。

早在 1988 年秋冬，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外国朋友时多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要求就是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根据世界进入新旧交替、动荡不定的过渡时期新形势，中国领导人一再呼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新秩序的核心是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一直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行为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现存居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最深层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的积累方式。其运行机制是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金融体系构成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改造这些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斗争的过程。对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共识。1992 年 9 月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十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保证，工业化国家津津乐道的世界新秩序不会变成一个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支配方式的新变种。”1993 年 4 月上旬，七十七国集团商会在雅温得召开第六届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团结行动，为建立新的公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 3/4，拥有全球原料的 80%，只要采取共同行动定能大有作为。会议最后决定，建立连接亚、非、拉三大洲的信息网，以便让成员国的经济贸易界人士更好地了解世界市场行情，并为鼓励南南交流提供可行性资料。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十七国集团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为成员国发展经济服务。这些都说明第三世界日益自觉地为争取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团结起来。

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建立民主的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而坚决批驳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对别国有“人道主义干预权”的主张和所谓“人权无国界”、“主权过时论”等论调。指出：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主体，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那种“干预有理”、“干预合法”的论点是非常危险的，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歪曲。他们寄希望于“联合国主持下的和平”，而不是“某国治下的和平”，但同时又警惕地防止把联合国变成少数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

总之，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在于努力争取建立一种以普遍和平和共同发展为基本目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法基础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同旧的强权型秩序有本质区别的民主型秩序，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在历史发展现阶段的要求和愿望。

第四章 当代世界三大政治思潮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就意识形态、政治思潮而言，世界呈现多样性的特点，不可能千篇一律。但从当代世界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类不同性质的国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世界确实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思潮：资本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三大政治思潮产生的根源及其特征

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当代三大政治思潮自然地也并非天外来物，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显现各自的特征。

一、当代资本主义思潮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这种被称为“立宪民主”、“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最早萌发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萌芽和成长。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力，一方面通过血与火的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也需要大批自由劳动力。他们的利益和愿望与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行会制度，以及完全否定人的价值的宗教蒙昧主义产生了尖锐冲突。他们已在不同的程度上初步阐述了某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观点。例如，他们在实际上要求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以人为中心，研究人的价值，提高人的地位，并且已经触及到了“人权”问题，他们的政治主张则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制。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经过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19世纪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而在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地区确立起来。

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种区别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形式，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与无产阶级的民主相伴随。不管这种民主在实质上是何等虚伪，但形式上仍不得不允许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确立自己阶级统治的初期，为了寻找和团结同盟者，资产阶级需要挥舞“民主、平等”的旗帜，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姿态出现，取得下层群众的支持。当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也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或多或少地给予群众某些民主权利。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民主在客观上和在一定范围内，也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马、恩就曾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表了无产阶级第一个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组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显然，如果

《资本论 第1卷第2版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2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1卷，第270页。

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没有议会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的虚伪性又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的深刻矛盾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因而在国家制度中始终存在着民主制的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的相互矛盾与冲突。

资产阶级民主离不开下列特征：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并以保障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为其目的。

第二，资产阶级民主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第三，资产阶级民主是口头和表面上的民主。

拿美国来说，选举具有相当的欺骗性。60年代之前，对选举的限制就不下50余种，其中包括居住年限、年龄、财产、纳税情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种族等。当然，资产阶级排斥劳动人民的手段已从明的、公开的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于隐蔽的一套。在这方面，他们玩弄的花样名目繁多、层出不穷。特别是，竞选费用高得惊人。在50年代的美国，一个众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为15万元，一个参议员竟要花50万至100万美元。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费用达4亿美元，1992年的选举则已上升到15亿美元。劳动人民既无大量金钱，又不掌握报纸、电视等宣传工具，自然无法问津。只有那些以垄断财团为靠山、能负担巨额开支的资产阶级政党或大资本家个人有能力参加这种金钱和资本的较量。据统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50%以上的巨额选举费用，都是由500家豪富所提供。由此产生出来的总统和内阁，没有一届不首先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有“富豪内阁”之称。80年代的里根内阁的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商务部长、运输部长、住房和城市部长等等都是大公司董事长、正副总经理一类富翁。

今天，一些美国学者正在认真思考美国民主的本质问题。他们指出：“美国的许多政策并不真正民主，实际上是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协商妥协的结果。美国垄断资本和政府间的联盟非常强大。……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今日之美国青年已感觉到这个联盟的可怕势力。”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空有其名，美国社会实际上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甚至连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作者罗杰·希尔斯曼都说，“当前，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异想天开地否认大企业公司在社会上有着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在政府决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美国有40多万个从事制造业的康采恩，其中规模最大的500个控制着全国3/4的工业资产。”这些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事实上，也多少代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状况。

那么，这种思潮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人本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对反对封建、发展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和生活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个人主义越来越走向自身的反面。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越来越强调的是“不受束缚的自我”和“享乐主义”，这就与工业社会的特有品格即经济与节俭原则发生了矛盾并构成了“西方所有

哈文·沃斯、乔恩·谢泼德：《美国社会问题》（中译本），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13页。

见该书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296页。

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文化危机，这种文化矛盾作为关系到社会存亡的最重大分歧长期存在下去”。今日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不能不和国内面临的毒品泛滥、赌博、色情、同性恋、艾滋病等等“美国病”的折磨有着内在联系。一位美国人士在1990年指出，“美国的确是一点一点地烂下去了。……烂下去，是由于美国道德堕落到令善良人们心惊胆跳，简直无法处身其中的境地。”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1990年说，“今天的美国危机四伏，不可效仿”，美国现在种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个人至上主义推到了极点”。

美国今天的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思潮发展到极端的一个缩影。

当然，目前一些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美英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二是欧洲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三是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并认为资本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已经出现。法国企业家米歇尔·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分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美国式”的和德国、瑞士、荷兰和北欧等国“莱茵河沿岸式”的，日本作为一种变种被列在后一类。他们认为前者是个人主义式的，追求的是眼前利益；后者是属于集团主义的，重视协调，追求长远利益。台湾一份杂志指出“英国与美国因主宰人民思想的个人主义已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思想与行为分歧，影响所至，国力渐弱。……日本则朝野皆强调团体精神，社会形成共识，是最佳范例”等等。

姑不论其提法准确程度如何，一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者、批评家力图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思潮自身之危机。

二、当代民族主义思潮 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战后美国出于其全球霸权主义政策之需要，十分重视对当代民族主义的研究。1960年出版的受美国参议院资助、由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撰写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一书指出，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所固有的成份就是它的群众性”。但美国统治当局又一厢情愿地说，民族主义有利于美国。1950年1月艾森豪威尔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中说，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利益和传统政策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

如果说民族主义以争取国家与民族独立为己任并且具有广泛群众性，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说民族主义与美国利益一致而“与共产主义根本冲突”，则是极大的谬误。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三联书店，1989，第132页。

《美国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人民日报》，1990年12月30日。

新加坡《联合晚报》，1990年8月2日。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1992年2月7日文章：《日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制度上的摩擦》。

台湾《天下杂志》1986年3月1日文章：《哈佛大学研讨会侧记——“美国病”需要东方良药？》

此处主要指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

见该书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8页。

见该书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1页。

转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第17页。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代兴起的世界性思潮，是随着欧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以反对民族压迫为内容的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内容的两种思潮。前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如北美独立战争、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后者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目标，而以反对封建压迫为其思想旗帜。如17、18世纪英、法的革命。虽然民族主义是以建立民族国家并以此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主要目标，但自从世界上出现帝国主义以来，世界已被明确划分为两类民族。列宁在1920年指出，“目前帝国主义阶段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雄厚军事实力的少数压迫民族”。还说，“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

二次大战以来，正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引导广大群众摧垮了殖民主义体系并使亚非拉国家形成世界反帝反霸的主力军——第三世界。有的西方学者惊呼：“自20世纪中期以来，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当代历史上一种普遍的观念力量。”20世纪因之可以称之为“纯粹民族时代”。

二战后出现过许多各具特色的民族主义思潮流派，像亚洲印尼苏加诺的“综合型”民族主义、印度甘地的“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及其继承者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真纳、伊朗霍梅尼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民族主义、非洲以统一的整体性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拉丁美洲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民族主义、民众主义与“新大陆主义”等等，它们的基本特点都是主张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坚持反帝反殖反霸。

尽管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思想旗帜，并且资产阶级是它最深厚的基础，它对共产主义虽也心存某种疑惧，但是它们争取与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压迫、剥削处于最直接尖锐对立地位，这就决定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进步性。

当然，也不可否认当代民族主义两面性的另一面。这表现为具有不同程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扩张主义倾向，对本国工农的压制，以及其中某些派别走向了强调全面恢复传统的原教旨主义等等。这些也成为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政局动荡、某些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当代世界史上存在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中东问题、南部非洲问题、南亚泰米尔人问题、未解决的领土争端等等问题，其起因除了有大国插手之外，民族主义的消极面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产生根源及其特征

这里所指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欧洲许多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其诞生创造了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立并不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恩反对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头脑里想象出来的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看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当生

《社会科学国际辞典》，麦克米伦公司1972年版，“民族主义”条。

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冲突时，就构成了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马、恩强调，要真正建立共产主义，必须高度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恩没有对未来社会作详细的描绘，并认为细节愈详尽，空想的成分就愈多。他们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只概括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例如，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变革，在全社会确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等。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中间不可避免地有曲折和反复，也在相当长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利用私有经济。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还有个同各国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个严肃的问题，来不得半点想当然与感情用事。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去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

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思潮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很大传播。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形成世界体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全世界仅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社会主义在取得胜利的进程中遭到了严重挫折。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某些做法又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没有结合本国实际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实践证明，要把社会主义同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只有在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中国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提出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以高速度向前发展。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明确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把改革推向前进。其结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独特发展模式。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仍将以压倒所有国家的11%的速度发展。“而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前苏联衍生的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中国在致力于由市场来指导其生产的同时，并没有大规模地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1卷，第39页。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301页。

这事实上是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肯定。西德一份报纸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信徒们显然都很不舒服。中国经济极度繁荣偏偏是在一种他们已宣判死刑的政治制度中完成的。但是这种腾飞却给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方针提供充足的证据。这一方针与西方授意的谋士们目前在原苏联制造的混乱形成强烈的对比。”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的实践将最终证明其强大生命力，并会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追求进步、向往公正幸福生活的人们。

见美国纽约《侨报》1993年6月22日文章：《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独特发展模式》。

德国《新德意志报》1993年8月3日文章：《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第373页。

第二节 三大政治思潮的相互关系

一、资本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

从阶级性上看，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思潮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同属资产阶级思潮。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从西方议会民主制等方面吸取了基本精神。对此，西方代表总是认定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会跟在自己政策后面亦步亦趋。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第三世界中许多国家依然贫困落后以及它们在当前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无权与被剥削的地位，使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定要起而抗争。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某些大国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企图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等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力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将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为争取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动摇甚至变化改变不了这一总趋势。

二、社会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

既然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具有对立的一面，加上历史的原因和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一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心存疑虑是很自然的。在 1955 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一些国家曾经一度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证明。但正如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讲的，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亚非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的基础，可以“求同存异”，这个“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的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连原来在会上发言鼓吹亚非国家的当前任务是同像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都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社会主义外交的本质特点是尊重别国主权，坚持和平共处，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的秩序的努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坚持上述原则立场，就必然为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所理解、所支持。由于中国努力实践这些原则性立场，因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同情和赞扬。他们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全天候的可靠的朋友”。

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旗号奉行大小霸权主义，企图干涉与控制其他国家，那么这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推行了一种与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无异的政策，则理所当然地要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但这已经不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是民族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关系了。

三、社会主义思潮与资产阶级思潮的关系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资产阶级民主，都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1955，4，19），见齐世荣、张宏毅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第191页。

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就必须对上述思潮取坚决否定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和动摇，就无法建立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否定”是就整体而言。拿资产阶级民主来说，其性质与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对立，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全盘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就是鼓吹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但无产阶级民主决不是任何人凭空构思出来的，它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吸取了或多或少合理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并按照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予以改造，使之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如此，辩证法还告诉人们，否定并不是简单的抛弃。否定既包含着批判，同时也是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环节。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民主的产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但不是形而上学地抛弃，而是一种辩证的、革命性的改革。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要否定它的阶级本质，即否定它固有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的一面，却要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中多少带有进步性的一面，或可资借鉴的一面。资产阶级民主是剥削制度中最严密、最完善、最精巧的一种国家形式。资产阶级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管理经济、文化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也创造了一些有效形式。所以，我们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方法和形式如代议制、普遍直接的普选制，某些分权的形式，以及公开审判制、陪审和律师辩护制度等等，并不需要一概加以否定和抛弃，而可以在批判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这些形式。我们体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的含义。

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公开申明对资产阶级民主可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却对社会主义思潮骂得一无是处，绝对不能容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视为洪水猛兽。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外交家凯南说，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损害”，“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

正因此，一切资本主义卫道士都千方百计地试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思潮。二战后初期一段时间，美国企图依靠赤裸裸的军事政治扩张手段来和社会主义作斗争，当这一手越来越不灵验以后，又自70年代起更多乞灵于思想意识形态一手。从卡特政府开始，把“人权外交”置于美国外交的中心地位。里根总统宣称，美国的领导地位就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对美国道德优越的普遍承认。”尼克松鼓吹加强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接触，“它播下不满的种子，有一天将开出和平演变的花朵。”他们特别着重于让人们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力图用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当前比较突出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现代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于二次战后。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27页。

乔治·凯南：《1917至1976年间的美苏关系》，见《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2月号，第44页。

赫尔格·哈夫多恩：《里根政权：美国实力的重建？》，第4—9页。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92页。

福成立，所通过的宣言名称就叫作《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主张用改革的措施，在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和组织实行阶级和平与合作的情况下，“以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其实质是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实行一种有利于资产阶级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渗透进社会主义国家，其特点则是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历史与社会主义制度予以全盘自我否定、自我丑化，从而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创造条件。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就说明了这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蜕化和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产物。

但是，既然科学社会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而必然产生的并且代表着客观真理，因此，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她必将最终为自己的胜利开辟前程。

第五章 联合国及当代其他重要国际组织

第一节 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

一、联合国建立的背景和经过

联合国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产物，它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国为巩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为维护战后和平而共同创建的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它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筹划过程。

1941年12月22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起草了《联合国家宣言》。翌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代表签署了 this 宣言，保证继续对德、日、意等轴心国协同作战。这是“联合国”名称的缘起，但这里所说的“联合国家”还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只是作为对法西斯轴心国进行战争的各国的总称。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盟国的战略性转折，这时，安排战后世界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美国认为，只有建立一个以几个大国组成的国际安全机构为核心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才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与国际和平；它主张在打败法西斯国家以后，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充当世界警察。美国还认为，凭着美国实力，它在战后世界中必居“领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美国表现得最为主动、积极。苏联也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3年10月30日，美、英、苏、中四国签署《普遍安全宣言》，提出：“必须在最短期间，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大小，均可加入为成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四大国政府首次共同宣布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1944年是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战略大反攻的一年。这一年的8月21日至10月7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和中、美、英三国代表先后在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谈，讨论和拟订组织联合国的建议。四国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案建议未来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提出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内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遗留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安理会的表决程序。苏、美、英三国原则上都同意设立否决权，实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但美、英主张在常任理事国成为争端当事国一方时，该理事国不应参加投票，而苏联反对任何限制否决权的规定。此外，关于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即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前夕，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三国首脑就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联合国的两个遗留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了协议。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采纳了美国的折衷方案，即规定对有关强制执行的任何决议案都需要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当事国不能投票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常任理事国在任何实质性问题上都拥有否决权。会议也同意了苏联的要求，确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创始会员

国。会议还决定，由苏、美、英、中四国发起，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在旧金山举行会议，以敦巴敦橡树园建议案作基础，制定联合国宪章，成立联合国。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建议，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开幕，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出席会议。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和协商，终于在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和雅尔塔协议的基础上，完成了宪章的制订工作。6月26日，51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其中波兰事后补签）。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宪章日”。同年10月24日，中、苏、美、英、法5个常任理事国和多数签字国递交了批准书，《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51个宪章签字国为创始会员国。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举行，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联合国的诞生是当代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主要组织机构

1945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是当代世界史上一部划时代文件，是联合国一切活动的准绳和依据。宪章由序言和19章构成，共110条。它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大会的组成及职权、主要机构的结构及权限和活动、争端之和平解决、对于和平之威胁与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等。宪章具有鲜明的国际条约的特征，第103条对此有明确的阐述：“联合国会员国依本宪章所负之义务与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义务有冲突时，依本宪章所负之义务应居优先”。宪章的局部修政，需经联合国2/3的票数通过，并需经联合国2/3的会员国，其中包括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

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修改宪章的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为此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但要真正修改宪章谈何容易。

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强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行的基本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但常遭到少数国家的曲解和践踏。联合国内一直存在着遵守和破坏宪章的斗争。

根据宪章规定，联合国设立的主要组织机构有6个：

《联合国手册》（第九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35页。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 大会。为联合国主要的审议机构，由全体会员国组成。宪章规定，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托管、法律等任何问题，并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常会，一般是在 9 月第 3 周星期二开幕。如经安理会或半数以上会员国请求，还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每一会员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不得超过 5 人。每个会员国均有一票表决权。重要问题的决议，需有会员国 2/3 多数票通过。每届常会设 7 个主要委员会，分别负责处理有关的事务。这 7 个委员会是：第一委员会，负责处理政治与安全问题；特别政治委员会，专门处理第一委员会不受理的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处理经济与财政事务；第三委员会，负责社会、人道和文化方面的事宜；第四委员会，负责托管；第五委员会，主管行政和预算；第六委员会，负责法律。此外大会还设有两个程序性的委员会，即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

(2) 安全理事会。它是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的机构，只有它有权作出根据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必须执行的决定。安理会由中、法、苏、英、美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6 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 年起非常任理事国增为 10 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不得连选连任。安理会每一理事国都享有一票的权利。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可由任何 7 个(1965 年起为 9 个)理事国的赞成票通过，而关于程序问题外的一切决议，则必须由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 7 个(1965 年起为 9 个)理事国投赞成票才能通过，即 5 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题上拥有否决权。

(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它在大会权力之下，负责研究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项，并就这些问题向大会、各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它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的理事国组成。理事国最初为 18 个，1963 年增加为 27 个，1971 年又增加到 54 个，亚非拉的名额得到显著增加。理事国任期 3 年，交替改选，每年改选 1/3，可连选连任。

(4) 托管理事会。它负责监督托管领土的管理，以促进托管领土的自治或向独立方向逐渐发展。该理事会由管理托管地区的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没有参加托管理事会的活动。按联合国宪章规定，适用于国际托管制度的领土是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大战后割自敌国的领土。最初有 11 个托管地区。至 1975 年，除美国管理下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外，其他托管地先后独立。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包括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贝劳四个政治实体。1975 年，北马里亚纳同美国签署《自由联邦条约》。根据该条约，北马里亚纳在政治上同美国合并，享有一定的内政自主权。1977 年 5 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在 1981 年中止托管协议。1982 年，马绍尔、密克罗尼西亚和贝劳同美国签署《自由联系条约》。1986 年美国宣布该条约生效。根据条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获得内政、外交自主权，安全防务由美国负责，可参加地区组织，但不能参加联合国。在贝劳共和国，该条约在多次公民投票中，均因未达 75% 的法定多数而未能获得通过。1986 年 11 月，美国总统还宣布北马里亚纳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联邦。1990 年 12 月，联合国安理会正式通过终止部分太平洋托管领土托管协定的决议，决定结束托管领土中的北马里亚纳、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三块领土的托管地位，并希望贝劳能适时完成行使自决权力的过程。

(5) 国际法院。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由 15 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

成。法官是以同一候选名单由大会和安理会分别以绝对多数票选出，任期 9 年，每 3 年改选 5 名，可连选连任。按惯例，15 名法官中应有苏、美、英、法、中五大国的法官。国际法院对受理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国均应遵守。国际法院还有应大会、安理会或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请求，对提交给它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的职责。

(6) 秘书处。为联合国的办事机构，负责处理联合国各机构的行政、秘书事务，并执行这些机构制定的计划和政策。秘书处设秘书长 1 人。秘书长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由大会根据安理会的推荐任命，任期 5 年，任满后如被重新任命，可以连任。秘书长除领导秘书处并向大会提出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外，还有权把认为有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处还负责处理以下工作：在解决国际争端中进行斡旋；管辖维持和平行动；调查世界经济趋势和问题；组织国际会议；编制统计预算；收集安理会及其他机构决议的执行情况等。宪章规定，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时，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的指示，只对联合国负责。

联合国其他机构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同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机构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这些机构在促进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发展和保护妇女儿童、环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三、联合国成分与作用的重大变化

联合国是一个具有广泛普遍性的国际安全组织，会员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按照宪章第 4 条规定，凡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接受宪章所载的义务，经联合国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这些义务者，均得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接纳新会员国要经安理会推荐，并由大会表决通过。

联合国成立之初，大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大陆还处在殖民主义奴役之下。51 个创始会员国中，亚非国家只有 13 个（其中亚洲 9 个，非洲 4 个），几乎只占整个创始会员国数量的 1/4。此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不断涌现，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数量不断增加（见下表）。到 80 年代末期，联合国会员国由成立时的 51 个增加到 159 个，新增加 108 个。这 108 个新增会员国中，除 15 个欧洲国家和日本外，其他 92 个均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在联合国中的会员国数增加了近 12 倍，其次是亚洲，增加了 3 倍多。80 年代末，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的会员国数大大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 1/2；至于整个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会员国约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 80%。

联合国会员国增加情况表

洲名	创始国	40年代末期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总计
亚洲	9	6	8	6	7	1	37
非洲	4		6	32	8	1	51
拉丁美洲	20			4	5	4	33
欧洲	14	2	10	1	2		29
北美	2						2
大洋洲	2				4	1	7
总计	51	8	24	43	26	7	159

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以及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分解而又有一批新的欧亚国家加入联合国。此外，90年代初加入联合国的还有朝鲜、韩国、纳米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摩纳哥等国。到1993年秋，联合国会员国总数达183个。在183个会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仍占绝对优势。40多年来联合国成分的这种变化，是当代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反映，是第三世界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和联合国成分的变化相应，几十年来，联合国的作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联合国成立初期，在美国操纵下，曾做了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事。最突出的事例是美国在1950年盗用联合国名义，组成所谓联合国军侵略朝鲜，并在战争期间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配合它侵略的决议。当时的联合国基本上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是美国牟取利益的表决机器。

进入60年代，美国仍然企图控制联合国，苏联则竭力把联合国作为苏美两国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利用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但是，60年代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使联合国的构成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重大变化，两个超级大国已经不能左右联合国的活动。1960年第15届联大在43个亚非国家倡议下，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1961年第16届联大又在38个亚非国家倡议下成立了“二十四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1962年，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发展中国家的倡议和推动下，联合国正式批准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其后又决定将其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常设机构。1963年第18届联大根据第三世界国家的提议，决定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6国增至10国，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由18国增至27国（1971年又增至54国），总务委员会副主席由13名增至17名，亚、非、拉的名额都得到了增加，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文作了相应修改。1964年3—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首次会议，77个发展中国家为维护第三世界的经济利益，在会上发表了联合宣言，组成“七十七国集团”。随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参加这个集团。这一切表明，60年代，联合国中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已逐渐占了上风，联合国的作用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70年代以后，联合国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又有一批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团结起来，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联

联合国力量对比和作用发生根本变化的重大标志。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理应由新中国的代表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但是，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曾把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说成是“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甚至操纵联合国通过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1961年，美国眼看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力量增长，于是又策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决定，把中国代表权提案列为“重要问题”，这样，按宪章规定就需要2/3以上多数票才能通过。在以后直至1970年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都借此手段使恢复我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得不到通过。经过第三世界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抗争，1971年第26届联大首先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接着又挫败了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最后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中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支持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7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召开的几次重要国际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相互支援，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1974年4月，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第29届联大通过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民族权利，同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后的大会；这届大会还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大会主席的裁决，中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席大会的资格。1977年安理会决定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1979年11月，第3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要求“立即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决议。翌年1月，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通过“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这两项决议反映国际社会反对越南侵略柬埔寨，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正义立场。1983年10月，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联合国立即应格林纳达要求举行全体会议，并于11月2日通过决议，要求美国严格尊重格林纳达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立即停止武装干涉和撤出其侵略军队。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为敦促伊拉克撤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通过了12项决议案，特别是1990年11月29日通过的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到1991年1月15日仍不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显然，从60年代、特别从70年代以来，联合国已经改变了被美国操纵的局面，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当代各类国际组织的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各类国际组织蓬勃发展，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既有政治、军事的，也有经济、科技、文化的；既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最快，数量最多。与国际形势变化相应，当代国际组织的发展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从 40 年代中到 60 年代初，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前曾是世界第一流资本主义强国的英、法虽是战胜国，但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和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7 年，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发动对苏冷战，从此形成美苏两极冷战对峙局面。为适应冷战需要，1949 年，美国联合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丹麦、挪威和冰岛建立了以它为首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 年 1 月，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式建立了负责协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略物资禁运的非正式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其总部设在巴黎，又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1952 年，美国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澳新美联盟；1954 年，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建立了旨在镇压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政治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 年，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筹组了中央条约组织这样一个军事集团。1949 年，苏联为对抗马歇尔计划而联合东欧国家建立了经互会集团；1955 年，苏联、东欧国家为抗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结成军事政治联盟——华沙条约组织。这样，在欧洲就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此外，从 1945 到 1955 年建立的其他重要国际组织还有阿拉伯国家联盟（1945）、关税及贸易协定（1947）、欧洲委员会（1949）、北欧理事会（1952）以及西欧联盟（1954）等。

1958 年，法国、联邦德国等 6 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生产国际化与资本国际化趋势，为了抗衡美、苏，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也是西欧国家政治上联合的国家集团。1960 年，英国为了同欧洲经济共同体抗衡，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又称小自由贸易区）。该组织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组织。1961 年，美、英、法、意、联邦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荷兰、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冰岛、爱尔兰、希腊、加拿大、土耳其等 20 个国家成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发组织，后又有日本、芬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加入）。此外，参加其活动的还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经合发组织是咨询性机构，其任务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一时期各类国际组织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第二，多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第三，不少国际组织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第四，50 年代中期前建立的国际组织多为军事政治集团，50 年代中期后转向以建立经济联合组织为主。

第二时期，60—80 年代，各类国际组织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先后取得了政治独立。随着民族独立国家的大量涌现，第三世界国家间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组织从60年代初起蓬勃兴起，大量涌现，成为国际社会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类组织的大量出现，既是第三世界国家自身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变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要。第三世界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加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集体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为了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继续控制与剥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需要组织起来，联合斗争。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多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总的特点是：（1）大都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民主协商和平等互利为原则；（2）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变革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宗旨；（3）大都从几个国家小范围的合作和单项合作过渡到更大范围的合作和多项合作。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组织，主要是按地理区域建立起来的，一般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协调成员国的政策，促进成员国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宗旨。除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美洲国家组织等少数几个组织外，其他均成立于60年代以后，主要有：（1）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于1963年5月，是全非性质的政治组织。截至1990年，成员国达51个，是当今世界上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区域性组织；（2）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67年8月成立。成立初期，其活动仅限于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合作。1971年以后，各成员国加强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合作，使东盟逐步形成一个区域性组织。成员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1984年1月，文莱达鲁萨兰国加入；（3）伊斯兰会议组织，成立于1971年5月，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组织，截至1990年，成员国达45个；（4）阿拉伯议会联盟，成立于1974年6月，截至1990年，成员国有17个；（5）东盟议会组织，成立于1977年9月，正式成员是除文莱外的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6）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由6个海湾国家于1981年5月组成；（7）里约集团，1986年12月由8个拉美国家成立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截至1991年，成员国达11个；（8）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成立于1989年2月，成员国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9）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2月，由埃及、也门、伊拉克和约旦4国组成。

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组织是在60—70年代蓬勃兴起的，主要包括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原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区域金融组织三种类型。

（1）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继续控制与剥削，并摆脱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一定区域内利用彼此邻近及经济结构、资源、技术方面的互补性，通过集体自力更生道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边综合性经济组织。早期成立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大都只是贸易合作，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中美洲共同市场以及非洲的一些关税同盟等。60年代后期，特别是70年代以来，从单项合作发展到多项合作，其组织形式从减免内部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到共同对外的关税同盟，进一步发展到资本和劳务自由流动的共同市

场，最后发展到工业、商业、运输、金融、财政经济政策全面协调、共同发展的经济联盟或共同体。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亚洲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既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区域性政治合作组织。在非洲有马格里布常设协商委员会（1964）、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1966）、东非共同体（1967）、西非经济共同体（1974）、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75）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1983）等。其中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在贸易、金融和生产合作方面都取得较显著成绩。在拉丁美洲有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1960）、中美洲共同市场（1962）、安第斯条约组织（1969）、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1969）、加勒比共同体（1973）、拉丁美洲经济体系（1975）和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1978）等。拉美各国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多数国家独立较早，民族经济也有了一定发展，创造了进行合作的可利条件。

（2）原料生产和出口国组织，它是大宗生产和出口某种同类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其共同经济利益，加强相互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截至1983年，已建立这类组织22个。它们是：国际茶叶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国家咖啡组织、可可生产者联盟、非洲花生理事会、拉丁美洲国家石油互助协会、铜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亚洲及太平洋椰子共同体、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国际胡椒共同体、国际铝土协会、肉类生产国组织、香蕉出口国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食糖出口国集团、铁矿砂出口国协会、拉丁美洲—菲律宾甘蔗协会、非洲木材组织、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丁香销售组织、拉丁美洲咖啡出口国组织、锡生产国协会和国际棉花生产者协会等。这22个组织，除国际茶叶委员会外，都是1960—1983年建立的。

（3）发展中国家区域金融组织，主要有：阿拉伯经济发展科威特基金会（1961）、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1971）、伊斯兰开发银行（1974）、亚洲清算联盟（1974）、阿拉伯非洲经济开发银行（1974）、西非货币联盟（1962）、非洲开发银行（1964）、中非货币区（1972）、加勒比开发银行（1970）、泛美储蓄和贷款银行（1975）等。

和第一时期相比，第二时期各类国际组织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第二，多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第三，多数组织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要求变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两极冷战对峙格局瓦解。与此相应，一些适应冷战需要建立的军事政治组织进行了调整，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和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将在1994年停止活动。世界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国际组织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斗争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第六章 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部战争

一、当代局部战争的发展和类型

局部战争是在一定地区内，使用一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的战争。二战结束以来，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却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息过。据统计，从二战结束到 80 年代末，世界共发生过 180 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 96% 以上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广大第三世界地区，而欧洲则相对稳定，所占比例不到 4%。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战后亚、非、拉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民族解放战争在战后，特别在 60 年代以前的局部战争中占有相当的比重。60 年代后，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局部战争和边界冲突又频繁发生。第二，由于美苏争霸具有全球性质，因此，这一时期的局部战争及地区冲突具有分散化的特点。第三，欧洲是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地区，因此，它虽是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但谁也不敢贸然在这里动武。同时，美苏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需要，对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严加控制，这一地区的一些潜在矛盾被压制下来。第四，西欧是经济发达地区，生产和资本高度国际化，这也制约了战争在这里的发生。

1991 年初的海湾战争是两极冷战结构全面解体前夕的一次重要局部战争，反映了两极结构即将崩溃，世界更加向多极化发展的一些特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的这种急剧变化给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原来的一些热点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解决或出现了政治解决的前景，如中东、阿富汗、柬埔寨、尼加拉瓜等。与此同时，欧洲却亮起了红灯。在东欧和原苏联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争端和领土要求而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续不断，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特征。

从二战结束到 80 年代末爆发的 180 多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领导人民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战后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发展，爆发了一系列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民族解放战争。主要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战争（1945 年 9 月—1954 年 7 月）；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英荷武装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945 年 9 月—1949 年 12 月）；马达加斯加反法武装起义（1947—1949 年）；埃及民族解放战争与埃及七月革命（1951—1952）；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1954 年 11 月—1962 年 3 月）；安哥拉民族解放战争（1961 年 2 月—1975 年 1 月）；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群岛民族解放战争（1961 年 8 月—1974 年 8 月）；莫桑比克民族解放战争（1964 年 9 月—1975 年 6 月）等。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不断赢得胜利。这种战争冲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壮大了和平民主的力量，有利于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

第二，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有：1950 年美国发动的侵略朝鲜

的战争；1956年英、法、以联合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1961年美国发动的侵略越南的战争以及1983年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的战争等。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造成了地区的动荡。被侵略国家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

第三，霸权主义政策引起的战争。主要有1968年苏联出兵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此外，苏联还利用古巴雇佣军插手非洲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内战。由地区霸权主义者直接挑起的局部战争有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

第四，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亚、非、拉国家独立以来，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以及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诸多矛盾，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70年代，这种战争占到该时期发生的各种类型局部战争总数的28.6%。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亚洲主要有：印巴战争（1947，1965，1971），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武装冲突（1955），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武装冲突（1963—1965），叙利亚约旦边境武装冲突（1971—1980），伊拉克科威特边境武装冲突（1973），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政变（1974），叙利亚干涉黎巴嫩内战（1975—1976），民主也门与阿拉伯也门边境武装冲突（1979），两伊战争（1980—1987）；在非洲主要有：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武装冲突（1963—1964），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边界武装冲突（1964），索马里与肯尼亚边界武装冲突（1964—1967），坦桑尼亚与乌干达战争（1972，1978—1979），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欧加登战争（1977—1978），埃及与利比亚边境武装冲突（1980），利比亚与乍得战争（1980）；在拉丁美洲主要有：尼加拉瓜入侵哥斯达黎加（1955），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边境冲突（1957），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足球战争”（1969）等。

第五，国内矛盾引起的国内战争。它包括国内对抗阶级之间的战争以及国内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这类战争在亚洲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6月—1950年5月），菲律宾国内战争（1946—），缅甸国内战争（1948—），越南南方国内战争（1954—1960），伊拉克人民武装起义（1958），老挝国内战争（1959—1962），阿拉伯也门国内战争（1962—1970），塞浦路斯国内武装冲突（1963—1967），黎巴嫩内战（1975—1976），阿富汗内战（1978—1979），斯里兰卡内战（1983—1987）；在非洲主要有：乍得人民武装斗争（1965—1973），尼日利亚内战（比夫拉战争）（1967—1970），埃塞俄比亚内战（1975—1978），乍得内战（1975—1986），安哥拉内战（1975—1976）；在拉丁美洲主要有：巴拉圭国内武装起义（1947—1948），哥斯达黎加国内战争（1948），哥伦比亚国内武装起义（1948—1949），玻利维亚人民武装起义（1952），古巴国内战争（1953—1959），危地马拉内战（1954），委内瑞拉人民武装起义（1958），巴拉圭人民武装斗争（1958—1961），尼加拉瓜人民反独裁斗争（1959—1963），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斗争（1959），危地马拉反美反政府武装斗争（1960—1962），海地人民反独裁武装斗争（1960—1970），智利武装叛乱（1973），萨尔瓦多内战（1981—1992），尼加拉瓜内战（1983—1990）；在欧洲有1946—1949年的希腊国内革命战争。

上述五种局部战争的分类只是大体上而言，实际上有些战争具有交叉的特点，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既是国内革命战争，也是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同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的；拉丁美洲国家反独裁的国内战争，大多同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

二、当代局部战争的特点

当代局部战争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作战目的的有限性。20 世纪上半叶，战争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走到了极限，进行战争的信条是：固守绝对的目的，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二战后，这一信条已失去意义，形成另一种原则，即战争主导一方一般不把完全占领交战国家的领土和威胁交战国家生存作为作战目的，而只持有限政治目的。60 年代前，战争主导一方一般持被动有限政治目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局部战争是由于老殖民主义者继续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美国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引起的，它们在发动战争之初企图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或控制交战国家领土，只是在遭到对方沉重打击后，才被迫修改原来的政治目的。例如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时，不仅想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想继续扩大战争，只是在遭到中朝武装力量沉重打击后，才将原来的政治目的修改为维持朝鲜南北分治局面的有限政治目的。60 年代后的战争主导一方一般持主动有限政治目的。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英阿马岛战争、海湾战争等大体上都是如此。

第二，军事手段和范围的有限性。军事手段的有限性是指对投入战争的军队数量和使用武器进行适当限制，一般只投入部分军队，不使用核武器，不轻易使用生物化学武器。军事范围的有限性是指对作战区域进行限制，如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其地面部队未越过北纬 17 度线。军事手段的有限性表现为多种形态：（1）对等有限状态，常出现于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或综合实力对比接近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例如在印巴战争中，双方都只使用了部分武装部队。（2）非对等有限状态，常出现于综合实力不均衡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在这种战争中，大国在军事上手段上加以限制，而中、小国家则可能是全力以赴。例如，美国 1983 年武装干涉格林纳达只使用了 6000 人的军队，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小规模有限战争；格林纳达则倾其全力进行抗击，对它来说无异乎是一场全面战争。（3）战争过程中由限制向非限制转化。例两伊战争开始时伊拉克只使用了陆军兵力的一半，伊朗以劣势兵力匆忙应战，后来演变为一场国家全面战争，双方都倾其全力作战。

第三，战争状态的有限性。二战前，交战国一旦正式交战便进入战争状态，双方一般要宣战和断绝外交及领事关系。二战以后，交战国之间很少处于严格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不仅没有宣战的实例，完全断绝外交关系的例子也不多见，大部分战争是在保持外交和领事关系条件下进行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目的有限以及军事手段和范围有限，交战国一般在不危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均愿保持外交关系，以给战后政治解决留下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法确定了禁止侵略战争的原则，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都采取了不宣而战的方法来逃避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第四，高技术较量。当代局部战争使用的常规武器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向高科技方向发展。苏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把局部战争做为新型武器的试验场，使当代战争越来越具有高科技性。战争的高科技性导致战争的高消耗，高消耗又使战争不得不加快节奏，尽早结束。例如，第四次中东战

争中，阿以双方拥有坦克 5400 多辆，作战飞机 1500 多架。战争进行了 18 天，双方损失坦克 3000 多辆，飞机 500 多架，交战双方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一方很难再继续进行战争，只好接受停火建议，谈判解决。海湾战争是一场高技术立体战争，空袭开始后每天消耗 5 亿美元，地面部队进攻后，每天耗资 10 亿美元。如此高技术、高消耗的战争，要长时期进行下去，那是不堪设想的。

第五，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联系空前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场局部战争都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上跟其他国家有利害关系，特别是同超级大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密切相关。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像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于局部战争之中。局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往往不是由交战国之间来决定，而是由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来控制的。如在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既争夺、又避免直接相撞的政治目的指导下，一方面有节制地分别给阿以交战双方运补了部分武器技术装备，另一方面又在幕后紧急磋商，频繁接触，穿梭斡旋，促使双方停火。从这个角度看，当代局部战争就不是纯局部性质的战争，而是有东西方对抗、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具有世界性。

上述特点是从局部战争的总体而言的，集中反映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局部战争上。由于战争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参战国综合国力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战争、不同国家进行的战争，往往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如被压迫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般呈现出以弱胜强的战争特点。这种战争多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民众，采用游击战的形式，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战争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战争，一般作战武器陈旧，持续时间长，多数局限在边境地段或局部地区。

第二节 二战后未发生世界大战的原因

本世纪的前 45 年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虽然局部战争频繁发生，但新的世界大战始终没有打起来。新的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当代存在制约大战发生的诸多因素。

首先，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制约世界大战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三世界是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打击了战争发动者的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土占世界陆地总面积 2/3 以上，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3/4 以上，第三世界国家数占世界上独立国家的近 4/5。所以，第三世界在当代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它和社会主义力量汇合，形成一支巨大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在联合国会员国中占了绝对优势，它在敦促联合国遵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依附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繁荣世界经济，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激烈争斗，尤其是核军备竞赛，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核战争的危险，激起亿万人民为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战后 40 多年来，世界反战和平运动波澜起伏。战后初期，特别是 50 年代，全世界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1949 年 4 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同时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发表了保卫和平宣言，选举产生了和大常务委员会。1950 年 11 月举行了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1952 年 12 月召开了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大会通过《致五大国政府书》，邀请中、苏、美、英、法五大国政府就缔结和平公约举行谈判。1955 年 6 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世界和平大会，发表了《世界和平大会宣言》。1955—1959 年召开了五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呼吁为禁止原子弹、氢弹而奋斗。经过 60 年代后的一段时间的沉寂后，80 年代在北美、西欧、大洋洲以及世界各地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对战争、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群众和平运动。1982 年，美国纽约举行了有 75 万人参加的反对核军备竞赛、要求和平与裁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83 年底，反对美苏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抗议浪潮席卷西欧，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在波恩、西柏林、巴黎、伦敦、海牙、布鲁塞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等西欧大城市都曾发生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参加和平运动的人士极为广泛，有工人、学生、家庭主妇、教授、科学家、企业家、宗教人士、国会议员和政党领袖。1985 年 8 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广岛、长崎被炸 40 周年，日本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 34 个国家和 15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广岛和长崎两地举行了和平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禁止研究、发展、试验、生产、拥有、储存、部署、扩散和使用包括太空武器在内的核武器，呼吁各国和平运动超越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加强团结，为防止核战争、废除核武器而共同努力。这些反战和平运动，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

其次，美苏核威慑态势迫使双方慎重考虑核大战后果，谁也不敢贸然发动一场战争。

二战后，美苏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1987年末，美苏拥有的核弹头数额为4.8万个，相当于TNT炸药爆炸当量计119.66亿吨，再加上其他核国家的核武器，世界核武器的总当量相当于广岛那颗原子弹的350万倍。有关专家认为，只要将现有原子弹的29%的能量施放出来，就会引起长达好几个月的“核冬天”，爆炸、冲击波和热能可以杀伤5亿人，核辐射可以杀伤10亿人，由此而引起的饥荒可造成25亿人死亡。1985年11月，美苏日内瓦首脑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双方应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鉴于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有资格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谁也不敢贸然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并尽量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战后美苏争霸的总的趋势是向间接对抗路线的方向发展。它们企图通过“代理人战争”和假手他人的战争，间接地插手，觊觎有利的战略目标和获得有利地位。这也是战后局部战争频繁发生而新的世界大战始终未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战后生产、资本国际化、市场国际化日益发展，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强，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这种经济利益的相互渗透，对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面对战后世界新形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高科技、经济领域，而不是通过发动战争来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苏两国安全战略重点也逐步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斗争。

此外，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转化对美苏形成某种牵制作用。70年代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形成，使中国取得了能够对苏美起制约作用的主动地位。西欧、日本和东欧国家一方面参与美苏之间的对抗，另一面又担心这种对抗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希望缓和东西方关系；同时，他们越来越强调政治上的独立性，要求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转化，表明一两个超级大国决定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战后历史表明，只要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防止世界大战，实现世界较长时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

第三节 二战后的国际裁军谈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消极和阻碍因素。世界人民要求裁军和削减军费开支，以维护和平，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承受不起核竞赛无限制扩大的负担和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在这种形势下，先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裁军谈判。

（一）联合国内的裁军谈判

联合国宪章第 26 条规定，安理会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应拟定管制军备制度的方案。根据联大 1946 年 1 月 24 日决议，联大下面设立原子能委员会，由安理会理事国和加拿大组成。美国代表提出设立国际发展原子总署的建议，以阻止苏联研制原子武器。苏联代表提出销毁原子武器公约草案。谈判陷于僵局，委员会解散。根据联大 1946 年 12 月 14 日决议，安理会设立常规军备委员会。苏联主张同时讨论禁止原子武器，美国反对。委员会于 1952 年 2 月解散。六届联大决定建立裁军委员会，讨论裁减常规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由于东西方立场对立，谈判陷于僵局。1957 年 11 月 19 日，联大通过扩大裁军委员会成员的决议，苏联反对，并拒绝参加。

（二）日内瓦多边裁军谈判

1959 年根据苏、美、英、法 4 国达成的协议，成立了有美、英、法、意、加、苏、保、捷、波、罗参加的 10 国裁军委员会。该委员会同联合国保持密切关系。1981 年 3 月增加 8 个不结盟国家，组成 18 国裁军委员会。1969 年 7 月又增加 8 个成员国，更名为裁军委员会会议。1978 年改称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国于 1980 年 2 月正式参加了该委员会。1984 年委员会又改名为裁军谈判会议。它是当前国际上唯一常设性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有 40 个成员国，每年春、夏各举行一次会议。

（三）中欧裁军谈判

全名叫“关于在中欧共同减少部队和军备及有关措施的谈判。”1964 年 12 月 14 日，苏联在第 19 届联大会议上，通过波兰外长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68 年 6 月 25 日，北约建议同华约就欧洲特别是中欧地区相互均衡裁军问题举行谈判，以此作为同意召开苏联倡议的欧安会的条件。1972 年 5 月，苏、美最高级会谈达成妥协，确定了欧安会与中欧裁军谈判分别但又是平行地举行的原则。1973 年 1—6 月在维也纳举行中欧裁军谈判筹备会议，确定谈判为大使级，有决定权的国家为 11 个（北约的美、加、英、联邦德国、荷、比、卢，华约的苏、波、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观察员 8 个（北约的丹、挪、意、希、土，华约的匈、保、罗）；每年举行全会 3 次，每次一般 10 周左右。1973 年 10 月 30 日，正式谈判在维也纳开始举行，至 1985 年 7 月，双方共进行了 36 轮会谈，数百次会议。会谈涉及的军备裁减范围是华约与北约的常规力量。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1）裁军原则。华约主张采取“对等裁减原则”，即双方各按同等数量或同样百分比裁减军队，目的在于继续保持自己在中欧的军事优势。北约则坚持“均衡裁减原则”，即双方按不同数量裁减地面部队，兵多者多裁，兵少者少裁，最后达到同等最高限额，目的在于削弱华约的地面部队优势。（2）双方驻中欧部队的实际人数。1976 年 6 月 10 日，华约宣布它在中欧地区的地面部队为 80.5 万人，与北约在中欧的兵力“大致相等”。北约认为华约少报了 12—15 万人。此后

双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3)裁减的军种。北约主张只裁减陆军,以削弱华约的地面部队优势;华约则坚持陆军、空军和战术核力量“三位一体”地裁减,以削弱北约在空军和战术核武器方面的优势。(4)裁减的方法、步骤。北约坚持采用“集体裁减原则”,即只规定两个军事集团的“集体最高限额”,至于各参加国如何裁减,则由双方内部自行决定。华约则主张各参加国应承担具体裁减义务,即分别规定各国军队的最高限额,同时进行裁减。此外,北约要求制定一整套严厉的核查措施,被苏联拒绝。

经过谈判,双方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了些妥协,如北约同意匈牙利不包括在中欧裁军范围之内,苏联接受北约关于双方在中欧的兵力最高限额为90万人的建议等。但在驻中欧军队实际人数、军备如何裁减及监督措施等问题上,双方寸步不让,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东欧剧变。翌年11月,北约16国和华约6国在巴黎签署欧洲削减常规武器条约。1991年2月25日,华约国家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会晤,决定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华约的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先后于4月11日和7月1日宣布解散。同年12月苏联解体,旧有的东西方关系到此终结。

(四)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这是美苏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双边裁军谈判。谈判所涉及的范围是射程在50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武器。美国的目的在于削弱苏联在陆基导弹和投掷重量上的优势,确保其在核武器质量上的优势;苏联则力图通过冻结核武器数量,集中力量从质量上赶超美国。1969年10月,美苏达成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

1969年11月至1972年5月,美苏举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心议题是冻结两国战略武器数量。经过7轮会谈120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妥协,提出草案。1972年5月26日,美苏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条约规定,双方各自可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两个。临时协定规定,双方把陆基洲际导弹冻结在1972年7月1日的水平上,即苏联1618枚,美国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和导弹潜艇冻结在1972年5月26日实有和正在建造的水平上,即苏联950枚、62艘,美国710枚、44艘。临时协定有效期为5年。这个协定对导弹的质量和核弹头的数量未作限制,因此美苏核竞赛的重点就由数量转向质量。

1972年11月至1979年6月,美苏举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心议题是拟定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来取代临时协定。其间美苏首脑多次会晤,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基本原则》、《部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议定书》、《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等文件。双方商定不进行当量在15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把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由1972年条约规定的两个减为一个,宣布同意根据“同等安全”原则签订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定。1979年6月18日,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正式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到1981年底,双方各自拥有的战略武器总限额为2250件(架),其中各自拥有的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和装有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不得超过1320件(架);在条约有效期内,双方各自只能制造和部署一种新的洲际导弹。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苏关系恶化,卡特政府宣布无限期地推迟将该条约提交美国国会批准生效。1985年

12月，美苏两国政府又都表示，在新条约缔结之前将继续“遵守这一条约的条款”。

1983年6月，美苏开始进行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同年11月，美国开始在欧洲部署新式导弹，苏联中断了这一谈判，东西方关系一度严峻。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苏两国分别调整各自在裁军问题上的策略，1985年3月美苏开始举行包括战略武器、中程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一揽子裁军谈判。1991年7月，美苏两国首脑布什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苏将在7年内分别削减战略核武器的23%和35%，即双方各自拥有的运载工具不得超过1600件，核弹头不得超过6000枚。这个条约变过去的相互限制为相互削减，无疑是裁军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个条约的签订是美苏两极对立体制行将终结的反映，同时也是由于美苏双方的核武器均已处于“饱和”状态，都愿降低军事对峙程度和减缓军备竞赛。特别是苏联，由于国内经济恶化和政局动荡，更是希望与美国达成裁军协议，以便腾出手来改变长期形成的畸形军事经济结构，并以外交上的成就来稳定国内政局。因此，苏联在谈判中作出了较大的让步。

苏联解体后，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3年1月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美俄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条约规定，美俄双方在2003年1月1日前，将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三种战略核武器的弹头总数分别从10875枚和10271枚削减到3500枚和2968枚。

（五）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又称限制欧洲战区核武器谈判）

1977年，苏联在其西部和东欧部署SS—20导弹。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认为，苏联此举打破了欧洲地区核力量平衡，使苏联在中程核力量对比上占了上风。为了对付苏联这一挑战，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通过“双重决议”，敦促美国尽快同苏联就限制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到1983年底仍达不成协议，美国就在西欧部署572枚新式导弹。中导谈判从1981年11月30日开始，至1983年11月下旬，先后进行了6轮会谈111次会议。美国先后抛出“零点方案”、“临时协议”等方案。其基本立场是：只有苏联拆除在欧洲的SS—20导弹，美国才放弃部署新式导弹，即使缩减原定部署计划，也必须以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把中导弹头削减到与美国同等水平为条件。苏联先后提出“冻结现状”、“分阶段裁减华约和北约中导”、“同等削减”等方案。其基本立场是：阻止美国按“双重决议”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保住自己的SS—20导弹部署系统，即使减少自己在欧洲的中导力量，也只能减到同英法两国总数相等的水平。双方立场相距甚远，谈判陷入僵局。1983年11月，美国开始在英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部署新式导弹。苏联反应强烈，中断同西方的各种裁军谈判。欧洲局势显得格外严峻。

美苏在渡过因中导问题导致的双边关系僵冷时期后，于1985年3月12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包括中导、战略武器和太空武器在内的一揽子裁军谈判。在新的谈判中，苏联坚持削减中导和战略武器要以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为条件，美国坚决反对。1986年10月，美苏首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冰岛会晤时，双方在中导问题上的立场有些接近。苏联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零点方案”，并不再坚持把英法核武器计算在内。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同意中导和太空武器分开解决，为解决中导争端跨越了一道重要障碍。同

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数包括部署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

年6月，美国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全球双零点”方案。7月22日戈尔巴乔夫宣布接受这一方案。同年11月中旬，美苏两国外长在日内瓦制定中导条约草案。同年12月8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在条约生效后的3年内，双方须全部销毁所拥有的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在条约生效后的18个月内全部销毁中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和辅助设施；条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再生产和试验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为监督条约的遵守，缔约每一方都拥有就地核查的权利，核查的范围包括对方领土及部署国领土，核查的时间将延续13年。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将销毁2611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导弹，其中美国为859枚，苏联为1752枚。

中导条约的签订，首先是美苏在内政和外交上各有所需和相互妥协的产物。戈尔巴乔夫企图以中导协议为契机，在美国和西欧造成强大的舆论，以减缓美国扩军的势头，拖住“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为苏联减少军费开支，实现“加速发展战略”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在中导条约谈判中，苏联作出了较大的让步，需要销毁的导弹，苏联比美国多得多。从美国方面来说，里根政府被“伊朗门”事件搞得十分被动，形象受损，同时里根总统任期只剩下17个月，与苏联签订中导协议，不但有利于他改善处境，而且将可使他戴上“和平总统”的桂冠卸任，并为共和党在1988年的大选中增加一点资本。其次，美苏双方储存的核武器已达到超饱和状态，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不会影响到美苏总的军力对比，不损害各自的战略利益。况且美苏军备竞赛的重点已转向太空武器，中导争端已退居次要地位。第三，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和巨大压力，也是推动美苏裁军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导条约是战后美苏裁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它对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条约所规定销毁的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数量，只占它们拥有的全部核武器实力的3—4%，军事意义不大，亦不能动摇两国的核霸权和核垄断的地位。只有超级大国实行全面和大幅度的裁军，才能使世界和平与安全得到保证。

第二编

第七章 战后初期的国际格局与冷战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对战败国的处置

一、战后初期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近 300 年来，特别是 19 世纪以来，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的中心，维持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成为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打开了一个极大的缺口，但是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主宰国际事务的仍然是西欧等地区少数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格局。德、意、日 3 国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被迫退出了争霸行列。英法虽为战胜国，但它们都已筋疲力尽，遍体鳞伤，再不能保住战前它们所保持的东西，同样退出了争霸行列。二次战后，西欧在国际事务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已成过去。正如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所说的，如果再有什么人“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世界，”他们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

代之以传统格局的是美苏两极结构的逐步形成，而首先是美国在战后初期就上升到称霸世界的峰巅。

美国是交战国中唯一没有遭到战火破坏的大国，而且通过战争获利甚大，国力得到空前加强。当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 53.4%（1948），出口贸易的 32.4%（1947）和黄金储备的 74.5%（1948），以及世界谷物收获量的 1/3。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变得异常强大。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军队曾达到 1200 万人的高峰，分驻在世界 50 多个国家，它还一度垄断了原子弹，使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大战末期，通过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在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并一度把 1945 年成立的联合国变成其控制和操纵下的表决机器，为其推行全球扩张政策创造条件。

苏联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大战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战争结束时，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而且恢复和扩大了沙俄时期俄国在东欧和远东的版图和政治势力。苏联成了在欧洲最强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国。而且在苏联直接间接援助下，东欧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的损失比美国要严重得多。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指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 24 : 1，与全部欧洲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国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 10 : 1，……物质的损失估计约有 2000 亿美元，但是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而已”，“这一切便是今日苏联对欧洲政策的背景。不知道这个背景，就没有桥梁可以跟俄国人沟通。”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苏联虽然对其邻国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但至少是，由于实力的局限，其行动是谨慎的。美国著名的外交家乔治·凯

埃德加·斯诺：《美苏关系检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47，第 37、41 页。

南在后来承认：“我认为当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

除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力量消长的显著变化之外，亚非的迅速觉醒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又一重大事件。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同敌人英勇战斗，在战时盟国的武装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为反法西斯战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锻炼出一支争取民族解放的队伍。这些国家人民既不能容忍老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也不容许新霸权主义者以改头换面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

以上便是战后初期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二、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的缔结

二战结束后，尚有战争遗留下来的许多共同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就有处置战败国及其附庸的问题。由于1943年和1944年间意、保、罗、匈、芬5个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盟国，相继被迫退出战争，并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这些情况与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因之，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外长会议，首先准备对意、罗、匈、保、芬5国的和约。

在对5国和约问题上，美国企图通过订约，获得停战时期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即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插足于东欧大门口。”苏联想在巴尔干确认停战协定条款，巩固战果，向地中海扩大影响。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召开了4次大国外长会议，还举行了21国参加的巴黎和会。在历次会议上，美苏围绕着5国和约问题，争论激烈。例如，1945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苏、美、英、法、中5国外长会议上，在讨论对意和约时，涉及对意大利殖民地的处理、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的归属、意大利的赔偿等问题，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对意大利殖民地托管10年，苏联提出对黎波里塔尼亚单独托管的要求；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的属权属意大利，苏联主张归南斯拉夫；美国反对向意大利索取赔偿，苏联要求意大利向苏联赔款1亿美元。在讨论对罗、匈、保和约时，美英打出贯彻雅尔塔协议的旗号，坚持要求在东欧实行“自由选举”，影射攻击苏联在东欧“扩张”，苏联则指责美国破坏和约缔结程序，谴责美英干涉希腊内战。会议对重大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欢而散。后来，经过3国3次外长会议的讨价还价，才在5国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正式签订了5国和约。和约主要规定了5国的领土边界变更、政治民主化、限制军备和经济赔偿等问题。

5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苏妥协的结果。和约的缔结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宣告结束了战争状态。在对意芬等国和约中，都规定了肃清法西斯势力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条款，从而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实现欧洲和平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也是战时盟国在战后初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此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冷战”完全取代了合作。

三、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德国和两个德国的形成

战后欧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美苏斗争的焦点。

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4国分区占领德国：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也由4国分区占领。但是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战略方针的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苏都是各行其是。唯一的例外是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对德国战犯的公开审讯和判决。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首要战犯被判处以绞刑。在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的空前浩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纳粹罪行辩护。

但是，一涉及到战后德国去向这一问题，美英与苏联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显暴露出来了。美国企图扶植德国，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战略地位为自己的霸权政策服务，便逐步对德采取了分裂和扶植政策，强调德国的统一必须先实行经济统一。1946年7月20日，美国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支持。签订了美英占领区经济合并协定。1947年1月1日成立了双占区。这是美英分裂德国的重要一步。1948年2月至6月召开了美、英、法、比、荷、卢6国伦敦会议，提出一个分裂德国的“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采取协调经济政策的措施，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参加“马歇尔计划”，国际共管鲁尔。伦敦会议建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

6月18日，美英法宣布从6月21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独的货币政策，规定西方占区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B”记马克。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并成为引发“柏林危机”的导火线。

针对美国分裂德国的计划，苏联于6月22日在苏占区开始实行货币改革，发行加上特别印记的“D”记新马克，并于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柏林危机”由此爆发，并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6月25日，美国派出大批飞机向西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和各种日用品。同时，美英法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11月，苏占区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机构。12月，西占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大柏林市正式分裂成两个城市，各有独立的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斗争，双方于1949年5月5日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召开4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引起的诸问题。“柏林危机”暂趋缓和。

美国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柏林封锁刚结束，西德于5月23日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法》，确定波恩为首都，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必须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清除战争工业，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但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则是要实现近百年

来使日本臣服于美国的梦想，从而带来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在日本投降前夕，美国政府已决定要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日本投降后盟国曾就最高统帅人选问题进行磋商。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建议最高统帅“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怒气冲冲地说，“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苏方的这一建议被美国断然拒绝。美国提出的麦克阿瑟成为盟国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趾高气扬地说：“我是8000多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建议成立苏、美、英、中4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又遭拒绝。经过反复斗争，才在1945年12月美英苏3国外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两个机构，一是远东委员会，作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决策机构，由苏、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11国组成；另一个是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苏、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组成。两个委员会的职权，在形式上有限制美国的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改变不了美国控制日本的局面。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3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2页。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开始

一、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酝酿和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

前已提到，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夏对未来有三怕。”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主义。二是技术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第三怕是经济上的，随着和平的来临，经济会重新转向衰退。避免经济萧条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外贸易，但如果世界其他地区对基本工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关闭其市场，美国就无法在海外竞争。”这第三怕带有根本的性质。当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外国经济形势面前反而变得脆弱起来，美国日益依赖世界各地的资源和市场。

就战后初期而言，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大量军事订货的消失和大批军人复员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五角大楼原计划两年内仅让200万人退伍，但结果，由于一场争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园的运动，使得退伍人数一下子达1200万之巨。美国当权人物惊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维持充分就业，就可能再来一次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大危机，那将威胁整个制度的安全。出路何在呢？就是向全世界扩张市场，一位美国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行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

这样，向全世界扩张，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这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由1898年以后的海外扩张转向1945年以后的全球扩张，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走上了新阶段。在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军人认为，凭着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弹，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取代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似乎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野心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在战后达到空前高度时，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看来，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苏联经济虽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增强，军队数达1200万人。战后仍保留三四百万人，并拥有精良的装备。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的直接间接援助下，从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

约瑟·夫·M·琼斯：《十五个星期》，纽约，1955，第166页。

斯蒂芬·安布鲁斯：《全球主义的兴起——美国外交政策，1938—1980》，纽约，1981，第16页。

见希瓦切夫与雅可夫合著《美国现代史》，俄文版，1980，第156页。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纽约，1980，第10页。

是美国实现其称霸计划的一大障碍。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俄国控制了东欧……导致冷战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东欧的解放成了美国公开反苏的直接动因。第二个障碍来自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积极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扬。战后初期，这些力量成为反对侵略，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力军。显然，不把这股势力压下去，美国的全球霸权也是一句空话。第三个障碍来自觉醒了的亚非人民。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人民在共产党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同敌人英勇战斗，在战时同盟国武装部队中，有很大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成为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生力军，也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大心腹之患。

美国把以上障碍最终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美国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正是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称霸计划，导致二战期间的美苏同盟的破裂和美国对苏“冷战”“遏制”的开始。

“冷战”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提出的。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指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冷战”一词公开出现。1946年2月21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按美国政府的要求向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文，主张美国应采用军事包围、经济封锁、颠覆、局部武装干涉和持续政治冷战的办法来遏制社会主义苏联的发展。李普曼则发表文章反对凯南的主张，认为美国应用脱离接触政策代替遏制政策。1947年李普曼把他的文章汇集成《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一书公开出版，冷战作为政治术语遂为各界普遍采纳。

“冷战”首先从波兰问题开始。早在1944年7月2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即卢布林政府），美国对此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在伦敦的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并千方百计使这个政府合法化。1946年1月初，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攻击苏联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他还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了“警察国家”，扬言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转变，美国就不予以承认。同年初，美国还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以扩大事态。

苏伊争端源于撤军问题。大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但德国人利用伊朗国土大肆活动。1941年8月苏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南部中部。波茨坦会议期间，苏美决定，对日战争胜利后半年内苏英美3国撤军。届时，英美军队撤出，苏军未动，并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

斯蒂芬·安布罗斯：《全球主义的兴起》，第93页。

如当时法共拥有法国选票的1/4，几乎全部是工人阶级的选票。意共拥有1/3选票。法共控制了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纽约，1982，第4页。

“遏制”一词，第一次公开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术语见于凯南1947年7月化名“X”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凯南于1967年称，“我是1947年‘遏制’理论的作者。

1942年10月美军亦进驻伊朗南部。

伊朗政府派兵前去镇压，被苏军挡回。美英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撤军，被苏联拒绝。苏联反问道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军，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暂缓撤出一事却大惊小怪。1946年1月，伊朗政府在美国默许下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于是，战后重大国际危机首先以伊朗问题在联合国出现。英美立即支持伊朗。苏联代表则予以反驳并激烈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的暴行。后来，苏伊通过会议达成协议。5月6日苏军撤出伊朗，这次历时半年的国际危机得以解决。但美国立即乘虚而入，大举深入伊朗。

苏、土纠纷开始于大战末期。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要求。包括把1921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地归还苏联，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陆海军基地等。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美国貌似公允地支持土耳其政府，甚至派遣战列舰“密苏里”号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耀兵于黑海海峡。接着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抛售船舶，企图通过土耳其去控制海峡。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进行的。

正是在这背景下，“铁幕”演说出笼了。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Iron Curtain），这条线背后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高压控制之下”。一般认为丘吉尔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这篇讲话无异于发出公开号召，要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依靠美国的实力，反对苏联和东欧各国。

其实，丘吉尔在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放出一枪并非偶然。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前夕，美国当政者已纷纷为这一枪而进行舆论准备。1月间，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前面提到，2月间美国驻苏代办凯南发回8000字的“长电报”，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电报认为苏联是“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其势力范围，目前，这种努力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和土耳其”等地。凯南认为，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就可以迫使苏联退却。凯南的“长电报”深深博得杜鲁门的赞赏，他立即被召回华盛顿。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当月，福莱斯特就要求国务院允许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

由上可见，美国已决心彻底结束战时对苏合作政策，而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对苏采取强硬的方针，用武力以外的种种措施来“遏制”苏联，对苏进

苏于1945年3月宣称，1925年12月17日签订的，后来在1935年11月7日延长10年的苏土中立条约已经过时，应大加修改。

“铁幕”一词源于戈培尔诋毁雅尔塔协定的一篇演说。他说，由于这个协定允许俄国占领东欧和东南欧，势将使这些地区为“铁幕”所隔离。“在这个铁幕背后，将开始对各民族进行大屠杀，而这种屠杀还可能得到纽约犹太人极大的欢呼”。（1945年2月23日），见〔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页。

行“冷战”。而苏联的某些超出其确保安全的大国主义的错误做法，则被美国利用来掀起反苏歇斯底里和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过是美国统治当局借别人之口发出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冷战”信号。

二、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1947年2月21日，英国通知美国，它因经济极度困难，无力继续支撑希腊右派政府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要求美国自4月1日起承担原由英国承担的任务。这就给了美国以插手希腊的大好机会。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在全国广播，说希腊遭到“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一旦它作为独立国家“殒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一种是“自由制度”，一种是“极权政权”。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至1948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要求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援助。

杜鲁门后来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可见，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希、土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完成。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开始了由局部扩张转变为全球扩张的时代。

三、战后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战后东欧地区有8个国家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8个国家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不仅进一步缩小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地盘，进一步壮大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反帝民主力量，也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保障。因此，这些国家建立后立即得到苏联的承认，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还在本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原料和机器设备。对东欧各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例

美国学者指出，“就希腊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就土耳其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土耳其也是一个独裁政权），杜鲁门所谓两种对立生活方式的说法至少也该说是文不对题的。很清楚，扎耳达里斯统治下的希腊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因此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显然是援助极权主义势力”。（〔美〕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48页。）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2卷，第120，121页。

如，一个美国记者就曾报道当时波兰的情况，由于经济恢复很快，使工人“得到了过去从未享有过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善，多数群众是接受这个新政府的。

此外，东欧各国在苏联帮助和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肃清政府和军队中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对工业、交通、邮电、金融等方面逐步推行国有化等。这些民主改革，使法西斯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势力逐步削弱，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增强，从而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所有上述政策其基本方面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至于苏联当时在东欧的乃至世界的基本政策，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政策。鉴于在二战中的惨重损失，苏联战后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首先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坚决顶住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壓力，打击德、日法西斯势力，保住东欧这块社会主义阵地。当然，斯大林在推行这一政策时，过多考虑了苏联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民族利益，犯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的错误。具体到对东欧的政策，也可称之为“安全带”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即保证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致被帝国主义颠覆；另一方面则是保守的，同时包含着大国沙文主义因素。这就是尽力保证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对各国革命采取并不积极支持的态度。具体对欧洲而言，是保住东欧，放弃西欧。约翰·史各脱在《欧洲在突变中》一书中说，苏联在“东欧建立一条‘安全带’，包括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与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是独立自主的，可以自由安排它们的国内生活，但它们的政府不能对苏联怀有敌意，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都得经过莫斯科的认可”。同时，为安全计，“俄国希望欧洲稳定，就是说没有革命没有内战；社会混乱时很容易发生的骚动，他们极力想避免”，“他们所支持与鼓励的社会主义措施，大抵只限于经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只限于实施的时候不致引起英美剧烈反对的政策。”

苏联的“安全带”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要确保雅尔塔会议上肯定下来的既成事实。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大体上局限于这一范围。

例如，苏联坚持在东欧各国成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这是战后初期苏联不可动摇的方针。正如斯大林 1946 年所说：“不要忘记以下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从当时东欧各国的现实情况和维持同英美的关系考虑，并不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成立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这些政府中，由对苏联友好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占据主要地位。在波兰临时全国统一政府中，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任临时总统；新政府 21 名阁员中，16 名来自华沙临时政府，其余 5 名则给了原伦敦流亡政府的成

纽约时报记者雪奈·格鲁森 1944 年 1 月 2 日和 3 日的报道，转引自 P.F 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纽约，1961，第 247 页。

见斯诺：《美苏关系检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47，第 108 页。

斯大林：《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1946 年 3 月 13 日。

员及波兰国内的其他人士。在捷克，由流亡伦敦的贝奈斯任总统，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理，建立起以捷共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希特勒的前盟国罗、保和匈，苏联驻扎了占领军，并担任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拥有监督这3国执行停战协定的权力。1945年2月，罗马尼亚拉德斯库政府依靠英美支持，执行反动政策，苏联即以盟国管制委员会名义，下令解除拉德斯库政府的武装，并坚持要罗马尼亚国王解散拉德斯库政府，任命左派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阁。然而，苏联并不要求两国立即废除君主制。后来还同意罗、保各自吸收两名反对党人士参加政府，以谋求与英美两国取得妥协。匈牙利的情况与罗、保有所不同，由西方支持的小农党控制了议会多数，并担任政府首脑。苏联对此也没有采取激烈措施，而仅限于打击一些公开反苏、反共分子，逐步发展左派力量，争取群众支持。

但是，有一点苏联是紧抓不放的，那就是对于战前建立“东方战线”时向东欧扩展的地盘它牢牢地抓住不作任何退让，并极力争取美英有关国家正式承认它扩占的领土。1944年9月，盟国分别与罗马尼亚、芬兰签署行政协定，确认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芬兰的贝柴摩等地割予苏联。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同意苏波边界按“寇松线”划分，即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苏联。此后，苏波缔结边界条约，肯定了上述协议。战争结束后，苏联不仅重新取得建立“东方战线”时扩占的领土，还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普鲁士取得了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地区。1945年6月，苏联通过双边条约，将联结苏、波、捷、匈、罗的铁路枢纽、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8月，苏联又根据《波茨坦议定书》从德国得到波罗的海的不冻港——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

这些事实又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

一、马歇尔计划与经互会的建立

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不久，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作为对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

从1946年秋开始，美国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且西欧经济状况又极为严重。1946年冬，西欧出现了百年未遇的严寒，燃料和粮食严重匮乏。欧洲有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赤字，这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法、意、英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法意共产党威信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摆脱自身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在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之后，抛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历数欧洲严重的经济困难，强调挽救欧洲经济的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他宣称：“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这样，美国以“复兴欧洲”为名，行控制西欧之实的计划就抛了出来。马歇尔的演说发表后，“马歇尔计划”这个名词立刻就在美国和世界各国报纸和广播中变成了通用名词。“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他们还秉承美国意旨，决定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前来参加讨论。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号召意识形态战争的批评，又可以将参加与否的责任抛给苏联。如果苏联参加，就经济上讲，对西欧也有好处。西欧需要东欧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何况把苏联经济纳入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更可以控制苏联经济。美国和英法估计苏联将不会参加，那样他们就可以推卸排苏的责任。6月27日，苏联派遣庞大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建议的会议。由于英法建议欧洲各国就各自经济资源提出报告，然后拟出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大纲。苏联代表认为，这将会要各国泄露本国的经济情报。7月2日，苏联退出巴黎会议。这样，欧洲复兴计划成了“西欧复兴计划”。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正式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欧洲复兴法案（马歇尔计划的法律形式）。根据这一法案，1948年4月至1952年6月，4年时间，美国共拨款援欧131.5亿美元。接受这一法案的西欧国家，他们的经济计划应受美国监督，应撤销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等。这样，就便于美国倾销过剩产品，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有助于防止欧洲因经济崩溃而导致革命。

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马歇尔计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西欧经济渡过了困难时期，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秩序。马歇尔的复兴计划由此而被形容

为“如同抛给正在下沉的人们的救生圈”。到1950年，西欧各国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到1952年，英、法、意工业生产分别比战前增长13%、29%和48%。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的工业生产，到1952年增长为115%。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由于西欧经济恢复较快，到1951年底就提前结束了。

对美国来说，马歇尔计划达到了一箭几雕的目的。既稳定了西欧经济、防止社会动乱与革命的爆发；又使受援国沦为美国的附庸和势力范围，纳入美国全球称霸的战略轨道。对于美国自身经济而言，美国通过国家财政开支，用纳税人交纳的钱去援助西欧，再由西欧向美国购买物资，这样做对美国的商品输出大有好处。“它使那些生怕美国出口不景气的人为之陶醉。”这样，美国统治当局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的计谋与制造商、出口商的热情溶为一体了。

美国除了向欧洲渗透，还把视线转向亚非拉地区。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今后美国外交方面的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第四点为“开发落后区域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国会于1950年6月通过了“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法案。到1951年底，“第四点计划”已扩展到33个国家。从1949年至1953年，美国向亚非拉国家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正是利用这种援助，美国竭力排挤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推行新殖民主义，使受援国在技术上、经济上乃至政治上都形成对美国的依附关系。美国垄断资本则获得巨额利润，1951年就从这些地区获得120亿美元利润，约占美国垄断组织全部利润的30%。正像有些美国教授所指出的，“美援总数的80%给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以此“作为阻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工具”，“援助总额的浮动情况和东西方对抗的紧张程度有明显的巧合。”美国确实想用“第四点计划”，既达到经济扩张的目标，又使之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具。

为了削弱美国的侵略扩张势头，特别是为了阻止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并与该计划相对抗，苏联加强了与东欧各国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联系。从1947年7月起，苏联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贸易、经济协定。与此同时，东欧各国之间也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方把这些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此后，东欧国家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急剧减少，大宗贸易转向苏联和东欧地区内部。苏联同东欧各国的贸易额，由1947年的3亿8千万美元猛增到1950年的15亿2千万美元。3年之内增加了3倍。

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保、匈、波、罗、捷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会议讨论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经互会成立的最初宗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济经验，相互给予技术上的援助，彼此在原料、粮食、机器、装备等方面提供协助”，以实现成员国间更广泛的经济合作。经互会成立不久，阿尔巴尼亚（1949.2）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9）相继参加。经互会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欧洲不仅在政治上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被划分成两部分，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经互会对于促进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有时苏联没有真正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办事，而是搞不平等交易，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利益。例如苏联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迫使波兰提供远比世界市场便宜的低价优质煤，使波兰吃了亏。苏联曾经迫使

托马斯·G·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1900年以来的历史》，第3版，列克星敦，1988，第455页。

见哈罗德·福克纳合著：《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515页。

其他经互会成员国一起对南斯拉夫施加了种种经济上的压力。

这样，战后初期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形成了如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两以前者占优势的对立体系。这种对立体系的存在有其当时的历史必然性。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由于自我封闭于国际经济体系之外，而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

战后初期西欧特定的局势，为美国控制西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6年冬至1947年春，美国逐步形成了对西欧的总政策，即大西洋联盟政策。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就是要“帮助建立一个在军事上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同美国和加拿大紧密结合的繁荣而统一的西欧，使它作为一个强大力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同北美洲进行广泛合作。”这项政策的重点是支持西欧的复兴和联合。

美国认为支持西欧的复兴与联合，有利于改变西欧分散无力、缺乏自信的局面，以一致对付“共产主义威胁”；有利于打破西欧各国的经济壁垒，使西欧成为统一的自由的市场，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铺平道路；还可利用西欧的资源，减轻美国的负担。可见，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需要一个广阔的自由的欧洲市场，而控制了西欧，又进一步为美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作为推行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重要步骤和具体表现，就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情况已如前述。接着便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在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而对欧洲各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同时，是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西欧各国的干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马歇尔计划”追求的一个政治目的。杜鲁门在敦促国会尽早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特别咨文中，就曾表示美国准备把西欧纳入“共同防卫”体系。他说，“要使经济复兴获得成功，必须采取某种对付内部和外部侵略的保卫性措施。……伴随着经济合作的运动又出现了一个共同自卫的运动。”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美国便着手策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遏制”苏联的军事政治集团。战后初期西欧依靠美国重建与联合的政策正好与美国的打算合拍。但作为策略，美国打算待英法把西欧组织起来后，再把它们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后，西欧各国胆战心惊，美国趁机施加压力，促使西欧迅速缔结多边“集体防御”条约。1948年3月，英、法、比、荷、卢5国代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缔结了五国条约，即“布鲁塞尔条约”，有效期50年。这是一项主要目标针对苏联的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集体防御条约”。从表面上看，美国没有参加。但是，西欧在军事上的合作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在开始缔约谈判的那一天，法国外长皮杜尔就致函马歇尔说“只有美国的帮助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英国外交

华德·罗斯托：《从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商务印书馆，1973，第61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3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大臣贝文则说，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定的“集体抵抗侵略的协定”，英国或其他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比、荷、卢3国在缔约谈判中也主张美国参加。这正中美国下怀。在布鲁塞尔条约签字的当天，杜鲁门致函国会，明确表示：“美国以适当的形式，根据需要”，给予这些国家以支持。

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后的第五天，美、英、加代表就在五角大楼开会，商议建立大西洋军事体系问题。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新方向”的“范登堡决议”。它规定，在持续有效的自助和互援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这些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美国国会破天荒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意美国政府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

苏联强烈反对“北约”的建立，多次建议举行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问题，但遭到美英法的一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美国军事战略相抗衡。其主要目标之一是，竭力阻止美国重新武装西德，阻止把联邦德国拉入北约。

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巴黎协定，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参加北约组织。苏联政府于同年11月23日向美国政府和西欧国家发出照会，要求它们不批准巴黎协定。苏联提议在莫斯科或巴黎召开全欧安全会议，讨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的问题，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拒绝。这样，在1954年11月29日到1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欧洲国家保障和平和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波、捷、匈、罗、保、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声明，如果西方国家批准巴黎协定，东欧国家将组成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被正式批准，西德参加了北约组织。5月14日，苏联和东欧8国政府首脑在波兰首都华沙开会，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根据条约，成立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抗衡的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

华沙条约第4条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此外，华沙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进行合作、彼此磋商、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相互尊重独立及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条约有效期20年，如缔约国各方在这一期限满期前一年没有提出宣布条约无效的声明，条约将继续生效10年。条约将在集体安全条约生效之日起失效。

根据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最高机构是政治协商委员会。军事指挥机关是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历来由苏联人担任。

华沙条约组织是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它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欧洲正式出现了敌对的军事同盟体系。

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军事合作关系的合乎逻辑的发

展，是苏联与东欧国家为了抗衡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共同需要。它的成立初期是一个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平的组织。但是，苏联力图通过华沙条约组织控制东欧国家，巩固安全屏障，并享有类似“治外法权”的特权，而东欧国家则要求独立自主。因此，从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之日起，就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执行霸权主义政策，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间的关系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这样，到 1955 年欧洲正式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的剥削阶级的传统影响在外交政策中自行消失，这使得华约后来日益蜕变为苏联霸权主义的工具。两霸相争成为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但由于两个军事集团势均力敌，谁都不敢轻易动武，从而使得近半个世纪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及美日安全条约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实现对日本的领导，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没有采取扶持态度。但从 1948 年起，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已成定局。鉴于亚洲形势的巨变，美国重新研究了日本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迅速调整了它的对日政策。“为了对付中共军事上的胜利，美国的战略家和五角大楼开始研究利用日本的重新武装和人力资源问题。” 1949 年 10 月印度尼赫鲁总理断然拒绝了华盛顿关于进行印美长久合作的建议，日本便成了亚洲唯一可能执行美国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开始考虑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

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以日本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府，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执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为此，美国极力修改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为改造日本所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主要目标。

1948 年 1 月，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竟公开提出：“使日本广泛非军事化的当初的方针，同建设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部分”，新的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是“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 3 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的凯南向麦克阿瑟正式传达了这一新方针：“目前的占领政策是建立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之上的，……这些波茨坦的目标实质上已经达到，因此，它们不能胜任对未来的指导。” 凯南回国后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提出：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的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予修改。凯南还批评美国现行对日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所谓“遏制”，凯南的意见受到美国外交决策集团高度重视。美国为扶植和支持日本的经济，大力加强援助。1948 年 12 月，美国政府制订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的计划，中心内容是紧缩财政金融，抑制通货膨胀。1949 年，麦克阿瑟在新年祝词中宣布：“如今日本复兴计划的重点已从政治转到经济上”。为实施复兴日本经济计划，由银行家道奇担任盟总财政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 4 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 14 页。

转引自周斌：《战后日本的崛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政治考察》，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第 19 页。

顾问。美国想复兴日本经济、加强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加紧完成“单方面媾和”，以谋求日本这个战略基地的合法化。从1949年9月美英法华盛顿会议决定了单方面媾和的方针后，经过两年准备，1951年9月4日至8日，对日和会在旧金山召开。除日本外有51国参加。美国排斥了对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等亚洲国家，否决了苏联的提案和修正案，纠集主要由非对日作战国家凑成的48国与日本签订了片面对日和约。

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未提这些岛屿的归属。这就严重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等国的主权。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要求。

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美日签订所谓《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边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军可以出动镇压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日本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处于半被占领状态，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被确定下来，日本完全被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

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标志着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彻底失败，也是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破产。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就得到苏联的承认，双方很快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了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热情态度。但是，苏联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是持怀疑态度的。“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这一国策无疑是正确的。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甘心所谓“失去中国”。无论从经济、社会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尖锐对立状态。因而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大国的友谊和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这一角度看，“一边倒”是无可奈何，是美国逼着新中国走的这一步。

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6日，以毛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未被邀请，印度、缅甸拒绝参加。

苏、波、捷拒绝签字。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经历》（1950.1—1958.10）一书中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自己找到的，是违反斯大林的意志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同志的道路是正确的。斯大林本人自然也是心中有数。……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我国建国问题时，斯大林就向中国同志表示过，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们为此感到内疚。’斯大林能作这样的自我批评，虽然是在内部谈话中作的自我批评，在他看来是很不容易的。”见该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第4—5页。

见上书，第5页。

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给以高规格的接待。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之间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缔结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为此在苏联呆得很久。斯大林开始犹豫不决，“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他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接着，中苏正式开始缔约谈判。最后，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两国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保证共同采取措施，包括其中一方受到进攻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巩固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在谈到条约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有的学者指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上记载：“据说，苏联将毛主席所乘专列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巧妙地安排在中午十二点整，列车刚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当天下午，“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了毛泽东同志。他一见毛泽东同志，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给予了热情友好的欢迎。“在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于各国领导人之前，紧挨自己并肩站在一起。”见该书第4、5页。

刘晓：《出使苏联》，《世界知识》，1987年第6期，第15页。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2页。

第八章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发展

第一节 战后初期苏联的恢复和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

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之一，它经历这场战争的严酷考验，变得更加强大。战争结束时，其军事实力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一流强国。这时，它拥有近 1200 万人的军队，有上万架飞机和上万辆坦克，而且这些技术装备主要是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苏军驻扎在西起德国柏林、东至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苏联对国际事务的态度还影响着各个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和解决。

但是，苏联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这次大战主要战场之一，4 年多的战争消耗和较发达的西部地区一度被德寇蹂躏，其人力、物资的损失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苏联国防部 1990 年 5 月公布的材料，战争期间，苏联损失的军民总数达 2700 多万人，其中阵亡、重伤致死和被俘未归的军人共 866.6 万人。在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的损失也极其惨重。1700 多座城市、7 万多个村镇、3 万多个工矿企业、6 万多公里铁路、4000 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 万多个集体农庄、1800 多个国营农场、2000 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质损失总计为 6790 亿卢布（按 1941 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的 1/3。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 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苏联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将工作重点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几百万人从武装部门陆续复员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许多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变成“冷战”，这使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强调新的战争威胁，继续采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仍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首位。1946 年 3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国家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为此，计划要求：首先恢复、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其次大量生产主要消费品，并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到 1950 年，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应分别比战前一年增加 48%、27%和 38%；住宅建筑面积要达到 7240 万平方米，约等于 1913 年全国住宅总面积的一半。

苏联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提前完成“四五计划”。苏联人民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为实现并提前完成“四五计划”，重建家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在工业战线，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 1946 年，在莫斯科车工巴·贝科夫和列宁格勒车工根·波尔特凯维奇的倡议下，开展了快速操作运动——金属切削速度由每分钟 70—80 米提高到 1000—1500 米。顿巴斯的矿工们在短期内，从被淹的矿井中排除了 6.5 亿立方米的积水，这等于排干一个面积 70 平方公里、深 10 米的大湖；同时，还修复了 2500 多公里倒塌的坑

道，这相当于从莫斯科到巴黎之间修筑一条离地面 200 米以上的长隧道，使顿巴斯重新成为苏联最大的产煤区。到 1950 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成 6200 个大企业，工业增长速度达 23%，工业总产值比 1940 年增加 73%。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1946 年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1949 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轻工业的生产只增加了 22%，其中的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在农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恢复和振兴农业也采取了多项办法。1946 年 9 月和 1947 年 2 月，联共（布）中央先后通过《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和《关于战后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定纠正和解决侵占集体农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产、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动日贬值、农村党政干部滥用职权等问题。到 1947 年，归还集体农庄的土地达 470 万公顷，牲畜 14 万余头，有 45 万多非生产人员转入生产第一线。为了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950 年联共（布）中央还批判了乌克兰一些地区试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并提出在全国合并小集体农庄的任务。“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向农业提供了拖拉机 53.6 万台（每台按 15 匹马力计算），谷物联合收割机 9.3 万台，恢复并增强了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1950 年，农业总产值恢复到 1940 年的 99%，其中子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粮食产量仅为 8120 万吨，比 1940 年少 1440 万吨，比计划指标少 4580 万吨。

“四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改善。1947 年取消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并进行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5 年中，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在城市和工人区修建住宅 1 亿多平方米，在农村建房 270 万所。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但是，限于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1950 年后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52 年已为 11.6%。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而且质量较差。农业发展缓慢，到 1953 年全苏人均粮食 432 公斤，仍低于 1913 年 540 公斤的水平。集体农户饲养的牲畜头数减少，1952 年比 1950 年，牛减少 8%，奶牛减少 10%，猪减少 6%。如与战前 1940 年相比，则各减少 27%、31%、和 50%。农民负担很重，1950—1953 年间，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了粮食总产量的 60%和全部甜菜与皮棉，以及 60%的肉和奶，而所得的钱还不够用以支付把产品运往收购站的运输费。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报酬很低，平均不到 1 卢布。

二、社会政治生活与联共（布）十九大

战争结束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1946 年 2 月，举行全苏最高苏维埃选举，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3 月，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45—1949 年间，举行了从区到加盟共和国各级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并举行了各级地方苏维埃选举。

但是，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继续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正常。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表大会应每 3 年一次，而从 1939 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中央全会应 4 个月一次，而从 1947 年 2 月以后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也极少召开正式会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斯大林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苏联报刊和一些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颂扬越来越无止境。1949—1950 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列宁

格勒党政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被秘密逮捕，无辜处决。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诬指通敌，其成员几乎全被捕，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等人被处死。1953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著名医生被捕，他们无端被指控用医疗手段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受牵连。

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联共（布）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1945年8月，设立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专门负责培训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及州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1946年广泛建立党的教育网，安排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进修。同时，设立社会科学院，培养理论工作人员，并大量出版马列主义著作，掀起学习马列著作热潮。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召开了全苏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会议，宣布反对在文学、艺术方面放弃马列主义，反对无批判地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号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同时，在文艺界开展了批判运动。在运动中，列宁格勒出版的两本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和《星》首当其冲。1947—1951年，在联共（布）中央倡议下，在全苏学术界又组织了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要求科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生活的现象。但是，在当时美苏冷战开始和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在这次对文艺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广泛批判运动中，对一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论，把许多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进行了批判，错误地禁演了一批电影戏剧剧目，封闭了一批刊物，解除了不少人的职务，逮捕处死了一些无辜的人。

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萨布罗夫作了关于1951—195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纲的建设的报告，斯大林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斯大林在大会前夕（1952年2—9月）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这次大会的指导文献。他在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个人消费品才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个人消费品的交换领域，也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起调节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尚存在矛盾，这必须通过逐步地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使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形成。这次大会给予该书极高评价，强调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我们的一切实际活动，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而实际上，它使苏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更陷于僵化，并在这方面影响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它充分肯定了党在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揭露批评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诸如有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纪律松弛，并存在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

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五计划”。计划规定这5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70%，其中，重工业为80%，轻工业为65%，国家投资比“四五计划”增加1倍。农业方面，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主要农活机械化，谷物

总产量提高 40—50%，国民收入增加 60%。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更改党名称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大会决定把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一党的双重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还决定用中央主席团取代中央政治局，取消总书记一职，并选出了斯大林等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及中央主席团。

三、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开始执政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 74 岁。斯大林逝世，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群众都以不同方式悼念了斯大林。

3 月 6 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全体会议，改组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任命贝利亚兼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军事部长。同时由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作为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被委以“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7 月 10 日，塔斯社突然报导，在几天以前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背信弃义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犯了“反党反国家罪”，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党对国家机关包括保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12 月 23 日，苏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发布关于贝利亚案件判决的通告：贝利亚等 7 人犯叛国罪，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9 月 3—7 日，苏共中央全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认为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提出应改革现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农民的福利等。全会就此报告通过决议，并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调整。经济方面，在坚持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着手对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1）精减管理机构，裁减冗员，下放企业。两年间，撤销了一半以上中央各部的管理司和总管理局，精减了 90 多万名行政干部，把 1.5 万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2）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和企业厂长的经营权，并对信贷、银行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3）改革农、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交售定额。同时，勾销集体农庄和庄员在谷物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对国家的积欠。（4）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并以农产品商品量为出发点制订计划。此外，为了提高谷物和饲料粮的产量，还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由国家投资并动员人力，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等地进行大面积垦荒；二是仿照美国农业，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

在政治方面：（1）在报刊上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批判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如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等。但这时尚未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2）开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如“医生间谍案件”和“列宁格勒案件”等。（3）改组内务部，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把保安工作置于

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同时，成立了以波斯别洛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滥用职权问题。（4）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著名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的第一部，出现以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阴暗面为特征的“解冻文学”。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赫鲁晓夫为此频频出访和会谈。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团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主动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同月，苏联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了苏、美、英、法四大国对奥的占领，并保证奥永久中立。7月，赫鲁晓夫参加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开始了战后大国首脑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9月，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苏同意提前释放德国战俘9626名。同年底，赫鲁晓夫又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

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的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对某些政策变动持不同意见。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1956年6月，莫洛托夫也被解除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及外交部长的职务。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及其初期的发展

一、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战后整个东欧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一地区有8个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先后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人民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东欧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既是第二次大战期间，东欧各国人民奋起打击德意占领军和本国反动派，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也是由于苏军追击法西斯军队进驻东欧地区，而得益于苏联的帮助。根据这些国家获得解放，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某些具体不同特点，可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类似。这两国的共产党是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领导力量，人民政权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

1941年4月，德意法西斯突然进攻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和政府流亡伦敦。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抗击入侵者。同年6月，成立了南人民解放游击总司令部。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国投降后，南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抗击德国占领军。同年11月，在亚伊策召开南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会议，宣布成立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人民政权机关。当时，正举行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会上反希特勒同盟决定承认南人民解放力量，扩大对其武器装备等援助。1944年10月，南人民解放军与入境的苏军并肩作战，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北部沿海地区。苏军随即离南进入匈牙利，南人民解放军继续在国内战斗。1945年春，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陆、海、空三军共约80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并发起了解放全国的总攻势。在德国投降一周后，它解放了全境。根据苏美英雅尔塔协定，南全国解放委员会与流亡政府签订协议，于1945年3月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临时政府。其中有3位流亡政府代表，但他们反对民主改革，于秋天退出政府。11月全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在选举联邦院时获90.5%的选票，在选举民族院时获88.7%的选票。反对派抵制选举失败。11月29日，立宪会议召开，宣告废除君主制，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它包括6个联邦单位，即共和国：塞尔维亚（含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梅托希亚两个自治省）、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以及黑山。铁托任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46年秋，反对派的复辟组织及活动被粉碎。到1948年，在南苏两党两国已公开冲突的形势下，参加人民阵线的几个小民主党派也不复存在。

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国王索古逃亡国外，政府瓦解。1941年11月8日，成立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阿共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反意武装斗争，并于1943年7月建立了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德军接替意军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阿共又领导人民抗击新入侵者。1944年5月，在佩尔梅特市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民主政权的职能。10月，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这时，阿民族解放军已发展到7万人，它乘苏军追击德寇进入东欧的有利形势，以自身的力量解放了3/4的国土。11月17日，解放首都地拉那。29日，攻克最后一座城市斯库台。1945年12月，阿举行立宪议会选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阵线获93%以上选票。1946年1月11日，

立宪会议正式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阿共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当选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和人民保卫部长。针对当时国内出现一些秘密敌对集团和破坏活动，同年底，阿政府明令禁止成立其他任何政党，形成阿共一党独存的局面。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另一种类型。这两国的资产阶级力量较强大，人民政权主要是靠苏联的直接支持建立起来。在巩固人民政权的过程中，斗争也较复杂。

波兰在 1939 年 9 月被德国侵占后，其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分为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依靠西方盟国的伦敦流亡政府所领导的抵抗运动。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武装在西线和盟军共同作战，一部分是在国内活动的“国家军”。另一派抵抗运动是依靠苏联的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在 1938 年被共产国际错误解散后，由波兰共产党人于 1942 年 1 月在华沙秘密建立的。工人党组织了“人民军”开展地下武装斗争。此外，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还组成了“波兰第一军”与苏军共同战斗。1944 年夏，波兰第一军与苏军攻入波境。7 月 22 日，在卢布林市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立即将人民军与波兰第一军合并，扩建为统一的波兰人民军。它与苏军迅速向西推进，直逼华沙。在此形势下，8 月 1 日，国家军抢先发动了华沙起义。起义坚持到 10 月 2 日，沉重打击了占领者，但最终失败，牺牲很大。12 月 31 日，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在苏军直接配合下，各派波军协同作战，1945 年 1 月 17 日解放华沙，5 月 6 日解放波兰全境。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波兰的边界被重新划分，卢布林政府与流亡政府达成协议，于 6 月组成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政府成员共 21 人，工人党占 7 名，社会党 6 名，农民党 6 名，民主党 2 名。社会党领导人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前流亡政府首脑米科拉契克任副总理。但米科拉契克纠集农民党右翼另组“波兰农民党”，反对民主改革和新边界。1946 年 6 月，政府就取消参议院、土改和国有化、西部新边界这三个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经 85.3% 有投票权的公民投票结果，赞同票分别为 68.2%、77.1% 和 91.4%。1947 年 1 月，波举行立宪议会选举，以工人党为首的民主联盟获 80.1% 的选票，波兰农民党只占 10.3%。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当选共和国总统，社会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任新政府总理，哥穆尔卡任第一副总理。米科拉契克在选举中惨败，于 10 月 20 日逃离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在 1939 年 3 月被德国吞并。前共和国总统贝奈斯去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共产党一部分领导人在莫斯科组成国外领导中心。一部分领导人留在国内组成地下党中央，具体组织和领导抵抗运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捷流亡政府被苏联承认，参加了捷民族阵线。同时，在苏联的捷侨组成了志愿军团，随同苏军作战。1944 年 8 月，捷共发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失败，起义军转移山区坚持斗争。1945 年初，苏军与捷志愿军团攻入捷境。4 月 4 日，在科息斯组成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出任总理。5 月 5 日，捷共发动布拉格武装起义，5 月 9 日，苏军开进布拉格消灭了德军，旋即解放全境。1946 年 5 月，捷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共产党获 38% 的选票，社会民主党获 12.1%，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共获 48%，余下为小党所得。共产党人萨波托斯基当选议会主席，贝奈斯当选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任政府总理。在 26 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 9 人，社会民主党 3 人，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 4 名，无党派人士 2 名。

1947年下半年国内发生特大旱灾，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在西方大国和梵蒂冈的支持下，力图利用这一困难和国际冷战形势，把共产党排除出政府。1948年2月20日，12名资产阶级部长集体向总统辞职，制造政府危机。捷共当即反击，坚决要求总统接受他们的辞呈，同时发表告人民书，揭露反动派颠覆民族阵线政府的阴谋。21日，首都10万群众在老城广场集会，支持捷共立场。全国各大城市和工矿企业起而响应。22日，共产党掌握的国家安全局宣布破获一起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随之进行了广泛的搜捕。同时，全体公安军团和工人民兵组织作好战斗准备。24日，全国250万工人总罢工1小时支持捷共的政策。在群众强大压力下，贝奈斯于25日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同意了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6月，贝奈斯也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萨波托斯基出任总理。捷二月事件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三国在战时都是德国的附庸国。三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本国反动政权的斗争更为困难，最后也是依靠苏联的直接支持才建立起人民政权。

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安东尼斯库在德国支持下，于1940年9月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0月，德军进驻罗马尼亚，次年将其拖入对苏战争。1943年夏，罗组成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阵线等组织参加的“反希特勒爱国阵线”。1944年6月，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参加，改名为民族民主同盟。在苏军抵达罗境的有利形势下，8月23日，民族民主同盟联合王室和爱国军官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成立了以王室将军萨纳特斯库为首的王国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声明转向同盟国一边，但它阻挠民主改革。1945年3月，经苏联要求，国王米哈伊任命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成新政府。1946年11月，罗举行议会大选，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政党联盟获胜。退出该联盟的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一些头目在选举失败后越境逃跑时被捕，这些集团的代表被逐出政府。1947年12月30日，国王被迫签署退位书，议会宣布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

匈牙利霍尔蒂政权在德苏战争爆发后，也尾随德国对苏作战。1944年3月，匈被德军占领。战争期间，匈牙利共产党等民主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或被迫转入地下。在苏军解放匈牙利的过程中，它们才恢复活动。1944年12月，在匈共倡议下，所有民主党派组成民族独立阵线，并在德布勒森召开临时国会，组成临时民主政府，对德宣战。1945年4月，苏军解放匈牙利全境。11月匈举行议会大选，小农党获总选票的57.03%，社会民主党得17.4%，共产党得16.95%，民族农民党得6.87%，组成以小农党人纳吉·费伦茨为首的新政府。1946年3月5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农民党等组成“左翼联盟”，要求政府推进民主改革，清洗政府中的反动分子。3月7日，首都40万人集会游行，支持左翼联盟。12月，匈共掌握的保安机关揭露一起“反革命阴谋案”，涉及小农党部分领导人。1947年2月，苏军当局逮捕了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纳吉·费伦茨逃亡国外。8月，进行新的大选，组成左翼联盟占绝对优势的政府。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新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民主德国的建立又属另一种情况。它是在德国战败被四大国分区占领后，在其东部苏占区内组织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四国分区占领德国虽然设有一个总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协调政策，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

国际冷战的出现，各国都力图牢固地控制自己的占领区，并按东西方不同的战略利益塑造德国的未来。1946年8月，美国对德政策出台一个重要新举措，它伙同英国将美英两个占区合并成了统一的经济区。12月，正式成立了“双占区”。1948年2月，法占区也并入成立了“三占区”。6月，美英法在“三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并决定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1949年8月，西德举行了第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在波恩组成了以资产阶级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为首的联邦政府。9月20日，宣布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英法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和国防的权力。

苏联在东占区内积极整肃法西斯分子，打击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大力扶持民主势力。它反对按西方设想的模式统一德国，于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德进行普选。但西占区只有共产党派正式代表与会，美英法坚决反对该决定。1949年5月，苏占区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10月7日，宣布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廉·皮克当选共和国总统，格罗提渥组成多党联合政府，苏联管制当局将行政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这样，就形成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

民主德国是前德国的农业区，资源也较匮乏，加上大战的破坏和战后对苏巨额赔偿，以及按苏经济模式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等，建国后国民经济异常困难，与在“马歇尔计划”援助下的联邦德国日益拉大了差距。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于1953年5月28日硬性宣布增加劳动定额10%，但不增加工资。这一做法引起全国性的群众抗议罢工示威浪潮。6月17日，东柏林的群众示威游行还由于西方间谍的混入和敌方电台的煽动等，转变成为暴乱。苏联驻军出动坦克干预，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政府承认了错误，并提出措施改善人民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苏联也调整对民德政策，宣布免除它尚欠的25亿美元赔偿费，并将33个大企业移交民德政府。1955年9月，双方正式缔结两国关系条约，苏联宣布取消管制委员会为实施对德占领而颁布的法律和命令。至此，民主德国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东欧各国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左翼领袖们的共同努力下，普遍进行了工人政党的合并。1946年4月，德国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了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7月改称共产党）。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11月改组称社会主义工人党）。1948年8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1950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这些国家工人政党的合并，对实现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对巩固各国人民民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给这些国家尔后执政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某些消极影响。

二、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与经济建设

东欧各国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原来的工业较为发达，其他都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村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残余。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存在大地主所有制。1944—1948年间，在各国人民政府领导下，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各国土改的做法大体相同，首先无偿地没收了国内外法

西斯分子的全部土地，然后规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土地，在南斯拉夫是由国家无偿没收，在其他国家是由国家低价赎买。各国的土地限额不一。如：保加利亚是 20—30 公顷，阿尔巴尼亚是 20—40 公顷，南斯拉夫是 25—35 公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是 50 公顷，波兰是 50—100 公顷，匈牙利是 100—200 霍尔特（1 霍尔特 = 0.57 公顷）。国家把没收或赎买来的土地大部分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少部分用以建立国营农场或公用林牧场。农民分到的土地大都不超过 5 公顷。分地的农民，除南斯拉夫外一般规定要付少量地金。土改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战后几年，东欧各国还广泛地有步骤地实行了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即通过法令，首先把外国人和卖国贼的银行和企业无偿没收，然后分阶段将本国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给业主以最低限度的补偿。此外，还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物价实行国家统一管理。如在工业国有化方面，南斯拉夫到 1946 年底，已将所有联邦共和国一级的企业和 7% 的地方工业收归国有。阿尔巴尼亚到 1947 年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已占 97%。波兰在 1946 年 1 月颁布法令，将所有每班雇用 50 名工人以上的企业，或不足 50 人但对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收归国有。捷克斯洛伐克在 1948 年二月事件后，也使 50 人以上的企业国有化。保加利亚到 1947 年底，国家已掌握了整个工业的 93%。罗马尼亚到 1948 年 6 月，已将所有主要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匈牙利到 1949 年底，已将 10 人以上的企业实行国有化。

与此同时，各国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各国损失十分严重。南斯拉夫有 170 万军民献出了生命，占全国人口的 10.8%，工农业损失过半。波兰丧失了 600 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2%，70% 的工厂和 1/3 的耕地被破坏，华沙成为一片瓦砾。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到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各国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各国则按苏联的经济模式，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制订了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展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南斯拉夫最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8—1952），规定 5 年后的工业生产比 1939 年增长 5 倍。但 1948 年苏南关系开始破裂，该计划在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很多。于是，从 1949 年起，南斯拉夫另寻一条以“自治体制”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随着苏南关系的破裂和南斯拉夫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共产党情报局在苏联操纵下发起了反对“铁托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的运动。为此，1948—1952 年，在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部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凡对情报局决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主张根据国情进行经济建设的干部和党员，均遭打击和迫害。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各国都相继加紧实施按苏联模式拟制的经济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从 1949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期间，新建 125 个大工业企业，扩建、改建 109 个企业，工业总产量增加 1 倍。其机器制造业增加 5 倍，按人均计算已占世界第四位。工农业比重从 75 : 25 变为 83.7 : 16.3。保加利亚的“一五”计划 4 年提前完成。到 1952 年，工业总产量已相当于 1939 年的 4 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已上升到 50%以上。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 1950 年开始五年计划建设。匈牙利在“一五”计划期间，要求把匈建成一个“钢铁之国”。1954 年计划完成时，工业产量增加一倍半，钢产量从 86 万吨增到 160 多万吨。在多瑙河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钢铁厂——斯大林冶金联合企业，它既生产钢铁，又制造联合收割机、工作母机、采矿机以及卡车、轮船等。其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供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了农业。罗马尼亚在“一五”计划完成后，一大批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产量超过 1948 年的 2.9 倍，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

波兰第一个建设计划是 1950—1955 年的六年计划。这期间，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工业项目共 1250 项。到 1955 年，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1.7 倍，工业化达相当水平。

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从 1951 年起实施五年计划。民德在完成“一五”计划时，工业产量增加约 90%。阿尔巴尼亚这期间工业产量增加 2.8 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 1938 年的 9.8%上升到 43.5%。

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保加利亚进展最快。到 1952 年，保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52.37%，加上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农业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75%。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的 1/2。匈牙利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在 1955 年达 26.4%。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在 1956 年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9%。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进展较缓，到 1955 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9.2%。

到 50 年代中期，除南斯拉夫外，东欧各国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农业集体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各国教条式照搬苏联经验，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力承受十分困难，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也多实行强迫命令，粮食义务交售指标过高，使农民的积极性受挫。这一切，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在有的国家如波、匈等甚至有所下降。对此，各国群众日益不满。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洲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建国问题上，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三种不同的建国方针。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和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经过1945年秋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严重斗争，达成了协议。但国民党反动派旋即破坏协议，并依恃其军事优势 and 美国的援助，于1946年7月向各解放区实行军事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及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失利，政治欺骗破产，经济危机加深，国统区人民运动高涨，形成第二条反蒋战线，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之中。一些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主张“调和国共，兼亲美英”，但没有起什么作用。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和政策。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深入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日益扩大。这时候，蒋介石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但已无济于事。1948年9月—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蒋介石的假和谈阴谋破产后，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崩溃。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陆续进入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同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困难很多。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而又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国际上，美国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力图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伺机进行侵略和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建国后头三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在党政机关和国营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各项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到1952年底已达历史最高水平。从1950年10月—1953年7月，中国人民还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为社会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3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党和政府又宣布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随着国家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始，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从此，全国人大是新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同时，人民政协仍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作用。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了给国家的独立发展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联系，促进了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经济建设中，最初党曾号召“学习苏联”，但坚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建设，依靠中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加上苏联及其他友好国家的援助，也取得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人民抗美援朝的胜利

第二次大战期间，朝鲜人民革命军活跃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早在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即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此时已迁往重庆。它于1941年对日宣战，并

将其在中国培训的“韩国独立军”编入盟军部队，派往缅甸、塞班岛、菲律宾等地抗击日军。

关于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问题，《开罗宣言》作了原则规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波茨坦会议后，美苏达成一项协议，在日本被打败后，在朝鲜暂以北纬 38° 线为界，分为两个地区由美苏分别受降和军管。后来，在盟军总司令发布的对日第一号命令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后，苏军开进朝鲜与朝鲜人民革命军一道迅速解放了朝鲜大部分地区。8 月 17 日，以朝鲜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汉城成立“建国筹备委员会”。各地人民纷起接管日本殖民政权，成立人民委员会。9 月 6 日在汉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宣告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但是，9 月 8 日美军在南朝鲜登陆后，苏军从其占领的三八线以南的汉城、仁川等地北撤，美国军政府控制了南部地区，解散了各地的人民委员会。从此，南北朝鲜开始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临时军事行动的二八线变成了割裂朝鲜南北方的分界线。

为解决朝鲜问题，1945 年 12 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由美苏的军事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与朝鲜各民主党派协商组织临时民主政府，逐步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但联合委员会长期达不成协议。

1946 年 2 月 8 日，在北朝鲜成立了以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次年 8 月改称北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领导北方人民积极进行民主改革。3 月，它颁布土改法，将日本殖民者、民族叛徒以及占地 5 町步（1 町步约等于 15 市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予以无偿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户。8 月颁布了关于产业、铁道、邮电和银行等部门的国有化法令。翌年 2 月，正式选举产生了北朝鲜人民会议，成立了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在南方，美国则于 1946 年 2 月建立起以长期流亡美国回来的李承晚为首的咨询机构“民主议院”。1947 年 6 月，美李集团宣布成立“南朝鲜过渡政府”。同年 11 月，美国操纵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否决了苏联关于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朝鲜问题讨论的提案，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监督朝鲜普选，建立全朝鲜政府。1948 年 5 月，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美李集团在南朝鲜单独举行了“国民议会”选举。8 月 15 日，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任总统。

针对美李集团在南朝鲜宣布成立“大韩民国”，1948 年 8 月 25 日，北朝鲜劳动党联合南北各民主党派宣布在全朝鲜普选，建立统一的朝鲜民主政权。9 月 2 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组成以金日成为首的内阁。9 月 9 日，宣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底，苏军全部撤离回国。1949 年 6 月，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统一的朝鲜劳动党。同时，党领导成立了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决定为实现“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退”，“为争取祖国尽速统一和反对妨碍统一的卖国贼而斗争”。

1949 年 6 月底，美国被迫宣布美军全部撤离，但留下了一个 500 人的军事顾问团。1950 年 1 月，又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控制南朝鲜。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最初这只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但当天美国利用苏联抵制安理会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指责北朝鲜是“侵略者”。第三天，美国即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7 月 7 日，美国

又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联合国军”由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侵朝军队组成，甚至还有日军参加，但主要是美国军队。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战争爆发第二天，金日成号召朝鲜军民“一致奋起投入打倒和粉碎李承晚卖国政权及其军队的救国斗争”。6月28日，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7月18日—20日，进行大田战役，全歼美军第24师，活捉师长迪安。到8月上旬，已把美、李军队压缩到洛东江左岸釜山周围约100公里的狭小地带，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为了挽救败局。9月15日，美国调集了它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共500多架飞机，300艘军舰和5万多军队，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并直驱朝鲜北方。9月28日，美军侵占汉城。10月19日侵占平壤，继之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的罪行，多次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警告。但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中国只是在吓唬人。10月初，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中国党和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时，全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首次遭遇。它利用敌人未料及中国出兵及其分兵冒进的弱点，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把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接着，中国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军机群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而且气候寒冷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前仆后继，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战局。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其后，又连续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较大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止，中朝军队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人（其中美军11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军战败，4月11日，麦克阿瑟被免职，由李奇微接任。6月23日，苏联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为交战双方所接受。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10月8日移至板门店。战争进入边谈边打、谈谈打打的新阶段。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之久。在这期间，美国动员了它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并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它企图以其海、空军优势，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对此，中朝军队则利用不同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小胜，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年中又歼敌72万人（其中美军近3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志愿军空军也得到苏联支援开始出战，后勤运输保障也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时已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1年多的克拉克，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朝鲜停战协定》确定：以北纬38°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一非军事区；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

鲜问题。但是，美国长期不愿就此问题和朝、中方面达成协议。尽管如此，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从朝鲜撤退，并于1958年10月已全部回国，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和中国无意在外国驻军的立场。

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它最终以朝中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个胜利揭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增强了朝中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原存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因此深受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和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和法国维希政府共同统治越南。1941年5月，在印度支那共产党倡议下，越南各党派和团体组成了越南独立同盟，建立起人民武装，同日、法侵略者展开斗争。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日本妄图保住印支这一重要战略基地，于1945年3月9日突然发动反法军事政变，接管了全部法国殖民机构，独占了整个印度支那。随即在顺化扶植保大皇帝组成傀儡政府，宣布越南为“大东亚”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5年3月12日，印支共产党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建立人民政权。5月15日，宣布正式成立越南人民解放军，统一了全国革命武装。6月4日，越盟干部会议决定，将越北6省解放区进行合并，成立解放区临时委员会，统一领导人民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印支共产党中央和越盟总部立即决定，发动总起义。8月16日，在宣光省的新潮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夺取政权、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实行民主改革等十大政纲，选出以胡志明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当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北越太原省城。17日，河内数十万群众在印支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示威游行和政治总罢工，继而转变成武装起义，于19日占领全市。23日和25日，又先后夺取了顺化和西贡。经过近半月的紧张战斗，人民革命政权普遍建立起来。24日，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发表退位宣言，越南八月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胜利。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法国拒绝越南独立，企图依靠英美重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根据波茨坦会议一项协定，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军队以北纬16°线为界，分别开进印支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9月23日，法军随英军开进，占领了西贡。越南人民奋起反击，南方抗法战争开始。

1945年11月25日，印支共产党中央发出“抗战建国”指示。1946年1月，越南全国进行普选。3月召开国民大会，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印支共产党中央提出“以和求进”的方针。1946年3月6日和9月14日，先后签订了《越法初步协定》和《越法临时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越南承认越南是“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并同意1.5万名法军进驻北方，期限为5年；越法之间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等。

但是，在 1946 年 3、4 月间英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队撤离前后，法国在英美支持下往越调进了大批部队替代换防。同时，法国还重返老挝，占领了柬埔寨。它部署就绪即公然撕毁协定，于 12 月 19 日对河内发起全面攻击。从此，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法国投入近 10 万陆、海、空现代化兵力，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在越北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发动总攻。越南人民军新建，仅有 2 万人，武器落后，又无任何外援。它在进行了河内等城市的保卫战后，转移至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抗战一年多，人民军收复太原、宣光等地，队伍发展到 10 多万人。

1948 年春，法国增派 15 万兵力到越南，改而采取“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战略，对南方占领区进行“绥靖”，对北方解放区进行“蚕食”、“扫荡”和“封锁”。同年 5 月，它在占领区开始建立傀儡政府和军队。1949 年 6 月，又扶植保大建立傀儡“君主立宪国”。美国很快承认了保大伪政权，并与法国签署了《军事财政援助协定》，积极支持法国扩大印支战争。但越南人民军在 1948 年—1949 年的东北、西北地区反蚕食、反扫荡的一系列战役中取得胜利，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越南人民抗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 年 1 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援越。9 月，在中国的支援下，越军发动北部“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打通了长近 1000 公里的中越边界线，取得了北方战场的军事主动权。这时，越人民军发展到 30 万人。1950 年，在老挝建立起以苏发努冯亲王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在柬埔寨也成立了“高棉自由战线”和民族解放委员会。1951 年 3 月，越、老、柬三国举行联盟会议，加强了印支三国人民的抗法统一战线。

1951 年 2 月，印支共产党召开了“二大”。大会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和统一，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残余，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并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越南劳动党。其后，在解放区逐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抗法斗争的开展。

越南军民再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把越北的敌军压缩到奠边府一隅。1954 年 3 月 13 日，在中国顾问团的直接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发动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经 57 昼夜激战，歼敌 1.6 万余人，占领了法军司令部，活捉了法军司令官。越军在奠边府大捷，改变了整个印支战争的形势，对正在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4 年 4 月 26 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 23 个国家。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未能达成协议。5 月 8 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奠边府战役的结果，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在法国人民一片反战声浪中，6 月，法国政府换马，国民议会通过了停止“肮脏战争”的决议。7 月 21 日，与会国家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通过了会议最后宣言。

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北纬 17° 线以南、9 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越军在线北集结，法军在线南集结；与会国保证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印支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

美国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而是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它将不使用武力威胁来妨碍协议的实施。但是，1955 年 10 月，在美国指使下，南越组

织了“公民投票”，成立起所谓“越南共和国”，由从美国回越的吴庭艳担任“总统”兼“总理”。从而此后一个时期，正式形成了两个越南并存的局面。

四、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称“外蒙古”，原属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的策动下，脱离清政府管辖，宣告自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1921年3月1日，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它领导蒙古人民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同年7月11日，蒙古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这年8月召开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1940年6月颁布蒙古新宪法，它宣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它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中蒙关系，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是，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秘密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中，苏联为参加对日作战而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随后，美国将这一协定内容通知中国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予以同意。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谈判，于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国民党政府表示，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了关于蒙古独立的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2月27日，蒙古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6日中蒙两国正式建交。

在经济方面，蒙古革命前的整个经济是建筑在游牧业基础上。从30年代开始，在苏联帮助下才建立现代工业部门，如煤矿、发电厂等。公路、铁路也开始修建。1940年，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15%和国民收入的10%，全国已有工人3500人。蒙古参加对日作战胜利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194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接着又实施三年计划（1953—1956）。这些年，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经济发展较快，又建立起一批轻工业、食品加工业、燃料工业和采矿业。到1957年，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41%。其中，国营工业占77%，合作社工业占21%，私人手工业占2%。工人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1/4。同时为发展畜牧业，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义务劳役制，超额养殖的牲畜免税，国家几次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建立马拉割草机站，扩充兽医网等。“一五计划”期间，畜牧业增产8.7%。到1957年又比1952年增加11.6%。在农牧业合作化方面，到1957年底，全国99.3%牧民参加了合作社，农牧业合作社拥有的牲畜占全国牲畜头数的77.3%，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但是，这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粮食主要依赖进口，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蒙古农业变化较大。它陆续垦荒100多万公顷，耕地增加20倍，国营农牧场生产的谷物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在乡村和草原出现了许多小城镇和一支新型的农业工人队伍。1962年，蒙古加入了“经互会”。此后20多年里，经互会各国特别是苏联，通过双边及多边合作形式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蒙古利用这些援助，兴建了200多个项目。这时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近10%。到1983年，工业产值已占社会总产值的65%，农牧业占35%，社会总产值增加了3倍，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提高。但是，蒙古的大多数建设项目投资效益不高，产品质量低劣。受苏联、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从1984年起，蒙古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也着手进行“完善经济机制”的试验和改革，并日益加强和扩大它与中国及其他非经互会国家的经济、文化联系。1991年，蒙古则开始全面转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大量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

在政局方面，1923年苏赫巴特尔遇刺身亡，乔巴山继任蒙党政最高领导人。1952年乔巴山逝世后由泽登巴尔继任。1954年达姆巴当选为蒙党第一书记，但他因提出“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被指责为“怂恿和支持民族主义”而于1958年被解职。此后，泽登巴尔又成为党政第一把手。1974年，巴特蒙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1984年起兼任党的总书记。1991年2月，总书记一职改由达希云登担任。随着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形势的变化，1990年蒙古也开始实行多党制，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新议会和联合政府中占主要地位。它声称更新社会主义，将实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1991年8月，新议会通过决议，禁止高级官员属于任何政党。据此，这时担任总统职务的奥尔其巴特和总理滨巴苏伦等相继退出人民革命党。同年11月，议会通过新宪法，改国名“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古”，明确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随着蒙古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转轨，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其从蒙古撤退，长期依赖苏联的、薄弱的蒙古国民经济，正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

第九章 资本主义国家的恢复与发展 (战后初期至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第一节 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战后初期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力量的对比。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欧被严重削弱，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

大战期间，美国由于有两大洋作为天然屏障，战争远离本土，生产能力没有受到破坏。不仅如此，美国经济由于受到世界范围内大量军火和粮食需求的刺激而急剧地增长。1941 年 3 月至 1945 年 12 月，美国作为“民主阵营的兵工厂”，通过“租借法案”，向英、苏等国供应了约 491 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和粮食。这一方面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1940—1944 年，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达 16.9%。1945 年同 1939 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扩大了约 40%。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9 年的 886 亿美元上升到 1945 年的 1350 亿美元。

战后初期，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出口的 1/3、黄金储备的 3/4、谷物收获量的 1/3；它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大大加强。与此同时，其主要竞争对手则严重削弱，不得不仰仗于美国的援助。1947 年 6 月，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感慨道：美国“今天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了全世界财富的 30%左右。而今天，美国则掌握了大约 50%。”

美国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凭借强大的经济后盾，军事实力也急剧膨胀。1939 年，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只有 33.5 万人，国防预算不过 10 亿美元，到 1945 年战争结束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 1212 万人和 800 亿美元以上。美国拥有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 1200 多艘战舰和 5 万多艘供应、登陆船只，它的海军舰艇吨位达 380 万吨，大大超过英国的 150 万吨，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它的 15000 架远程飞机几乎垄断了整个洲际空中运输。战后初期，美国在 56 个国家驻有军队，在国外建立了 484 个军事基地，还垄断了原子武器。美国已成为全球性军事强国，它的军事力量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和苏联相比也处于明显优势。

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二次大战期间，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科学研究，1941—1945 年间，受雇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从 8.7 万人增加到 19.9 万人。同时，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大批世界第一流科学家流亡美国，从而使美国拥有了空前的智力优势。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就是来自各国的科学家通力合作的产物。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标志人类大规模利用

托马斯·佩特森：《美苏对抗》，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3，第 11 页，脚注 41。

战后由于大规模复员曾一度下降到 150 多万，不久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军队再度扩展，人数上升到 300 多万，此后长期维持这一水平。

原子能时代的开始。

1945年底，美国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标志着世界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开端。战争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战后美国作为世界科技中心的地位，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国家。

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客观上把美国推上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位置，确立了它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它凭借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的经济、军事实力，公开追逐世界霸权。1945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

二、1945—1969年美国经济的发展

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947—1953年的初期繁荣阶段。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完成了从战争时期经济到平时期经济的转变。1947—195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9%，工业生产年均递增6.6%。虽然在1948—1949年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但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经济又出现了“战争景气”。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达到8.7%和15.7%，均创战后最高纪录。战后初期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繁荣，是由于存在着刺激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居民在战时受到压抑的对住宅建筑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急需得到满足；战时被迫减少或暂时停下来的固定资本更新需要大规模进行；军工技术转入民用；西方世界为重建本国经济需要美国援助；朝鲜战争的刺激。

（2）1954—1960年的经济低速增长阶段。其间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5%和2.7%。之所以出现这种低速增长局面，主要是因为：第一，战后初期刺激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有利因素逐渐消失；第二，这一时期美国遭到了三次经济危机的打击。这三次危机分别发生在1953年9月—1954年4月，1957年3月—1958年4月和1960年2月—1961年2月。由于多次发生危机，因此美国经济在此期间升升降降，低速增长。

（3）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从1961年2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持续上升了104个月。这样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其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4.3%和5.9%。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分别为5037亿美元和1883美元，到1970年分别上升到9741亿美元和2579美元。60年代，美国农业几乎全部实现了电气化，在经营管理上则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1947—1970年间，美国农业人口减少了2/3，从占人口比例的1/6降至1/20，但美国农畜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输出国。

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推动。从美国首先兴起的这次科技革命促进了新工艺、新产品与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老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据统计，1953—1973年，美国取得了65项突破性发明创造，其中绝大部分是在60年代研制成功的。1970年美国的技术出口占美、英、法、德、日5国总和的71.1%。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美国政府扩大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加紧推行凯恩斯主义的

反危机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三，依赖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刺激。60年代，美国发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使国家长期保持高额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经济、特别是刺激了与军事有关的工业的增长。美国的军火输出1953年为1.9亿美元，1970年达到14.8亿美元。

第四，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廉价原料和燃料。美国对外投资从1946年的187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55亿美元。1960—1970年，美国从直接投资一项中就获得623亿美元的利润。1950—1970年，美国跨国公司从第三世界掠走的利润达1400亿美元，为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掠资的4.8倍。1946—1970年，美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历年累计超过1006亿美元。1949—1970年，美国从廉价石油（当时每桶石油为1.5美元）得到好处。

第五，这一时期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同垄断资本利润迅速增长、投资日益扩大有密切关系。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1947年为201.9亿美元，1972年达546.2亿美元。利润的膨胀引起了投资的扩大。美国私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按1972年价格计算，1951—1960年为597亿美元，1961—1970年达928亿美元。投资增加使再生产扩大。

上述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诸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用凯恩斯主义办法扩大需求，必然引起通货膨胀；通过国民经济军事化来刺激经济，必然削弱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基础。60年代美国发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曾一度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危机终于在印度支那战争高潮的1969年10月爆发，结束了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三、1945—1969年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继任总统；1948年又竞选连任总统获胜。杜鲁门政府推行称之为“公平施政”的社会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制定充分就业的立法。1946年2月，国会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负责协调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计划、职能和资源，为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授权总统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制订出旨在防止经济衰退、保持充分就业的财政金融政策。《就业法》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置于联邦政府的肩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因而是一项重要的立法。

第二，实行廉价民用住宅建造计划。1946年国会通过两年内为退伍军人建造270万套住房的紧急住房法案。1949年国会通过《全国住宅法》，授权总统在6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造81万套廉价住房，并为城市清理贫民窟和改善农村住宅提供大笔贷款和援助。

第三，扩大社会保险范围，提高最低工资限额。1950年1月，杜鲁门提出的公平劳动标准法（即工资工时法）修正案生效，工人的最低工资由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同年8月，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的几项修正案。据此大约增加了100万新受益人，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1952年又将养老金增加12.5%。到1953年受联邦老年和遗属等保险的有4500万人，受联邦和州政府合办的失业保险的有3500万人。

第四，扶植农业。1949年10月国会通过农业法，规定到1950年底，农

产品价格维持在平价的 90%的水平。

此外，杜鲁门还提出了关于实行国民健康保险等法案，但未被国会通过。

“公平施政”基本上是罗斯福新政这种社会经济改革在战后初期条件下的继续，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远远逊色于新政。这是由于在经济繁荣时期，垄断资产阶级不愿轻易向劳工作出大幅度让步；同时，杜鲁门政治上的反共反民主倾向以及对外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不能不对他的“公平施政”起制约作用。从根本上说，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美国不可能对各阶级“公平施政”，也不可能对国民收入进行“公平分配”。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这是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执政20年后入主白宫。1956年艾森豪威尔又连选连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回到共和党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老路，而是改行一条介乎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新政式的国家干预之间的“中间道路”，即所谓“现代共和党主义”。一方面，针对杜鲁门政府遗留的通货膨胀等问题，试图用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原则办事，削减开支，平衡预算，降低国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把一些属于联邦政府的工厂卖给私人公司。到1954年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朝战争中移交给联邦经济总署的154个工厂中，有101个被出售，36个被出租。另一方面，又基本上沿袭民主党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例如，1954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两度扩大社会保险范围，1958年又提高救济金额，放宽退休年龄。到1960年，得到社会保险法保护的人达到5800万。社会福利开支由1955年的326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522.9亿美元，占政府全部开支的38.4%。1955年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5美分提高到1美元。尽管国会两次拒绝总统关于联邦参与全国健康保险计划的要求，但联邦在公共卫生、医学研究、医院建筑等项目的开支还是从1954年的2.9亿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近10亿美元。在资助教育事业上艾森豪威尔政府非常吝啬，只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人震惊不已时，国会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于1958年9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规定对大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如贷款学生毕业后到中小学任教5年，贷款可减半偿还。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有条件的支持农业价格政策。根据1958年8月签署的农业法，对主要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到1961—1962年度下降至维持平价的65%。鉴于战后黑人民权运动蓬勃发展，1957年通过了民权法，成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各种阻挠黑人投票的诉讼。同年秋，政府还派军队到阿肯色州小石城，制止阻拦黑人学生入学的不法行为。

现代共和党主义是传统的共和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折衷，是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问题上进行折衷调和。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矛盾的产物，适应了美国5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1960年民主党人肯尼迪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选总统。60年代初的美国正处在战后科技发展的颠峰时期，但同时又面临着苏联在空间技术上的挑战以及西欧和日本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进行的激烈竞争。于是肯尼迪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开拓“新边疆”的口号，宣称要探索“未知的科学和空间领域”，征服“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解答“尚未解答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对外是争夺世界霸权，对内是实行社会经济改革。他的国内“新边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由联邦提供经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稳定物价、改建城市贫民窟、改善老人医疗、援助教育事业和农场主、开发和

保护国家资源、发展空间技术、改善社会保险、结束种族歧视等。但是，肯尼迪提出的援助教育法案、医疗保健法案以及民权法案等一系列法案都被国会所否决。肯尼迪在争取立法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有：（1）1961年通过新住房法，授权总统以49亿美元实施为期4年的地方城市更新计划；（2）将最低工资在两年内由每小时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3）1962年国会通过了贸易扩大法以及加速折旧、延期纳税和投资税优惠等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法案。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工资—物价指导线，规定工资和物价的增长不得超过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3%。肯尼迪政府制定了发展空间技术计划，开始实施规模巨大的阿波罗工程。肯尼迪执政前的两任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曾努力避免不平衡预算和赤字财政，赤字开支只是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复苏，政府即削减开支，实行平衡预算，依靠市场自由调节。肯尼迪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在经济正常时，也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把它作为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长期赤字财政政策标志着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加强。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又竞选连任获胜。约翰逊一上台就宣称要继续肯尼迪开始的事业，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未完成的“新边疆”的主要立法。1964年5月22日，约翰逊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说，声称“美国不仅有走向一个富裕社会和强有力的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社会”。从此，“伟大社会”就成了约翰逊内政的标签。在约翰逊任内，国会通过了435项法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立法成就，主要内容有：

第一，调整征收所得税的幅度。1964年通过的税收法规定，将最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从20%降为14%，最高收入阶层所得税从90%降为77%。

第二，扩大联邦政府对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干预。在教育方面，国会先后通过了60多项法案，大大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教育开支，促进了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改善了黑人和穷人的教育状况。其中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联邦政府对中、小学普遍进行援助的法律。同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贫困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和低利贷款，至少使100万贫困大学生得以继续深造。在医疗卫生方面，国会通过了40多个法案。其中医疗照顾法规定，凡符合参加社会保障制度和铁路职工退休制度条件的65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此外，医疗援助法规定，对低收入家庭和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一般家庭提供医疗补助。约翰逊在教育 and 医疗立法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得意地自诩为“卫生和教育总统”。

第三，改善和发展城镇居民住宅，保护环境。1965年通过的住房和城市发展法规定：建造低租金公共住房24万套，联邦拨款29亿美元用于为期4年的城市改造。次年通过的《补充法》又规定提供资金补贴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房租。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包括保护水质，控制污染；制订大气质量标准，推行控制废气计划，以及保护和美化自然环境等。

第四，提出了一系列反贫困计划。内容包括：给失学、失业的城市青年进行职业培训；组织“街道青年服务队”，为失学、失业青年提供工作机会；给贫苦学生提供临时工作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勤工俭学来支付大学学费等。此外，约翰逊政府还把改善贫困地区的状况作为向贫困宣战的重要内容。

1965年通过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与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开发落后地区的计划，大大加强了联邦政府协调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作用。

第五，保障黑人民权，缓和日益尖锐的种族矛盾。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由非暴力的和平示威发展为武力抗暴。面对黑人如火如荼的斗争，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对黑人的要求作出让步，先后促使国会通过了三个民权法案：（1）1964年民权法，规定黑人可以同白人一样享用旅馆、饭店、娱乐休息等公共场所，禁止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2）1965年《选民登记法》，禁止在选民登记时采取文化考查和其他歧视性措施；（3）1968年民权法（又称《开放住房法》），禁止在出售、出租住房时实行种族歧视。

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是一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它是在美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新条件下，加强美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企图通过国家的力量适当调整各个阶级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政治上缓和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从经济上适应科技革命对劳动力再生产提出的新要求，从环境上解决工业化社会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从而实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把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推行长期赤字财政为核心的“新边疆”和“伟大社会”，固然在一个时期内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它导致了60年代中期后美国历史上持续的通货膨胀，结果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新边疆”和“伟大社会”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是在对外不断扩大侵越战争的条件下推行的。在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期间，军费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0.2%。浩大的军费开支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迫使约翰逊在60年代中期后缩小“伟大社会”计划的实施。面对重重危机，约翰逊在1968年无可奈何地宣布退出竞选连任总统。执政8年的民主党又离开白宫让位于共和党。

四、1945—1969年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财团势力进一步发展，它们不仅支配着美国社会经济，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同国家政权的结合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企业界、政界、军界的相互交错和渗透是战后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杜鲁门是摩根财团的政客，并与西部财团有密切联系，有50个大资本家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艾森豪威尔上台是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财团争夺和妥协的结果，他的政府是有名的“富豪内阁”。《新共和》杂志说它是“8个百万富翁加1个管子工”（管子工指劳工部长、管子工和汽车装配工会主席马丁·德尔金）。肯尼迪上台是洛克菲勒财团实力增强的反映。在他的政府中，国务卿腊斯克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福特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财政部长狄龙是狄龙—里德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约翰逊入主白宫，其背景是南部和西部财团的崛起。历届政府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不是资本家就是与垄断资本有密切关系的人。垄断组织与政府机构人员的互换达到很大的规模。从1967年7月—1971年12月，有232名军工垄断组织领导人进入国防部，同时有1101名中、高级军官转入私人军工企业任职。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趋紧密，国家政权愈益成为“总资本家”。

战后初期，在美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极其反动和黑暗的时期，其突出表现就是所谓“忠诚调查”和麦卡锡主义。

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第9835号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令。根据这项法令，联邦调查局和文官委员会对联邦公务员进行“忠诚调查”，结果有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是发表了不同的政见。

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反劳工的立法，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47年6月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即《劳资关系法》）和1950年9月通过的《麦卡伦法》（即《国内安全法》）。《劳资关系法》规定：禁止全国性同行业工人集体谈判；禁止工会与资方订立只许雇用工会会员的合同；禁止举行政治罢工、同情罢工和工人的纠察活动；罢工前要有60天“冷却期”，法院有权颁布80天内不准罢工的命令；工会得向政府机关报告有关会员人数、领导人及工会会费使用情况，禁止将工会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禁止在工会中容纳共产党人。这一法律从根本上修改了1935年的《华格纳法》，取消了工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争得的工会权利。《麦卡伦法》规定：共产党或所谓“共产主义外围组织”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提供有关财务和组织的全部情况；禁止共产党员在政府机关和国防企业工作；禁止发出国护照给共产党员；禁止共产党人或任何属于“极权主义组织”的外国人移居美国。

在上述这种反动政治气氛下，麦卡锡主义便应运而生。

1950年2月9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费林城发表煽动演说，虚构“共产主义威胁”和“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声称有205名共产党的“颠覆分子”钻进了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要求进行清洗。麦卡锡的演说得到一些财团、反共组织和社会右翼势力的支持；共和党人也曾把麦卡锡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发起攻击。从此，在美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潮流。麦卡锡利用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和政府工作委员会委员的职权，在朝野上下搜集黑名单，制造恐怖舆论，进行非法审讯，采取各种法西斯手段诽谤、攻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和无辜人士，造成指控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的“共产党间谍”案和迫害“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案，清洗国务院中对中国共产党持较客观态度的“中国通”费正清、谢伟思、范宣德、柯乐博等人。他大肆攻击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称民主党执政的20年是“叛卖的20年”。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麦卡锡自恃为共和党上台效力有功，从此居功自傲，更加飞扬跋扈，变本加厉地干预政府和军方内部事务。麦卡锡的猖狂活动不仅激起各界人士的义愤，也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恐惧。1954年4—6月，麦卡锡在陆军听证辩论中被击败。1954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主义从此完全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在美国仍然极其猖獗，占美国人口11%的黑人仍然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直到50年代，还有13个州在交通、公共场所和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到60年代初，南部的几个州和首都旁边的弗吉尼亚仍然保留以征收人头税作为参加选举条件的法律。据调查，1950年黑人的失业数是白人的两倍；1952年黑人的工资只及白人的1/2。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黑人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1955—1956年，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公司种族歧视的罢乘运动，迫使地方法院作出了

不准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判决，最高法院于 1956 年确认了这一判决。1960 年，黑人群众举行静坐示威，抗议在商店、餐馆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1961 年春，美国民权组织发起“自由乘客”运动，迫使南部诸州取消州际公共汽车乘坐上的种族隔离制。1963 年 3 月，金牧师等人在伯明翰组织抗议种族隔离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伯明翰事件后，民权运动队伍迅速扩大。1963 年 8 月举行了有 25 万人（其中 1/4 为白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进军，要求就业，要求自由、平等。金牧师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向华盛顿进军将战后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峰。另外，有些城市黑人还开展了以暴力抗击暴力的斗争。1968 年 3 月，金牧师组织“贫民进军”（亦称“穷人运动”），4 月 4 日途经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时被种族主义分子刺杀。这一事件激起了黑人更大规模的抗暴斗争，抗暴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 172 个城市。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迫使美国国会和政府 60 年代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法令。

60 年代中期美国不断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后，美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在一起，给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猛烈的冲击。

第二节 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及其走向经济大国

一、战后初期日本的民主化改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排除其他盟国，单独制定占领日本的政策。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对日占领初期基本政策》，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宣称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美军占领初期，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要求下，占领当局推行非军事化政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及撤销其军事机构；（2）逮捕和审判战犯。1945年9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了以东条英机为首的39名甲级战犯，以后又陆续逮捕了104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8年11月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荒木贞夫等16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2人有期徒刑；（3）进行政治整肃。1946年1月，盟军总部发布整肃指令，宣布取缔一切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党、社团组织，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到1948年3月整肃结束时为止，有201815人受到整肃。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整肃对象基本上全部被解除了整肃。

在推行非军事化政策的同时，从1945年9月起，美国占领当局在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推动下，在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主要内容有：

第一，修改宪法，改革政治制度。1945年10月，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修改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新的《日本国宪法》，翌年5月3日正式实施。通过修改宪法，改革了日本的政治制度，主要表现在：（1）取消了天皇总揽国家统治大权的权力，天皇只是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天皇本人于1946年1月1日发表《人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的神权。（2）改革了日本政治制度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法西斯军国主义因素，确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新宪法取消了贵族院，设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均由选举产生；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内阁由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对议会负责，行使行政权，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职人员。这样，内阁就由原来从属于天皇、军部的行政机构变成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内阁。新宪法改变了天皇是法律最高主宰的状况，扩大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3）新宪法扩大了日本国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使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新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久放弃用发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总之，通过修改宪法，在日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这在日本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对于战后日本政局的稳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解散财阀，禁止垄断。以封建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日本财阀，具有封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日本投降后，作为日本经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盟军总司令部指令日

本政府解散财阀。1945年11月，日本政府提出解散财阀方案，经盟军总司令部批准后开始实施，至1947年基本完成。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解散作为财阀总公司的控股公司，切断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日本政府成立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指定三井总公司和三菱总公司等83家总公司为控股公司，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10大财阀的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以及与这些财阀有关的625家公司为“限制公司”，勒令其交出全部股票。交出的股票，一半以上作为财产税上缴，其余由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出卖。股票出售后付给原股票持有者以偿还期为10年以上的国债。在战后初期日本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这种偿还近似于没收。于是，财阀和财阀家族就失去了股票和资本，以股票和家族关系来对子公司进行控制的统辖关系随之被切断。从此，子公司成为独立公司，日本企业由财阀家族集中掌握的形式改为垄断资本互相开放、允许共同持股的形式。与此同时，还勒令财阀家族及所属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一律辞去公司领导职务，禁止其在10年内重新任职。此外，还勒令2500家战时的主要银行、公司的大股东、领导人辞去职务。这样，就从人事关系方面切断了财阀家族和企业的直接联系，一批具有实际管理能力的中层管理人员登上财界的领导岗位，建立了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对分离的新体制，从而为日本实现经营管理现代化准备了条件。（2）分割大企业，防止经济力量过度集中。1947年12月公布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指定应划小的企业为325家。（3）制定禁止垄断法，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1947年4月公布了《关于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全面禁止卡特尔的共同行动，限制企业间的结合，禁止设立控股公司，原则上禁止事业公司持股，金融公司的持股率不得超过对方公司股份的5%等。该法后经多次修改，放宽了限制。

美国对日本财阀的打击，主要是为了消除日本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性和封闭性，把它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型的轨道，并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改组，为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客观上，日本财阀封建统治形式的铲除，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为日本经济的起飞创造了条件。

解散财阀的工作进行得并不彻底，83家控股公司被解散的只有42家，而在42家中又有26家开办了第二公司作替身，真正被解散的只16家；指定应划小的325家企业，最后被分割的只有11家。1947年以后，特别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政策就由打击转变为扶植了。1951年，日本政府宣布解散财阀的工作结束。1952年解散了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在此前后，有关解散财阀的其他法令相继被废除。大批原财阀的企业，通过横向结合，组成新形式的垄断集团——企业集团。

第三，实行农地改革。战前日本仍保留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约4万户地主占有全部租佃土地的47%，而租佃土地相当于耕地面积的46.4%，占农户总数48%的贫农只占有耕地面积的7%；地主向佃户索取的地租高达收获量的50—80%。这种情况严重阻碍农业的发展。由于战后空前的粮食危机，土地和粮食问题更加突出，农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盟国和日本农民强烈要求铲除半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形势下，美国占领当局敦促日本政府继1945年12月28日公布第一次《农地改革法》后，又于1946年10月21日发布了第二次《农地改革法》。该法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和在村地主超过

1町步（约合0.9918公顷）的出租地（北海道为4町步）由国家征购，转卖给农民，农民应付的地价，分24年还清；残存出租地的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率为水田25%以下，旱田15%以下。农地改革到1949年基本完成。结果全国约230万町步出租地中有194万多町步被征购，买到土地的农户有474万多户。经过农地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寄生地主及其土地所有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从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并为日本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日本的战后改革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反封建、反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它铲除了明治维新以后残存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封建因素，革除了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毒瘤，完成了明治维新所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使日本从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这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日本战后改革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直接产物，世界民主力量和日本人民是推动改革前进的重要力量。1947年以前美国的对日政策，是通过一系列民主改革来消除日本再度与美国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可能性，这在客观上表现为反军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和打击日本财阀。由于日本战后改革是在美国政府指示下由日本政府实施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和保守性，被限制在美国的利益、战略目标和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之内。1947年冷战爆发以后，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对日政策日益走向反动。

二、日本经济的恢复及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底经济危机爆发，日本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6—1955年），恢复和调整时期；第二阶段（1955—1973年），高速发展时期。

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于瘫痪和崩溃边缘。1946年，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1934—1936年平均水平的30.7%，农业生产降至战前的6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战前的50%。

1947年日本实行“重点生产方式”，即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生产，煤炭部门增产后重点供应钢铁业，再用增产的钢铁重点加强煤炭业，力图通过扩大煤和钢铁再生产的能力来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1949年又采用超紧缩措施控制通货膨胀，谋求综合平衡。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需物资供应地。1950—1953年，日本从向美国提供军需品和劳务得到的“特需”收入达24.7亿美元。美国的“特需”，为日本工业品提供了市场，使日本获取了大量外汇，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到1955年，除对外贸易外，其他主要经济指标都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调整。

从1955年起，日本进入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日本先后出现了1955—1957年、1958—1961年和1965—1970年三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新闻界分别称其为“神武景气”（“神武”是传说中日本第一代天皇）、“岩户景气”（“岩户”是日本神话中天皇祖神天照大

日本学者一般把高速增长时期的下限断到1970年。

神降临前的隐居处)和“伊诺景气”(“伊诺”是日本神话天照大神之父)。1955—1970年16年期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3%,其中1966—1970年更是高达12.2%。在1956—1973年的18年中,日本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年平均增长13.6%。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9.1%,60年代为11.3%,超过了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的地位迅速上升。1950年为第7位,到1960年先后超过印度和加拿大,1966年超过法国,1967年超过英国,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后一直保持这个地位。同时,它跟美国的差距也大大缩小。1955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为美国的6%,到1973年上升为1/3。到7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其主要标志是:(1)整个工业已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武装起来,工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企业管理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2)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55—1975年间,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23.1%降为6.6%;第二产业的比重从28.6%上升为35.8%;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48.3%上升为57.5%。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由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低增值型工业结构变成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值型工业结构。到1970年,重化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53.7%上升到68.9%,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应,对外贸易结构亦发生显著变化。1955—1971年,在日本的出口产品中,轻工业产品的比重从52.2%下降为20.6%,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则从30.8%上升为74%。(3)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已居世界前列。1973年日本的船舶、收音机、电视机、铝、人造纤维等5种产品的产量占世界第1位;水泥、橡胶、小汽车、卡车、合成纤维、棉纱等6种产品产量占世界第2位;生铁、粗钢、精钢、铅、电力、硫酸、纸浆等7种产品产量占世界第3位。日本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从1955年的2.2%上升为1975年的8.3%。日本的工业品,特别是钢铁、机械、汽车、船舶、家用电器等在质量上已属世界第一流,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战后的民主化改革铲除了明治维新以后残存于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封建因素,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第二,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即所谓“吸收性战略”作为坚定不移的国策来推行。1950—1973年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21863项,结合自己的经济特点和需要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使之更加完善、先进,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日本自己的工业技术体系。据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调查,在1955—1970年的15年中,日本就集中了全世界用半个世纪开发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1950年日本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美国20—30年,到1970年就基本上消除了这个差距,并在钢铁、汽车、家用电器等生产技术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发展科技事业的基础是发展教育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经费占政府行政费用的1/5左右,这一比重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最高的。1950—1972年,教育经费由1599亿日元增加到40244亿日元,增加近25倍。1946—1975年,全国大学由48所增至998所,学生从82900人增加到213.58万人。教育的发展为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充分数量的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和科技人才。

由于重视教育，大量引进和广泛采用新技术，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51—1969年，日本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提高10%，远远超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推行高积累高投资政策。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从1957—1973年的15年间，日本国内总积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高达38.4%，同期美、英、法、联邦德国分别为15.3%、19%、26.4%和27%。在高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据日本官方资料，1955—1970年，固定资本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1亿日元，增加13倍以上。固定资本巨额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1）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长期以来，日本工人工资一直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据统计，五六十年代，日本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大体上只有美国的1/9、英国的1/3、联邦德国的1/2。70年代中期，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为263%，而日本工业中的剩余价值率高达431%。（2）政府的投资和贷款。日本政府用于固定资本投资的资金占其财政支出的40—50%。在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24%左右。政府通过银行对私人企业提供大量贷款，而且贷款条件十分优惠。（3）发展个人储蓄事业。日本的低福利政策，迫使国民将个人所得的1/4投入储蓄。1955—1970年，个人储蓄总额从9121亿日元增加到94309亿日元，增加9.2倍。个人储蓄通过金融机构流入私人企业，成为它们扩大企业经营的重要来源。（4）引进外资和向外国银行借款。1950—1970年引进外国资本126亿美元，向国外借款67亿美元，另外还有外国证券投资59亿美元。日本的高积累高投资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

第四，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战后历届日本政府都注重对经济的指导作用，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69）、《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6—1971）、《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6—1975）等。国家通过计划调节，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在10年恢复时期以后，日本政府适时地选择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加工贸易型的面向世界的经济发展战略。此外，政府还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第五，出现了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1）日本作为战败国，制定了放弃战争权的宪法，每年军费支出压缩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因而政府长期内可以拿出较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支持企业发展生产；（2）美国的扶持和军需订货。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美国向日本提供的援助、贷款和投资近200亿美元。在美国侵朝和侵越战争期间，美军对日采购的军需总额达100多亿美元。这就为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提供了大笔外汇，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3）战后兴起的世界新科技革命，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4）国际市场上提供了廉价的燃料和原料。日本是加工贸易国，能源和矿物资源几乎全部靠进口，然后加工成工业成品出口。1956—1972年，日本共进口石油101亿桶，每桶只1—3美元。1958—1967年，国际市场铁矿石每吨价格从14.96美元降为12.55美元，日本进口的每千升石油价格从7114日元降为4392日元。相反，1955—1972年日本工业制成品价格却上涨了20%。无疑，这种情况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

第六，建立了具有日本特点的、高效率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这种体制

是在参考欧美的企业经营管理制，结合日本传统的“集团意识”建立起来的。所谓“日本式经营”的核心是重视人的因素，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人力投资”，造就一个“优秀工人，优秀技术人员和优秀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技术集体”。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按企业组织工会”等。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1951—1971年，日本发生了6次经济危机。1973年在世界能源危机影响下，日本爆发战后第7次经济危机，结束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三、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社会政治生活

1946年日本颁布新宪法后，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专制独裁的近代天皇制变成象征性天皇制，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政党运动显著活跃，政党纷纷成立。1945年11月，自由党和进步党（后改为民主党）以及社会党相继成立；日本共产党也于同年12月重建。5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重新复活，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形势。1955年10月，由于对待《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态度不同而在1951年发生分裂的日本社会党重新实现统一。日本共产党也于同年召开“第6次全国协议会”（即党代表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结束了1951年以来的分裂状态。为了对抗日益增强的民主力量，稳定保守党政权，在经团联等财界组织的大力促进下，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从此，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格局，即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以及它同革新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相对抗的政治体制正式形成。

自民党是日本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其内部派系林立，各派与一定的垄断资本集团保持联系，各派系之间围绕总裁（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的总裁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然人选）选举不断展开错综复杂的争夺。自民党成立之初，即因派系矛盾而使总裁职位空缺，暂由原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原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以及三木武吉和大野伴睦4人代行委员。1956年1月绪方病故，遂于4月选举鸠山为第一任总裁。其后至70年代初，历经石桥湛山（1956.12—1957.2）、岸信介（1957.2—1960.7）、池田勇人（1960.7—1964.11）和佐藤荣作（1964.11—1972.7）等各届总裁。自民党内的派系体制弊端甚多，但另一方面也为它进行一定范围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灵活性，有利于在大选中通过不同派别来争取那些不满现行政策的选民。

五六十年代自民党历届政府的政策大同小异，在外交上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与资本输出，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在经济上，广泛、深入地干预经济生活，推动和扶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采取敌视人民的政策，通过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斗争。1956年10月制定“勤务评定制度”，限制学校教职员参加政治斗争。1958年岸信介政府提出《警察职务执行法修改草案》，扩大警察干涉权，警察可以采取强制拘留、搜查、审讯等手段对付所谓“紧急状态”，可以制止公众集会。这个法案因遭到民众强烈反对而未获通过。1961和1962年自民党政府又先后提出《取缔政治暴力法案》和《关于保持民主秩序的法案》，结果也因遭到议会内外的反对而被否决。1964年，为镇压工人运动，自民党政府以消灭街头暴动为名，提出《暴力行为法案》，

最后由国会通过。1969年8月通过《大学管理法》，根据此法，文部大臣可采取强制闭校、废校的措施来控制青年学生的反政府斗争。

适应对内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对外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1950年7月，日本政府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建立了国家警察预备队。1952年成立保安厅，将警察预备队改称为保安队，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1954年保安厅改为防卫厅，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于是，在自卫队的名义下，日本的陆、海、空三军正式建成。1958—1971年，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实施了三次扩军计划，到1971年，陆上自卫队的兵力达17.9万人，海上自卫队舰艇达14.4万吨，航空自卫队飞机达940架。自民党政府还曾试图修改宪法，特别是修改第9条关于日本放弃战争权的条款。1957年成立了“宪法调查会”，进行修宪的准备。1965年，该调查会制定了《宪法修正纲要》。日本政府的修宪企图因在国内外遭到广泛反对而未能得逞。

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为反对美军占领和设置军事基地，为反对日本垄断资本的剥削和自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1952年5月1日，日本各地300万民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旧金山和约，当东京的游行队伍进入皇宫广场时，遭到军警的血腥镇压，游行群众2人被打死，300多人受重伤，1232人被捕，酿成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流血的五一节事件”。1952年11月，石川县内滩村人民为反对美军建立打靶场，在野外静坐示威达百日之久。1955年为反对美军扩大沙川基地，日本人民又展开了全国性的斗争。1957年，美军基地的士兵枪杀无辜日本妇女，激起日本强大的抗议浪潮，迫使美军当局将凶手交日本当局审判。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日本人民掀起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和要求废除这个条约的斗争，他们先后发动23次全国统一行动，参加者达1.1亿多人。1951—1971年，冲绳人民持续进行了要求美国归还冲绳的群众运动。1972年5月15日冲绳回归日本。此外，从50年代中期起，日本工人每年都开展全国性的春季斗争和秋季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1962年春季斗争达到高潮，这一年曾举行7次大规模的全国统一行动，有1600万人次参加。日本人民为维护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于1958、1961、1962年先后掀起反对自民党政府的《警察执行法修改草案》、《取缔政治暴力法案》和《关于保持民主秩序的法案》的斗争，终于使这几个法案作废。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日本人民运动从总的规模和势头来看，逐步转向低潮。

第三节 西欧各国的恢复与发展

一、英国经济的缓慢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由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1945年7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克利门特·艾德礼出任首相。工党政府在1945—1948年间将英格兰银行、煤矿、煤气、电力、电报、国内运输、海外航空等部门实行国有化，以一定的计划性指导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工党政府还实施一些改善劳动人民状况的措施：废除1927年工会法，恢复工会合法权利，对居民实行免费医疗、食品涨价津贴以及社会保险等。1951—1964年由保守党执政，温斯顿·丘吉尔、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和霍姆先后任首相。保守党政府也把社会福利作为争取民心的旗帜，并基本上保持了国有化企业。1964—1970年工党再次上台执政，由威尔逊任首相。威尔逊政府扩大了社会服务，拆除贫民窟，大量兴建公共住房，并重新将85—90%的钢铁企业实行国有化。1970年1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爱德华·希思任首相。

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增长缓慢。但在战后初期，它的工业生产发展较快，1945—1955年，年均增长率为4.5%。这段时期英国工业生产发展较快的原因主要是：（1）战争期间英国人民被抑制的日用消费品需求急需得到满足；（2）战前的竞争对手德、日、意以及法国暂时无力与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英国的出口贸易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1951年英国的出口额达25.8亿英镑，而1937年只有5.22亿英镑。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45年的7.41%上升到1951年的9.58%；（3）马歇尔计划的援助。1948—1950年，英国获得23.51亿美元的物资供应和3.37亿美元的贷款；（4）战后初期，英国尚拥有相当大的殖民地附属国，在廉价输入原料、高价推销工业品以及资本输出上还占据有利地位；（5）战后初期的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上述因素大都具有暂时性。

50年代中期后，英国经济发展日趋缓慢。1956—1970年，英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8%，大大落后于日本的15.3%、联邦德国的6.5%、法国的7.2%，也落后于美国的4%。1960—1969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6%，亦大大低于日本的11.1%，法国、意大利的5.9%，美国的4.5%。战后初期，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资本主义世界第2位，50—60年代，先后被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超过，退居第5位。人们把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国力相对削弱的现象叫作“英国病”。导致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殖民体系瓦解。过去受英国控制的殖民地从50年代起纷纷独立，使英国丧失了大片土地和开采矿产资源的特权，在国外垄断的传统市场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各国竞相角逐的场所。

第二，英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相对落后。固定资本投资是技术装备更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前提。英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无论就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或就其增长速度来说，都低于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1）英国经济发展不稳定，资本家对增加投资缺乏信心，致使资金外流；（2）伦敦金融市场利息率高，吸引着大量用作短

期投资的“热币”，使这些资金不能用于长期投资；（3）英国工业原料严重不足，为了扩大出口，以增加进口能力，设备出口增长较大。这就限制了国内固定资本更新的后备力量。

第三，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受到传统势力的限制，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英国长期以来重科学，轻技术，重基础理论，轻实际应用，致使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脱节，企业的技术更新进展缓慢。此外，英国的守旧思想、等级观念、企业管理方式落后等，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由于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相对落后，技术更新进展缓慢，因此英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1951—1975年，英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6%，远低于日本的8.8%、联邦德国的4.4%、法国的4.3%，也低于美国的3.2%。

第四，英国国内生产发展和国际收支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由于历史上殖民帝国主义的特点，英国经济对海外贸易有很大的依赖性。战后每逢英国国内生产发展较快之际，生产资料的进口就大量增加，而出口增长的幅度往往落后于进口，从而出现大量贸易逆差。这时，英国政府就采取措施来抑制经济发展，以改善国际收支情况。

二、法国重建和60年代末期前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举行反法西斯起义，经过几天浴血奋战，于24日解放巴黎。翌日，戴高乐率领法军进入巴黎。接着全国光复。满目疮痍的法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亟待重建。

戴高乐回到巴黎后，在政治上采取的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颁布整编内地军的命令，并宣布解散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兵。戴高乐的这一行动遭到法共部分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的反对，但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强调“全国团结”，要求法共接受戴高乐的领导。

对于战后法国应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问题，各派政治力量意见分歧：戴高乐派反对多党制政治，要求削弱议会，加强总统权力，建立超党派的总统制共和国；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要求制订一院制的民主宪法；以人民共和党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坚持恢复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议会制度。1946年1月，议会通过社会党人提出的削减军事预算20%的提案，戴高乐愤然辞职。1946年10月制宪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告第四共和国正式成立。该宪法确立两院议会制，并对共和国总统的权力作了严格的限制。

1946—1947年大选中，法共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参加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组织的联合政府。随着国际冷战加剧，共产党于1947年5月被逐出政府。与此同时，戴高乐组成法兰西人民联盟。面对这两大反对党，共和国总统只能依靠“第三势力”各政党（社会党、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等）组成混合政府，因而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在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2年间共换了24个内阁，最短的只有两天，最长的也只有15个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损失高达48930亿法郎以上；1945年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39年的50.89%。

战后，法国政府实行国有化和计划调节两大措施，扩大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1944—1946）先后将雷诺汽车公司、保险公司、法兰西银行和各大银行，以及电力、煤气和矿物燃料等收归国有。此后，国有化范围继续扩大。至1946年12月1日，法国政府在工商业中占

有股权在 50%以上的公司达 103 家。

1946 年，法国政府成立计划总署，莫内 负责制订了第一个七年计划（1947—1953），重点是发展煤、电力、钢、水泥、运输、农机等 6 个基础部门，以此来刺激法国经济的恢复、发展。1954 年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1954—1957）。此计划增加了制造业的现代化与发展这一新的内容，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和生产率为目标。

法国积极参加了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惠国，共获得 30 亿美元的援助。

战后初期，法国经济恢复、发展较快。法国工业生产 1947 年的增长率为 13.4%，1948 年为 18%，1948 年恢复到战前 1938 年水平。此后开始进入经济发展时期。50 年代，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4.8% 和 6.1%，经济增长速度只低于日本、联邦德国和意大利。

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坚持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先后发动对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958 年 5 月 13 日，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军头目发动反对法国政府的叛乱，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雅克·马絮将军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要求法国成立“坚决捍卫”法国在阿利益的“救国政府”。6 月 1 日，议会以多数票授权戴高乐组阁。随后又授予新政府以修改宪法和 6 个月的特别权力。9 月，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草案，产生第五共和国宪法。10 月 5 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告成立。12 月戴高乐当选总统，翌年 1 月正式就任。1965 年 12 月再度当选。

第五共和国宪法的主要特点是削弱了议会的权力，降低了总理和内阁的作用，扩大了总统的权力。总统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有权直接任免总理、解散议会、宣布“紧急状态”、撇开议会行使“非常权力”。通过这部宪法，使法国从议会制共和国演变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这一改革适应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的需要，扭转了法国政局长期不稳、政府无力的状态，但也限制了资产阶级民主。

戴高乐上台后集中全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面对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戴高乐不得不顺应潮流，改变旧的殖民政策。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以代替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联邦，共同体成员国享有内政方面的自治权。1960 年宪法修正案又规定，共同体成员国经法国同意可以独立。到 1960 年底，除阿尔及利亚和吉布提外，法属非洲殖民地全部独立。1962 年 3 月 18 日，法国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了 8 年殖民战争，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戴高乐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59 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1960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3 年撤回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的大西洋舰队，拒绝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合作条约》，否决力图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西欧共同市场；1964 年撤回在 NATO 军事机构工作的法国军官，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6 年完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戴高乐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戴高乐政府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财政改革，先后采取了提高税

让·莫内（1888—1979），法国经济学家，战后主持计划工作并任驻美经济代表团团长，1952—1955 年任欧洲煤钢联营主席。

收、法郎贬值、发行新币、冻结物价、限制工资增长、促进设备更新等一系列措施。

由于摆脱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政局相对稳定，以及采取了较有力的经济政策，在戴高乐执政的 12 年里，法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 5.8%，仅次于日本和联邦德国；外贸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8.6%，进口增长 10%；黄金外汇储备从 1958 年的 10.5 亿美元增加到 1967 年底的 61 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由 50 年代的 4.8% 上升到 60 年代的 5.7%。法国经济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1965 年 2 月，法国财政部宣布退出金汇兑本位制，恢复法郎的金本位制。

戴高乐政府推行的政策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法国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新体制限制和侵害了资产阶级民主，加强了本已高度集中的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加速资本集中的种种经济措施使垄断兼并的进程加快、规模增大，使广大中间阶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面临破产的威胁，最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矛盾。1968 年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五月群众运动风暴。1969 年 4 月，由于在两项关于社会改革提案的公民投票中受挫，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同年 6 月，蓬皮杜当选为总统。他继续执行戴高乐的政策，但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

三、联邦德国的崛起

联邦德国是在德国分裂的基础上，在东西方对峙的政治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它在 1949 年成立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政治上还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根据 1949 年 9 月 21 日生效的美、英、法三国《占领法规》的规定，三国虽然结束了对德军事管制，但仍保持了在联邦德国的最高权力，由三国政府代表组成的“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拥有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国防、对外贸易与外汇支付的权力，监督联邦和州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以及对联邦和各州发布命令和否决其立法、行政决定的直接行动权等。复兴经济，恢复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经济大国地位，进而统一德国，成为联邦德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

1949—1966 年，联邦德国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联盟党）单独或和自由民主党以及其他小党联合执政，康拉德·阿登纳和路德维希·艾哈德先后任总理，其间阿登纳连任四届，直到 1963 年辞职，被称为“铁腕人物”。1966 年因政策分歧，自由民主党退出内阁，由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联盟党的库特·基辛格任总理。1969 年第 6 次联邦大选后，组成以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

早在 1948 年，德国西部地区就实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即废除以行政控制为特征的中央统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加国家总体调节，再加社会保障。首先是保护竞争，限制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使经济摆脱困境、实现繁荣的主要手段；其次是国家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通过货币、信贷、外贸和财政政策等杠杆对经济生活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以保证市场经济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力图避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周期性

起伏和结构不协调；再次是通过保险、救济、补贴等社会保障手段来缓和私有制和竞争所必然引起的社会不公平，以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

市场经济的实施使备受折磨的经济勃发了生机。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已超过了战前1936年同一地区的水平，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的2%。在此基础上，联邦德国的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

50年代是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誉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时期。这10年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4%，工业总产值从487亿马克增加到1647亿马克，增长了2.4倍，国民生产总值从233亿美元增加到726亿美元，增长2.1倍。6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这10年中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仍有5.8%，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倍，国民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增长1.6倍。从总体来看，从联邦德国1949年建立直到1974年爆发经济危机从此陷入严重滞胀为止，联邦德国经济持续了25年的高速增长。据统计，1950—1973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国民生产总值按马克固定价格计算，增长3.06倍，正好翻两番，年平均增长率为6.3%。其中，工业产值增长4.3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7.5%，农业产值增长0.7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5%。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于1959年和1960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在本世纪中第三次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只是到1968年被日本赶上，才退居第三位。联邦德国的外贸总额在1953年超过法国，1954年超过加拿大，1962年赶上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它的黄金外汇储备在1948年只有3亿美元，到1970年猛增到124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5.2%，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总之，联邦德国已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联邦德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复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决定的，主要有：第一，战前德国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又集中了战前德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从而为恢复和发展工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第二，适时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建立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造就了一支宏大的科技队伍，并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50—1970年，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由100339人增加到411951人，平均每万居民的大学生数从21人增加到67.9人。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联邦德国也很重视职工的业余教育，规定不再升入大专院校的中学毕业生，在三年内享有法定休闲日去接受正规课程教育。为了加快科技发展，联邦德国还特别注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50—1973年，联邦德国进口的专利和许可证的支出从2200万马克上升到165400万马克，增长了74倍以上。由于重视科技，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据统计，1950—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经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5.3%；第四，利用外国资本。根据马歇尔计划，西德在1948—1951年获得了36.5亿美元的援助。而根据马歇尔计划设立的“马克对等基金”（即联邦德国工商企业偿还马歇尔计划的款项，可作为短期信贷再投资于本国经济建设中）的投资，到1956年就达100亿马克。马歇尔计划与马克对等基金，对于当时缺少外汇、急需资金的联邦德国好比雪中送炭。50年代以后，外国私人直接投资成为联邦德国输入资本的主要形式。1957—1975年，美国公司在联邦德国的直接投资从5.81亿美元上升为87.26亿美元。

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同时，联邦德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求恢复国家

主权和应有的国际地位。阿登纳政府推行亲美、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谋求在美国的扶持下洗刷掉战败国的屈辱。1954年10月，联邦德国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署《巴黎协定》，次年5月协定生效，联邦德国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主权国家，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6年1月建立国防军，3月通过防务法，规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58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63年签订德法友好条约，正式实现了法德和解与合作。阿登纳政府追随美国对苏冷战，坚持“哈尔斯坦主义”。1955年7月22日，阿登纳政府发表声明，声称联邦德国代表整个德国，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这项政策是由当时的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建议制定的，故称“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主义”等于作茧自缚，限制了联邦德国自己在国际舞上活动的地盘。

当联邦德国重新以经济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的时候，它不愿再在外交上处处追随美国，作美国的“小伙伴”，而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外交活动，改变“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国际形象。60年代末上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式实行“新东方政策”。1970年，联邦德国先后与苏联、波兰签订条约，承认欧洲各国现存边界不可侵犯。1972年同民主德国签订《关系基础条约》。条约规定：彼此承认是主权国家，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的正常睦邻关系”。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新东方政策使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关系中取得了主动权与发言权，在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可以直接同苏联、东欧打交道，而不必再仰仗美国。新东方政策使联邦德国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有力的政治态势，使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联邦德国终于以一个经济—政治大国的形象崛起于欧洲大陆。

四、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初期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形势和国际关系格局。自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一直居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西欧被严重削弱，美、苏崛起，形成两极冷战对峙局面。为了抗衡美、苏，西欧有联合起来的必要。美国也曾鼓励、支持西欧联合，希望建立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经济发展、军事强大、政治稳定的统一欧洲”来帮助它抗衡苏联。50年代，西欧发达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强，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呼声日趋强烈。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还远远落后于美、苏，只有联合成为一个地区性组织，才能有效地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发挥作用。西欧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聚集的地区。但西欧地区疆域不大，国家林立，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比，西欧国家都深感市场狭小，资源不足。战后，随着垄断资本对外扩张的加强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资本和生产国际化也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西欧国家要求打破国家经济壁垒，加强经济联合。战后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日益直接地干预、组织经济生活，使各国政府出面组织超国家经济集团，实行国际经济调节和干预成为可能。

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又称欧洲煤钢联营）的计划（即舒曼计划）。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6 国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次年 7 月 25 日条约生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促进了法德和解，为实现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1955 年 5 月，荷、比、卢 3 国外长联合提出备忘录，主张扩大经济一体化的范围，成立全面关税同盟。同年 6 月，欧洲煤钢共同体 6 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纳举行会议，讨论三国备忘录，确定了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基本设想和目标，并决定由各国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起草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计划。筹备委员会经过近两年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才达成妥协。1957 年 3 月 25 日，6 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长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

《罗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从 1958 年 1 月 1 日至 1969 年底的 12 年过渡期内逐步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进口限额，并对非成员国采取统一的关税率和贸易政策；（2）实现共同体内部工业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3）规定成员国共同农业政策，筹组农业共同市场；（4）制定共同运输政策，统一运费；（5）制定共同竞争规则；（6）协调各成员国的课税立法和社会立法；（7）设立欧洲投资银行，以促进一个共同的投资政策；（8）建立联系国制度。

1958 年 1 月 1 日，《罗马条约》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同时成立。这样，在西欧就有三个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存。在三个共同体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又称西欧共同市场）最为重要，因为它涉及全面经济一体化，而其他两个共同体只涉及个别部门一体化。1965 年 4 月 8 日，6 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上述三个组织的主要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 年 7 月 1 日，三个组织的主要机构正式合并，欧共体正式成立。欧共体成立后，上述三个共同体仍各自存在，有时仍以各自的名义活动，行使某些专门职能。

欧共体的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主要机构有：（1）部长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2）执行委员会，为常设执行机构；（3）欧洲议会，为监督和咨询机构；（4）欧洲共同体法院，为司法仲裁机构；（5）审计院，为监督共同体预算执行机构。此外，共同体还设有 70 多个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至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它在实施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面的主要活动和成果是：

第一，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实行统一的外贸政策。1968 年 7 月，共同体成员国比《罗马条约》规定提前一年半全部取消了关税和贸易限额，对外实现共同关税率。1970 年 1 月起共同体基本上实现了共同的外贸政策，逐步在关税的调整、贸易和关税协定的缔结、进口配额和出口政策等方面建立一致的原则。1973 年 1 月起实行完全统一的外贸政策。

第二，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1962 年 1 月通过了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的协议并逐步着手实施。至 1968 年 7 月，主要农产品已纳入各类农业共同组织，实现了农产品的统一价格。1969 年取消农产品在共同体内部的关税，对外则征收差价税，从而实现了成员国间农产品的自由流通。

第三，决定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1969 年 12 月，共同体海牙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1970 年 10 月理事会通过决议，计划于 1970

—1980年分三个阶段建立该联盟，但因爆发经济危机而搁浅。

第四，统一预算。1967年设立了欧洲共同体总预算。预算开支由成员国按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摊付。1970年4月决定建立“自身财源”制度。

第五，加强政治领域的合作。1967年7月，6国发表《关于政治同盟的宣言》。1969年12月，共同体海牙首脑会议决定建立政治合作制度。1970年10月，6国外长通过“关于欧洲政治统一问题的报告”，开始定期协调对外政策，努力就重大国际问题“用一个声音说话”。

欧洲共同体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组成的国际垄断联盟。它既有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使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得到一定程度调整的一面，又有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另一面；既有维护成员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的一面，又有维护成员国既得权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和剥削的另一面。共同体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的作用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五六十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作用一面是主要的。

首先，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共同体国家对外贸易，特别是成员国相互贸易的扩大，刺激了成员国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58—1969年，共同体国家进出口贸易均以年平均11.5%的速度增长，而成员国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6.5%。1958—1970年，共同体出口贸易增长2.77倍，而同期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分别只增长1.39倍和1.64倍。随着6国间关税的逐步取消，6国垄断资本不能再用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为了提高竞争能力，它们必须加速资本积累，增加企业投资，提高装备水平，以降低生产成本。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刺激了经济的增长。1959—1969年，6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率为5.5%，高于同期美国的4.3%和英国的3%。

其次，共同体的建立、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增强了西欧抗衡超级大国的地位。它是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促使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有利于维护西欧的和平与稳定。

欧洲共同体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决定它必然要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制约，无法使成员国摆脱和消除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通病的困扰。同时，由于各成员国所处的地位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各成员国间利益的冲突，这就使它们在联合的道路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分歧。

第十章 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殖民体系的瓦解

第一节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和特点

一、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和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兴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殖民地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据统计，截至1990年，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有近100个国家是在战后宣布独立的，其中亚洲27个，非洲48个，拉丁美洲10个，大洋洲11个，欧洲1个。在短短的45年间，如此众多的国家挣脱殖民枷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世界近代民族独立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崛起，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经历了两个大浪潮。第一个浪潮发生在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地区在亚洲和北非一带。亚洲宣布独立的国家先后有：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越南（1945年9月2日）、老挝（1945年10月12日）、叙利亚（1946年4月17日）、约旦（1946年5月25日）、菲律宾（1946年7月4日）、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印度（1947年8月15日）、缅甸（1948年1月4日）、斯里兰卡（1948年2月4日）、朝鲜（1948年9月9日）、阿曼（1951年12月20日）、柬埔寨（1953年11月9日）、马来西亚（1957年8月31日）。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拥有世界人口1/4的大国——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枷锁，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大大鼓舞和促进了亚洲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朝鲜和越南。这样，在亚洲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类国家体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在北非还有利比亚、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宣布独立，埃及爆发了七月革命。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之所以首先在亚洲、北非地区掀起，首先与二战有直接关系。二战期间，亚洲、北非地区，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遭受了法西斯的直接侵略，使这些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战争也锻炼和教育了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广泛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这就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条件。其次与历史的继承性有关。二战前，民族解放斗争风暴主要集中在亚洲、北非，特别在亚洲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经过二战的锻炼，承继了战前的斗争传统，在战后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第三，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亚洲、北非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比较起来，一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得多，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要强得多，因此使民族解放运动有新兴的阶级来领导，而且有比较完整的指导思想体系。至于拉美地区，早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曾进行了长达30多年之久的独立战争，绝大部分地区都摆脱了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直接控制，建立了民族独立国家，所以在此以后，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不像亚非那样尖锐。

当代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二个浪潮发生在 5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期，这是一个以非洲为中心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浪潮。继加纳和几内亚两个黑非洲国家先后于 1957 和 1958 年诞生后，在 60 年代，非洲诞生了 32 个新国家，仅 1960 年一年就有 17 个国家诞生，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史上的奇观。此后，70 年代中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又彻底崩溃。作为第二个独立运动浪潮的组成部分，在亚洲先后诞生的独立国家有：塞浦路斯（1960 年 8 月 16 日）、科威特（1961 年 6 月 19 日）、马尔代夫（1965 年 7 月 26 日）、新加坡（1965 年 8 月 9 日）、巴林（1971 年 8 月 14 日）、卡塔尔（1971 年 9 月 3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 年 12 月 2 日）；美洲宣布独立的国家有：牙买加（1962 年 8 月 6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 年 8 月 31 日）、圭亚那（1966 年 5 月 26 日）、格林纳达（1974 年 2 月 7 日）、苏里南（1975 年 11 月 25 日）、多米尼加联邦（1978 年 11 月 3 日）、圣卢西亚（1979 年 2 月 22 日）、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 年 10 月 27 日）、伯利兹（1981 年 9 月 21 日）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 年 9 月 19 日）；大洋洲宣布独立的国家有：西萨摩亚（1962 年 1 月 1 日）、瑙鲁（1968 年 1 月 31 日）、汤加（1970 年 6 月 4 日）、斐济（1970 年 10 月 10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1975 年 9 月 16 日）、所罗门群岛（1978 年 7 月 7 日）、图瓦卢（1978 年 10 月 1 日）和瓦努阿图（1980 年 7 月 30 日）。80 年代中期以后，亚洲、大洋洲和非洲又诞生了 5 个独立国家：文莱（1984 年 11 月）、巴勒斯坦（1988 年 11 月 15 日）、马绍尔群岛共和国（1986 年 10 月 21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1986 年 11 月 3 日）和纳米比亚（1990 年 3 月 21 日）。1959 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是这次浪潮中的突出事件。

经过两次独立浪潮的冲击，亚、非、拉历史完成了由殖民地附属国走向独立的发展进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西方殖民主义大国苦心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之所以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遭到土崩瓦解的命运，就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亚、非、拉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这种斗争之所以在二战后才迅速取得胜利，则是由于二战后出现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内外新因素、新条件。

首先，出现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国际条件，主要表现在：（1）中国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力量壮大；（2）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法被削弱，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打破；（3）第三世界兴起。

第二，出现了有利于民族独立运动成功的内部新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1）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进了亚非人民民族觉醒的新意识，培养了民族革命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大亚非人民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在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民族觉悟。战后，不少退伍军人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和骨干力量；（2）二战进一步促进了亚非拉新型社会力量的壮大。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些年代里，西方国家为了满足其战争的需要和追求高额利润，扩大了在亚非拉一些国家的投资，发展了采矿业和加工工业，从而导致了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例如，战后非洲工人的总人数，由战前的 800 万增加到 1300 万。正是这些新的阶级和阶层，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领导力量；（3）在上述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各种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建立，使民族独立运动有了组织保证。据统计，1961 年非洲各地区共有 147 个政党和组织，其中 139 个是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建立的，

而在战前建立的只有 8 个。

第三，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变化。过去，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直主要依靠武力征服，把殖民统治强加在亚、非、拉人民头上。二战后的新技术革命使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不能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也不利于宗主国攫取利润。因此，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动用军队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失败后，转而对原有殖民地采取承认政治独立、侧重于经济渗透的策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崇信武力。同时，二战中遭到削弱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也需要改变对殖民地一味武力镇压的政策。因此，它们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力图把原殖民地保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有利的新因素、新条件，因此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是战前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具有相同的共性，但它是在新形势下展开的，因此又具有新特点。这些新特点主要有：

第一，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空前的广泛性。战前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北非，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仍在沉睡之中。战后，民族解放斗争风暴从亚洲向非洲发展，席卷整个亚、非、拉。既有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也有大规模争取独立的群众运动。亚、非、拉人民和各爱国阶层都卷入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洪流。

第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战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除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及阿富汗和埃及的独立运动取得胜利以外，其他革命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遭到了失败。战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风暴摧毁了资本主义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第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类国家体系。战前，亚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均未取得胜利。战后，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在亚、非、拉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类国家体系。

第四，大多数国家通过和平斗争方式取得了独立。在战后近 100 个新独立的国家中，有 80 多个是通过和平斗争方式取得独立的。这确实是战后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

(1) 蓬勃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老牌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以 50 年代中期的亚非会议作为标志，亚非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新兴力量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支持，殖民主义者面对的是第三世界整体的反对力量。

(2) 它是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产物。二战以后，美、苏发展成超级大国，它们加紧了对欧洲以及亚、非、拉地区的争夺，严重威胁了英、法等国利益。面对这种形势，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抗衡美、苏霸权，恢复昔日欧洲大国地位，就必须从殖民地腾出手来，如果长期把力量陷在对付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上，是无法做到这点的。这是导致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家中的有识之士，例如戴高乐等人断然采取非殖民化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它是战后经济形势变化的产物。战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使经济生活进一步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原始的赤裸裸殖民统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允许殖民地政治上独立，但仍保持某种经济依附关系，对它们更有利。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国内实行福利主义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在国外推行非殖民化政策，改善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它和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趋势的加强有关。所谓世界政治民主化，是指以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强权国际关系向以独立自主、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转化。战后，一系列殖民地国家逐渐取得了独立，并建立各种联合组织。它们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独立、自主、和平的国家，使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正义，而有利于强权政治的重大变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它们的侵略扩张行动和殖民奴役都无法逃脱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得到世界各国的同情和支持。不仅第三世界的各种国际组织，而且联合国也日益成为谴责殖民主义的讲台。显然，在战后，殖民主义国家要抗拒这种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完全维持过去那种对殖民地的血腥统治关系，那是不可能的。

(5) 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矛盾斗争的产物。战后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东方人民的解放斗争有了坚强的后盾，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巨大的影响。为了抵挡这股红色巨浪，西方殖民主义者推行所谓“非殖民化”政策，把部分权力转交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允许这些国家独立，从而使它们仍然保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藉此保留殖民者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

除了通过和平斗争方式取得独立的国家外，还有一部分国家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例如阿尔及利亚、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家的独立，都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结果。至于亚洲、拉丁美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从它们的阶级利益和经济利益出发，不肯把权力移交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通过和平斗争方式取得独立，仍不失为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节 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1942年日本军队侵占印尼，荷兰殖民当局投降。日本侵略者为了拉拢有影响的印尼民族主义者作为政治工具，就把苏加诺和哈达从流放地接回。在日本占领期间，多数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基本上采取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立场，同时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工作。印尼共产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抗日派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晚上，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在雅加达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宣布独立的决定，并派代表与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哈达协商。在革命青年组织的敦促下，8月17日，苏加诺、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成立共和国。印尼八月革命于是发动起来。

独立宣言发表后，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一旦独立，永远独立！”广大群众还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夺取日军武器，占领电台、车站、铁路和矿山，解放了泗水、梭罗、三宝瓏等城市。

8月18日，印尼各政党、社团领袖召开了“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选举苏加诺、哈达为正副总统。9月4日成立了总统制内阁。11月改行议会制内阁，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任总理。印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的巨大胜利，但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地主手里。

1945年9月29日，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在爪哇登陆，随即占领了雅加达、万隆、三宝瓏等城市。英国支持荷兰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10月初，流亡澳大利亚的荷印殖民政府重返印尼；被日军拘留在集中营的荷印殖民军被英军释放后组成“荷印联军”，他们与从欧洲开来的荷军结合在一起，妄图恢复殖民统治。英军的入侵遭到印尼人民的坚决抵抗。1945年11月爆发泗水保卫战，英勇的泗水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与英军展开了长达21天的殊死战斗。在印尼人民的坚决抗击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底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当局。

荷兰一方面加紧准备殖民战争，另一方面又与印尼谈判，想利用谈判来收买印尼的地主买办势力，分裂抗荷阵线，同时争取时间加紧向印尼运送军队，作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1946年2月谈判开始。同年11月15日，荷兰殖民者与印尼沙里尔政府签订了《林芽椰蒂协定》。协定规定：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对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行使“事实上的主权”；印尼共和国与荷兰扶植的联邦区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并参加以荷兰女王为首的“荷印（尼）联邦”；印尼共和国同意赔偿外国资本在印尼的财产，恢复它们在印尼的权益。《林芽椰蒂协定》是印尼沙里尔政府妥协路线的产物，严重损害了印尼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由于人民的反对，沙里尔于1947年6月被迫下台。7月组成以共产党人沙里佛丁为首的联合政府。

1947年7月21日，荷兰殖民者为迫使印尼政府屈服，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印尼人民奋起反抗。美国利用联合国插手荷印（尼）冲突。1948年1月，在美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三国组成的“斡旋委员会”的压力下，印

林芽椰蒂为印尼爪哇井里汶附近的一个村子。

尼共和国政府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同荷兰在停泊于雅加达的美国运输舰“伦维尔号”上签订《伦维尔协定》。协定规定：（1）双方以莫克线为分界线，就地停火；（2）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都拉的荷占区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这些地区是回归印尼共和国还是直接参加印尼联邦；（3）在印尼联邦成立之前，荷兰在印尼继续行使主权。这个协定比《林芽椰蒂协定》对印尼更加不利。印尼最富庶和最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包括爪哇岛的 2/3、苏门答腊的一部分和马都拉的全部均被荷兰殖民者占领。

1948年1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马斯友美党制造政府危机，沙里佛丁被迫辞职。1月31日成立以马斯友美党占优势的总统制内阁，哈达任总理。哈达政府对外推行投降主义政策，宣布无条件遵守《伦维尔协定》，对内推行打击进步势力、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哈达的政策遭到人民的反对。1948年5月，印尼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组成人民民主阵线，制订《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内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印尼共和国。

1948年8月，印尼共产党在慕梭主持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印尼共和国新道路》的决议，总结了独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决议指出，必须把三个工人阶级政党——劳工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的印尼共产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阵线；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坚决为取消《林芽椰蒂协定》和《伦维尔协定》、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在印尼共产党为贯彻“新道路”决议而斗争的同时，印尼右派势力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茉莉芬事件”。1948年9月17日，驻梭罗的左派军队被右派军队赶出梭罗，退往茉莉芬。次日，茉莉芬驻军中的左右两派发生冲突，左派军队控制全市。当时州长出差在外，左派组织人民阵线推选副州长（共产党员）代理州长职务并电告中央政府。9月21日，慕梭又撰文声明，茉莉芬政府是民主的印尼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次事件只是纠正哈达政府错误政策的进步运动。哈达政府以共产党在茉莉芬“发动政变”为借口，派遣大批军队围攻茉莉芬。印尼共产党人和人民阵线成员进行了自卫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于9月30日撤出茉莉芬。10月底，慕梭在战斗中牺牲。11月，沙里佛丁等印尼共领导人被俘，12月被害。在茉莉芬事件中，约有35000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10000人惨遭杀害。

茉莉芬事件使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共和国的力量均遭严重削弱。荷兰殖民者乘机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哈达、沙里尔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但是，印尼人民并没有屈服，组织游击队，坚持抗击荷兰殖民军。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和军费开支与日俱增。美国乘荷兰处境困难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荷兰坐下来同印尼谈判。在联合国三国“斡旋委员会”（1949年1月改名“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干预下，1949年5月荷兰印尼签订停战协定。同年8—11月在海牙举行了有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与荷兰在印尼建立的15个傀儡邦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后者再与荷兰、荷属苏里南和库拉索共同组成

“莫克线”是1947年8月由荷兰片面宣布的，它把荷军在印尼共和国领土上的一些前哨据点连结起来，将这条线一侧荷军已占领和未占领的地区都划入荷军占领区。

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其归属问题待以后双方“协商”解决；印尼偿付前殖民政府所欠的400亿荷盾的债务。协定虽规定除西伊里安外，荷兰应将主权移交给“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但保留了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许多特权。

《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军从印尼撤走。1949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任总统，哈达任总理。12月27日，荷兰向印尼联邦共和国“移交主权”。印尼人民反对和抵制保留荷兰特权的联邦制，要求取消各傀儡邦。1950年8月15日，苏加诺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尼共和国。1953年7月，民族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组阁。阿里政府奉行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经过谈判斗争，印尼与荷兰达成了解散荷兰—印尼联邦的协议。1956年4月21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宣布全部废除《圆桌会议协定》。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回西伊里安，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二、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分别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都被日本侵占。三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民主人士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三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为三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1944年8月，缅甸共产党、缅甸人民革命党（缅甸社会党前身）和昂山领导的缅甸国防军秘密组织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以下简称自由同盟）。1945年3月27日，自由同盟配合盟军反攻，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于5月1日收复仰光，不久光复全境。

日本投降后，英国卷土重来，企图在缅甸重建殖民统治。1955年5月，英国政府发表对缅政策的白皮书，宣布缅甸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3年后，才可取得自治领地位，并规定掸邦等少数民族地区为特区，仍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这是一个以“自治”为名，分裂缅甸的计划。同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与自由同盟主席昂山等领导人签订“抗日军问题协定”。协定规定：自由同盟领导的抗日军改编为英国殖民政府的“缅甸国防军”。10月，战时逃亡印度的英国总督史密斯回到缅甸。史密斯拒绝自由同盟提出的成立临时政府的要求，于11月3日组织了一个不包括自由同盟在内的“行政委员会”。

英国重建殖民统治的行动遭到缅甸人民的反对。1946年9月，缅甸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性总罢工。卷入罢工浪潮的有工人、学生、公务人员和警察。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要求完全独立”、“撤退英国占领军”等口号。9月23日各地农民也举行了支援总罢工的示威游行。这是战后缅甸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次大示威，史称“九月高潮”。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在进行镇压的同时，对自由同盟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1946年9月26日，英国把缅甸“行政委员会”改组为享有临时政府权力的“行政参事会”，10月吸收自由同盟的昂山等6人参加，昂山任该会副主席兼国防和外交部长，主席由英国新任驻缅总督兰斯担任。缅甸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因反对参加“行政参事会”而被开除出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分裂削弱了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的力量。

1947年1月，昂山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伦敦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

定》。这个协定虽规定缅甸可以“在英联邦内或联邦外尽快取得独立”，但没有确定独立的日期，并规定缅甸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须经英国国会批准。这个屈辱性的协定遭到缅共及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坚决反对。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昂山提出了一年内实现独立、建立全权民族政府的主张，并邀请缅共等左翼组织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1947年4月，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成立了以昂山为总理的临时政府。6月，制宪会议通过《缅甸独立法案》，要求脱离英联邦，实现完全的独立。

对昂山态度的这种转变，英国殖民者极端恼恨。1947年7月19日，昂山和临时政府其他6位部长在仰光行政会议秘书厅开会时，被英国殖民者唆使的武装暴徒杀害。

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激起了缅甸人民的愤怒和强烈的反对浪潮。7月20日，昂山等人的葬礼变成有10万群众参加的政治示威。9月24日，缅甸制宪会议通过了《缅甸联邦宪法》，规定缅甸是英联邦以外的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10月17日，缅甸临时政府吴努和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伦敦签订《关于承认缅甸独立及有关事项的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正式承认缅甸联邦共和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保留了英国在缅甸享有的经济和军事特权。1947年12月10日，英国议会正式批准该条约。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告独立，缅甸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日本投降后，英国殖民军于1945年9月在马来亚登陆，重新控制了马来亚。1946年1月，英国发表白皮书，规定新加坡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而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以及原海峡殖民地中的马六甲和槟榔屿则联合成马来亚联邦，由英国派总督统治。同年12月，又发表蓝皮书，把马来亚联邦改名为马来亚联合邦，派高级专员代替总督统治，同时扩大了素丹会议的权力，在联合邦立法机构中增加马来人的席位。英国企图通过对素丹封建势力的微小让步来分化反英力量。1948年2月1日，英国不顾马来亚人民反对，正式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同年6月颁布紧急法令，对马来亚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进行镇压。

马来亚共产党在日军入侵马来亚后，建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日本投降后，马共一度对英国抱有幻想，与英国当局妥协，于1945年12月解散了人民抗日军。1948年2、3月间，马共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当英国殖民者向革命力量猖狂进攻时，马共把力量从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武装斗争道路。1948年12月，马共中央制定了党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纲领，规定了武装斗争的目标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翌年2月建立了统一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战后，马来亚资产阶级建立了3个主要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1946年5月以马来人协会为基础成立；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1946年8月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1949年2月成立。1955年4月，上述3党决定组成马来亚联盟党（巫华印联盟）。联盟党主张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在英联邦内独立。7月，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执政党，阿卜杜勒·拉赫曼出任政府总理。经过1956年1月和1957年5月两次

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为英国殖民者统治马来亚的两种形式。前者是在1896年由马来半岛的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4个土邦组成；后者是由马来半岛南北两部分不曾加入马来联邦的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及玻璃市5个邦组成。

赴英谈判，英国终于同意马来亚在英联邦内独立。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同年9月，马来亚同英国签订《外部防御和互助协定》，规定英国继续在马来亚保持军事基地。1963年7月5日，英国、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在伦敦达成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协定。同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宣告成立（新加坡于1965年8月退出联邦，成为独立国家）。

随着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军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配合下，先后于1944年10月和1945年1月在莱特和仁牙因湾登陆。1945年2月底，美军攻进马尼拉市，菲律宾自治政府也随之宣布恢复。

美军重返菲律宾之后，美国不但不感谢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三年抗战和协同美军最后打败日本占领军的功劳，相反，却将其视为它战后控制菲律宾的最大障碍，竟然下令解除人民抗日军的武装。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扶植以罗哈斯为首的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右翼集团。1945年9月23日，马尼拉爆发了有6万人参加的群众示威游行，要求独立。同年12月23日，马尼拉召开了有6.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反对美国企图修改《泰丁斯—麦克杜菲法》、延迟宣布菲律宾独立的阴谋。在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不断发生。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美国按照《泰丁斯—麦克杜菲法》的规定，如期宣布菲律宾独立。1946年7月4日，在马尼拉举行了独立仪式，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美国扶植的自由党首领罗哈斯就任共和国首任总统。美驻菲高级专员公署改为驻菲大使馆。

菲律宾独立后，美国与菲律宾于1947年3月14日和21日先后签订《关于军事基地的协定》和《关于对菲律宾军事援助的协定》。前者规定美国租借菲律宾23处军事基地，租期为99年；后者规定美国在菲设立军事顾问团。1954年美国又把菲律宾拉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独立后的菲律宾实际上仍然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菲律宾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继续进行斗争。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1945年10月，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保卫东南亚日”的活动，要求英国立即从印尼等国撤军。11月又爆发了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审讯“印度国民军”军官的群众运动。“印度国民军”是大战期间由在东南亚日占区的印度侨民和被日军俘虏的印度战俘组成的，领导人是国大党领导人之一苏巴斯·鲍斯。他们企图依靠与日军合作，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印度人把他们看作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士。因此，英国殖民当局对国民军军官的审讯，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激起了大规模的反英斗争。

在群众反英斗争推动下，爆发了印度皇家海军水兵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1946年2月18日，孟买托尔瓦尔海军通讯训练基地的水兵因不堪忍受英国军官的歧视和压迫举行罢工。翌日，孟买的2万多名印度水兵起而响应。2月20日，斗争扩展到马德拉斯、卡拉奇、加尔各答等地。全印共有78艘舰只、20个基地的水兵参加罢工。孟买水兵组织了皇家海军中央罢工委员

《泰丁斯—麦克杜菲法》是美国在1934年3月24日颁布的，宣布在菲实行10年自治过渡体制，10年之后让菲独立。

会，统一指挥罢工斗争。21日，英军进攻孟买的城堡兵营，水兵被迫还击。至此，罢工发展为起义。在卡拉奇也发生了激烈战斗。孟买的20万工人、学生为声援水兵起义，举行了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在起义水兵的推动下，英印军队的印度士兵、皇家空军的印度飞行员也举行罢工。斗争浪潮波及全印度。但是，掌握印度民族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反对起义，在它们的压力下，海军中央罢工委员会于2月23日通过停止起义的决议。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起义领袖。印度水兵起义极大地震动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

面对日趋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认识到用老办法统治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殖民主义政策。1946年2月19日，即印度水兵起事的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将派遣内阁特使团赴印，就赋予印度某种形式的自治问题进行谈判。3月24日，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特使团到达印度，与英印总督魏菲尔一起同印度政党领袖和土邦王公开始谈判。当时，印度两大政党之间存在尖锐分歧：国大党要求建立一个由它领导的统一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则坚持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大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成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穆斯林联盟则提出英国人在“分治后离开”。1946年5月16日，内阁特使团提出关于未来印度的方案，其要点是：（1）建立一个由各行省和土邦组成的联邦，享有自治领权利；（2）各省和土邦拥有广泛的自治权；（3）按宗教原则成立两个穆斯林多数区的省联合集团和一个印度教区的省联合集团；（4）在改组总督行政会议的基础上成立有各主要政党支持的临时政府，然后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

1946年7月，印度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国大党获209席，穆斯林联盟获75席，其他党派获14席。同年8月16日，在加尔各答发生了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大仇杀，死亡达千人。随后，比哈尔、孟买等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教派流血冲突事件。9月2日组成印度临时政府，由英印总督魏菲尔和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分别担任总理和副总理。穆斯林联盟经总督施加压力，于10月26日参加了政府，但拒绝出席12月9日召开的制宪会议，并坚持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

1947年，印度形势更加紧张。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教派冲突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各种政治力量对英国的不满急剧增长。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下议院发表对印政策声明，宣布至迟在1948年6月以前把政权转让到“负责的印度人”手里。前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蒙巴顿被选派来印，接任英印总督，办理政权移交事宜。

1947年3月24日，蒙巴顿到达印度。他发现印度的局势比原来估计的还要危险得多。他的主要助手伊斯梅谈到当时印度的形势时说：“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载满弹药而在大洋中着了火的船。当时的问题是要在大火烧到弹药之前把火扑灭。事实上，除了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去做之外，在我们面前别无选择的余地。”鉴于形势危急，蒙巴顿决定提前移交政权。1947年6月3日，在德里和伦敦同时公布“印度独立法案”，即“蒙巴顿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1）依据宗教原则把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英国分别向两者移交政权；（2）分治前就孟加拉、旁遮普是否各划分为两部分和各部分的归属问题，以及西北边省、信德和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县的归属问题分别进行投票；（3）各土邦有权自行选择

加入哪个自治领，如果不愿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可保持原来与英国的关系，但得不到自治领的权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对这个方案虽不满意，但都宣布接受。1947年7月，英国议会批准了这个法案。

在完成分治手续后，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于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宣告成立。巴基斯坦领土包括西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西部、西北边省、信德省、俾路支省）和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东部和阿萨姆的锡尔赫特县）；原英属印度的其余部分归属印度。印度领土（包括并于它的土邦）占原英属印度领土的3/4。

印、巴独立后，分别组成了以尼赫鲁为总理的印度政府和以穆斯林联盟书记列雅格特·阿里汗为首的巴基斯坦政府。真纳任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蒙巴顿留任印度自治领总督，1948年由印度人拉贾戈巴拉查理接任。1950年1月印度宣布为共和国。1956年3月巴基斯坦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两国仍为英联邦成员国。

印、巴独立标志着英国在印度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的结束。但是分治给印、巴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分治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进行大迁徙。到1948年流落在印巴各地的难民达800万人以上。在1947年8月旁遮普的教派仇杀中有50万人丧生。甘地因谴责教派仇杀，呼吁教派团结，于1948年1月30日被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由于分治，使统一的经济和灌溉系统被分割，从而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困难。例如，黄麻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印度，而黄麻和长纤维棉花产地却主要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由东西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组成，相距1600多公里，交通联系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克什米尔土邦归属问题造成印巴两国长期不和，酿成多次武装冲突。

第三节 非洲的觉醒和古巴革命

一、非洲大陆的独立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昔日被西方称为“沉睡的大陆”的非洲觉醒，掀起了巨大的民族独立浪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经营几个世纪之久的殖民体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48个国家获得了独立。

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由北向南，即由北非向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发展。从全过程来看，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这时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集中在北非。从斗争方式来看，虽有和平斗争，也有联合国进行干预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利比亚），但武装斗争是这个阶段突出的特点。1952年，埃及爆发了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七月革命，用暴力推翻了以英国为靠山的法鲁克封建王朝。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开始了长达近8年之久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也展开了反法武装斗争。1956年3月，法国被迫承认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同年1月，苏丹这个非洲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冲破半个多世纪黑暗的英国殖民统治，迎来了独立。这样，到1956年，北非6国，除阿尔及利亚外，都已获得独立。在这个时期，东非的肯尼亚和中非的喀麦隆这两个英属殖民地也爆发了武装斗争。

第二阶段，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期。这是民族独立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时期。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和1956年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鼓舞和推动了非洲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1957—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两国独立为契机，在非洲大陆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独立浪潮。在1957—1968年短短的12年时间里，非洲大陆诞生了32个新独立国家。非洲，这个昔日帝国主义的后方基地成为反帝反殖斗争的前线。

加纳原名黄金海岸，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后，加纳人民争取自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日趋高涨。1947年，加纳成立了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1949年6月，该党总书记恩克努玛另行成立人民大会党，主张采取非暴力和合法斗争手段，为立即实行完全自治而斗争。1950年初，人民大会党组织了总罢工。1951年，英国被迫宣布黄金海岸在英联邦内自治，恩克鲁玛出任政府事务领导人。1956年7月，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获胜。同年9月，英国被迫同意黄金海岸取得自治领地位。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改名加纳。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成立的第一个独立国家。1960年7月，加纳宣布成立共和国。

几内亚原是法属西非殖民地的一部分。1947年，几内亚工人领袖塞古·杜尔创建几内亚民主党，作为法属西非地区的民主联盟的一个支部，反对殖民统治，开展工会运动。1956年，根据法国海外领地根本法，几内亚成为半自治共和国。1957年，几内亚民主党在领地议会选举中获胜，杜尔出任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法国戴高乐政府颁布第五共和国宪法，宣布建立“法兰西共同体”以取代“法兰西联邦”，规定凡加入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还规定海外领地可通过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是参加共同体还是独立。在1958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几内亚人民响应民主党的号召，

投票反对参加共同体。同年 10 月 2 日，几内亚宣布独立，成立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

1960 年，非洲的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变化，有 17 个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因此被称为“非洲年”。这 17 个国家中有 14 个曾是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和法国托管地。它们是：喀麦隆、塞内加尔、多哥、马达加斯加、贝宁（原名达荷美）、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原名上沃尔特）、科特迪瓦（旧译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原名乌班吉沙立）、刚果、加蓬、马里、毛里塔尼亚。其余 3 国是扎伊尔、尼日利亚和索马里，他们独立前分别是比、英殖民地和意托管地及英保护地。这样，到 1960 年非洲的独立国家就增到 26 个，其面积约占非洲总面积的 2/3，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3/4。

1960 年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向前发展。1961—1968 年又有 15 个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它们是：塞拉利昂（1961 年 4 月 27 日）、坦桑尼亚（由 1961 年独立的坦噶尼喀和 1963 年独立的桑给巴尔两国在 1964 年联合成立的）、布隆迪（1962 年 7 月 1 日）、卢旺达（1962 年 7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1962 年 7 月 3 日）、乌干达（1962 年 10 月 9 日）、肯尼亚（1963 年 12 月 12 日）、马拉维（1964 年 7 月 6 日）、赞比亚（1964 年 10 月 24 日）、冈比亚（1965 年 2 月 18 日）、博茨瓦纳（1966 年 9 月 30 日）、莱索托（1966 年 10 月 4 日）、毛里求斯（1968 年 3 月 12 日）、斯威士兰（1968 年 9 月 6 日）和赤道几内亚（1968 年 10 月 2 日）。到 60 年代末，非洲已有 41 个独立国家，英、法、比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崩溃。

第三阶段，70 年代。这是以葡属非洲殖民体系崩溃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通过长期武装斗争迫使殖民国家最终让步，是这个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特征。

葡萄牙是最早侵入非洲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也是放弃其殖民统治最晚的国家。到 70 年代，它在非洲还霸占有 6 块殖民地，即：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群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马德拉群岛等。从 60 年代初起，葡属殖民地人民相继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

1961 年 2 月，安哥拉首府罗安达的爱国青年，袭击了一个警察巡逻队，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然后冲上街头，袭击圣保罗监狱，揭开了武装斗争序幕。短短几个月内，武装斗争烈火蔓延到北部的大部分地区。1966 年，一批爱国者又在安哥拉东南部开辟了新战场。领导安哥拉人民武装斗争的是以下三个组织：1956 年成立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1962 年成立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 1966 年成立的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70 年代初，这三个组织的武装力量发展到 1.5 万人，活动遍及安哥拉北部、东部和首都罗安达以南的广大地区。

1963 年 1 月，几内亚比绍人民在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领导下开始了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爱国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 70 年代初形成一支拥有 1 万多人的队伍，并解放了 2/3 以上的土地和 1/2 的人口。1973 年 9 月，几内亚比绍第 1 届全国人民会议召开，宣布成立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1962 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成立。1964 年 9 月，该阵线发表《武装大起义宣言》，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经过 10 年战斗，解放了北部 3 省以及中部两省的部分地区。

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猛烈冲击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制度。1974 年

4月25日,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顽固坚持殖民政策的卡埃塔诺政权被推翻。面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葡萄牙新政府改变政策,与各殖民地解放组织谈判,并被迫承认它们国家的独立。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先后于1975年6月25日、7月5日、7月12日、和11月11日宣告独立。至此,历时500年之久的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彻底崩溃。

在葡属殖民地独立浪潮的推动下,法属科摩罗群岛和英属塞舌尔群岛先后于1975年7月和1976年6月宣布独立,1977年6月,法属索马里通过公民投票也宣布独立,成立吉布提共和国。

第四阶段,1980—1990年,这是最终完成非洲大陆非殖民化历史任务的时期,其标志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独立。

津巴布韦原为英国殖民地,旧名南罗得西亚。1953年10月英国将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联合组成为“中非联邦”。1963年底“联邦”解体。1964年南罗得西亚白人右翼势力组成以史密斯为首的政府,并于1965年11月片面宣布独立,1970年改名为罗得西亚共和国。白人统治集团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压迫津巴布韦广大黑人群众。60年代组成的以恩科莫为首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和以穆加贝为首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简称民盟),领导人民进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1977年12月,史密斯政权与穆佐雷瓦为首的统一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为主的温和派达成协议,成立“过渡政府”,谋求所谓“内部解决”。1979年5月,穆佐雷瓦出任“黑人多数”政府总理,并宣布将国名改为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共和国。由于国内外强烈反对,穆佐雷瓦政权未获国际上承认。1979年9月10日,津巴布韦各派在英国主持下召开了伦敦制宪会议,就制订独立宪法及实现停火、选举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80年2月,根据该协议举行议会选举,民盟获胜。同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宣布独立,成立津巴布韦共和国,穆加贝出任政府总理。

1990年南部非洲又诞生了另一个新独立国家——纳米比亚共和国。纳米比亚原名西南非洲,1890年沦为德国殖民地,1915年被南非出兵占领,1920年由国际联盟“委托”南非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米比亚成为联合国托管地。南非要求兼并纳米比亚,遭联合国拒绝。1949年,南非议会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把纳米比亚当作南非的一个省,在纳米比亚实行种族隔离制和法西斯统治。1950年7月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布南非这一行动为非法。此后联大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南非把该地交联合国托管,均遭南非当局拒绝。1960年4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立,并于1966年8月26日领导人民开始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1966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撤销南非对该地的委任统治,由联合国对它直接履行职责。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根据该地人民意愿,将西南非洲更名为纳米比亚。1973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将纳米比亚人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日子——8月26日定为“纳米比亚日”。1978年9月联合国通过第435号决议,要求终止南非统治,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公民投票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南非当局口头上表示接受决议,实际上阻挠和破坏决议的实施。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

189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得斯建立的英国南非公司占据了津巴布韦,1895年将其命名为南罗得西亚。1923年英国政府接管该地,并给予“自治领地”地位。

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突破。1988年12月22日，安哥拉、古巴、南非三国在纽约签署协议，规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实施435号决议。1989年4月，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努乔马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57.3%的多数票获胜。1990年2月，制宪议会通过独立宪法，努乔马当选总统。同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宣告独立。至此，非洲大陆完成了非殖民化的伟大历史任务。

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和亚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相比，它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出现殖民主义堤坝大块崩溃、一批一批国家宣布独立的现象。

非洲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含南非）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低，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较弱，从而导致民族独立运动起步较晚。一般来说，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是在50年中期亚非会议之后才出现的。但是一经发动，就汹涌澎湃，势不可挡，迅速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堤坝，形成当代世界史上蔚为壮观的一批一批国家摆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这一年一下子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其次是1962年和1975年，分别有4个和5个国家宣布独立。在1956—1980年1/4世纪的时间里，殖民主义者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崩溃，有46个国家获得独立。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之所以出现如此壮观景象，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

（1）50年代中期后第三世界崛起，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无论是亚非会议，还是不结盟运动，殖民主义都是遭到谴责和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联合国，随着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的加入，它也采取了一系列非殖民化措施。1960年联大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1961年联大又决定成立“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从此，非殖民化问题成了历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之一。殖民主义成了众矢之的。

（2）老殖民主义者在遭到战后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沉重打击后，面对着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日益认识到，与其背着这个因殖民地反抗而日益加重的包袱，不如放下包袱，给殖民地以政治独立，但保留经济影响，更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正因为如此，法国和葡萄牙先后在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中期放弃了旧殖民主义政策。

（3）非洲殖民地多属英、法、葡、比四国所有，非洲人民在反对宗主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各所属殖民地人民往往又联合一致，互相支持，因此只要一个国家宣告独立，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第二，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范畴。由于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因此民族独立运动的群众基础十分广泛。就其领导权来说，主要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在亚州，中国、朝鲜、越南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而在非洲，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手里，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过领导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1）非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要求。非洲的知识分子，大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范畴，他们不仅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接受了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正是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成为非洲民族主

义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2) 黑非洲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低, 工人阶级显得更年轻更不成熟。(3) 北非国家的共产党或因统治当局镇压以致力量过小, 或因自己路线错误, 或因受制于宗主国共产党, 都未能高举反帝反殖的旗帜, 未能掌握民族独立运动领导权。

第三, 社会主义思潮在非洲广泛流行。

在五六十年代非洲掀起独立运动高潮的同时, 出现了非洲社会主义的浪潮, 70 年代又有一批国家宣称把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据统计, 在 50 多个非洲国家中, 有近半数国家曾先后公开宣称奉行社会主义, 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有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工人自管社会主义”、加纳的“泛非社会主义”、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塞内亚尔的“民主社会主义”等。非洲社会主义派别很多, 内容不一, 各具特色, 无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们的共同点是普遍强调非洲大陆的传统价值体系, 把非洲传统社会理想化, 认为社会主义早已扎根于非洲历史传统之中, 企图恢复西方殖民者入侵前的古老的非洲社会结构。这种思潮反映了非洲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以部族为基础、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历史实际, 是非洲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虽受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但基本上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宗教的社会主义。

第四, 非洲国家取得独立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 但大多数国家是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迫使殖民主义者放弃旧殖民主义政策而取得独立的。五六十年代大批黑非洲国家, 如加纳、几内亚等就是这样独立的。此外, 少数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等是通过武装斗争赢得独立的。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 不仅使几个世纪以来遭受殖民奴役的非洲人民获得了解放, 改变了非洲的面貌, 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在联合国占了近 1/3 的席位, 在不结盟成员国中约占一半, 它们是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的反帝反殖力量, 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埃及共和国的成立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依据英埃同盟条约 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埃及, 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运输线和港口, 几十万埃及人和大量物资被用来为英军服务。战争结束后, 英国军队拒不撤出埃及, 腐败的法鲁克封建王朝又利用英国的支持实行专制统治。于是, 埃及人民为废除英埃同盟条约, 实现埃及真正的独立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英、反封建王朝的斗争。

1946 年 2 月 9 日, 数千名开罗学生举行反英示威游行, 在阿巴斯大桥遭到英军血腥镇压, 酿成“阿巴斯大桥惨案”。同月, 埃及工人学生联合会成立。在该组织号召下, 2 月 21 日和 3 月 4 日, 埃及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抗议斗争, 要求终止英埃同盟条约、英军撤出埃及、改变现行制度。反动军警开枪打死打伤示威群众数百人, 并封闭工人学生联合会。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 英军被迫撤出开罗和亚历山大, 退入运河区。

英埃同盟条约签订于 1936 年, 它用条约形式将英国 1922 年提出的四项特权——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区, 保留防卫埃及国防和交通线的权利, 保护在埃及境内的外侨及其财产的权利, 保持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1948年埃及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败，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广大人民、士兵和下级军官对以法鲁克国王为首的封建统治极为不满。1950年1月重新上台的华夫脱党政府继续执行软弱的谈判政策，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结果毫无成效。由于谈判失败和民族运动的推动，1951年10月15日，华夫脱党政府宣布废除英埃同盟条约和1899年的英埃共管苏丹协定，并拒绝参加中东司令部。英国宣布不承认埃及的决议，并增兵运河区。10月16日，苏伊士运河地区8万工人举行罢工，使该地区陷于瘫痪状态。接着，工人、农民和学生以及少数军警组织了志愿军和游击队，在运河地区与英军开展武装斗争达3个月之久。

1952年1月26日，开罗5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同一天，英国指使歹徒纵火焚毁了开罗的许多建筑物，制造了开罗纵火暴乱事件，企图以此来迫使主张废除英埃同盟条约的华夫脱党政府下台。翌日，法鲁克国王解散了华夫脱党政府，任命前宫廷大臣、亲美分子马赫尔为首相。马赫尔一上台就宣布全国戒严，设立军事法庭，逮捕爱国人士。1952年上半年，埃及政局动荡，在5个月时间里，内阁就更换了5次，这说明统治阶级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就在这种形势下，埃及爆发了“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七月革命”。

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成立于1945年，由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和阿卜杜勒·哈基姆·阿迈尔、查卡里亚·毛希丁等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军官建立，其成员大多为爱国的中下级青年军官。它的宗旨是反对英国的占领和法鲁克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由埃及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1948年5月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后，自由军官组织在前线进行秘密活动，影响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埃及革命的领导力量。1950年初，它建立了以纳赛尔为主席的执行委员会；同年下半年秘密出版《自由军官之声》报，主张建立爱国军队和代议制政府。到1952年初，该组织成员达数百人，遍及各军兵种。1952年1月6日，开罗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进行改选，自由军官组织的代表以多数当选。法鲁克国王立即下令解散军官俱乐部管委会，同时借故作人事调动，企图分散自由军官组织的力量。这次冲突促使该组织决定提前采取推翻封建王朝的行动。

1952年7月23日清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首先扣押了高级军官，控制了开罗各重要据点，接着占领了国王行宫所在地——亚历山大，包围了王宫。7月26日，法鲁克国王被废黜，逃往国外。

七月革命后，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改组为革命指导委员会。8月14日，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参加了革命指导委员会并担任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9月组织了埃及新政府，纳吉布任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新政府宣布没收封建王室土地，取消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1923年宪法，禁止一切政党活动。1952年9月颁布《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本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200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征购的土地以较低价格卖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953年6月18日，埃及新政府正式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埃及共和国，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统兼内政部长。1954年纳吉布被罢免，纳赛尔任代总统兼总理，并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1956年6月埃及举行公民投票，通过新宪法。新宪法规定埃及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纳赛尔当选为总统。埃及共和国的成立，是埃及人民反帝、反封、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的巨大胜利。

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阿尔及利亚，各大城市的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欢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要求民族独立。示威群众高呼“打倒殖民主义”、“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万岁”等口号。法国殖民当局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有4.5万人被屠杀，成千上万的人被监禁或流放。1946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成立。1954年7月，以本·贝拉为代表的一部分对民族独立要求比较激进的青年党员脱离该党，于同年8月另组“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1954年11月1日，3000名阿尔及利亚爱国志士在“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奥雷斯山区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进入新阶段。

起义爆发后，“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联合国内其他反法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该阵线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政治机构和领导起义的机关。在它的领导下建立了民族解放军。起义者首先在沿地中海的大卡比利山区和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奥雷斯山区建立了根据地。不久，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东部战区。1955年上半年，起义军又在西部靠近摩洛哥的地方发动起义，建立了以特累姆森为中心的西部战区。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新开辟的中部战区同东、西战区联成一片。从1957年3月起，战争扩大到南部撒哈拉地区。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震撼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法国不断增派军队，妄图扑灭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的火焰。1954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为5万人；1955年增加到20万人；1956年扩大到40万人；1958年又翻了一番，猛增到80万人，加上保安队、警察等不下100万人。法国殖民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围剿”、“扫荡”，但一败再败，又被迫改用重点“围剿”、“扫荡”，也未能得逞。法国殖民主义者不仅在战场上屠杀阿尔及利亚爱国者，而且对普通居民进行灭绝人性的“总体战”。集中营在法占区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71个集中营，至少有10万阿尔及利亚人被关在那里受难。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1957年10月起，民族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不断取得胜利。到1958年，民族解放军发展到13万人，武装斗争扩大到全国3/4的地区。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基础上，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费尔哈特·阿巴斯任总理。在解放区，法国殖民者的土地被没收分配给农民。同年9月26日，临时政府发表政策声明，指出临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和军队走向解放，同时也希望同法国进行谈判，和平解放阿尔及利亚。

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执政后，为摆脱法国政府面临的困境，从1959年起，他一再声称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并建议进行法、阿谈判。谈判从1960年6月25日开始。在谈判中，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开始时，法国政府拒绝双方在平等地位上谈判；后又提出只谈停火问题，不谈政治问题的无理主张；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对撒哈拉地区的主权，致使谈判一再破裂。同时，法国在战场上仍坚持武力镇压政策。它采取所谓“固守

要点，全面封锁”的方针，妄想守住主要城镇、石油产区以及东西两面同突尼斯、摩洛哥的边界防线。法国海军封锁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陆军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之间修筑了长 300 公里、纵深 1 公里电网的所谓不可突破的“莫里斯防线”。阿尔及利亚人民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用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在谈判桌上坚持原则，在战场上勇猛作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一再突破“莫里斯防线”，大量歼灭法军，使法国“固守要点，全面封锁”的战略破产。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取得的胜利，大大地推动了阿尔及利亚法占区人民的爱国运动。1960 年 12 月 9 日，正当戴高乐“巡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阿尔及尔、奥兰（今瓦赫兰）和君士坦丁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示威群众与军警进行了搏斗。阿尔及利亚人民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二条战线。

在阿尔及利亚人民沉重打击下，法国政府已无法继续殖民战争。同时，作为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戴高乐深知，不摆脱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就在这种形势下，法、阿于 1962 年 3 月 7 日在埃维昂恢复谈判，3 月 18 日签署《埃维昂协议》。协议规定 1962 年 3 月 19 日在阿尔及利亚结束军事行动，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有权行使自决权，成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协议宣布，在 3—6 个月内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协议还规定，3 年内法国分批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全部军队，但保留米尔斯克比尔（现凯比尔港）的海军基地，租借期 15 年，并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其他基地。

1962 年 7 月 1 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自决投票，99.73%的公民投票赞成独立。7 月 3 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同年 9 月，阿尔及利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定国名为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达 132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揭开了阿尔及利亚历史新的一页，同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统治，支持了非洲人民特别是法属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四、古巴革命

1952 年 3 月，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在古巴建立了亲美军人独裁政权。

巴蒂斯塔对外追随美国，对内实行军事恐怖统治。美国垄断了古巴的大部分工矿业和对外贸易，霸占了古巴 1/4 的耕地。美国不仅继续占领于 1902 年强行租用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并且在古巴军队中驻有军事代表团，掌握了古巴军队的训练与指挥权。巴蒂斯塔剥夺了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从 1952 年至 1958 年，古巴有 2 万多名爱国者惨遭杀害，数万人被囚禁或流放。巴蒂斯塔的亲美独裁统治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反抗。

1953 年 7 月 26 日，100 多名古巴革命青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下，袭击了奥连特省圣地亚哥东北的蒙卡达兵营。起义虽遭失败，但它揭开了古巴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序幕。

1955 年，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与流亡在那里的古巴爱国青年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1955 年 11 月 25 日，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 82 名革命青年，乘“格

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口出发，经过7昼夜航行，于12月2日在古巴奥连特省科洛腊多斯海滩登陆。他们登陆时遭到政府军的围剿堵击，大部分人在战斗中牺牲。卡斯特罗与其弟劳尔·卡斯特罗及格瓦拉等15人突出重围，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了武装革命根据地，展开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争。

1957年1月，起义军出击普拉塔兵营，全歼敌人的一个巡逻队。同年5月，起义军攻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乌贝罗兵营，扩大了武装斗争范围，并建立了两个战斗纵队。起义军在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从而赢得农民的支持。由于农民纷纷参军，到1957年底，起义军队伍已增至2000人。

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火种，点燃了全国革命斗争的火焰。1957年3月13日，以哈瓦那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为首的一批爱国青年攻打总统府，失败后建立“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转入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打游击。1958年，人民社会党也在亚瓜哈依地区组织游击队。同年7月20日，各反独裁政权组织代表在委内瑞拉签订《加拉加斯协议》，组成了反巴蒂斯塔的“革命民主公民阵线”，并推选卡斯特罗为总司令。这次会议加强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

1958年5—8月，起义军粉碎了敌人对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歼敌1000余人，俘虏450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此后，革命武装力量由防御转入反攻。

1958年9月，起义军从奥连特省出发，经卡马圭省，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10月，进入哈瓦那省，开始了夺取中心城市的战斗。12月，解放了古巴中部平原的中枢圣克拉腊，消灭政府军主力。接着，挥师西进，直指哈瓦那。在革命形势逼迫下，巴蒂斯塔逃亡国外。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进入首都哈瓦那，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接着，成立临时政府。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2月出任政府总理。

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时，美国承认了古巴临时政府，并邀请卡斯特罗赴美进行私人访问，企图拉拢古巴新政府。但随着古巴革命的深入，两国关系日益恶化。1961年1月，美国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同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支由1000多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在美国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在古巴拉斯维利亚斯省吉隆滩登陆。美国飞机还空投了一批雇佣军。雇佣军一度占领吉隆滩和长滩，并向北推进。古巴军队和民兵英勇反击，经过72小时战斗，全部歼灭和俘获入侵者。这就是有名的“吉隆滩战役”。

在美国雇佣军入侵的前一天——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年5月1日，他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年7月，“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原古巴共产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又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与此同时，古巴政府实行了以国有化和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社会经济改革。

第十一章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 国际格局的演变

第一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一、中苏关系的破裂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逐步开始了对外政策的调整。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二十大后，赫鲁晓夫越来越寄望于和美国平起平坐，乞求美国同意“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赫鲁晓夫后来多次向美国表示，“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赫鲁晓夫的论调掩盖了现代战争根源，美化了帝国主义，不能不造成国际上的思想混乱。

早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一部分兄弟党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有关国际共运的路线和观点，特别是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片面强调“和平过渡”，就持有不同意见。但苏联把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政策当作金科玉律，强迫各兄弟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向苏共领导人反复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只是分歧没有公开。

这时的赫鲁晓夫已感受到中国力量的壮大正严重威胁着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一家之主”的地位，从而加剧了其固有的“恐华症”。1955年9月，赫鲁晓夫居心叵测地请求西德总理阿登纳帮助他“对付赤色中国”。1958年赫鲁晓夫兼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热衷于谋求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事务，并把中国视为最大障碍。于是，他接连向中国施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压力，力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把分歧公开化，并挑起种种事端。

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共同建设”和使用一所长波电台并与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企图控制中国海军，中国予以拒绝。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片面撕毁中苏双方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又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意见，由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然袒护印度扩张主义，把中苏分歧公布于众。9月15—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举行戴维营会谈。艾森豪威尔希望赫鲁晓夫压制中国放弃解放台湾、发展独立核力量的立场。访美结束后，赫鲁晓夫飞往北京，他为美国充当说客，说什么不要有意地试探资本主义的势力，劝中国作出“临时性”的让步和牺牲，不要解放台湾。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驳斥和断然拒绝。

以后苏共领导变本加厉地对中国进行攻击。在1960年6月召开的社会主义

《真理报》，1961年9月10日。

据记载，毛泽东认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当代中国外交》，第114页。转自林军著《中苏关系（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第179页）。

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搞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领导还把两党之间的理论分歧扩大到国际关系上。1960年7月，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內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停止供应许多重要设备和物资，企图施加经济压力使中国屈服。

从1960年夏天开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寻衅滋事。中国政府屡次主动建议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拒不承认存在中苏边界问题，拒绝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直到1964年2月才勉强同意双方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在谈判中无视中国方面公正合理的态度和建议，坚持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拒不承认是沙俄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还想占有他们违约多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从而导致中苏边界谈判于1964年8月中断。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会上指名攻击有不同意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鉴于赫鲁晓夫的蛮横态度，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率团提前回国，两党关系开始全面恶化。

1961年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时苏联支援中国军事物资的贷款。

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在中国政府再三抗议和交涉后，仍然顽固地拒绝遣返。同年10月，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又公开偏袒印度，迅速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军事援助。

苏联采取的所有这些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苏联完全背弃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1963年3月开始，以中苏两党为中心，展开了公开大论战。

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第一次称中共为“叛徒”。9月，苏共的一份宣传提纲把中国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并准备在组织上公开同中国决裂。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走这一步，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同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4年赫鲁晓夫离职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访越途经北京期间，以“援越”的名义，要求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和基地，但遭到中国方面理所当然的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召开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分裂会议，导致中苏两党彻底决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正式地完全分裂。1966年10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中国全体留学生离苏回国。

1966年，大批苏军进驻中蒙边界，对中国北疆造成严重威胁。1969年3月2—15日，苏联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苏联的上述作法，都是企图压制中国服从于苏美争霸全球与共同主宰世界的需要，因为在苏联看来，实现其目标的最大“内部”障碍乃是中国，这是它难以容忍的。

二、社会主义阵营分歧的加深与走向解体

苏中两党两国分歧的日益扩大，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还在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中步步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正是这一过程的逻辑结果。

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一系列事件，曾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各社会主

义国家感到有必要协调共同的策略，消除分歧，为此而在 1957 年 11 月举行了有 64 个党参加的代表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当时，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从大局出发，一方面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对苏共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并把和平过渡仅仅归结为议会道路提出了批评和自己的修正案；另一方面，为了照顾苏共领导的困难而作了妥协，最后与苏共代表团共同拟定了《苏共和中共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交会议通过。南共联盟中央不同意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提法，而未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

由于《莫斯科宣言》本身不过是各种观点妥协的产物，莫斯科会议后不久，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间表面团结的关系很快就被新的分歧所打破。赫鲁晓夫为了维持苏联“老子党”的特殊地位和压服社会主义国家跟在苏联对外战略后面亦步亦趋，日益采取指名攻击、经济制裁等各种手段。除对中国的高压外，还在 1961 年对持不同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打击报复，撤回全部在阿技术人员，停止对阿经济援助，并在同年 10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霍查和谢胡。

及至 1964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变本加厉。此时的苏联领导人自恃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超级大国。其达于顶点的恶劣做法则是于 1968 年 8 月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为名，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公然武装侵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

第二节 西方阵营的分化

一、西欧、日本与美国矛盾的发展

从 50 年代中期起,西欧、日本经济已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并且走向“起飞”。尤其是 1958 年 1 月 1 日西欧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把西欧经济联成一体,提高了与美国抗争的能力。美国学者德波特指出,“到了 50 年代后期,当欧洲(以及日本的)生产和贸易有了出人意料的发展时,所谓的经常性美元短缺已变为美元过剩。”经济力量的增强,促使西欧各国尤其是几个西欧大国和日本,有可能采取更为活跃的外交姿态,向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美苏“两极”格局挑战。西欧则为争取“欧洲人的欧洲”而同美国进行斗争。

首先是美国在西欧的两大盟国——英国和法国当中开始出现了离心倾向。直接的触发因素是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深感在关键时刻不仅无法寄望于美国的保护,甚至会被自己的盟友“落井下石”。此后,两国都积极发展独立的核武器,以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则竭力限制两国发展核力量,要求两国拨款提高常规部队的作战能力,从而导致了矛盾的加剧。

1962 年 10 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走向缓和。西方内部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随着自身的经济走向繁荣和对苏联恐惧的减弱,西欧国家甚至包括西德在内都分别制定、提出和执行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东西方关系的和缓势头和西欧要求独立发展的倾向,相互促进,是这一时期西欧舞台上的重要特点。法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西欧因形势演变而调整对外关系、并相应调整对外政策的信号。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成为长期维持与美国“特殊关系”的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日本争取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则是要求发展其自主独立倾向的明确表述。

二、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

最早起来向美国领导地位挑战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1958 年 6 月戴高乐重新上台,随即于同年 10 月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9 年 1 月戴就任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是一位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强烈主张欧洲应是欧洲人的欧洲,主张欧洲联合起来,摆脱美国人的控制。60 年代在法国获得很大发展的科技革命,特别是其中电子计算机、原子、火箭技术的广泛运用,更加强了法国的独立倾向。

1958 年 9 月,戴高乐在致美英政府首脑的备忘录中,提出在北约组织中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大国组成的理事会,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美国不愿让法国来分享领导权,英国也不想让法国来冲淡英美的特殊关系,它们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

于是,戴高乐政府在 1959 年 3 月 6 日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7 月,又把美国驻法国的战斗轰炸机赶了出去。与此同时,法国加紧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于 1960 年 2 月 13 日首次试爆成功,戴高乐的态度更加强硬。1963 年 1 月,他断然拒绝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法国放弃独立核力量,由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但只允

许美国人的手指扣动核扳机。1966年3月，戴高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法国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10月北约理事会被赶出法国。翌年3月，一切外国驻法部队均被赶出法国。这些措施，都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严重挑战。

与此同时，戴高乐也在对其他国家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策。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并促使联邦德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戴高乐毅然抛弃法德宿怨，与阿登纳共同努力，实现了其有历史意义的法德和解。1963年1月22日，双方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戴高乐把这个条约看作是抗衡美苏，制约美国的有力武器。1964年1月，又冲破美国设置的反华阵线，与中国建交。总之，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与美国相抗衡，促使法美矛盾尖锐化，这是西方阵营分化的重要标志。

三、西德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是在60年代初，国际形势、东西方关系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62年11月，古巴导弹危机后，东西方关系向缓和方向演变，当时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鉴于苏美妥协，企图主宰世界，感到他们已不可能指望美国去打破德国问题的僵局。而随着德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苏联、东欧的广阔市场是很具吸引力的，继续推行阿登纳时期完全倒向美国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德国自身的发展。于是他响应法国戴高乐的号召，加强德法合作。1963年1月，两国签订《法德合作条约》。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有关部长分别定期举行会晤，以求协调政策，并在外交、经济、防务、教育和青年等方面加强联系和合作。但这时西德仍强调“必须同美国保持团结”。1966年1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康尔特·基辛格继阿登纳和艾哈德之后出任总理，组成了包括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外长的联合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67年1月，西德同罗马尼亚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哈尔斯坦主义即将结束，这也是后来宣布的新东方政策的先导。

1969年9月，勃兰特上台任总理后，正式宣布实行“新东方政策”，以完全取代以哈尔斯坦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由于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从俾斯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相应的东方政策，为了加以区分，人们习惯地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称为“新东方政策”。

勃兰特解释说，“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显然，其中最主要的是改善德国两部分的关系。要通过接近来实现东德的转变。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而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的必要前提，是联邦德国保证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以满足苏联巩固战后欧洲现状的要求。1970年8月和12月，联邦德国政府分别同苏联和波兰签订了德苏《莫斯科条约》和德波《华沙条约》，保证了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侵犯，承认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改变了前此历届政府所不承认的立场。

1972年12月21日，两个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这是自1949年德国分为两个国家以来，两个德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个国家关系条约，从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一年以后，西德又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条约表明，6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也在突破美国对西欧的战略限制，而独立自主地向苏联、东欧推行缓和对话政

策。这是西欧实力增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必然结果。

四、英国加入共同市场

作为美国在西欧的主要盟国英国，曾长期坚持三环外交，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英国为了同它相抗衡，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等国于1960年5月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但不久即改弦更张，开始逐步放弃英美特殊关系，主动向西欧国家靠拢，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变化的原因在于：英国的经济状态和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到1967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已由第二位降为第五位，先后被西德、日本和法国赶上。英国同英联邦国家的经济纽带松弛了，同西欧6国的经济关系却日益密切。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对英国来说，“英美特殊关系”也渐渐失去了作用。英国担心再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它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必将继续下降，最终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力，也难以保其安全与独立。因此，英国决定转向共同市场。

1961年、1967年英国两次申请加入共同市场，均因不愿完全放弃“英美特殊关系”，被戴高乐否决。1970年初，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希思开始推行以西欧为重点的外交政策，以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同年11月戴高乐逝世。这一年，英国提出第三次申请，终于进入谈判阶段，并于1971年6月与西欧“共同市场”6国就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各项主要问题达成原则协议。英国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答应最终同意放弃英美特殊关系和取消英联邦“帝国特惠制”，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放弃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承担较重的财政缴款，共同体方面则给予适当照顾。1973年1月1日，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对英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调整，并增强了共同体同美苏打交道的能力。

五、日本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

旧金山单独媾和后，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国策是：经济上争取最大限度的美援，军事上依靠美国的“保护伞”，外交上采取“向美一边倒”，把国家的首要目标放在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上。日本1955年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1950年至197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以年均增长14%的高速度发展，到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419亿美元，超过了英、法和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第二位。这一年日本还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自60年代起，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垄断资本谋求扩大商品和投资市场，要求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日美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逐渐激化起来。

日美贸易斗争以1965年为分界，这一年日本对美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以后日本的顺差数额直线上升，这就导致了日美贸易摩擦的连续发生。1968年，日对美贸易顺差突破10亿美元，引起了1968年至1972年的第一次日美贸易摩擦。经过长期谈判，日本于1972年限制了纺织品和钢铁出口，并减少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宗旨是消除成员国间工业品贸易壁垒，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对外不实行统一关税和贸易政策。一体化程度远低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其成员国的组成多次变化。目前有瑞典、挪威、瑞士、奥地利、列支敦士登、芬兰和冰岛。

参见吴学文主编：《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第44页。

了对美国的限额进口商品的项目，才使第一次日美贸易摩擦平息下来。但是，往后日美经济发展不平衡更形加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美经济、政治摩擦的进一步加剧。到了70年代，日本已一再强调要发挥其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

美日两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早已显露端倪。1956年10月日方不顾美国阻挠，与苏联签署联合宣言，规定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1957年2月，双方互派了大使。1961年池田首相同肯尼迪会谈时，把日美关系说成“平等伙伴关系”。日本内阁还表示“要抛弃把日本看成好像是美国附庸的可耻想法”。美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突出的表现是修改1951年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的问题。日本人民一直强烈反对这个条约。日本统治集团在50年代后半期也开始普遍对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表示不满。他们利用日本人民的反美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最终不得不于1960年1月同日本共同签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安全条约》，即新日美安全条约，以代替1951年的旧约。新条约确认美国有权继续在日本驻军和保持军事基地，但限定双方必须就此进行协商，并删去了旧约中美国可以镇压日本国内“暴动和骚乱”的条款；此外，规定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受到武装进攻，双方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在依附于美国的前提下，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1969年11月日美两国同意自动延长新日美安全条约并签订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的协定。1972年5月，美国把冲绳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但保留驻军权。至此，日美领土争执最终解决。

综上所述，到60年代后半期，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已逐步分化，这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第三节 第三世界的兴起

一、亚非会议

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地区一件突出的大事就是 1955 年亚非会议的召开。它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兴起。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一系列亚非国家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链条，到 50 年代中期，亚非两洲已有约 30 个独立国家。

独立后，亚非国家普遍要求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促进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1953 年 12 月，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翌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并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它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为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所接受，被称为“亚洲的宪章”，同时它的发表也为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12 月，印尼、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巴基斯坦 5 国总理决定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国等 25 国参加。会议定于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会议旨在促进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除中非联邦外，其余 24 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中国政府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和西方殖民国家惧怕亚非世界的团结和觉醒。美国《圣路易邮报》当时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为了破坏会议的召开，4 月 11 日，美国情报机关利用台湾特务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航客机中放置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从香港飞往印尼的途中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罹难。

1955 年 4 月 18 日，亚非会议冲破了各种阻碍和西方的破坏，在印尼万隆开幕。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共约 3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事实是，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会议。

大多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都围绕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和谴责殖民主义三个题目进行，但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偏离大会的宗旨，硬说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有的则影射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人们担心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

这时，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同时由周总理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4 月 19 日，周总理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阐述了亚非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的基础，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指出，这个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

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作了解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周总理的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许多著名政治家前来同周总理握手、拥抱。连原来在会上发言鼓吹亚非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同像美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一些在会上攻击过中国的代表主动与周总理握手，并表示歉意和懊悔。由于中国代表团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获得了各国代表的普遍接受，终于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4月24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分7个部分。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亚非会议是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亚非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亚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60年代非洲国家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赢得独立。1956年埃及人民为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而斗争，由此而爆发了中东第二次战争，沉重打击了英法帝国主义。

在万隆精神鼓舞下，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亚非国家日益增多，汇成一股新兴的政治潮流，为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大成就，从战后到1961年，共有34个亚非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取得了独立。但是他们还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维护独立、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美苏建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也威胁着新独立国家的安全。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积极谋求维护自身生存发展与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

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实际上已揭开了不结盟运动的序幕。铁托曾经指出，不结盟的“一些原则来自万隆会议”。第四次不结盟运动东道主、阿尔及利亚主席布迈丁也指出，“发起我们的运动的由来，应追溯到万隆会议”。1956年7月，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各国之间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坚持民族独立，反对加入军事集团。此后，他们又和苏加诺、恩克鲁玛举行了会谈。1961年2月至4月，铁托出访非洲9国，建议举行不结盟国家的首脑会议。6月在开罗召开了筹备会议，规定了“不结盟国家”的五项标准：（1）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2）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3）它不应当是任何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同盟的成员；（4）它不应当是同某个大国缔结的双边联盟的参加国；（5）它的国家领土不应当有在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

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5个国家，其中15个国家出席过万隆会议。这次

见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世界知识社，1956，第16，22页。

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正式形成。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宣言》等。

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以独立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并从根本上冲击着以美苏两大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不结盟运动积极参与解决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国际问题，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左右国际事务的局面。英国路透社指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独立于美苏两国领导的军事条约组织的道德力量，强调最初在万隆会议上获得赞成的和平共处原则”。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它在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它不是一个只作出消极反应的运动，它太有用了，因此不会消失。”

三、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

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剥削它们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为维护民族利益，发展民族经济而进行共同的斗争。60年代，另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组织，即“七十七国集团”诞生。

1963年，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第1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当时亚非拉75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五国集团”。196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五国集团增加为77个国家和地区，并以《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的名称发表了1963年75国提出的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七国集团”。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走上联合斗争的道路。以后“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不断增加，到1985年已增加到125个，几乎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但仍沿用“七十七国集团”这个名称。

1964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作为一个常设机构。贸发会议每4年召开一次大会。七十七国集团在每次贸发会议前都召开部长级会议，共商对策。

可以说，不结盟运动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政治组织，七十七国集团则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经济组织。两者相互支持，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就在七十七国集团成立的当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两个组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不结盟运动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或者叫做南南合作上；而七十七国集团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相互关系或者叫南北关系问题上。就是说，不结盟运动主要通过发展中国家的直接行动来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而七十七国集团主要通过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进行谈判来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出现，是第三世界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此，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之外，出现了一支由绝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力量，给予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两极格局以有力冲击。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加强

亚非会议后，中国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到60年代初，中国同约3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大部分是亚非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古巴。

中国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有关邻国合理解决了边界问题。1960年10月，中缅两国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合理地解决了两国长达2000公里的边界划分。1961年10月，中国同尼泊尔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年12月同蒙古签订了边界条约；1963年3月同巴基斯坦签订了边界协定；同年11月中国阿富汗签订边界条约。

中国同印度之间有长达2000公里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存在一条由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包括西、中、东三段。1914年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代表用秘密换文方式炮制了中印边界东段的“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这条非法界线把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英属印度。当时中国政府拒不承认这条非法界线，连英国政府自己当时都不敢公开把这条线画在地图上。1959年3月西藏事件后，印度政府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提出大片土地要求，并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不断向中国挑起武装冲突，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边防军忍无可忍，于1962年11月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击溃印军，消除其侵略据点。但中国真诚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自卫还击战以后，立即主动宣布停火，并从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还将缴获的军用物资交还印方，释放全部近4000名印度俘虏。中国的行动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赞扬。他们称赞中国为全世界“树立了空前的范例”。此后，中印边界基本上平静无事。

为了寻求与亚非国家的合作与友谊，周恩来总理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应邀访问了非洲的阿联（今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在顺访了阿尔巴尼亚之后，又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3国，全程108000里，历时72天，受到热烈隆重的欢迎。在访问阿联期间，周总理发表了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即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支持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各国主权应得到其他国家尊重，反对外来侵犯和干涉。在访问马里时，周总理又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主要精神是，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援助目的在于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提供优质设备，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技术；中国专家同受援国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等。这些原则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反对旧国际经济关系的锐利武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

1964年1月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建立正式关系上实现了突破。

1954年8月，中美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主要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国代表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驳斥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和企图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的顽固主张。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时断时续，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两国间保持了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本身就说明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失败。

指我国西藏地方某些上层分子在印度统治集团策动下公开发动的武装叛乱。

第四节 美苏争霸局面的逐步形成

一、苏美合作与争夺的开始

前已提到，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逐步改变了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并提出一套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实现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基本战略。赫鲁晓夫提出这一对外战略的背景是：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力量对比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使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连遭挫折，苏联正好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是，苏联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实力大为增强，有可能从实力地位出发执行新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环顾全球，当时唯苏联有资格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进行谈判。1953年8月，苏联氢弹爆炸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地位，这也使苏联有可能就裁军、欧洲诸问题发动“和平攻势”。但赫鲁晓夫乞求的“苏美合作”，与美平起平坐，又反映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当时尽管野心膨胀却仍感力不从心的矛盾状况。这反映在苏美关系上一开始强调东西方缓和，而随着苏联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苏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便愈演愈烈。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议，是东西方缓和的开始，而对奥地利和约的缔结则是一项重要的突破。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奥地利及其首都维也纳，由苏、美、英、法4国分区占领。由于冷战兴起，德国分裂，西方国家有意阻挠对奥和约的签订，致使这一战争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1954年初，在苏、美、英、法4国外长柏林会议上，苏联提出对奥和约的建议，并声明，支持迅速缔结对奥和约。1955年4月，奥地利代表团应邀赴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团就缔结和约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奥地利接受苏联倡议，保证奥地利国家中立化。苏联表示无偿地签订对奥条约，并从奥地利撤回苏联军队。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的主动外交行动，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响应。1955年5月15日，苏、美、英、法、奥5国外长在维也纳签订了对奥地利国家条约，即《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条约规定恢复奥地利主权、独立和1938年1月的边界；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或缔结任何同盟；奥地利应组成民主政府。盟国对奥地利管制自条约生效之日起废止，驻奥盟军在条约生效后90天内，至迟在1955年12月31日撤退完毕。

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结束了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对世界局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缓和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1955年7月18日，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开幕。这是自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四国最高级会议。出席四国会议的首脑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富尔、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会议的议程是：有关德国、欧洲安全、裁军和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等。

会议中，双方都把德国与欧洲安全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苏联认为，

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以1960年与1950年的国民收入相比，苏从1950年占美国31%变为1960年的占美的58%。10年内缩小了27个百分点。

根据德国现存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实现统一以前，可以成为两个具有平等权利的国家。苏联还提出欧洲安全体系的计划，它打算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保持欧洲两大集团的存在，两个德国可以分别参加两个集团，由双方缔结条约保证不使用武力。第二阶段是取消两大集团，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美国可以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成员国。这一方案表明，苏联放弃了统一德国的主张，转向承认两个德国。美英在会上提出“自由选举”，统一德国，保障欧洲安全的主张，旨在并掉民主德国，按照西德的政治制度建立起统一的德国。

在裁军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提出别出心裁的“开放天空”的建议。包括美苏互换本国军事地图，允许对方飞机进行“空中摄影”，从而取得国家之间的信任，作为缔结任何裁军协定的先决条件。赫鲁晓夫予以拒绝。认为这是美国针对苏联的一个赤裸裸的间谍阴谋，对正处在发展阶段的苏联核技术保密是很不利的。四国首脑会议因意见分歧而未获成果。

四国首脑会议是战后东西方首脑首次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赫鲁晓夫大肆吹嘘会议的伟大成就，说会议“标志四大国关系的转折点”，它创造了大国和平协商的所谓“日内瓦精神”，则纯属子虚乌有，倒是反映了苏联所追求的是苏美合作。

1955年6月7日，在四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苏联邀请西德阿登纳总理访问苏联，以便商谈实现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直接发给西德政府的照会，意味着苏联从国际法上对西德政府的承认。这是苏联政府当时采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西德政府于1955年6月30日照会苏联，表示接受邀请。但为了使西方盟国放心，阿登纳事前赴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会晤，商谈了共同采取的立场。他还向杜勒斯保证说：“联邦政府始终不渝地信守已订立的条约。”

1955年9月8日，阿登纳访苏，并与苏联领导人开始了建交谈判。苏联的立场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阿登纳则要求把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作为两国建交的先决条件。经过几天的艰苦会谈，苏联同西德之间总算弥合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双方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将在建交后一周开始释放战犯。9月14日，阿登纳在飞离莫斯科回国之前，向布尔加宁发了一封信，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并表示德国的东部边界不是最终的边界。西德政府旋即宣布，西德同苏联建交，并不意味着西德承认同苏联早已建立外交关系的民主德国；今后如有第三国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将把这种承认看作是不友好行动，并将与该国断绝外交关系。后人将这一政策冠以最初提出这一主张的当时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哈尔斯坦的名字，称之为哈尔斯坦主义。西德的立场自然与当时苏联的立场是直接对立的。塔斯社于9月16日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看作是德国的一部分，德国的另一部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的边界已由波茨坦协定解决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它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上执行着自己的管辖权。坚持不同意阿登纳的联邦德国“有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发言”的主张。9月20日，即阿登纳莫斯科之行后一个礼拜，苏联就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重新安排它们相互关系的“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条约”。条约重申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至此，苏联大体上完成了两个德国的外交部署。

二、赫鲁晓夫对苏美首脑会晤的追求与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上台后追求的一个近期目标是访问美国，企图通过美苏首脑会晤来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但是艾森豪威尔不予理睬。苏联便窥测方向，在全球尤其是在欧洲向美国发起新的外交攻势，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触起一场新的柏林危机。

1958年11月27日，苏联政府向西方三大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美、英、法在6个月内撤出它们在西柏林的驻军，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否则，苏联将把进入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权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此举的目的是在德国达到民主统一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使德国分裂固定化，迫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美、英、法拒绝了苏联要它们从西柏林撤军的要求，并宣称苏联如果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它们将不惜诉诸武力。战后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

面对西方的强硬态度，苏联放低了调子，表示6个月期限决不是最后通牒，并希望通过国家领导人互访和会谈改善东西方关系。针对赫鲁晓夫急于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打破美苏僵局、软化苏联的好机会。他向国会领袖表示，他要作出重大的个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经过协商，美苏于1959年8月3日同时宣布：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在同年9月访问美国；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秋后到苏联访问。据赫鲁晓夫自己回忆，当收到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信时，“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看来美国已经把苏联当作平等伙伴了，“我们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我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了给他壮行，在他访美前夕，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访美期间，赫鲁晓夫和他的随行人员先到各地参观了10天，最后在艾森豪威尔陪同下前往马里兰州的总统疗养地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两天会谈。会谈中双方就美苏关系、德国和柏林问题交换了意见。谁也不愿作出实质性让步。不过，会谈公报宣布双方在柏林问题上“恢复谈判”，在国际争端中不诉诸武力，并宣布艾森豪威尔总统应邀于1960年春正式访苏。于是，会谈产生了“戴维营精神”式的美苏缓和。赫鲁晓夫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他的美国之行虽未产生什么实际成果，但他认为这本身就给人以苏美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事务的印象。

但是，战后美苏的第一次“蜜月”是十分短暂的。无论是四大国巴黎首脑会议还是艾森豪威尔访苏，都因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被苏联导弹击落而告吹。转瞬之间“戴维营精神”烟消云散，美苏关系又跌入低谷，进入新的冷战僵持时期。

三、从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到肯尼迪的“和平战略”

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和1957年苏联在世界上首次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当局既看到了希望又深感必须更加注意用“和平的方法”来“缩短共产帝国主义的预期寿命”。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和平演变”战略狂热鼓吹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加深共产党内部的困难”，以达到“解放”的目的，首先要使社

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马列主义失去信仰。他非常重视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后代上，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三代人身上，非常重视加强对这些国家青年学生的工作。艾森豪威尔曾在 1958 年草拟过一个美国和苏联大批交换留学生的计划，其总数达 1 万人之多。他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但是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有关“和平演变”的策略思想仍处于形成时期，实际办法不多。到肯尼迪时期，方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战略策略思想。

1961 年 1 月，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在 1960 年大选中获胜，登上了白宫宝座。肯尼迪上台之后就明确提出了“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的“和平战略”。还提出对非洲的“新非洲政策”，对拉丁美洲的“争取进步联盟”，对西欧的“宏伟计划”，等等。

所谓“和平战略”，实质上是在实力地位基础上灵活运用文武两手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其矛头首先对准了社会主义国家。肯尼迪及其谋士们总结了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搞“遏制”“围堵”无助于“和平演变”的教训之后，强调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口号下，通过援助、贸易、旅行、科技与文化交流，设法削弱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状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这一“和平战略”也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以“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攀亲戚”运动，派遣“和平队”等等，争取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把它们纳入美国战略轨道。为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进美国的全球扩张，肯尼迪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即既准备打有限核战争和核大战，也准备打常规战争与特种战争。

四、维也纳交锋和“柏林墙”事件

在肯尼迪任期内，美国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武装干涉行动。美国特别惧怕共产主义在古巴的得势，其第一次干涉就是支持古巴流亡分子入侵古巴。1961 年 4 月 17 日，中央情报局装备和训练的反卡斯特罗的 1400 多名古巴流亡分子，乘美国运输船并在中央情报局雇佣人员所驾飞机的掩护下，由古巴南海岸的猪湾（吉隆滩）登陆。在短短 72 小时内全部被击溃。中央情报局所预言的古巴本土反卡斯特罗的起义并未发生，使美国的这场间接军事入侵遭到彻底失败。

在肯尼迪政府支持古巴流亡分子猪湾入侵失败之后，赫鲁晓夫趁机倡议举行美、苏高级首脑会议，试图摸清肯尼迪外交政策的底牌，并向肯尼迪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肯尼迪想利用这个机会挽回因猪湾事件失去的威望，因而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挑战。

1961 年 6 月 3 日和 4 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进行了两天的会谈。会谈的主要议题有双边关系、裁军、禁止核试验条约，柏林和老挝问题等。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重新提出了 1958 年曾提出过的要求，即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美国、英国和法国从西柏林撤军。如果西方国家拒绝，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媾和，那时西方国家进入西柏林都须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意。肯尼迪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

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决心在西柏林问题上与肯尼迪较量一番。

1961年7月初，他宣布暂停红军的复员，并将苏联的军费增加1/3。肯尼迪立即作出了强硬的反应。他认为西柏林是美苏对抗的焦点，表示决不容许西方被赶出西柏林。他要求国会追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扩大民防计划，修筑防空设施。顿时间美国和苏联剑拔弩张，持续近3年的柏林危机开始进入新的高潮。

1961年8月13日，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从15日起沿着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在东柏林境内修筑起一道“柏林墙”，防止东柏林人西逃。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措手不及，恼怒之至。它们虽然并不想和苏联发生全面军事冲突，不得不把“柏林墙”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但肯尼迪为了向苏联显示美国保卫西方在西柏林利益的决心，向赫鲁晓夫提出不惜一战的警告。接着，他派遣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柏林，同时还命令一支1500名美军全副武装沿高速公路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检查站，开到西柏林。苏联对此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柏林墙既已筑起，10月10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式取消了要求美、英、法于1961年12月底以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不久，赫鲁晓夫冻结了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美、苏关系得以再次缓和下来。柏林危机的结束，是美苏进行军事对抗后妥协的结果。但这次危机的结束并没有消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为新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就在柏林危机过程中，美、苏双方之间核军备竞赛迅速升级。“柏林墙”筑起两个星期后，苏联撕毁美、苏两国为期3年的禁止核试验协议，恢复一系列核试验。肯尼迪明确地知道苏联是虚张声势，对美国不会构成任何真正威胁，但他不甘示弱，在9月命令恢复地下核试验。美、苏军备竞赛又进入一个高潮。

五、古巴导弹危机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与防止核扩散条约

赫鲁晓夫还试图在加勒比海地区同美国进行较量。1961年美、古断交。苏联取得了打入美国在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机会。苏联向古巴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美国感到不安。1962年8月底，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上空发现古巴近程导弹发射场。肯尼迪总统立刻在9月4日对苏联发出警告。苏联予以否认。但是在10月14日后，U—2飞机拍摄到苏联正在古巴修建的中程与中远程导弹发射场的照片。

10月16日，肯尼迪下令召集由政府各主要部门官员和顾问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研究关于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对策。委员会提出各种建议，其中主要是对导弹发射场进行空袭和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最后决定先对古巴进行海上封锁，迫使苏联撤走导弹。如果封锁不起作用，再实行空袭。

10月22日晚，肯尼迪通过电视向全国正式通报苏联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的“惊人”消息，宣布对古巴实行名为“隔离”的海上封锁，以切断正在运往古巴的武器运输线。肯尼迪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核导弹视为苏联对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的全面报复。他要求苏联立即从古巴撤出所有中程导弹。

根据肯尼迪的命令，180多艘美国军舰在加勒比海进行巡逻，形成对古巴的严密的海上封锁。美国设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也得到加强。载有核弹头的B—52轰炸机飞上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在全世界的海、陆、空三

军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笼罩了美国 and 全世界。

就在肯尼迪进行战争威胁，核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自知苏联仍处于军事劣势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后退了。10月26日和27日，赫鲁晓夫两次写信给肯尼迪，建议以苏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并要求美国从意大利和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肯尼迪在复信中许诺如苏联迅速撤出它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就不入侵古巴，但对赫鲁晓夫要美国从土、意撤走导弹的要求不予理睬。肯尼迪要求苏联立即作出答复，否则美国就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肯尼迪政府的软硬兼施，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的复信中撤回要求美国从意、土撤走导弹的先决条件，同意从古巴撤出苏联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两国之间的一次核赌博。这场危机不仅对美、苏关系，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把世界推到核战争的边缘，各自也深深受到核武器致命威胁的震动。在危机结束以后，美国和苏联从各自利益出发，设法避免用核讹诈方式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作出努力，缓和两国关系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两国合谋保持核垄断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其实际措施是双方加快了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步伐。

1963年7月15日，美、英、苏在莫斯科恢复谈判，并很快达成协议。8月5日，3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以下简称《部分核禁试条约》）。条约于同年10月10日生效。此后，约有100个国家加入该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保证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或水下“禁止、防止并且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还保证“不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加”上述核武器试验爆炸或其他核试验。但这项条约并没有真正限制住美、苏核军备竞赛，因为条约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在条约签订后的5年里，核试验的次数增加了，而不是减少。运载核武器的导弹和其他运载工具更是得到大规模的发展。

美、苏签订的《部分核禁试条约》是一个意在巩固美苏核垄断地位的条约。美苏企图以此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然而，美、苏垄断核武器的目的没能达到。1960年，法国试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进入60年代后，中国加快了研制核武器的步伐。法国拒绝在《部分核禁试条约》上签字，中国则揭露了美苏的企图，指出正确途径应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给了美苏核垄断与核讹诈政策以有力打击。同时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美国和苏联在达成《部分核禁试条约》的同时，还于1963年8月达成协议，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由电传打字机构成的所谓“热线”，供双方领导人保持联系，以避免由于误会而爆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1968年美苏又联合抛出所谓“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并于同年7月签署。这标志着美苏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更大勾结。条约主要内容是：有核国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地将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器械转让给无核武器国家，或帮助这些国家制造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器械；无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器械，不从其他国家接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器械，也不索取或接受这方面的援助。条约掩盖美苏核竞赛是世界紧张局势的

根源，反而归罪于“核扩散”。条约还规定国际原子能总署有权检查无核国家的核技术情况，这就为美苏利用国际组织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打开了大门。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变化

第一节 5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改革运动的兴起

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初建

南斯拉夫解放后，曾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到1947年，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单方面撕毁了过去同南斯拉夫签订的一切贸易和经济协议，对南斯拉夫进行经济封锁，施加政治压力，南斯拉夫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遇到巨大困难。1950年南斯拉夫又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只有正常年景的50%左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这极其困难的时刻，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顶住了外来压力，认真研究和总结本国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认识到照搬苏联模式是行不通的。他们决心根据南斯拉夫国情，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诞生。

1949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政府经济委员会和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联系会议通过了《关于国营经济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一些企业开始进行工人自治的试点工作。到1950年年中，全国有529个企业选举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在这段试验的基础上，联邦议会于1950年6月通过《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宣布在所有国家企业中实行工人自治。法令规定：“工人集团通过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以及联合几个经济单位的高级经济组织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管理这些企业。”工人自治法的颁布，标志着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正式开始。

工人自治法颁布后，在全国工矿企业中普遍成立了工人委员会。但是，由于国家计划制度未作相应改革，工人委员会的职权受到很大限制。针对这种情况，联邦议会于1951年12月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革计划体制，国家计划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主要比例，不再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使指令性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

1953年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确认自治原则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并把工人自治从工矿企业扩大到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以及教育、科学、文化、保健等部门。按照新宪法规定，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新宪法还规定，在联邦和共和国两级议会中设立生产者院（后改为联合劳动院），由劳动者选出的代表直接参加社会事务的管理。

实行工人自治后，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有权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自行制订生产计划，自由经营，自负盈亏。企业所得利润约2/3左右以投资基金税形式上交国家，其余部分留归工厂。工人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经营的好坏。在工人自治时期（1950—1963），企业的权限一般只限于处理简单再生产领域方面的问题，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资金仍由国家掌握。工人委员会最初的权

限较小，主要起咨询作用，国家机关和企业经理作为国家的代表在企业中仍起决定作用。只是到了这阶段后期，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的权限才逐步有所扩大。

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对农村的生产关系也进行了一定调整。1952年南共六大决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放弃苏联模式。1953年3月颁布法令，宣布农民可以自由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到1960年，合作社只剩下100多个。为了把个体农民的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政府鼓励个体农民同农业合作社和国有农场签订供销合同。政府还努力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强国有农场的建设，要求把国有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

为了适应自治制度的发展，1952年南共第6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954年1月，南共联盟第3次非常中央全会批判了以联盟中央执委、联邦人民议会主席米洛万·吉拉斯为代表的关于将南共联盟改组为协会团体、实行多党制的观点，撤销了吉拉斯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又将其开除出党。1958年南共联盟七大通过的南共联盟纲领明确规定，南共不再干预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政治思想工作，起引导作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抛弃苏联模式，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改革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1953—1963年，南斯拉夫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13.8%，国民收入增长1倍。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1961）提前一年完成。

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与苏联改革的探索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在理论部分，赫鲁晓夫提出一系列新观点：（1）关于现代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绝对正确的”，但在目前，情况已经根本改变，由于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和平力量已增长到足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动，因此，“现代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也指出，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有效，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2）关于和平共处问题。他宣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强调和平竞赛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在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竞赛中取得胜利。（3）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他认为，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不应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过渡的唯一形式。他认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有可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在议会中取得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十大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 133 名中央委员中只有 79 人是原十九大的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2 月 24 日,大会在完成了预定的正式议程之后宣布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代表再次开会,向他们作了长达 4 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严厉批评斯大林鼓励个人崇拜、违背集体领导、滥用权力、破坏法制、批准镇压无辜,以及对法西斯德国入侵警惕不够,造成卫国战初期苏军失利等错误。赫鲁晓夫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不良品质。秘密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开了问题的盖子,对人们震动很大。但报告未能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历史的全面评价,未能找出错误的根源并得出应当汲取的教训。

二十大后,苏共中央于 1956 年 6 月 30 日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时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工作。据统计,1956—1957 年间,有 700—800 万人被释放,500—600 万已死的人得到平反。在文化方面,政府放松了书报检查。

赫鲁晓夫的做法遭到一些领导人的反对。1957 年 6 月 1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严厉谴责赫鲁晓夫的内政外交政策。主席团的多数成员要求赫鲁晓夫立即下台。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一决定,说主席团无权解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他的去留问题。6 月 22 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经过几天激烈争论,中央全会于 29 日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路线”,反对二十大所赞同的“消除个人崇拜的错误和后果”的方针,走上了“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8 年 3 月,最高苏维埃以布尔加宁参与反党集团活动为由,免去了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赫鲁晓夫接任。这样,苏联的党政大权就集中在赫鲁晓夫一人手中了。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经济政治领域的若干方面进行了改革的尝试。

第一,改革农业管理体制,调整农业政策。斯大林执政时期,由于农业政策失误和管理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造成苏联农业长期徘徊不前。为改变农业落后局面,赫鲁晓夫当政后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 纠正农业部门中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改变农产品采购制度。

苏联从 30 年代起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集体农庄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其价格远远低于成本。1952 年牛肉义务交售价格仅为成本的 5%,猪肉为 6%,牛奶为 22%;1953 年谷物义务交售价格只有成本的 10%。1958 年 6 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按地区规定统一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的统一收购制度,并规定采购价格应反映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并保证农庄有一定的赢利率。1952—1964 年,苏联农产品采购价格平均提高 2.54 倍,其中谷物提高 7.4 倍,经济作物提高 58%,牲畜提高 15.09 倍,牛奶提高 3.55 倍。由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多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业生产已经成为赢利的部门,从而从经济利益上提高了集体农庄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 改革农业计划管理制度,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1955 年以前,苏联在农业方面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对农庄、农场合下达繁多的计划指标,详尽规定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产量等等。农庄、农场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因地制宜地

进行生产。1955年3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决议，废除国家下达繁多计划指标的做法，改为国家只下达农畜产品收购指标这一项计划。这项改革扩大了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有利于农庄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但是，这项决议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3)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使农庄拥有农业机器。斯大林当政时期，按照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机器拖拉机不卖给农庄，而由国家成立的机器拖拉机站代耕，国家收取实物报酬。195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机器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到1959年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标准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这项措施结束了“一块土地，两个主人”的不合理现象，并使集体农庄从此免除了向国家交纳实物报酬，从而减轻了农庄的负担。同时，这项措施也是对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理论的一次冲击。但是，由于推行过急，使农庄要在短期内购买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农业机器，又要建造机房和修配厂，因此，负担极其沉重。许多农庄不得不取消其他项目的建设，这给当时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特别对一些贫穷的农庄来说，国家一下子把如此巨额的农机购置费用负担压到它们身上，使它们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4) 加快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改组为国营农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加快了在50年代初就开始的合并农庄的进程，并从50年代中期起将部分经济薄弱的农庄转为国营农场。这两种做法使农庄的数量大为减少。1953—1964年，农庄的数目从93300个减为38300个。平均每个农庄的农户从1950年的不到100户扩大到1965年的426户。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农庄转为农场，加上在垦荒区建立的农场，使得国营农场的总数从1953年的4857个，增加到1964年的10100个。

(5) 扶植家庭副业经济。从1953年起，苏联开始减少家庭副业的义务交售定额，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从饲料、运输工具、销售等方面为发展家庭副业提供方便。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1月起取消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人副业的各种农产品的义务交售，代之以支付较高价格的国家收购。在政府的扶植下，家庭副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同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生产的肉增加33%，奶增加27%，蛋增加44%，羊毛增加91%。

(6) 大面积开垦荒地。赫鲁晓夫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主要采用粗放经营方式，即通过扩大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1954年2月2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同年3月2日，苏共中央作出决议，决定由国家投资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及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区开垦大面积荒地。接着，赫鲁晓夫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垦荒中去。据统计，1954—1960年期间，共开垦荒地4183万公顷。新垦区成了东部地区新的谷物生产基地。但是由于不尊重客观规律，破坏生态平衡，致使新垦区发生严重风蚀和沙暴。1962年夏，几百万公顷土地遭风蚀。赫鲁晓夫时期，未能把垦荒的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改革没有触及集体农庄制度本身，还是集中劳动，按劳动日分配，吃大锅饭，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还对某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采取收缩

的政策。例如 1958 年以后，他放弃了鼓励发展家庭副业的政策，并对家庭副业进行了不适当的限制。结果，导致家庭副业萎缩，私人经济减少。1964 年和 1958 年相比，私人经济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产量都减少了 13%—15%。同时，赫鲁晓夫把一批批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国营农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断合并集体农庄，使得农庄规模过大，难于管理，陷于困境。

赫鲁晓夫在改革调整农业过程中，办了不少主观盲动的事。他看到美国种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就不顾苏联多数地区气温低、雨量少的自然条件，强行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 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 350 万公顷，1962 年达到 3700 万公顷，占谷物播种面积的 1/4 以上。结果由于绝大部分玉米未能成熟，造成谷物歉收。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尽管很不彻底，政策有很多失误，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了苏联农业发展，其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是主要的。1958 年和 1953 年相比，苏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50%，其中谷物增长了 63%，由 1953 年的 8250 万吨增加到 1958 年 13470 万吨。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集体农庄庄员 1958 年平均劳动报酬比 1953 年增长 82%。

第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30 年代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和部门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造成经济效益低下。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更为突出。赫鲁晓夫执政后，发现中央很难把全国 20 多万个企业集中管理好，就力图改变这种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他陆续把 1.5 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在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改革的基础上，1957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

1957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重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采取分区管理的形式。5 月 10 日，最高苏维埃公布了相应的法令。根据法令，撤销了 10 个全联盟部、15 个联盟兼共和国部和 113 个加盟共和国部，中央保留的全联盟工业部和建筑部有：航空工业部、造船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中型机器制造部和交通运输建筑部；把全国划分为 105 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国民经济委员会，原属中央各部的企业移交给所在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撤销的原属加盟共和国部的企业，一部分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另一部分转交给地方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对企业的具体领导是通过专业管理局和职能处（局）实现的。改组后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结构为：苏联部长会议——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业和建筑业企业。改组后，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在全苏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45% 下降到 6%，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的工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72%，地方工业占 22%（1959 年统计）。

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改组对改变中央过分集权的弊端，发挥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次改组只不过是把部门行政管理体制改为地区行政管理体制，领导经济的方法和企业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原来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病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由于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走向另一极端，权力下放过了头，致使国家丧失了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滋长泛滥，造成严重的地方割据，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混乱。此外，在大改组

中涉及大量人事变动，侵犯了相当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对此又未妥善处理，因此增加了人为阻力。1958年后，赫鲁晓夫又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中管理，陆续将物资分配权、计划编制权和建筑业的管理权收归中央；1960年把105个经济行政区合并为100个，1962年又减少为47个；1963年设立苏联部长会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苏的工业和建筑业，并且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工业管理机构不仅没精简，反而扩大了2、3倍。1957年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造成了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据统计，改革之前的1951—195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1.3%和13.1%，而到1956—1960年，分别降为9.1%、9.0%、和10.4%，1961—1965年又分别降为8.5%、6.6%、和8.6%。

60年代初，赫鲁晓夫开始寻求新的改革方案。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计划、利润、奖金》为题的文章，主张用利润、奖金等经济手段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建议国家给企业只下达各种产品的数量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其余完全由企业自行制订，并逐步取消物资的统一调拨。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962年9月到1963年底，《真理报》等报刊组织了全国性大讨论。利别尔曼改革方案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并从1964年起开始在一些企业中进行试验。赫鲁晓夫支持的这场围绕利别尔曼建议所进行的理论讨论和改革试验，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赫鲁晓夫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虽不算成功，但他执政时期苏联工业还是有了明显的进展。1953—1963年，苏联工业产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科学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1957年8月26日和10月4日，先后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洲际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第三，改革政治体制。斯大林当政时期，苏联形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受到破坏。赫鲁晓夫上台后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改革措施：

(1) 建立干部更新制度，限制干部任期。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正式提出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并把它列入苏共纲领和章程。党章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党章又规定：“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时期内连续选入领导机关”。

(2) 加强法制，整顿和改组国家安全机关。清除贝利亚后，苏联重新把内务部一分为二，于1954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分开后的内务部，变成一个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权力大大缩小。1960年1月撤销了苏联内务部，将其职权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克格勃后来虽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组织，起秘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职权仍然赶不上过去的苏联内务部。它不能包揽逮捕、侦查、审判、执行判决的全部过程，也不再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而是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

领导。

赫鲁晓夫在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了一种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理论观点。1959年，他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1961年，他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更进一步提出了苏维埃国家“已变为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成了全体人民的党”的理论，并规定了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表，提出苏联要在20年内，即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认识，阻碍了改革的深入，使其难以建立起一个符合苏联国情的经济政治体制。

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有探索和开创的性质。这些改革措施，有的成功，效果显著；有的虽有成绩，同时伴有错误；有的很不彻底，前后不能贯彻始终；有的则是心血来潮的蛮干。这些改革极大地冲击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各种弊端，但并未根本改变高度集中的传统管理体制模式。进入60年代后，改革的矛盾日益突出，赫鲁晓夫领导的主观任意性也日益严重，最后终于导致他本人1964年的下台。

三、匈牙利事件和匈牙利改革的酝酿

匈牙利建立人民政权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苏联政治经济模式。在经济上，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完全不顾缺乏原料的状况，提出把匈牙利建设成一个“钢铁国家”，结果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51—1953年，职工工资先后下降11%、17.8%和13%以上。在政治生活中，拉科西集党政大权于一身（1952年8月起兼任政府总理），大搞个人崇拜，排挤、打击异己。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匈牙利大搞清洗“铁托分子”运动，被清理审查的党员、干部有2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50。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一批高级干部被处决，卡达尔被捕。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主席纳吉·伊姆雷因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反对拉科西的左倾路线于1949年被解除党政职务。

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拉科西被迫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由纳吉接任总理。纳吉上台后，调整了政策：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贯彻自愿入社原则，允许农民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实行对外开放；允许小私有企业存在；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政治大赦；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满足教会的正当要求。苏共领导指责纳吉发展轻工业的方针是错误的。在1955年3月和4月召开的两次中央全会上，拉科西主持批判了纳吉的所谓“右倾路线”，解除了纳吉的党内外职务。同年12月，纳吉又被开除出党。拉科西的极左路线和苏联对匈牙利内政的干涉，引起了匈牙利人民的严重不满。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人民要求克服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政治经济改革。1956年3月17日，布达佩斯知识界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选出由20人组成的执行局，其中13人是党员。俱乐部十分活跃，各种辩论常常通宵达旦。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同年6月30日，匈党中央通过决议，谴责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宣称要严惩“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苏共领导对匈牙利的局势极为不安，7月派米高扬赶赴匈牙利进行干预。在苏联压力下，拉科西被迫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继任。

格罗执政后，继续坚持拉科西路线，但在舆论压力下，被迫下令将 300 多名“铁托分子”释放，并为拉伊克平反。10 月 6 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为拉伊克等 4 名被害领导人举行国葬。30 多万布达佩斯群众自发拥上大街，护送送葬队伍。这次葬礼实际成为一次政治示威。10 月 13 日，格罗被迫下令逮捕判处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法尔卡什。14 日，政治局宣布恢复纳吉的党籍。但是这些让步已无法平息群众的不满。10 月 17 日，匈作家协会党组通过决议，要求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新的领导机构。10 月 21 日，波兰党抵制苏共干预、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布达佩斯民情激奋。翌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随后，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召开联系会议，决定 23 日举行声援波兰人民的示威游行，并向政府提出十六点要求。十点和十六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清算拉科西的罪行，由纳吉出任党政最高领导职务，民主选举各级领导干部，撤走苏联驻军，维护民族尊严与独立。

10 月 23 日，布达佩斯的几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迅速增加到十多万人。游行群众一路涌向国会大厦广场，一路前往电台大厦。在国会大厦广场上，纳吉在群众的要求下发表了讲话。晚八时，电台广播了格罗的讲话，一方面表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又指责有人利用自由制造“民族沙文主义骚动”，扬言要进行反击，粉碎敌人的阴谋。格罗讲话无疑是火上浇油，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少数坏人乘机挑拨，扩大事端。当天夜晚，一些人向电台发起冲击，和守卫电台的保安部队发生交战，并占领了电台。随后又攻占国际电信局、《人民自由报》编辑部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深夜，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改组政府和政治局。24 日上午党中央发表公告，宣布由纳吉出任政府总理，接着又宣布实行戒严，并请苏联出兵恢复布达佩斯的秩序。中午，纳吉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称首都发生的暴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呼吁停止流血冲突，恢复秩序，表示将实行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10 月 25 日，匈党中央举行会议，在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参与下，决定解除格罗的职务，由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不过，这时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陷于瓦解。与此同时，事态进一步恶化，暴乱迅速波及全国各地。

10 月 28 日，纳吉在广播讲话中转而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革命”，宣布苏军应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将撤离布达佩斯。29 日，纳吉下令解散国家保安机构。30 日他又宣布取消一党专政，允诺在秩序恢复后即举行自由选举。

纳吉的妥协退让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气焰。“剑与十字”、“白色卫队”、“血盟”等 250 多个不法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国际帝国主义极力挑拨，进行蛊惑宣传，并通过各种形式支持暴乱分子。暴乱分子打开监狱，释放所有罪犯，包括 9000 名刑事犯，近 4000 名前党卫军分子、战犯以及其他政治犯。10 月 30 日，武装暴乱分子攻占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杀害了市委第一书记和守卫大楼的公安战士。各地发生多起屠杀共产党人和保安人员事件。

11 月 1 日，传来苏军开进匈牙利的消息。纳吉召见苏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向苏联提出抗议。当天，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预。11 月 3 日组成四党联合政府，纳吉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10 月 31 日，以卡达尔为主席的党中央 6 人主席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 月 1 日，卡达尔离开布达佩斯。

11月4日，卡达尔通过索尔诺克电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新政府请求苏联出兵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再次开进布达佩斯，暴乱逐步被平息。纳吉政府垮台，他本人逃往南斯拉夫驻匈大使馆避难。11月7日，卡达尔和工农革命政府其他成员回到布达佩斯。11日，卡达尔宣布彻底平定了武装暴乱。

十月事件给匈牙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20亿福林，约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

十月事件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认真总结事件的原因和教训，决心纠正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至60年代中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和改革。政治上，改善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局面，挽回党在人民群众中失去的威信。经济上，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降低积累率，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把农业、轻工业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第二，调整农业政策，改革农业体制，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承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使用了强制手段，允许农民退社。初期，合作社的耕地急剧减少，1957年只占全国耕地的10%。从1958年起采取自愿互利原则，重新进行农业合作化。到1961年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占全国耕地的93%，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取消了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指令性计划，改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节；第三，在工业方面实行局部改革，着手制订全面改革方案。1962—1963年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组，取消各部所属大批总管理局，建立托拉斯，减少管理环节。1964年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制订出改革的总体方案。上述政治经济措施使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形势逐步稳定，为全面进行经济改革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波兹南事件和波兰改革的开始

波兰解放后，波兰人民先后在工人党和统一工人党领导下迅速医治好了战争创伤。但是这时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总书记哥穆尔卡为首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波兰的政治传统和民族特点与苏联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应该从波兰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波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1948年8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批评哥穆尔卡犯了“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错误，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后又将他开除出党，逮捕入狱。哥穆尔卡下台后，由贝鲁特任总书记。贝鲁特在政治上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1948—1949年，在消灭“民族主义倾向”的口号下，对波党进行了三次大清洗，约有1/4的党员受牵连，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建设中照搬苏联模式，大量资金用于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正常提高。上述失误引起波兰人民的不满。

苏共二十大在波兰引起了强烈反响。波党新领导人奥哈布（贝鲁特于1956年3月12日逝世）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很多错误。4月20日，政府宣布大赦，释放了1000多名政治犯。但是，波兰领导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群众生活，没有着手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

经交涉，纳吉于1956年11月23日离开使馆，随即被苏军逮捕。1958年6月被匈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1956年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地方政府表示无权作出决定。于是工人便派出代表团前往华沙机械工业部请愿。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当代表团把请愿失败的消息用电话告知本厂工人后，工人决定立即到自由广场集会，再次向市政府请愿。6月28日，全厂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沿途有不少群众加入。当市委领导拒绝接见工人代表，人群中又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时，全场哗然。敌对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事态进一步扩大。有人高喊“要面包，要自由！”“到监狱去！”等口号。部分游行冲击市委大楼和专政机关，枪击公安人员。当局出动警察进行镇压，造成5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当晚事件被平息。

6月29日，波兰领导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夺取人民政权”。6月30日，当局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原机械工业部部长被撤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650多万税款将分期退还给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7月，波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奥哈布在发言中把引起波兹南事件的主要责任归结为“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10月，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波兹南事件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局势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提高工人工资，降低农产品的交售额。8月，撤销了1949年谴责哥穆尔卡等人的决议。同年10月，波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坚决抵制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和压力，选举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执政后，重新提出“波兰道路”，着手改革政治经济体制。

在政治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平反冤假错案，保证议会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加强同统一农民党、民主党的合作，扩大工会、合作社和社会团体的民主权利。

在经济方面，1957年制定了“管理体制和计划体制改革提纲”，决定将中央下达的几十项指令性指标减至8项，并将部分中央管辖企业下放给省管理；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限；放慢投资速度，稳定就业，维持市场平衡，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重要地位；允许解散违反自愿原则建立的和经营不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强调充分调动个体农民的积极性。经整顿，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解散。

哥穆尔卡的这些措施，调动了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因而迅速扭转了形势。1956—1958年，波兰工业产值增长了31%，农业产值增长了15.4%，职工实际工资提高了24.8%。

第二节 六七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发展与挫折

一、苏联的新经济体制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次日又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起改称总书记）。10月15日，最高苏维埃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1965年12月，波德戈尔内接替米高扬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起勃列日涅夫又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会议主席。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推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新经济体制试验，并积极着手全面的经济改革。1965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10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决定正式实行新经济体制。

这次改革的基本原则是：（1）在不改变集中管理体制的前提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管理经济在继续保持行政方法的同时，突出经济方法，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3）贯彻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方针，使工人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生产成果。改革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取消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恢复部门管理体制，加强经济的集中领导，但适当兼顾地区管理原则。

第二，减少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改革后，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由原来的近30个减少为9个，从而使企业制定计划的权限相应有所扩大；国家拨给企业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由企业自行使用支配；企业经理有权确定本企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有权根据劳动法招收或解雇职工，有权确定职工的劳动报酬形式及具体的奖励指标和条件，有权确定部分职工的附加工资。

第三，建立企业经济刺激基金。企业经济刺激基金的内容包括发展生产基金、物质鼓励基金以及社会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设基金三项。基金的来源主要是企业的利润留成，一般占企业总利润的40%左右。这样，企业经营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经济刺激基金的数额，从而刺激企业和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改进企业的经营。

第四，采用经济方法刺激企业完善管理。内容包括：（1）调整工业品批发价格，其原则是使价格最大限度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消耗。价格的水平必须保证每个正常工作的企业除了补偿生产消耗外，还要有充足的利润完成上缴财政任务和建立企业经济刺激基金；（2）实行生产基金付费制，即企业占用的固定生产基金和流动资金要按一定比例向国家上缴基金使用费。付费率一般占企业基金总额的6%。其目的是促使企业有效地使用国家拨给的生产基金，避免设备积压，加强资金流转；（3）加强信贷杠杆的作用，包括扩大信贷范围，实行有差别的利率政策，采用区别对待的贷款原则等。

新经济体制从1966年开始正式推行，原计划在三年内基本完成，实际上到7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这项变革。

70年代，苏联开始推行以集约经营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此从70

年代初起实行以建立联合公司为核心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联合公司的类型有：(1) 生产联合公司，由同一工业部门的若干企业及相关组织组成的经济综合体；(2) 科研生产联合公司，是以科研机构为主体，合并有关企业、设计、工艺等机构组成科研、生产和经营相统一的综合体；(3) 工业联合公司，全苏和共和国工业联合公司是行业性的统一的生产经营综合体，是介于部和生产联合公司之间的中间管理环节。建立联合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第一，通过加强生产集中和专业化协作来提高生产效率；第二，加强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加速科技进步；第三，减少管理环节，提高管理效率；第四，把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两种职能结为一体，使权责统一。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联合公司的企业或单位保持法律上的独立性，致使许多联合公司并未成为真正有机的综合体，而是一种松散的混合体，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979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规定了进一步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有：第一，改进计划体系。把五年计划作为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基础，重视长期计划的作用，建立长期（10年、20年）、中期（5年）和短期（年度）相结合的计划体系。把5年的累计成果作为评价企业完成计划好坏的主要依据；第二，改进经济核算，加强物质刺激。决定在2、3年内把基本核算单位由企业过渡到联合公司，并在部一级推广经济核算制；第三，用经济方法管理科技。各部建立统一的科技发展基金，由部集中调配。科研组织实行经济核算制，科研成果实行有偿使用制。

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改革，实质上是1965年改革的继续，是对新经济体制的修补和完善。

新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来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部分地调整了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因而符合苏联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八五”计划期间（1966—1970），一些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七五”计划期间的增长速度。按年平均增长速度来说，国民收入由6.6%提高到7.7%，农业总产值由2.3%提高到4.1%，社会劳动生产率由6.4%提高到6.8%，只是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由8.5%和8.6%下降为7.4%和8.4%。这一时期，苏联进一步缩小了同美国的经济差距。据苏联官方统计，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在1965年为美国的65%，1977年上升到80%以上，同一时期，国民收入由59%上升到67%。而据美国国务院的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为53%但是，勃列日涅夫的改革只是对原来的管理体制作了一些修补，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原有体制所固有的弊病和矛盾。苏联改革后实行的仍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仍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仍不能有效地刺激经济的发展。所以进入70年代后，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带有长期化的特征。（见下表）

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速度下降情况表（%）

	1966 — 1970	1971 — 1975	1976 — 1980	1981 — 1985
社会总产值	7.4	6.4	4.2	3.3
国民收入	7.7	5.7	3.8	3.2
工业总产值	8.4	7.4	4.4	3.7
农业总产值	4.1	2.5	1.7	1.1
社会劳动生产率	6.8	4.5	3.3	3.1

二、匈牙利的改革

1966年5月，在前一时期局部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的决议。1968年1月，正式宣布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把计划管理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中央对经济的领导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结合起来，把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手段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以经济手段为主。改革的主要措施有：

第一，改革计划体制。除重要消费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重要投资项目等外，均取消了国家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制度。中央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国家计划主要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比例，而且只作为参考指标下达给企业，不具有指令性。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市场和自身特点制定发展计划。当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出现矛盾时，如属国家计划脱离客观实际，就实事求是地修改国家计划，如果是由于企业只顾自身利益而背离国家计划的要求，国家就通过税收、信贷等各种经济手段，迫使企业从经济利益上关心和接受国家计划，必要时还可使用行政手段。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企业间的相互竞争。在发挥市场作用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把生产资料也作为商品直接投入市场进行买卖，用市场买卖代替由中央统一调拨生产资料和统一分配产品的制度，从而促进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的竞争，并通过市场竞争的作用来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与此相应，对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把工业品由国家统一定价的制度，改为由国家定价和企业定价相结合的制度。匈牙利实行三种价格制度，即固定价格、协议价格和自由价格。价格调整的趋向是固定价格比重减少，自由价格比重增加。这种多样和灵活的价格制度，一方面为企业间进行竞争，发挥市场作用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能通过价格机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控制。

第三，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在简单再生产方面享有较充分的自主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有权决定生产计划、生产工艺、招收和解雇工人、产品的销售、部分产品的价格以及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此外，还有权支配留归企业的利润和折旧费，有权根据国家规定调整工人的工资。国家通过税收等形式从企业集中必须由国家统一使用的纯收入，通过任免企业领导人以及改组、合并或关闭企业来行使对企业的支配权。

第四，改变基本建设的投资制度。改革中，取消了由国家预算无偿拨款的办法，除少数国家的重点项目外，一律改成银行贷款，并规定在10年内偿还。对于那些能促进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 and 国内生产结构的改造，有利于出口，同时经营好、赢利高、偿还能力强的企业，银行不

仅优先贷款，而且在利息上给予优惠。

经济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1968—1973年，匈牙利经济平均每年以6%的速度增长，人民消费水平每年以5—6%的速度提高。同时，整个经济结构得到改造，外贸顺差、国际收支也保持赢余。匈牙利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黄金时期”。

从70年代中期起，由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涨价，匈牙利商品成本提高，出口减少，外贸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成了某些人主张改革刹车的理由。1974—1978年，匈牙利的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阶段。但是，改革是匈牙利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从70年代末起，匈牙利又开始实行新的改革。

三、哥穆尔卡改革的挫折与盖莱克的新战略

1958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错误地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高潮，一些人谴责改革是“铁托主义倾向”。同时，在波兰，由于前一时期消费水平的提高快于生产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超过了市场商品的供应，因而出现了财政收支不平衡和市场供求关系失调。在内外压力下，哥穆尔卡被迫公开表示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并在1959年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放弃了改革，重新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模式进行工业化。60年代国民收入中的积累比重不断上升，从1960年的24.2%上升到1969年29.7%。在这10年里，职工实际工资只提高18%。人们把这个时期波兰的经济政策称为“清贫的社会主义”。1970年12月，波兰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肉类等46种食品的价格，立即遭到群众的反对。格但斯克等沿海城市的数十万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造成45人死亡的流血事件。为了平息群众的不满，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2月20日举行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哥穆尔卡的职务，由盖莱克接任第一书记。

盖莱克上台后，提出“高速发展战略”，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以及“开放的经济政策”和“积极的借款政策”，力图借助外资和西方技术高速度地发展波兰经济。1971年12月，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盖莱克的新战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盖莱克实施了以下改革措施：（1）减少中央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只保留出口产品销售额、国内市场的供货额和投资的最大限度等三个指标；（2）推行企业联合。这种联合的大型经济组织可直接与国外进行贸易，也可以依据“自我偿付”原则向外国借债；（3）改革价格体系，实行固定价格、极限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价格体系，以及进口原材料国内销售价接近世界市场价格的办法；（4）扩大出口贸易，实行企业出口利润分配的制度。70年代初期，由于向西方国家借贷的条件比较优惠，同时国内冻结物价和迅速提高工资的政策刺激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加上1971年和1972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使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得以超额完成，出现生产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的局面。5年里，工业生产增加了73%，每年递增11%；农业生产增加了33%，每年递增5%；国民收入增加62%，每年递增10%；职工实际工资增加了40%，每年递增9%。但是，由于盲目引进，借债过头，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致使70年代中期以后波兰经济日益陷入困境。1979年国民收入比上一年下降了2.3%；1980年波兰外债高达23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波兰的偿还能力。至此，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全面破产。

四、“布拉格之春”的天折

1968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上上下下强烈要求摆脱苏联模式，按照自己民族特点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浪潮的冲击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经过激烈争论，决定解除诺沃提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任。3月21日，诺沃提尼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和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由斯沃博达接任总统。

1968年3月28日—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实行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宣布“将进行试验”，“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改革政治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纲领认为，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垄断一切权力，到处发号施令，而主要是应该民主地集中人民的意志，科学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提出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并“通过党员的工作和自己理想所具有的说服力来贯彻”。纲领提出，要彻底改革党政合一、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今后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其次是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纲领认为，“一个党或几个政党的联合，都不能垄断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人民的一切政治团体必须直接参加国家权力机构”。纲领主张以民族阵线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再次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

第二，改革经济体制，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首先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地位，并拥有外贸权。其次是成立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企业。工厂委员会有权指定经理，决定企业的利润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重大问题。第三是改革计划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捷共主张国家计划主要规定长远发展战略，确定重大比例关系，对少数特别重要的产品确定指令性指标，其他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利用税收、利润、利率、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

第三，调整对外政策。纲领主张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关系，在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西方的关系。

4月中央全会改组了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将一批支持改革的人充实到领导核心中去。4月8日，政府实行改组，改革派人物切尔尼克取代纳尔特任政府总理。5月，诺沃提尼被开除出党。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改革是一次综合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全面改革运动，并有着鲜明的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争取独立自主的倾向，它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西方人士把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时期出现的现象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化不满，认为它是反苏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轨道”。1968年5月3日，苏联邀请杜布切克到莫斯科会谈，要他改变政策，但被拒绝。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要在捷举行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以此对捷施加压力。

苏联的行为引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愤慨和不安。1968年6月27日，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两千字声明》。声明一方面指责“领

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由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复兴”要由共产党的“进步派”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来领导。声明提醒人们注意“外国势力有干预我们国内发展的可能性”，声称只要政府“按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

声明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捷《红色权利报》说，不管这一声明的意图如何，声明的提法旨在“贬低捷共现领导的复兴努力”，为“反共产主义的倾向开辟道路”。苏联则称这一声明为“反革命的号召书”。

1968年7月14—15日，苏、波、匈、保、东德5国领导人在华沙开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通过了一封5国联名给捷共中央的信，声言“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18日，捷共中央复信，逐点反驳联名信的观点，指出5国不得干涉捷内政，表示愿意和5国分别举行双边会谈。7月29日，捷苏两国代表在捷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没有取得成果。8月3日，捷共与华约5国党代表团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没有直接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捷共认为形势有所缓和，全力准备预计9月9日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苏联等5个华约成员国正在积极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许，一架苏联民用客机以机器发生故障为由在布拉格机场降落。可是从飞机中下来的却是苏军突击队员。他们立即抢占了机场。接着，载着空降部队的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苏军迅速占领了布拉格，并绑架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领导人，将其押解到了苏联。与此同时，苏、波、匈、保和东德的50多万军队越过边境，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21日，苏联要求斯沃博达总统任命一个亲苏的“工农革命政府”，但遭拒绝。22日，捷全国举行1小时总罢工，抗议苏联的入侵。同一天，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卡德工厂秘密举行。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撤走占领军，释放被捕的捷党政领导人。大会选出了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23日，苏联邀请斯沃博达等人到莫斯科谈判。在斯沃博达坚持下，苏联被迫让杜布切克等人参加会谈。24日，捷苏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中，苏联一方面频频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加紧在捷代表团中进行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26日，双方签署会谈公报。捷方在公报中被迫接受了苏军占领“不是干涉内政”，苏军将在捷局势“正常化”后撤走等说法，表示不允许国内发生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苏方被迫同意杜布切克继续担任第一书记。10月16日，捷苏又签署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件的条约》，使苏军占领合法化。

苏联的武装入侵使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春的改革运动遭到夭折。1969年4月，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所谓“正常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包括杜布切克等领导人在内的约占捷共党员人数1/3的50万党员因支持改革和反对苏军占领被清洗，约为全国人口1/7的2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第647—652页。

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第653页。

五、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

从 1963 年起，南斯拉夫又开始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把工人自治推进到社会自治阶段。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扩大自治范围。1963 年联邦议会通过第三部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也实行自治。自治从工厂企业扩展到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从工人自治发展到社会自治阶段。

第二，进一步减少国家的干预，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加强市场的作用：

(1) 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投资基金全部转入银行，由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2) 企业只交纳供社会行政费用的税款，不再向国家上交投资基金税。企业的积累全部归己，它可以从自己的积累中提取投资基金。这就取消了国家对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权。(3) 商品价格原则上按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并按国际市场行情进行调整，以加强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和本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通过这阶段的改革，南斯拉夫经济最终由国家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宏观经济失控，曾造成盲目投资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及通货膨胀加剧等困难，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由 1961—1965 年的 6.8% 和 10.9% 下降为 1966—1970 年的 5.8% 和 5.4%。在政治上，民族主义抬头，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使南斯拉夫必须寻求一种既符合自治原则，又能够制约企业权力、调节经济关系和加强宏观协调的体制，使企业自主权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但是，按照自治理论，国家经济职能要不断消亡，因此不能恢复以国家为调节中心的经济制度。于是从 70 年代初起，南斯拉夫在经济制度方面提出了联合劳动的原则，实行一种以联合劳动组织为基础的自治社会经济体制。

联合劳动组织分三级：第一级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它是生产管理和核算的基本单位，也是自治的基本单位；第二级为联合劳动组织，由若干联合劳动基层组织根据自治协议组成，它是独立的自治组织，负责协调所属各基层组织的发展计划和相互关系，帮助基层组织实现其任务，但无权直接干预基层组织的活动；第三级是联合劳动复合组织，由若干联合劳动组织联合组成，其任务是协调所属各联合劳动组织在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活动，并协调同政府部门的关系。

联合劳动组织不仅限于各生产部门的联合，而且生产部门与文化、教育、卫生、科学、集体福利等社会事业部门也实行联合，组成自治利益共同体，采取“自由交换劳动”的方式，即由社会事业部门提供劳务，生产部门提供资金，由生产部门、社会事业部门和居民各派代表共同协商管理。

南斯拉夫实行一种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自治社会计划制度。其计划制定是从基层开始，通过层层协调，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地进行综合、协调而形成的。自治社会计划不具有指令性。

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 1974 年新宪法规定，南斯拉夫实行议会代表团制。首先由基层自治组织的公民以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本单位的代表团，然后由一个代表团或若干个代表团从自己的成员中推选出议会代表候选人，最后由全体选民选出参加议会的代表。代表团为常设机构，代表团成员不脱产，每届任期 4 年，任何人不得多于两次连续当选为同一级组织的代表团员。议会代表要接受本代表团和基层选民的监督与指导，他们如被基层

取消代表团成员的资格，也就同时丧失了议会代表的资格。

南斯拉夫根据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实行联合劳动以后，宏观调控失灵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同时，由于权力下放过分，结果造成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主义、闭关自守及相互分割，从而破坏了统一的市场及经济的一体化，导致经济混乱。

第三节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

一、80年代东欧国家的改革与剧变

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中后期普遍下降，没有完成计划。（见下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国的情况也有差异，但是现行经济体制不能适应各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正是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促使一些东欧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新的体制改革。

1980年7月，波兰政府决定提高肉类零售价格，引起全国性的罢工浪潮。在罢工中成立了“团结工会”。同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六中全会，解除盖莱克第一书记职务，选举卡尼亚接任。1981年10月在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12月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对全国进行军管，波兰政局逐步稳定。1983年7月，波兰议会宣布取消战时状态。

在上述背景下，波兰于1982年1月起实施新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总原则是：废弃指令加统制的体制，实行中央计划和运用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体制；企业实行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原则。

匈牙利从1980年开始，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主要内容有：（1）撤销托拉斯。从1980年初开始撤销了一些大型工业托拉斯，以促进企业间更加自由地开展竞争；（2）改革价格制度。从1980年起，对73%的工业品实行直接与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的自由竞争价格；（3）实行企业破产法；（4）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保加利亚在1981年通过《经济机制章程》，翌年开始在全国实施。该文件总的原则是在中央计划为主的原则下，实行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捷克斯洛伐克在1987年颁布了《经济机制的原则》，公布了《国营企业法》（草案），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东欧国家70年代经济年平均增长率*（%）

国别	时期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波 兰	1971—1975年 实际	9.8	10.4	3.7
	1976—1980年 计划	7.0—7.3	8.2—8.5	3.0—3.5
	实际	1.2	4.8	-2
匈 牙 利	1971—1975年 实际	6.2	6.3	4.7
	1976—1980年 计划	5.4—5.7	5.7—6.2	3.0—3.4
	实际	2.8	3.4	2.3
保加利亚	1971—1975年 实际	7.8	9.2	3.0
	1976—1980年 计划	7.8—8.5	9.2	3.7
	实际	6.1	5.9	0.8
捷克斯洛伐克	1971—1975年 实际	5.6	6.7	2.7
	1976—1980年 计划	4.9—5.2	5.7—6.0	2.7—2.8
	实际	3.9	4.7	2.0
民主德国	1971—1975年 实际	5.4	6.6	2.7
	1976—1980年 计划	4.9—5.2	6.0—6.3	3.0—3.2
	实际	4.1	4.9	1.2
罗马尼亚	1971—1975年 实际	11.3	13.0	6.5
	1976—1980年 实际	7.0	9.5	3.8

*根据各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80年代多数东欧国家的改革，只是对传统管理体制进行了局部的修补和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旧体制固有的弊端和矛盾。曾对传统管理体制进行了实质性改革或较大改革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未能建立起完全符合本国国情的新体制。因此，80年代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例如，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1976—1980年的2.8%和6.1%下降到1981—1985年的1.4%和3.9%。南斯拉夫的工业、农业和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1976—1980年的6.9%、2.5%和5.6%下降到1981—1985年的2.7%、0.6%和0.6%。1980—1982年，波兰经济出现负增长，此后经济发展逐步转入正常，但80年代中期后经济发展速度又出现下降，从1986年的4.9%下降到1987年的1.9%。多数东欧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外债负担过重。1989年波兰的外债达395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收入的40%。1986年，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需偿付外债的本息分别达40多亿和3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偿付能力。

上面是就东欧国家本身的经济状况而言，如果作横向的国际比较，东欧国家经济没有搞好的落后情景就更加突出。考虑到历史的、地缘的和现实的政治关系，下边将东德和西德、匈牙利和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配对进行比较。东德和西德原是一个国家，战后被分成两半。1988年，东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7080美元，西德为18480美元，西德为东德的2.6倍。匈牙利与奥地利也曾是一个国家—奥匈帝国，战后经济发展的起点大体相同。可是到1988年，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460美元，奥地利为15470美元，后者为前者的6.3倍。1988年，南斯拉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520美元，意大利为13330美元，后者为前者的5.3倍。整个东欧经济与西欧经济出现了极大的反差。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东欧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力图通过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等来摆脱困境，结果导致 1989 年东欧形势的急剧变化。

1988 年波兰罢工浪潮又起，导致了 1983 年战时状态结束以来的新的社会动荡。在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一直不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调整政策。1989 年 1 月，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立场》的决议。同年 2 月 6 日至 4 月 5 日举行有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等各方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达成了关于团结工会合法化和实行议会民主等协议，并确定提前于 1989 年 6 月举行议会大选。4 月 7 日，波兰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工会法修正案等 6 项法案，使圆桌会议的结果法律化。此后波兰形势急转直下。6 月，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7 月，雅鲁泽尔斯基以一票多数当选总统。9 月，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新政府。12 月，更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 年 1 月，40 多年来一直居于执政地位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停止活动。同年 12 月，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取代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总统。

1989 年 2 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下简称社工党）宣布实行多党制，并肯定 1956 年十月事件是“人民起义”。5 月 8 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决定免去卡达尔的党的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6 月 16 日，为因十月事件被处死的纳吉重新举行葬礼，仪式之盛大，有如国葬。10 月 6 日，社工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把社工党改建成社会党的决议和新的党纲、党章。社会党纲领称，该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建立“以混合经济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自治体制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10 月 18 日，匈国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关于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1990 年 3 月 25 日和 4 月 8 日，匈牙利举行了两轮大选，民主论坛等反对党派获胜，获得组阁权。社会党成为在野党。国际舆论认为，这次大选标志着匈牙利“一个时代的结束”。

70 年代后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要求为 1968 年“布拉格之春”平反和苏联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各种力量，以维护人权为旗号，发起“七七宪章”运动，形成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抗的政治反对派。

1989 年 11 月 17 日，布拉格大学生利用纳粹关闭捷大学、杀害捷学生的 50 周年纪念，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急转直下。11 月 19 日，“七七宪章”等 12 个反对派组织成立“公民论坛”。12 月 4 日，苏、保、匈、波和民德 5 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承认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捷内政的干涉，应当受到谴责”。次日，捷共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宣布，捷共愿意为因 1968 年不赞成华约 5 国出兵而被迫离开党的人恢复名誉。随后，捷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驻捷苏军在 1991 年 7 月 1 日前分三个阶段全部撤走。至此，1968 年事件彻底翻案，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一个屈辱的篇章宣告结束。但是，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受到猛烈冲击。1989 年 11 月 29 日，联邦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12 月 10 日，组成多党政府，捷共在政府中只占少数。12 月下旬，捷共前领导人杜布切克当选为联邦议会主席，“七七宪章”发言人哈维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90 年 3 月 1 日和 6 日，斯洛伐克和捷克民族议会分别通过宪法性法律，取消原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4 月 20 日，联邦议会通过宪法性法律，将国名定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6 月，“公民论

坛”和“公众反暴力”组织在选举中获胜，它们在人民院和民族院分别得票46.6%和45.9%，共获170个席位。共产党在人民院和民族院共获47个席位。共产党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1989年，保加利亚要求党政领导人日夫科夫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11月10日，执政33年的日夫科夫被迫辞职。随后，保共清除了中央领导班子中日夫科夫的亲属和亲信。日夫科夫父子被开除党籍。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民主力量联盟，后又有几个反对派组织加入。反对派组织不断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对保共及其新领导施加压力。1990年1月15日，国民议会根据保共中央建议，决定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条款。2月初，保共第十四次（特别）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宣言声称，在保加利亚建设民主与人道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经济上实行所有制多元化和市场经济。4月3日，保共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6月，保加利亚举行大国民议会自由选举，社会党获得400个席位中的211席，民主力量联盟获144席。1991年11月15日，改国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

1989年席卷东欧的政治风暴在罗马尼亚表现得最激烈。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群众因持不同政见者特克斯神父被驱逐一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者和防暴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次日，游行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内务部部队和军队进行干预，造成人员伤亡。21日，首都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22日，国防部长米列亚上将因拒绝执行向游行队伍开枪的命令而被处决，国防部军队立即倒戈，并与支持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展开激战。示威群众占领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电台及电视台。同日在首都成立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实行多党制，举行自由大选，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罗马尼亚共产党停止活动。齐奥塞斯库夫妇于22日晚被捕，25日被处决。28日改国名为罗马尼亚。1990年2月1日，救国阵线同其他30个政党举行圆桌会议并达成协议，成立全国联盟临时委员会，在全国大选前取代救国阵线成为罗马尼亚最高权力机构。救国阵线于2月6日登记注册为政党。同年5月，罗马尼亚举行大选，救国阵线在参、众两院议席均超过半数，该阵线主席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

民主德国形势在1989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下边另辟专目叙述。

1989年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钱其琛外长在回答《世界知识》杂志记者的问题时说：“这些事情来得虽很突然，但都有长期形成的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这些国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多地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这些情况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使得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发挥和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而且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从外部条件来说，苏联‘新思维’的改革之风，西方‘和平演变’的鼓励政策，都对东欧变化有影响，起了推动作用”。

二、德国重新统一

1989年5月匈牙利放宽边界限制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假道匈牙利、奥地利涌入联邦德国，同时，莱比锡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要求“开放边界”，实行“民主改革”。10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公开敦促民德首脑昂纳克实行改革。10月18日，执政18年之久的昂纳克被迫辞职。此后，民德最高领导层连续变动。11月9日，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及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允许民德人只凭身份证即可前往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一时间，民德天下大乱，两天内涌向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逾400万人次。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抓住时机，于11月28日提出关于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提出分三个步骤来统一德国：第一步建立一个契约性或以条约为基础的共同体；第二步是成立“两个国家间的邦联结构”；第三步是“建立一个联邦”。民德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现实”，苏、美、英、法四大国也大多认为“为时过早”。但是，民德的经济、社会形势不断恶化，群众和一些新成立的党派要求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2月1日，民德人民议院决定废除宪法中关于统一社会党领导作用的条款。12月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又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新党章取消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 and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内容。与此同时，要求统一的群众游行示威此起彼伏。面对这种形势，民德总理莫德罗为变被动为主动，在1990年1月30日访苏征得戈尔巴乔夫同意后，于2月1日提出统一德国的四阶段方案。至此，两个德国都把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四大国意识到两德统一是大势所趋，被迫调整各自的对德统一政策。1990年2月13日，四国外长和两德外长利用出席渥太华北约和华约“开放天空”会议的机会，共同制定了被称为“外交杰作”的“2+4方案”，即先由两德解决“内部”统一问题，再由两德同四大国一起解决“外部”问题。此方案的意义在于：（1）表明四大国认可了“德国人有权统一”；（2）体现了“德国命运应当首先由德国人自己决定”的原则。

1990年3月18日，民德举行第十届人民议院大选，有24个党派参加竞选。选举结果，得到科尔支持的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主体的德国联盟获胜。4月12日组成由基民盟、社民党、自由民主联盟、德社盟和民主觉醒等5党组成的民德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出任总理。德梅齐埃政府的施政纲领基本体现了科尔政府的意图，因此两德迅速就统一的目标、方式和速度达成一致。

德国的分裂是从货币开始的，重新统一也是从货币开始。1990年2月7日，科尔建议建立两德经济、货币联盟。4月24日，德梅齐埃和科尔就7月1日实现两德货币联盟达成谅解。5月2日，两德政府就货币联盟问题达成12点协议。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签署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条约规定：民德按照联邦德国的经济模式，实行以私有制、竞争、价格自由形式以及人员、资本和劳务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按照双方商定的兑换率和期限，在民德境内以西德马克兑换东德马克后，东德马克即停止流通；西德联邦银行在全德范围内行使货币发行权和管辖权；按联邦德国模式在民德建立独立于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制。条约规定用4年半时间完成对民德经济的“改造”。条约的签订和生效，标志着民德从此放

弃国家经济和财政主权，为按照联邦德国的意图完成两德统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90年8月31日，西德政府签署了实现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亦称统一条约）。条约规定：民德在行政区划上恢复5个州的建制，这5个州在10月3日按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集体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的德国使用西德的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首都设在柏林；西德的基本法为全德宪法，西德的所有国内法和所签订的全部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协定以及欧共体的有关法律和条约，从统一之日起都自动延伸到民德地区，与此有抵触但又需延用的民德法律只作为州法律，民德签订的国际性条约、协定须同缔约的另一方商谈后再确定是否沿用。

为了解决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两德与四大战胜国先后于1990年5月5日、6月22日、7月12日和9月12日举行了4次“2+4”外长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德波边界、外国驻军、柏林地位以及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与责任等问题。其中联盟归属是关键，它直接关系到欧洲的均势与稳定问题。苏联反对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主张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军事中立”。科尔在国际上左右逢迎，纵横捭阖。为了换取苏联让步，科尔政府对苏联做了些妥协让步，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苏联的外交行动：（1）明确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2）对苏联的安全利益做出承诺；（3）迎合戈尔巴乔夫的“欧洲大厦”构想，强调建立“欧洲和平秩序”，构造“欧洲未来大厦”；（4）向苏联提供120亿马克的无偿援助和总计近100亿马克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科尔的这些做法终于促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中科尔访苏时同意德国统一后可“自由决定其联盟归属”。同年9月12日，两德和四大国外长签署了《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文件规定统一后的德国将拥有完全的主权。10月1日，四大国外长在纽约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从10月3日两德统一之日起中止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10月3日，两德统一条约正式实施。分裂了40多年的德国重新实现了统一。12月2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以科尔总理和根舍外长为首的联盟党和自由党获胜。

结束分裂，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全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德国统一是通过民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以西德统一东德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从民德方面来说，其原因是：

第一，民德没有高举民族统一的旗帜和执行正确的民族统一政策。德国分裂是希特勒发动的罪恶战争结成的一个苦果，也是战后大国争夺的必然结果。结束分裂，重新统一祖国，这是两德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民德鉴于自身在国际上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也鉴于苏联早在50年代中期起就已奉行两个德国的政策，于是放弃了统一的旗帜，以图巩固现状。这种做法违背了德国人民的愿望，并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第二，民德没有按照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与联邦德国的经济竞赛中遭到失败，加上对联邦德国的和平演变抵制不力，于是出现了人员大量外逃的现象，并导致了1989年的大动乱。

第三，民德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因此，当苏联推行“新思维”外交，改变对东欧的政策时，它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

第四，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国家出现动乱的形势下，在内外压力下无原则让步，实行政治多元化，放弃领导权，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整个局势

失控，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随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执政（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契尔年科执政（1984年2月—1985年3月）两个短暂的过渡时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从而开始了苏联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是苏联发生急剧变化，以致最后解体的时期。

1985年4月，针对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已降低到“危机点”这一状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加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包括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实现生产集约化，以及完善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1986年2月25日—3月6日，苏共举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确认“加速发展战略”，决定对计划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实行根本改革。198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指导苏联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于6月30日通过了第一部《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制定了10个在计划、财政、价格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决议。这些文件和决议，构成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确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使企业从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和国家计划的单纯执行者变为自主决策、自主经营、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

第二，企业的经营机制要向完全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经营机制过渡；

第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从行政领导方法向经济领导方法过渡；

第四，计划体制从过分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向民主化体制和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体制过渡。

按照部署，在1988年，约占全苏工业产值60%的重要企业将按新的原则进行工作，1989年全部企业要实现向新体制过渡。

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力图扭转经济停滞现象，把经济搞上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所采取的改革原则和措施同苏联以往的改革比较起来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企业法确定了企业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由于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措施不配套，许多规定都是单方面的，在实践上苏联又没有为企业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创造必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因此，企业法的规定难以真正落实。一些企业利用企业法关于企业有权自行确定职工工资和奖金的规定而国家又缺少必要的制约机制的条件，乱发工资和奖金，造成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例如，1985—1989年，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7.1%，而平均工资却增长了25.3%，企业的经济刺激基金提成由1985年的205亿卢布猛增到1989年的1156亿卢布，增加了近5倍。同时，苏联财政失控，通货膨胀加剧。1989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为1200亿卢布，通货膨胀率约12%。长期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一时难以调整过来，致使食品和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市场供应紧张。上述种种原因，造成80年代中期后生产继续滑坡，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苏联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由1981—1985年的3.3%和

3.2%下降到 1986—1990 年的 1.8%和 1.0%。

1988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把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归结为政治体制起了阻碍作用，认为要扭转局面，就必须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此，苏联的改革转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关于公开性》、《关于法制改革》等 7 项决议。主要内容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 5 年；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制；党政职能分开，扩大苏维埃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反对官僚主义，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针等。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界定。1989 年 11 月，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及其思想理论基础作了全面阐述。1990 年 2 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又明确提出：“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确立，标志着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苏联党和国家的政策方向发生了带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此后，苏联的政治体制急剧演变，其主要表现为由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中心发生转移。

1990 年 3 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总统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包括行政人事权、护法和监督权、立法提案和否决权、紧急处置权、统帅武装力量权、外交权等 16 项。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这样，苏联国家权力中心从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总统手中。7 月，苏共二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多党制的具体内容：排除任何阶级和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各政党和组织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竞争；实现直接的普遍选举；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大会通过了苏共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由于苏共推行多党制，到 1990 年底，非正式组织发展到 9 万多个。许多非正式组织单独或联合组成政党，同苏共内部的反对派或从苏共退出的反对派人物协作，夺取了一些加盟共和国、市、州的部分或全部权力。

与上述政局变化的同时，苏联民族纷争迭起，一些加盟共和国要求脱离苏联独立，联盟迅速走向瓦解。

1989 年 8 月 23 日，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 200 多万人拉起 600 多公里的人链，抗议 1939 年的苏德条约，要求俄罗斯人退出三国。1990 年 3 月，立陶宛首先宣布独立。随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采取通向独立的实际步骤。1990 年，先后有 11 个加盟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991 年 4 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

在联盟面临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 1990 年 11 月提出新联盟条约草案。新联盟条约规定，除国防、外交和涉及全国命脉的经济部门仍由联盟中央掌握外，其余主权均归各共和国所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表示不会在这项条约上签字。其他共和国要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1991 年 3 月 17 日，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大多数公民赞成保留联盟。此后，戈尔巴乔夫同 9 个共和国领导人反复协商，于 8 月 14 日公布新联盟条约。条约规定各共和国拥有本国领土内的全部权

力，改国名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并确定于8月20日起开始签署。

1991年8月19日，正当《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条约》即将签署之际，由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8·19事件”，试图“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但起事不到三天，便归于失败。

“8·19事件”后，苏联政局急转直下。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下令，“在法庭确定俄罗斯共产党是否卷入政变前”，“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作为保障苏联各族人民团结统一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苏联共产党被搞垮了。

与苏共解体的同时，各加盟共和国掀起了一个新的独立浪潮。1991年8月20日—12月16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哈萨克相继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虽未宣布独立，但叶利钦于11月16日宣布了10项总统令，接管了联盟中央一系列财政金融部门，并剥夺了中央的重要财源，包括控制石油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停止向中央约80个部提供资金等。一周以后，他又宣布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国家银行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从而掌管了联盟中央的金融货币大权。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戈尔巴乔夫被迫于1991年9月6日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但又试图把其他共和国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1991年11月26日，苏联报纸公布了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规定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国家”，它“在条约的每个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联盟中央只统管军队，负责协调对外政策和外贸工作。但是，建立新联盟的计划遭到实力位居苏联第二的乌克兰的抵制，致使新联盟条约搁浅。

1991年12月8日，作为苏联创始国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未通知苏联总统的情况下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项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三国发表的宣言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将要停止其存在”，苏联的法律和其他一切准则在这三个国家内已不再适用。12月21日，俄罗斯联邦等11个独立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联合体首脑会议。与会的11个国家是：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并致函戈尔巴乔夫，通知他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总统的设置也已停止存在。会议还决定俄罗斯联邦将取代原苏联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既成事实。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并将核按钮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克里姆林宫降下了苏联国旗，代之以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20多名代表。他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而完成了最后一道

“法律手续”。苏联，这个曾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赫赫大国，经过69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完全解体，从地图上消失。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

第一，30年代形成的僵化的苏联模式，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得到根本改革，越来越成为苏联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障碍。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步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结果，诱发了政治、经济、社会和联盟的全面危机，直接促成了苏联共产党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第三，苏联长期奉行军事优先原则，军费开支庞大，严重阻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常提高。

第四，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使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第五，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演变、解体起了催化、促进作用。

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曲折。但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告终结。苏联演变、解体的历史教训将成为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

一、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与“文化大革命”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前十年，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前进的十年。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7年，鉴于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报告还提出了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这些论述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1957年，中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前进过程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

1957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此，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致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对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许多混乱现象和严重后果，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渐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起开始采取措施纠正，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当时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纠正错误的，因此很不彻底。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按照正常的组织原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但毛泽东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通过了完全错误的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会后，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中国在1959—1961年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损失。

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国内局势的严重性，开始采取措施进行调整。1961年1月，中共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措施纠正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同时，对反右倾斗争中的一些被批判的人进行平反。这些经济、政治方面的调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在1962年底以后明显好转。

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仍将存在，并企图复辟。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天天讲。据此理论，在 1963—1965 年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产生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左倾错误。1965 年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进行了一系列“左”的批判活动。这些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

“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历时 10 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之所以发生，首先与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失误，提出一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一错误进行破坏的结果。此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1976 年 9 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 10 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两个凡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摒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2 年 9 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会面展开，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首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村改革全面、深入的展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 1990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发展到 9265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22%，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1/3。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次，在城市进行以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为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1984 年 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1987 年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

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对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三，为了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1985年3月和5月党中央相继作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第四，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987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以邓小平的谈话和3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79—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超过1953—1978年平均每年增长6.1%的速度，是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的3倍。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1387元，剔除价格因素，比1980年增长68.1%。1991年同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710元。

第十三章 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调整

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滞胀和低速发展，虽然1983—1990年经济一度回升，但1990年7月以来，又陷入经济危机，迄今复苏乏力。与此同时美、日、西欧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随之，各国相应调整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对策，垄断资本主义也有新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节 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

一、1970—1982年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和经济低速发展

7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着结构性经济危机和低速发展的困扰。在1970—1982年的12年间，西方世界发生两次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即1973—1975年发生的以滞胀为特征的严重世界性经济和1979—1982年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与以往传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同，7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从时间上看比周期性危机要长得多；从表现形式上看，结构性危机往往是生产停滞或低速缓慢增长；从波及面看，结构性危机期间各国不是同步发展，时而伴生美元危机、能源危机，时而伴生贸易失衡、信用危机；从直接导因看，主要由结构失衡而触发的。

经济滞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为滞胀(stagflation)现象，兼有生产停滞(stagnation)或缓慢发展和通货膨胀(inflation)现象。造成滞胀经济的深层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内对外经济干预政策处于交替调整时期的综合产物。与滞胀经济恶化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正面临大调整：旧工业、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所体现的“夕阳工业”不景气，进行改造需要时间，新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体现的“朝阳工业”取代“夕阳工业”尚需时间；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正面临新的脱皮转折期，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生产力也需时间；劳动力又遇新的调整。以美国为例，1950—1965年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增加了9.8%，1965—1980年增加了40.5%，1950—1960年就业人数为690万，1970—1980年增加到1860万人，但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有增无减。与以往不同，出现了地区性、部门性的结构性失业现象，从而使失业问题的解决面临新难题。

在这期间，西方世界经济关系的结构发生了新的调整。表现为从1971年起，美元霸主地位的结束，美日欧经济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和从1973年由于中东“石油战”的结果，西方廉价石油原料时代宣告结束。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70年代以来的经济。

与此同时，作为西方经济主流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面临难以解决滞胀经济的严重危机，西方世界的强化国家干预政策的某些弊端，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社会严重不公矛盾的加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影响，促使西方国家寻求新的调整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先后在1948—1952、1957—1958、1969—1971、1973—1975、1979—1982、1990—1992年爆发了6次经济危机，其中

70年代以来的3次影响最大。1973—1975年危机从英国开始，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在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下降了8.1%，其中钢下降14.5%，小汽车下降了18.6%；企业破产严重，最初两年内西方10国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倒闭12万多家；股市行情惨跌，英国高达52%，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水平；固定资本投资减少，房屋建筑投资下跌更惨；失业人数剧增，1975年全失业人数达1500—1800万人；物价继续上涨。1974—1975年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联邦德国为11.1%，英国则高达43.9%。由于滞胀的加剧，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瓦解和中东石油战对发达国家的打击，都使1973—1975年危机比起战后至70年代前的西方经济危机要严重得多。

在1975—1979年持续滞胀后又于1979—1982年发生了更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它于1979年7月从英国开始，接着波及欧美大陆和日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1979—1982年危机期间，危机时间之长创战后新记录，一般都达3年之久；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除日（4.1%）、法（7.4%）外，其他大国都在11.8%—22%之间；企业倒闭率和失业率均创战后新记录，失业人数共达3200万人，美国失业比例高达11%以上；物价持续上涨，消费物价年增幅均超过两位数，而利率居高不下，英国一度优惠率高达21.5%，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均创战后历史最高水平；世界贸易萎缩，国际债务危机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逆差扩大，要求延付债务国家1980年只有6国，1982年增加到40国。

二、1983—1990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1990—1992年世界经济危机

随着1979—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和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1983—1990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80年代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的好势头。1990—1992年西方世界又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入1993年，美国恢复疲软，西欧、日本尤其是德日等国尚蒙受危机的严重阴影，迄今日本仍受困扰。

1983—1990年是西方世界在战后的又一发展时期，美国出现了连续7年半发展的好势头，联邦德国则有连续10年发展的记录，即使发展相对较慢的英国也出现了振兴的征兆。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例，自1983—1990年间，美国由14110美元增加到21790美元，增长了55.4%；日本由10120美元增加到25430美元，增长了151.3%；联邦德国由11430美元增加到22320美元，增长了95.3%；法国由10500美元增加到19490美元，增长了85.6%；意大利由6400美元增加到16100美元，增长了151.6%；英国则由9200美元增加到15540美元，增长了68.9%。80年代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点，美、日、德、法、意、英分别为3.4、4.1、2.1、2.2、2.4和3.1。而通货膨胀百分点则明显下降。以1973—1983、1980—1985、1980—1990三个时期相比，美国为7.5、5.3、3.7；日本为4.7、1.2、1.5；德国为4.3、3.2、2.7；法国为10.8、9.5、6.1；意大利为17.4、14.2、9.9；英国为14.3、6.4、5.8。

1990年7月起，美国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加拿大、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直到1992年底，美国才走出低谷，而西欧、日本等国仍蒙受严重阴影。这次危机，是西方世界战后经济发展中

各种矛盾的继续和 80 年代结构性矛盾发展的结果；也受到 90 年代国际经济关系面临新调整的影响，即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对德国和其他欧美国家的冲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间经济矛盾的加深。同时还受到新兴工业国家廉价劳动力和产品的强有力的挑战。1991 年和 1992 年，西方经济仅分别增长 0.7% 和 1.5%。即使走出低谷较早的美国，自 1991 年 3 月到 1992 年 12 月，经济增长也只是 2% 的年率。1991 年，西欧国家破产企业高达 17.9 万家，1992 年增加到 22.2 万家；1992 年西方国家失业人数达 3000 万人，西欧失业率 1992 年为 9.4%、1993 年平均将达 11.5%。在危机期间，财政赤字和外债大幅度增加，1992 年欧共体国家的预算赤字合计 2800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欧共体国家的债务则高达 3.8 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62%。在这次危机中，德国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它深受德国“统一经济”之苦，为在德国统一后提高间接税、紧缩银根政策和高利率付出代价。美国则受“债务经济”之苦，日本受“泡沫经济”之苦。与最富裕国家几年来年平均增长率不超过 1% 相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则以 4.6% 的速度增加，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发达国家唯有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能更快地发展。1993 年 7 月 9 日结束的西方七国东京首脑会议《经济宣言》宣称：北美地区经济虽在“继续回升”，但速度“缓慢”，欧洲“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回升的征兆，但依然处于显著的萧条之中”，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回升”。并说七国的失业人数已达“难以忍受”的程度。

三、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强和西方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7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了新格局，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强，由 70 年代前美国独霸、欧日依附演变为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相对衰弱，日本经济大国地位上升；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集团化、一体化趋势发展。

美、日西欧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明显表现为美国独霸地位的动摇和日本以及联邦德国为主力的欧洲共同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其一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百万美元为单位的统计，1965 年、1983 年和 1990 年，美国分别为 7013.8、32757 和 53922；日本分别为 912.9、10628.7 和 29428.9；联邦德国分别为 1147.9、6530.8 和 14882.1；法国分别为 993.0、5192.0 和 11907.8；意大利分别为 668.8、3528.4 和 10907.5；英国分别为 1006.9、4551.0 和 9751.5。西方六强的排位美、德、法、日、英、意改为美、日、德、法、意、英。就力量对比而论，1965 年美国是日本的 7.69 倍、联邦德国的 6.11 倍、法国的 7.06 倍、意大利的 10.49 倍、英国的 6.97 倍。而 1990 年美国则分别是日本的 1.83 倍、德国的 3.62 倍、法国的 4.53 倍、意大利的 4.94 倍、英国的 5.53 倍。1965 年美国的 GDP 为其他五国总和的 148.29%；1983 年减少为 107.6%；到 1990 年则进一步减为 70.14%。以美日力量对比而言，1965 年日本为美国的 13%；1983 年日本为美国的 32.45%；1990 年则为 54.58%。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1992 年世界机动车、航天航空、电脑办公设备、电子电气设备等 19 类行业销售额的前三名，美国占 22 项，欧洲国家 22 项，日本 11 项，其他亚洲国家 2 项。显示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态势。

其次，明显表现为美元霸主和美国债主地位的结束，资本主义货币多元

的变化。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多次爆发美元危机，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首次对外贸易逆差。这一年，美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只有102亿美元，而美国的短期负债则达520亿美元。1971年8月9日，法、英两国要求把30多亿美元兑换成黄金，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暂停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西方各国对美国的损人利己的做法，作出强烈反应。1971年12月，在西方10国财政部长史密森尼会议上，迫使美国宣布：自1934年1月起的每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固定汇价贬到38美元。1973年2月，美国政府又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再贬10%。西方各国纷纷对美元实行了单独汇率或浮动汇率制。197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联系，承认浮动汇率制。这样，自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正式瓦解。80年代以来，美元危机加深，日元、德国马克坚挺，欧洲货币单位活跃，其他欧洲国家货币也呈现活力，从而出现了西方货币多元化趋势。与此同时，自1916年以来，美国作为资本债权国二战以来处于西方金融世界的垄断地位，到1983年美国债权国地位宣告结束。迄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成为最大的债权国，它的海外投资拥有5136亿美元，德国则成为第二大债权国，拥有海外投资3339亿美元。1992年世界上最大的15家银行中，美国已没有一家，而日本则拥有11家，其中前7家都为日本占有。

随着西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加剧，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集团化、区域化趋势加强。北美、西欧和东亚三个工业发达地区成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主体。北美和西欧两大经济区的集团化已成大趋势，两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对外贸易规模总和，均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由于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对美国和日本都有巨额贸易逆差，因而，这两大经济区的形成，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和美国、西欧争夺冷战后世界商品和货币新市场的产物。至于日本，虽然自60年代以来，先后倡议“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环太平洋联合构想”、“太平洋经济文化圈”等，实际上东亚是日本的“前门广场”，但是日本迄今持稳步推进战略，宣称全方位的经济“不结盟”。

需要指出，70年代以来，美日经济摩擦升级，美国和欧共体经济矛盾不断。美日经济战由纺织品大战扩及汽车、家用电器、电脑等各个领域，美、日贸易逆差扩大，日本由经济大国地位进而要求政治大国地位。1980年，一家西方报纸刊登一幅漫画：一架日本轰炸机满载日本制电视机、汽车和各种电气设备，在加州上空投放，上面标写着“记住珍珠港”几个大字。1981年《国际先驱论坛报》还刊载一幅漫画：一个正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象征着日本的经济竞争力，上面写着美国人的一句话：“我命令你不许上升”。日本要求以日美的“平等伙伴关系”取代美日的“美主日从”关系。1990年3月索尼公司总裁和石原慎太郎合写了一本带有挑战性的书：《敢说“不”的日本》，随即石原慎太郎又和别人合写了《日本还要说“不”》及《日本坚决说“不”》两部书，公开倡导：“为了整个世界，日美应该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

为了协调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自1975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经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向心力”显著下降，因而在1991年的伦敦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整顿全球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和债务等问题；在1992年的慕尼黑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促进西方经济复苏与

援助独联体及东欧问题 ;在 1993 年的东京会议上则着重讨论了如何协调经济政策问题。

四、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这种新发展首先表现在垄断财团的重新组合和超大型的混合联合公司的出现。在美国十大财团的单一格局已不存在，财团间相互交错和渗透趋向明显。十大财团按实力大小及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程度又可分为两大类，即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和新兴的第一花旗银行财团；影响较小的地方性财团和家族财团，如中西部的芝加哥财团和克利夫兰财团，南部的得克萨斯财团，东北部的波士顿财团，以家族为中心的梅隆财团和杜邦财团。此外还有影响较小的财团如库恩—洛布财团、福特财团、哈里曼财团、狄龙—里德财团、旧金山、洛杉矶、费城、底特律、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亚特兰大财团等。

在日本左右经济命脉的是六大企业财团。它们是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以及第一劝业银行财团。到 1988 年，这六家财团所属的直系企业共 163 家，资产总额和营业总额分别占全国的 13.29%和 14.68%。如果加上它们的子公司及相关企业，则共 11998 家，占 26.95%和 25.20%。它们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还通过“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经济团体联盟”、“工商会议所”等财界组织影响着日本的政治。

在联邦德国形成和发展了以大银行为中心的财团和以工业垄断组织为主的财团两大类。前者，有德意志银行财团、德累斯顿银行财团和商业银行财团；后者有蒂森财团和法本继承公司财团。在法国 1975 年五大财团及其相关的 20 多家工业集团和金融集团控制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五家财团是：巴荷兰财团、苏伊士财团、昂班—施耐德财团、罗特希尔德财团和温台尔财团。在英国有十几个财团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有大银行和大银行家为中心的劳埃德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弗莱明财团、密德兰—希尔·希金生—鹰星财团、洛希尔—萨缪尔—奥本海默财团、摩根—格兰费尔财团、拉萨尔财团。还有以帝国化学公司为中心的财团及以尤尼佛斯为中心的财团。在意大利主要有蒙特—爱迪生公司集团、菲亚特汽车公司集团和皮雷利公司集团等。

其次，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一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70 年代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完善。它的基本形式有公私共有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本和独立存在的国有垄断资本。在这一方面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出现了私有化的新浪潮。另一方面，在国家通过金融、生产、流通、财政和分配等领域加强政府的宏观干预和调节上并未减弱，只是改变了它的方式和重点。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支持本国垄断组织向外扩张。

第三，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发展。跨国公司是垄断财团所属或控制的企业在国外的分支或子公司组成的国际垄断组织。据联合国的统计，1976 年，跨国工业公司国外子公司的总销售额为 6700 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世界出口总额的 73%。多年来，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要比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多得多，但 1981 年外国对美直接投资资本流入额首次超过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有美国的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德士古公司、福特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

业机器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有英国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尤尼佛斯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等，还有德国的西门子股份公司、巴夫斯公司、大众汽车公司，法国的国营雷诺汽车公司，意大利的国家碳化氢公司等；以及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新日铁制铁公司等。

跨国银行大都是以跨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为主的垄断财团。在 1982 年西方最大的 500 家商业银行中，绝大多数都有其跨国经营的代理机构。如美国的美国花旗公司、美洲银行公司、大通曼哈顿公司，日本的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里昂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等。

第四，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合的发展。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的高级形态。这种国际同盟是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地区性经济集团，也是国际调节程度很高的一体化集团。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和扩大，是它的典型表现。西方七国政府首脑会议，则是联合国际协调和干预的新形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排除私人垄断资本和自由竞争的发展。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私人垄断资本结合得更紧密，在它发展的同时，出现更多的中、小自由竞争企业。在当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发展和腐朽的两重趋势。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经济部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美国集中表现为通过国家立法、行政的政策干预和私人垄断资本保持密切联系。在西欧一些国家表现为计划化、福利保障社会化和发展公私共有企业的形式。在日本则有强化主导型垄断资本模式。

第二节 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和保守主义思潮

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面临如何解决经济滞胀、重振经济和国威的新课题。随共和、民主两党交替执政,美国政府进行了四次调整和改革,即1969—1974年共和党尼克松政府的新联邦主义政策;1977—1980年民主党卡特政府的反滞胀经济政策;1981—1992年共和党里根、布什政府的振兴和稳定发展经济政策;1993年民主党克林顿上台后又大幅度调整政策,宣称进行新的改革,力图挽回颓势,取得跨世纪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治和思潮在美国流行。

一、尼克松政府的新联邦主义政策

1968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13.1.9—)以301张选举人票击败民主党人休·汉弗莱和独立派人士乔治·华莱士,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宣布实行新联邦主义政策。停止或缩减约翰逊政府伟大社会政策,推行“分享岁入计划”。1972年10月22日签署分享岁入法案,即州与地方财政援助法。把一部分联邦政府的权力和相应的政府岁入交给地方政府,来减轻联邦政府的经济负担,形成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间的新平衡。1970年6月10日,尼克松还发表了扩大福利改革建议的申明,推行“家庭援助计划”,强调对贫困家庭要以工作福利取代通常的一般福利,以鼓励工作,并博得纳税人的信任。在尼克松任期继续扩大了环保措施,通过和颁布了15个环境保护法规,其中,1969年12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适当精简和改组了联邦政府机构,但总统的行政控制权并未削弱。

为了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难题,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内冻结工资、物价和房租90天,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取消7%的汽车税、减征10%的新设备投资税;对外暂停用美元兑换黄金,征收10%的进口商品附加税,削减对外援助经费10%。其目的是对外维护美元的霸主地位,对内控制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回升。国内计划分1971.8—1971.11、1971.11—1972.12、1973.1—1973.6、1973.6—1974.4四个阶段进行,但以失败而告终。

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政策是对自罗斯福到约翰逊政府强化联邦政府干预经济职能的调整,也是对胡佛自愿合作的联邦主义政策的继承和修正,它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的困境和美国统治集团为解决经济滞胀所进行的政策大幅度调整的探索。它在当时虽然收效不大,但在调整联邦制度权力结构、加强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克服社会福利政策弊端,寻求对付滞胀经济的途径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在尼克松任期还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1972年6月7日晚,5名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窃取情报的人被捕,案件涉及尼克松竞选连任班子的主要工作人员,尼克松一开始就卷入了掩饰活动,新闻媒界的穷追不舍、民主党人如获至宝、三权分立体制效应的运用和人民群众为政府的伪证所激怒,使水门事件愈演愈烈,一直困扰尼克松政府。其间,副总统阿格纽受控犯有共谋、勒索、受贿、逃税等罪行,1973年10月10日阿格纽辞去副总统一职。12日,尼克松提名杰拉尔德·福特为副总统。1973年10月30日和11月15日,索传的两盘重要录音带丢失和18分钟录音带被

洗的消息曝光，要求弹劾尼克松的呼声席卷全国。1974年最高法院通过了美国诉尼克松一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公开辩论弹劾尼克松的动议，8月4日，该委员会提出了H1293—1305号报告。8月8日，尼克松被迫宣布辞职，福特接任总统。水门事件，既是统治集团间争斗的产物，也是广大人民运用宪法权利制约总统非法行为的成功范例。福特政府承继了尼克松政府的经济政策，大同小异。

二、卡特政府的反经济滞胀政策

民主党人吉米·卡特(1924.10.1—)以297张选举人票击败获240张选举人票的福特，1977年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他于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是1849年自扎克里·泰勒以来第一位来自南部的总统。卡特上台后首先致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在就任的头两年实行了两个阶段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宣布自1979年起全国各公司工资(含附加工资)增长最高限额在7%以下，物价上涨幅度至少比1976、1977年的平均数低0.5%，一旦通货膨胀率超过7%，遵守合同的工人可获减税，违背协议的要受制裁。由于它并不限制地租、销售利润和利息，也不对所有企业都有约束力，实际上受到严格限制的主要是工资。卡特政府虽三换主持人，也未奏效，1979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3.3%，1980年4月17日，卡特在白宫宣布，消费物价指数，1978年为195.4到1980年4月上升到242.6，反膨胀计划宣告失败。与此相联，在社会福利方面，卡特政府主张实行灾祸保险，对享有福利待遇的人规定严格的工作条件，防止滥用医疗经费。这一方案遭到了国会的拒绝。为解决滞胀现象，卡特在1978年11月8日签署了减税187亿美元的法案，其中，在1979年削减的130亿个人所得税，有85%属于年收入在15000以上的人，公司及资本所益税也减少了57亿美元。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的提案，贴上民主党的标签”。

70年代美国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依靠进口的石油消费由1973年的35%增加到1977年的50%。1970年进口石油只有11.57亿桶，到1977年猛增到31.03亿桶。美国石油消费量猛增的原因是由于：工业能源结构的变化，1950年石油占36.2%，1979年上升到50%；居民消费方式发生变化，1970年美国职工乘汽车上班的占77.7%，住宅和商业建筑用油也惊人地增长；在能源消费上存在着严重的浪费，每个家庭的平均耗电量超过西欧和日本，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五年之后，美国仍然是一个大手大脚的能源消耗者和能源挥霍者。”1972—1973年美国曾发生两次能源危机，1976年冬、1978年夏、冬又发生了能源短缺，为解决能源短缺，卡特采取了开源节流兼顾的能源政策。还在1977年4月，卡特就提出了第一阶段能源计划，经过18个月的讨价还价，国会才批准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这是一个由五个能源法案组成的一揽子计划，规定分阶段取消对天然气价格控制；鼓励以煤代替油和天然气；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者减税；改革用电收费标准；鼓励其他节能措施。1979年4月5日，卡特又宣布实行第二阶段能源计划，要求征收石油暴利税。1979年7月17日，卡特宣布内阁全体成员总辞职，以示坚决。经过激烈争论，1980年3月13、27日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修正了的石油暴利税计划，4月2日，卡特签署生效。它规定从1980年3月1日起，向石油公司征收50%的石油暴利税，以便在10年内集资2273亿美元，用于解决能源开发的经费。5月21日，国会还通过了发展合成燃料法案。此

外，卡特政府还修建地下战略储备石油基地，调整对中东的政策，寻找新的进口能源国。卡特的能源政策虽不能应急，也难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但是，为 80 年代美国能源危机的缓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并且提供了调整能源结构和布局的宝贵经验。

整个说来，卡特政府试图解决经济滞胀难题的努力，虽然当时收效甚微，但是为里根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他身为民主党的总统，却不固守传统的“新法式”的模式。

三、里根、布什政府的振兴经济政策

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1911.2.6—）1966—1974 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80 年以 489 张选举人票击败在任总统卡特，当选美国第 40 任总统。这位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要对外重振国威，对内振兴经济，实行新联邦主义政策。在里根政府 8 年任期，他一反传统的现代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经济政策，改行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政策，兼顾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出现了恢复和振兴经济的新局面。

首先，他实行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还在 1981 年 2 月 18 日，里根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就提出了大规模减税的建议。经过几年的争吵和妥协，1986 年 10 月 23 日，里根签署了于 8 月 23 日和 9 月 29 日美国众、参两院批准的修正税法，即 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这是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减税行动，也是复兴里根经济政策的核心。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的最高税率，使超富裕阶层的所得税平均降低了 16%；由于不同阶层税率都有所下降，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 6.4%；新税法将公司所得最高边际税率由 46% 减为 34%，最低边际税率定为 20%，同时取消了一些项目的优惠税率，延长资产折旧年限。它改变了 30 多年来税率越订越高，特惠越来越多的情况。它实际上是大规模减税和局部增税的结合，既使中产阶层得到实惠，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其次，里根政府坚持紧缩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膨胀。1980 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18%，到 1987 年降到 3%。由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单 1985—1986 年就有 1000 亿美元流入美国，刺激美国经济的回升，然而，美国商品竞争力的下降却导致美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成为债务国。里根政府还推行新联邦主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983 年 4 月里根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削减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用以解决当时出现的联邦政府承担社会福利的过重负担。1982—1985 财政年度，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和食品券，比 1981 年前减少了 13%，医疗补助减少了 5%，儿童营养补助减少了 4.4%，一般就业和训练基金减少 35%，工作鼓励项目削减了 33%，年收入低于 20000 美元家庭的 48% 受到了影响。他还强调州和地方政府要承担社会保障的某些责任，并着力推动私营福利事业的发展。

此外，里根政府 1985 年初正式推出战略防御计划，以期促进高科技、社会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致力于平衡预算，控制财政赤字，放松对企业的控制。里根于 1985 年 12 月签署了《1985 年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强制规定每年的赤字限额，一旦超过最高限额 100 亿美元，总统有权削减预算开支比例。

1988 年 11 月大选中，乔治·布什（1924.6.24—）以在任副总统竞选总

统成功。布什任期4年间(1989.1.20—1993.1.20)萧规曹随,基本上承继了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但里根政府留下的高赤字和高国债使布什政府在旧轨道上步履艰难,里根政府扩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还使社会矛盾增多,共和党的统治基础缩小,为共和党的1992年大选投下了严重的阴影。

1992年11月大选的结果,民主党人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1946.8.19—)获胜,他迎合美国人心思变的心理,打出变革的旗帜,主张变革美国政府、变革美国经济、变革美国社会。在他上任以来提出了与7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以图迅速复苏和发展美国经济,重掌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霸主地位。

四、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经济调整 and 改革的特点

和战后初期至60年末的1/4世纪改革不同,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经济调整 and 改革有着自己的特点。从尼克松到里根经历十多年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新的调整改革模式。

从改革背景和任务看,它面对着经济滞胀要着力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难题;在国际事务中美国面临全球霸权的局部收缩态势和重振西方霸主雄风的任务。五六十年代的调整改革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高税收和高福利模式;而7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社会、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模式政策的发展趋势;在政治思想领域,和在这以前自由主义大发展不同,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相对衰落,保守主义抬头,新联邦主义发展。

从改革的内容看,70年代以来,税收政策以减税为主,偶尔局部增税;货币政策和以前的膨胀货币不同,以紧缩货币,控制膨胀为主;财政政策以控制财政赤字,争取相对平衡预算为主;社会保障政策和60年代的扩大社会福利规模与开支不同,以控制社会福利规模和纠正社会福利保障的弊端,强调州和地方发挥作用为主;经济管理体制政策以放松管制,鼓励民营化为主;工资、物价和生产增长的协调受到了更多的重视;70年代以来,美国更加重视能源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高科技发展政策。

从改革的指导思想看,70年代以来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功能;强调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兼顾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借以指导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学说,转向了重视现代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并兼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在政治思潮方面,更加重视共和主义和新保守主义。

从改革的效果看,70年代的试验付出了学费,取得了经验;80年代,治理经济滞胀成效明显,但它是高赤字和高贸易逆差的沉重代价换来的,它困扰了布什政府。

70年代以来的政策调整 and 改革,构成了本世纪以来新一轮变化,体现了和罗斯福新政不大相同的政策模式。它虽然承继了新政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和实行福利保障社会化的基本精神,但着重注意的是要纠正新政以来的改革弊端,并在新的条件下,吸收了胡佛强调发挥州和地方作用、限制联邦政府在福利等方面干预过度的思想。

五、美国保守主义两党政治的新变化和社会矛盾的新发展

70年代以来,美国垄断统治集团对政权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它牢牢地控制了总统的选举结果,影响着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种利益集团、院外集团和

社会组织，制约着思想舆论界。美国学者托马斯·戴伊 1979 年在调查 70 年代初美国 5416 位掌权人物时分析说，它们分布在工业公司、公用事业、电讯、交通运输、银行和保险合计 3572 人，政府和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合计 286 人，新闻、教育、基金、法律、民间和文化合计 1558 人。“最上层的这些职位共控制全国工业资产的一半，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全部资产的一半，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和保险业总资产的 2/3，还有电视网，有影响的通讯社和各大报系，所有私人基金会资产的近 40%以及全部私立大学基金的一半。他们领导着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全国最大和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全国最主要的民间组织和文化团体。他们占据了联邦政府中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关键职位，以及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全部最高指挥官职位。”（《谁掌管美国》第 19—20 页）另一位社会学家认为：“最好的答案看来仍然是，美国的统治权是由权贵层来行使的，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领导集团。”（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1985 年中文版）

要特别提出的是，70 年代以来，为美国统治集团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科技和社会各个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出谋划策，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咨询研究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被称为“思想库”的机构，大都受到一定财团和利益集团的控制。它们通过智囊团的谋划行动来影响政府各部门的决策和舆论导向。如受到东部财团控制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国大西洋委员会、乔治敦大学国际部问题研究中心、对外政策研究所等；还有得到西部财团支持的胡佛研究所、现代问题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战略研究学会、世界观察研究所、洛杉矶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三边委员会等。

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的相继出任美国总统显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相当底层的台阶上爬上来的。他们的内阁班底既反映了西部和南部新兴垄断资本集团势力的增强，也表明共和党保守主义政治的抬头。1969—1993 年的约 1/4 世纪里，共和党执政了 20 年之久。保守主义思潮也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趋向保守对社会生活发生重要影响。

70 年代以来的美国既是经济现代化的超级大国，又是社会危机重重的国家，既是物质生活十分丰富，又是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困和高度商品化的国家。这种社会危机的表现，其一为老年保障危机的深化，1991 年初，据老年、医药及饮食团体联合组织的报告，在 65 岁以上的 3000 万美国人口中，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状况，80%患有与营养不良相关的慢性病。其二为家庭危机，再婚率高，据 1990 年的人口统计，14%的妇女结过两次婚，15%的儿童有两个父亲或母亲；性病和爱滋病剧增，1991 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表示，已有 100 万美国人感染爱滋病病毒；性骚扰严重并波及儿童，未成年和未婚生子女增多。其三为社会安全危机加深，暴力案件和恶性事故上升。1982 年 10 月里根宣称：“犯罪在今天已经是美国的一种流行病”。围绕枪枝管制问题美国政界展开了又一场大辩论，1991 年 3 月布什向国会提出了反犯罪法案，对利用枪支犯罪加重刑罚，并扩大联邦适用死刑的范围。其四为种族危机激化，到 1992 年 3 月，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高达 14.2%，而白人为 6.9%，在 3100 万黑人中，有 36%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白人只占白人人口的 11%。1992 年 4 月 29 日晚至 5 月 3 日，发生在洛杉矶中南部地区的黑人种族冲突事件震惊了全美国，事件导因于 1991 年 3 月 3 日夜，黑人青年罗德尼·金因超速开

车遭警察毒打，滥施暴力，曝光后，洛杉矶锡米峡谷法院裁决 4 名白人警察无罪，引起黑人群众的强烈抗议，进而爆发暴力冲突。短短几天使 58 人丧命，2383 人受伤，6000 余人被捕，直接物质损失达 5.5 亿美元。洛杉矶事件迫使加州州长宣布洛杉矶实行紧急状态，布什宣布调遣联邦军队前往洛杉矶恢复秩序。种族矛盾突出地暴露在全国面前。与此相关，亚裔、西裔、黑人人口的增加，白人人口比例的减少，伴随经济危机的深化，排外和种族歧视势头发展。其五为，精神危机的加深，在美国青少年吸毒有增无减，教会蓬勃发展，福音传遍全国，1989 年全美国的教徒近 60%，其中保守教会和天主教会发展最快。1991 年 10 月 23 日，克林顿在竞选演说中称：“家庭破裂，孩子辍学，毒品和犯罪肆意街头”，美国“80 年代是一个充满贪婪、自私、不负责任、穷奢极欲和玩忽职守的华而不实的年代。”他宣称要“变革美国的精神”，“重新确立美国基本价值观的革命。”这些价值观是“个人责任心、个人自由、容忍、忠诚、家庭观念和勤劳。”克林顿上台以来，尽管经济危机已经度过，但是并没有扭转精神危机的颓势。

90 年代美国又兴起了关于美国经济兴衰的大争论。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衰落论者（代表作《大国的兴衰》）和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复兴论者（代表作《美国是衰落还是复兴》）相持不下，两派的争论涉及对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的相对地位的不同认识；对二战效应和正常标准的不同效果的看法；对庞大赤字和外贸逆差原因和影响的不同结论；对外债的结算和投资环境作用的不同判断；以及对军事行动、军事扩张作用的不同估计。实际上制约美国经济兴衰的因素包括：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整和干预作用；经济周期变动中能否及时有效地调整对策；生产力发展因素和新科技革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战争和军事干预因素对经济的两种作用；社会心理文化因素对美国的影响；雅尔塔体制解体后的世界格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等。美国经济的兴衰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克林顿面临挽回颓势的严峻任务。他在 1991 年 10—11 月的三次重要的政策演说中哀叹：“美国不过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跛足巨人，军事上强大而经济上软弱”。他宣称“我们要一位领导美国参加全球经济竞争并取得胜利而非放弃世界领导地位的总统”，号召“重建美国经济，夺回我们在世界竞争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节 70 年代以来的西欧和欧洲共同体的发展

一、欧洲共同体的扩大及其影响

70 年代以来，欧洲共同体经历了两次扩大，从而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经济集团。1972 年 1 月 22 日，共同体 6 国与英、爱、丹、挪 4 国签署了 4 国分别加入共同体的布鲁塞尔条约。1973 年 1 月 1 日条约生效，英、爱、丹三国正式成为欧共体成员国（挪威因条约未在公民投票中通过而没有加入）。欧共体 9 国人口 2.56 亿，出口贸易 2100 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 606.2 亿美元，均已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国民生产总值 10650 亿美元，为美国的 77.7%。尼克松惊呼“美国受到了挑战”，“美国和欧洲的关系非改变不可”。

1975 年 6 月 5 日，希腊正式申请加入共同体，1977 年 3 月 28 日和 7 月 27 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分别提出加入的申请。这是南欧 3 国和共同体经济联系加强和经济差距相对缩小的结果，也是欧洲共同体国家联合抗霸的需要。1979 年 5 月 28 日，共同体与希腊在雅典举行了希腊加入共同体的签字仪式，6 月 28 日，希腊议会正式批准，1981 年起希腊正式成为成员国。西、葡加入的谈判因农产品和劳力自由流通等问题而进展缓慢。1984 年 10 月 22 日，共同体 10 国外长卢森堡会议同意西班牙于 1986 年 1 月 1 日加入共同体，10 月 24 日共同体又和葡萄牙签署葡于 1986 年 1 月 1 日加入共同体的决议。由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入，欧洲共同体 12 国的面积由 152.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225.3 万平方公里；人口由 2.6 亿增加到 3.2 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 1/4；对外贸易占全世界的 2/5，整个地中海北岸连成一片。

二、欧洲共同体加速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协调政治行动的政策

70 年代以来，欧共体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政策步伐加快。首先，在关税同盟政策方面，到 1977 年 7 月，英、爱、丹三国已经完全取消了在共同体内部的关税。在对外共同关税上实行了区别对待的不同税率，如对与雅温得条约、阿鲁沙条约、洛美条约的签字国实行特惠税率；对签定互惠贸易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实行协定关税；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遍优惠关税；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参加国实行最惠国税率等。尽管如此，通过限制进口、规定不同技术标准、征收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等非关税壁垒仍很盛行。关税同盟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共同体各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内部贸易的增长，加速共同体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程度，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专业化和国际分工。

为了加快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进程，1988 年 6 月在汉诺威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通过了要求在 1992 年实现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的《完全实现欧洲一体化文件》，1991 年 12 月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关于建立欧洲一体化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确定了在 2000 年前实现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战略目标。围绕批准马约欧共体各国国内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辩论。经过激烈争论，到 1993 年 8、10 月，英国和德国勉为其难地批准了马约。1993 年 11 月 1 日，马约生效。然而，马约的生效，对欧共体是祸是福迄今仍在争论不休。

其次，在共同的农业政策方面，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决定建

立农业共同市场组织，对共同体内部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价格保证和提供补贴，实现农产品自由流通，对外来农产品提高关税，保护共同体内部的农业生产。1976年11月，共同体9国外长理事会还决定，1977年起在北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捕鱼区扩大为200海里，作为共同体的共同捕鱼区。与此同时，共同体负责协调成员国的农业结构改革，根据1968年曼斯霍尔特的《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改革的备忘录》，实施1970—1980十年计划。1972年欧共体修改了农业政策的规章，规定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鼓励农场主转向其他部门，改进农业经济情报工作和发挥生产者联合组织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1975年共同体还建立了欧洲地区开发基金，用以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共同的农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相对稳定了市场价格。但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对农业的冲击和价格干预政策加重了农业生产过剩，以及欧共体扩大后农业政策协调难度的增大，都使农业一体化的前景困难重重。

第三，在共同体的货币联盟政策方面，还在1969年12月的共同体国家首脑海牙会议上，就提出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主张。1970年10月7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在共同体内部分阶段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报告》，1971年2月开始分阶段实行这一计划。1973年4月，共同体9国决定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1979年3月13日，正式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英国未参加）。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有：创建欧洲货币单位；扩大原先的西欧货币联合浮动体系，稳定西欧货币间的比价关系。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走向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重要步骤。它使西方国际货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打击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有利于共同体农业一体化的推行。由于1973—1975年经济危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多次货币危机，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进程被一再打断。

第四，在政治领域和对外政策协调方面，1970年10月，共同体6国外长发表《政治统一问题的报告》，开始定期协调对外政策。1973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9国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欧洲独立的宣言，提出西欧国家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重要口号。1974年12月，欧共体9国首脑巴黎会议决定，把最高级会议改称欧洲理事会，每年举行三次，协调各国的政策行动。1978年4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理事会确定了1979年6月为欧洲选举日，实行直接普选议员，1986年后，欧洲议会增至518席。

共同体还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对话和合作。1975年2月，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定了为期5年的洛美条约，1979年10月、1984年12月、1990年3月又先后与57、66和69个非、加、太国家续签了第二、三、四个洛美协定，对这些国家给予产品进口的优惠，提供援助基金和价格补贴。1974年7月，共同体开始了“欧阿对话”，发展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1980年3月，欧共体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签定了《经济贸易合作协定》。1983年12月，共同体和安第斯条约组织在哥伦比亚也签定了为期5年的合作协定。1975年5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关系。1983年11月，双边关系扩大到整个欧洲共同体。80年代以来，欧共体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三、英国撒切尔政府对“英国病”的治理

整个说来，战后英国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被称为“英国病”。其工业

生产指数 1970 年为 100, 1980 年只有 105.1, 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西方世界的比重到 80 年代已低于意大利。这种“英国病”是一种综合症, 病因是多方面的, 它是一个世纪以来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伴生的特殊产物。首先是长期以来英殖民帝国和“世界工厂”的苦果加重了“英国病”, 忽视发展国内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农业和采掘业, 导致农业长期慢性危机, 食物自给率下降; 其次由于国内资本投资率低下, 工业竞争精神衰退, 使英国活力受阻; 再次由于超负荷的“富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国有化的管理不善, 加重了英国负担; 第四由于封建残余的影响, 传统意识的等级观念和保守思想阻碍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

1970 年 6 月大选中上台的爱德华·希思保守党政府 (1970.6—1974.2) 和 1974 年再度执政的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 (1974.3—1976.4) 和接任的詹姆斯·卡拉汉工党政府 (1974.6—1979.5) 试图治愈“英国病”但收效不大。1979 年 5 月大选中,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获胜组成保守党政府, 她在 1983 和 1987 年大选中获胜连任, 共执政 11 年多 (1979.5.4—1990.11.28) 成为英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位连任三届的首相, 也是英国历史上头一位女首相。她针对“英国病”症和滞胀经济, 记取前几任政府的经验教训, 一反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实行货币主义经济政策, 治理“英国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 紧缩货币, 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 压缩公共开支, 削减税收, 控制通货膨胀。以公共住房开支为例, 由 1978—1979 年度占总开支的 5.4%, 减到 1986—1987 年度的 2%; 从 1979 年起英国的最高工资税率和投资税率分别由 83% 和 98% 下降到 80 年代中的 60%; 1979 年 5 月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 10.3%, 1986 年 5 月下降到 3.4%。

其次, 推行企业民营化, 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在 80 年代西方国家国营企业民营化趋势中, 英国起了推动作用。撒切尔政府逐步推行出售国营企业, 将国家雇佣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民营部门, 并以股票形式, 将国营企业资产转向民营企业。1979 年英国的持股人有 300 万, 到 1987 年增加到 900 万人。民营化趋势在公用事业领域发展最快, 1979 年 1/3 的英国居民是居住公房或享有补贴者, 6 年后, 17% 的公房以 60% 的折价出售给私人。民营化趋势反映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 也说明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和货币主义学派及供应学派的兴起。

第三, 控制社会保障制度规模, 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多年来, 福利国家制度起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安全阀、调节器、缓冲带的作用。因此, 撒切尔政府在维护福利国家制度的前提下, 稳步消除福利支出过度而经济收效不大的弊端。政府削减了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 1986—1987 年度比 1979—1980 年度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

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 国内生产总值明显增加。以 1979 年为 84.2, 1986 年则为 142.1; 英国的年实际增长率达 3% 左右, 近一个世纪来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直线下降趋势得以控制, 80 年代初以来稳定在 7% 左右。美国《幸福》杂志称: “英国这个 20 世纪工业不断下降的最典型的国家突然停止下降, 它又重新威风凛凛地振作起来, 这样的变化在四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 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症”的诊断; 显示了企业民营化和企业国有的交替使用有利于垄断

资本的发展和福利保障社会化应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体现了由凯恩斯主义主流向货币学派的转化趋势；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撒切尔首相辞职后梅杰继任保守党首相，他承继了撒切尔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但面对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了必要的政策调整。在 1979 年以来整个保守党执政期间，保守主义政治和思潮占据统治地位。

四、从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到密特朗的“社会主义”

在 1969 年 4 月的一次公民投票受挫后，戴高乐总统宣布辞职，经过两轮投票，戴高乐主义者、戴高乐时期的得力总理乔治·蓬皮杜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新总统（1969.6.5—1974.4.1）。尽管戴高乐已退出政坛，1970 年 11 月 9 日又因病去世，但是戴高乐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蓬皮杜推行了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奉行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国内外政策。

1974 年蓬皮杜病故后，保守主义者吉尔斯坦·德斯坦以微弱多数击败了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当选第五共和国时期的第三位总统（1974.5—1981.5）。他本人并不是戴高乐主义者，任用无党派的经济专家巴尔为总理，采取紧缩通货和节约开支的政策来应付滞胀经济，但成效不大。1981 年法国政局剧变，最大左翼政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1981.5.10—），他于 1988 年 5 月总统选举中再次连任，在密特朗任职期间实行密特朗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策，出现了 80 年代以来法国社会党为主的左翼长期执政的局面。

密特朗主张把法国建成为一个“民主、自由、自治管理的社会”，他交替推行企业国有化和民营化、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和福利经济、扩大地方自治和社会宽容的政策。1981 年 5 月，密特朗政府宣布扩大国有化政策。1982 年 11 月，颁布了国有化法令，将巴黎—荷兰金融公司、苏伊士金融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五大工业集团实行国有，使国有企业职工由 165 万人增加到 240 万人，一度成为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的主要手段。但是，1986 年 3 月，法国议会选举出现了第五共和国以来从未出现的左翼总统和右翼雅克·希拉克总理两驾马车共治的局面。1986 年 4 月，希拉克强调要在五年内逐步实施对国有的银行、工厂和企业的民营化政策。80 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化势头减弱，民营化趋势加强。

在计划经济方面，继 1966—1970 年第五个计划后，1971—1975 年实行了第六个计划，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规划现代化的发展。1976—1980 年，实行了第七个计划，规定国内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 5.5%至 6.0%。1981—1983 年，又实行了第八个计划，强调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根据国家整体需要决定投资重点。在 1982 年 6 月 15 日，议会通过了关于计划改革的法案，加强了计划中的指令性因素，实行计划合同制。1985—1988 年还实行了第九个计划。法国的有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意在既消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弊端，又避免了高度集中的国家控制经济的缺陷。

在福利经济方面，密特朗上任后以社会公正为目标，制定了 40 余项提高福利待遇，增加就业机会，改革税制，保障劳动者在企业的合法权利。80 年代初，工人的最低工资增加了 10%，退休金增加了 20%，家庭和住房津贴增加了 25%，10 万名最高级收入的纳税人需缴纳特别税，对银行和石油公司征收特别利润税。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密特朗政府于 1981 年 8 月通过了《权力下放法

案》，把中央的权力部分地下放到基层，实行地方自治。

在发展高科技方面，1985年4月17日，密特朗总统向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及西班牙、葡萄牙提出建立协调欧洲高科技发展机构的建议。同年11月，在联邦德国汉诺威召开了有18个欧洲国家外长和科技部长参加的会议，达成协议，以加强欧洲在工业和科技方面的战略独立，并逐步缩小和美国、日本的科技差距。法国和西欧国家担心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投入的巨额资金会把大量西欧的技术人员吸引到美国去。这一项以开发民用产业高技术为主要目的的尤里卡计划，在两极体制解体和SDI计划取消后，仍在继续发展。

在70年代西方国家转向保守主义改革时，法国推行自由主义的强化国家干预措施。直到80年代中后期法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密特朗的改革受阻，左翼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五、联邦德国从勃兰特到科尔的经济政策

1973—1975年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步入平稳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1974—1985年间为2.42%，在1980—1985年间为1.16%。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1974—1985年间为1.03%。就其平均数而言，低于美国和日本，但高于西欧的平均数。1973年德国的失业率为1.0%，到1985年达9.2%；1973—1982年间，年通货膨胀率为7.5%，1985年降到2.2%；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969年9月28日大选后，社会民主党的维利·勃兰特出任总理（1969.10—1974.5），10月3日，组织社会民主党和谢尔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期间实行了四次经济调整。继任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社会民主党政府（1974.5—1982.10）继承了勃兰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作了三次调整。基督教民主联盟赫尔穆特·科尔领导的政府（1982.10—）又在危机、发展以及与民主德国合并的条件下作了政策调整。所有这些政策调整并没有改变国家干预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均都遵循1967年6月德国议会通过的《经济稳定和增长促进法》中规定的“达到稳定而适度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内外经济平衡”政策。

勃兰特政府四次经济政策调整的时间是：1969.10—1970.6；1970.7—1972.6；1972.7—1973.9；1973.9—1974.5。它是为适应与德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上的间隔性两高两低而作的调整。第一次调整致力于稳定物价，宣布马克升值，提高银行信贷利率，并通过调整财政收支，以求得收支基本平衡。第二次调整是为了应付局部性危机，实行减税、降低银行信贷利率和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以期刺激投资和消费。第三次调整为了稳定物价和汇价，加强对外汇的管理，1973年2月宣布外商在联邦德国的公司投资必须得到联邦银行的同意；通过增收节支来缩小赤字；再次提高银行信贷利率；并和法、比、荷、卢、丹等西欧国家一起，组成欧洲货币联合浮动集团，这有利于马克同西欧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对美元汇率的及时调整。第四次调整为了对付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相交织。首先调整能源政策，节约和合理使用能源，紧缩能源数量，以煤代替部分石油，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实行多渠道能源贸易，改变能源进口结构，发展多种能源生产，改变能源、生产结构。其次，调整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通过减税刺激投资。第三，调整金融政策，抽紧银根，提高信贷利率；放宽对国际资金流动的控制，鼓励外资流入。

施密特政府任期，经历了两头的经济危机和中间的经济回升。1974年5月17日，他在联邦议院的政府声明中说：“高的就业水平、物价稳定、经济

增长仍是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我们不能排除在我们经济的个别部门进行一些调整。”在 70 年代中期，为克服经济危机，施密特政府一方面大量增加政府开支，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控制货币年增长率，有限度地膨胀通货，同时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在 70 年代后期，为对付滞胀，施密特政府实行谨慎的赤字财政政策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加强金融管理和参加欧洲货币体系。在 80 年代初期，施密特政府为对付严重经济危机特别是财政危机，采取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并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及能源等方面作了政策调整。即局部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交替扩大和缩小财政赤字；加强限制增发货币，局部调整信贷政策；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平衡国际收支；节约石油，增产煤炭，改革能源结构。

科尔政府任期，经历了 80 年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和 1990 年秋以来与东德合并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两个时期。到 80 年代末除充分就业外，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平衡经济都已达到预期目标。科尔宣称：“政府经济革新的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不要实行集体负担，而要个人作出成绩；不要僵硬的结构，而要更多的灵活性、更多的自身主动性，加强竞争能力。”科尔政府鼓励固定资本投资，实行减税，通过了 1984 年的减税法，同时降低利率；另一方面着重发展新科技，提高出口竞争能力，加速经济发展速度，1984 年 3 月通过了发展信息技术的总体方案。为稳定物价，科尔政府严格控制国债发行，缩小赤字；紧缩货币流通总量，控制发行，扣紧银根，消费物价从 1982 年 9 月的 5.5%，降到 1985 年的 0.8%；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控制本国资本外流，扩大国际贸易顺差；调整对美元的汇价，稳定马克的国际价值；在充分就业方面，目标没有实现，1982 年 10 月失业人数 204 万，到 1985 年 12 月增加到 228.9 万人。

1990 年秋，德国实现了统一，科尔对东德经济复苏的估计过于乐观，加上同时到来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困扰着科尔政府，迄今仍在为摆脱低谷、复苏经济，进行一系列新的政策调整。

需要指出，意大利 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超过了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地位增强。在政治领域中，1973 年 10 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提出，与天主教民主党实行“历史性妥协”，支持政府实行民主性改革，对意大利政局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贩毒走私盛行，以西西里为大本营的黑手党活动猖獗。1982 年 7 月 3 日，黑手党杀害了西西里总督、宪兵司令达拉·切萨将军，近年来又暗杀多名政界要人和法官。意大利政府自 1992 年以来，合力追捕黑手党头目，打击黑手党的猖狂活动。1969 年在工业三角区建立的“左翼”极端组织红色放恐怖活动也很频繁，1978 年 3 月，居然绑架并于两个月后杀害了天民党总理莫罗，1981 年又绑架了北约南欧盟军副总参谋长、美国准将多齐尔。

在北欧，社会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除 1936 年短暂 3 个月和 1977—1981 年外，自 1932 年至今一直执政；挪威工党自 1945—1965，1971—1972，1977—1981，1986 至今多次执政；丹麦社会民主党战后也长期执政。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引人注目。这种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社会主义”富有特色。1975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第 26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概述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实行多党制、议会制、普选制和多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治民主制；经济权利适当分散、高税收、充分就业、福利国

家和工人参管的经济民主制；社会、种族和宗教平等，国私兼顾混合经济的社会民主制。瑞典重视宏观经济管理，坚持编制国家计划，指导经济发展；加强需求和供给管理；采取抗周期性的投资、收支、建筑和人力政策。它把公有和私有、集权和分权、计划与市场适当结合，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管理经验，采取混合经济模式，从而赢得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即使在 7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三次严重危机中也能相对保持平稳。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欧洲政局迅速向右转，不仅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衰微，而且左翼政府也诸多落马，欧洲右翼政党纷纷抬头，并改变过激策略争取民心，如德国的右翼政党共和党、意大利的右翼政党北方联盟、法国的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等。由于经济不景气及东欧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大批居民涌入西欧，出现了西欧各国右翼势力排斥外来移民的浪潮，从 1989 年以来，丹麦、瑞士、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对难民作了更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第四节 7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发展

一、日本经济大国稳定发展经济的对策

日本自 70 年代以来，经济继续发展、经济实力跃居西方世界第二位，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 1987 年编制的《日本综合国力测算》，到 1985 年，各发达国家的国力以美国为 100，日本为 61，联邦德国为 54，苏联为 50，日本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德国《银行家》杂志 1992 年 7 月提供的数字表明，在世界上最大的 20 家银行中日本占了 11 家，其中头 7 家都由日本占据。80 年代，日本开始了新的远航，并提出了日本“国际化”的口号。1983 年中曾根首相使用“国际国家”一词来概括日本向着超经济大国方向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崛起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

首先，日本政府采取强化主导型混合经济的管理体制。重视中期计划的宏观调控，如 1970—1975 年佐藤政府《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3—1977 年田中政府《经济社会基本计划》；1976—1980 年三木政府《70 年代后期经济计划》；1979—1985 年大平政府《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1983—1990 年中曾根政府《80 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指针》。经济社会七年计划旨在纠正各经济部门间发展的不平衡；改变产业结构和克服能源制约；建立新型的日本式的福利社会。1988 年 5 月 22 日，竹下登政府公布了第十一个经济计划 1988—1992 年的《新五年计划》。它与前 10 个经济计划的加快经济发展战略不同，重在大幅度地调整不均衡的外贸关系，降低高额的顺差、实现与富国相称的国民生活多样化、协调发展地区经济技术和社会。

其次，日本政府采取科技立国战略，发展应用技术和高科技。

1980 年 3 月，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在《8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中提出，为克服 70 年代以来“贸易立国”遇到的资源和商品进口的困难，应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发展自主开发性技术，开发智力资源。日本是将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先进国家，1955—1982 年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 倍，到 1984 年，日本的制造业出口已达 15.4%，在西方世界已占首位，日本的工业生产单位产值耗能和耗材在全世界最低。日本十分重视引进、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在这个基础上带动自主性开发，在走向 21 世纪的 800 项尖端技术课题中，约有 80% 的项目有待借助国际合作的力量。日本的科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速度，在发达国家中位居第一，1970 年还是美国的 1/8 和德、法、英的 1/3，1990 年已占美国的 2/3 和德、法、英之和。日本科技的重应用、重实际倾向，明显表现在国内申请专利件数为世界之最，1987 年共 34 万件，为美国的 2.7 倍、苏联的 1.9 倍、西欧主要国家之和的 3 倍。日本还推行以民用生产技术为主和军民两用的科技发展路线，专门用于军事技术在 1988 年只占美国的 1/55.6，在技术水平上出现了军民接近、军民趋同和军民互转的现象。

第三，日本由外向型经济为主向内需外向贸易兼顾的方向转化。70 年代的三次严重经济危机和激烈竞争和摩擦的国际市场迫使日本改变 70 年代前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贸易立国战略。这明显地表现为在经营战略上强调兼顾内需型贸易。与此相联系，由“以生产为中心”改变为“以销售为中心”或“以顾客为中心”，奉行“顾客至高无上”的原则。据此，针对国内外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层次化，提出了企业经营多角化、生产柔性化即管

理计算机化和生产流水线的自动调整及同一流水线上生产不同规格的混流生产、生产服务专业、市场管理文明化和服务多样化即大力发展面向企业的服务业，面向家庭和个人的服务业和公共服务。同时对劳动力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终生学习系统，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技术质量、信用和纪律。

二、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如前所说，1983年的中曾根政府，就明确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主张，宣称“要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对世界做出贡献”。1987年度日本的《经济白皮书》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供应国”，日本要起到“19世纪的英国和战后美国所起的作用。”1993年4月，日本发表外交蓝皮书，提出“日本应在国际上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作用”。

为了加快走向政治大国，首先，日本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以同美国的合作与协调为外交基轴。1972年7月，大平外相宣称“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他出任首相后提出以“对美协调为主轴”，以恢复日中邦交为头号课题为目标的“多边自主外交”；1974年12月，三木武夫组阁后提出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等距离外交”；福田首相上任后则推行了“全方位和平外交”；大平正芳组阁后一方面在1978年8月同中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并同时强调日美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主轴和基石；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在组阁后宣称日美两国是“命运共同体”。80年代以来，在日美经济摩擦由局部的、单个的摩擦发展到金融摩擦、高技术摩擦、结构性多方面摩擦的情况下，美日关系定位十分重要，虽然摩擦多于协调、竞争多于合作，但不会动摇美日同盟的根基。《日本还要说“不”》一书中说：“今后文明的主宰者将是日本、美国和欧洲三大势力”，“日本目前不可能单独地立即脱离美国的世界战略”，“日本必须在历史的大潮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她将与浩瀚的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的另一核心，她正踏在未来文明的浪尖上。”“美国离不开日本，日本也同样需要美国。”近年来，日美经济摩擦加深，并日益公开化。

其次，日本立足亚洲，在美、日、欧三角中谋求亚洲代言人的角色。日本曾提出过“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太平洋经济文化圈、日本海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等设想。日本认为作为亚洲唯一经济大国，要在全球发展，必须立足亚洲。近年来西太平洋的崛起，为日本提供了机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趋势也向日本提出了挑战。但是，在当前，采取经济“不结盟”的策略对日本的“国际化”更为有利。在政治上，1992年6月15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派遣500名自卫队前往柬埔寨参加维持和平行动，1993年1月，宫泽首相的曼谷演说，宣称要以亚太地区为日本的外交中心。

第三，随着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和日元不断升值，日本谋求建立“日元圈”，并与美元、马克形成鼎立之势。

第四，日本加强防务力量，并向军事大国方向发展，出现为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铺路的倾向。1981年和1986年日本先后出现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严重事件，1986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突破防务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1985年8月15日，在日本政府战败投降纪念日之际，中曾根率内阁主要成员破天荒地正式参拜了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后几乎每年都有重要阁员去靖国神社参拜。

第五，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3年7月6日，日本内阁正式表明了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第六，谋求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历届日本政府都表示信守1972年9月29日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日中友好条约，维护和发展日中友好，并支持中国的四化建设。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双方确认了日中之间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期间宣布日本自1990—1995年间向中国提供约8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日中间的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全面发展。但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及前面提到的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防务开支突破1%限额事件等对日中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了阴影。1993年7月细川护熙上台后更明确宣布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为表示歉意。

第七，日本力图扩大日本文化的世界性影响。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展示了欧美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的效应。她把弘扬日本文化和吸收新儒学及西方文明的长处结合起来。日本的岛国心态所特有的忧患意识，激励人们居安思危，拚搏向上，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它向全世界表明，19世纪以英为师和20世纪以美为师将让位于20—21世纪之交以日为师。《日本坚决说“不”》一书称：“今后世界混乱之后而诞生的、控制世界的新文明，将在西方最后的代表美国和现代世界东方唯一的代表日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发展中产生。对于日美关系这种未来的意义，美国人会逐渐明白的。”并说：“现在也许轮到日本帮助一下‘疾病缠身’的超级大国美国了。”

三、日本政局的新发展，自民党一统天下的结束

7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生活中的自民党一党多派的民主政治总趋势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是自民党的垄断地位发生了动摇。佐藤荣作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于1970.1.14—1972.7.5第三次组阁，田中角荣于1972.7.7—1974.12两次组阁，三木武夫于1974.12.9—1976.12.24组阁，福田赳夫于1976.12.24—1978.12.6组阁，大平正芳于1978.12.7—1980.6.12两次组阁，伊东正义于1980.6.12—7.16代理首相，铃木善幸于1980.7.17—1982.11两次组阁，中曾根康弘于1982.11.27—1987.11组阁，竹下登于1987.11—1989.6.2组阁，宇野宗佑于1989.6.3—1989.7组阁，海部俊树于1989.7—1991.11组阁，宫泽喜一于1991.11.5—1993.7.22组阁。其间变更了12位首相，均为自民党的各派掌权，但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争端屡起，丑闻不断，几度出现统治危机。

1972年田中内阁建立时获得国民支持率62%，为战后历史的最高记录，他的日本列土改造计划作为主要的施政纲领，企图通过改革国内的生产结构和地区结构，解决人口过密和过疏问题，推动日本式福利社会的到来。这一计划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引起通货膨胀和地价上涨，使田中内阁面临危机。1976年2月洛克希德案件曝光，该公司通过日平丸红公司赠贿日本高级官员6亿日元，以求“全日空”购进洛克希德公司的三星飞机。7月27日，田中逮捕，在历时6年零9个月的审理中，共逮捕18人，公审191次，田中被判刑4年，罚款5亿日元，这一战后日本最大的官僚丑闻，暴露了日本“金权政治”的内幕，动摇了自民党主流派的稳固统治。1987年7月，该派内的竹下登为首的“经世会”取代田中派。三木上台后，为消弥“金权政

治”形象，实行一些改革，提出“整肃纲纪”，“净化政界”的口号。1975年4月和7月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对捐赠政党、公职候选人等的总额作了限制；同时通过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禁止公职候选人向选区选民捐款。根据1976年10月29日，三木政府提出的《防务计划大纲》还明确规定，“当前个年度的国防开支总额，以不超过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1%为限额”。由于洛克希德丑闻的冲击，在1976年第34届大选时，自民党分裂为两个选举本部，在大选中自民党只获全部议席的48.7%，首次出现了执政党和在野党在众议院中势均力敌的情况。

福田内阁虽在形式上解散了党内的派阀，但好景不长，未能奏效。到1979年10月大选时，自民党仅得248席，降到自民党成立以来的最低点。1980年6月两院选举时，大平猝死，自民党各派暂时联合，从而恢复了在两院中的稳定多数。由于日本自民党内派系争斗激化，丑闻不断，为挽回颓势，55岁的原田中派参议员细川护熙脱离自民党于1993年另组新生党，以革新政治争取选民，在大选中一举获得36个议席。1993年7月29日，该党和日本社会党、公明党、社民联、民社党、日本新党和新党魁党组成七党联盟，并在大选中获胜，细川出任首相，从而结束了自1955年以来38年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是，细川派本是自民党的派生物，自民党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不容低估，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等长期的在野党势力日衰，且不团结，难以稳操胜券，围绕细川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危机以及1994年4月细川首相辞职就是证明。在本质上细川联合内阁所代表的同样是垄断资本主体的利益。

战后日本天皇裕仁作为日本国的“象征”一直在位到1989年1月7日，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天皇。1952年11月10日被立为皇太子的明仁，自1989年1月7日起接皇位，年号“平成”。

对70年代以来政局有着重要影响的仍然是日本经济四团体，即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济同友会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九大智囊团也对日本经济和政治发生重要的影响。它们是1992年成立的朝日银行综合研究所，号称“零售业头号银行”、樱花综合研究所从事环太平洋研究、三和研究所1986年成立以来以确立走向世界最优秀的智囊团为目标、大和银行综合研究所标榜自己是“中坚中小企业的调查部”、大和综合研究所1989年成立以来推进以亚洲为重点的国际化、野村综合研究所1987年成立以来确立“开创信息世纪知识资产创造企业”的形象、富士综合研究所1989年成立以来谋求“成为代表日本的大型综合研究所”、三井信息开发研究所成立25年来谋求成为“提案型知识创造企业”、三菱综合研究所1990年成立以来以尖端科学研究所著称。这些智囊团集中反映了日本六大财团和自民党的政治经济策略需要。

日本共产党在1976年举行的第13次代表大会上把党纲中的“马列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垄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和平与民主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日共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减小。作为日本国会第二大党的日本社会党70年代以来势力不振，1977年3月，田英夫脱离社会党另组社会民主联盟，1993年细川联合政府组成，社会党女委员长当选为众议院院长。1970年5月，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宣布该会与公明党“政教分离”，1978年公明党提出“中道革新联合政府设想”，以图建立一个不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以公明党为主体的在野党联盟。70年代以

来日本的工人运动、大规模群众运动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但是，老年社会和人口老年化问题、超劳动强度问题、外来移民问题等日趋尖锐，对日本社会将带来影响。

北方四岛领土问题是妨碍日苏和日本独联体关系的最大障碍。1969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关于收复北方领土的决议》，1973年田中首相访苏时提出了一揽子收复北方四岛的要求，其后历届日本政府基本立场不变。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为求得日本的支持一度妥协，但今年以来态度又趋强硬，日俄首脑会晤一再推迟。

第十四章 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 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节 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

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成就

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国家的剥削和掠夺，因此取得政治独立后，经济上仍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从生产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综合考察，它们独立时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经济特征：

第一，现代工业不发达，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主要地位。农业人口一般占全国人口 60—70%，有的国家占 80—90%。多数国家的农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第二，生产结构单一。不少民族独立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形成了畸形片面发展的单一经济结构，主要生产一两种或少数几种面向出口的农、矿原料产品。

第三，经济成份复杂多样，既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多数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时，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在这些国家的农村中，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他们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 50—80% 缴纳给地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部落土地所有制和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

第四，贫富悬殊，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劳动人民生活极其贫困。发展中国家占人口总数 10% 的富有者，一般占有国民收入的 50% 左右，而占人口 40% 的贫困者，只占有国民收入的 10%。

民族独立国家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改变殖民地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

在民族独立国家面前，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两种道路，成为民族独立国家考虑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进行抉择的依据。

民族独立国家的政权一般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手里，它们大都选择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即以自由的市场经济为主，扶持私人经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的国家还通过发展国家资本，掌握重要经济部门，发展交通、运输、金融、电力、通讯及其他基础设施，为民族资本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这些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密切，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吸收外资，重视从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采取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的战略。有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它们一般对西方国家的资金依赖很强，某些重要部门甚至为外资所控制，容易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因此经济增长极不稳定，波动较大。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宣称仿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它们建立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实行国有化政策，把外国资本甚至部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在重要经济部门建立大规模国营企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国营农场和合作农场，在部分农民中推行集体化。这些国家自称“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采用某

些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并不是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实行的政策不符合本国国情，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都比较缓慢。70年代以来，多数国家都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

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实施的具体政策措施各有不同，情况比较复杂。一般地说，战后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它们采取了以下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措施：

第一，取消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殖民统治特权，收回海关和货币发行权，接管原殖民政府的财产、企业和公用事业，对外资占有或控制的土地、矿山、银行和企业实行监督、限制和管理，直至收归国有。

第二，国家制订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发展国营经济，并通过财政、税收等措施，引导、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

第三，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采取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或重点发展中、小型工业和农、矿产品加工工业等战略方针，以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第四，对外国资本实行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有的国家规定各种优惠待遇，鼓励外资投入；有的国家实行利用与限制外资政策。各国根据本国工业发展情况，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实用技术，以弥补技术落后的不足，加速经济的发展。

第五，在农业方面，一些国家实行了土地改革，对土地占有权规定最高限额，减轻地租负担，缓和农村阶级矛盾。很多国家在农村推行“绿色革命”，如推广优良品种，发展水利灌溉，使用化肥、农药和农业机器。此外，政府还通过农村信贷和价格补贴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六，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培养本国的科技、管理人才。

此外，民族独立国家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促进民族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里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斗争的范围涉及资源、贸易、金融货币、海洋权、国际经济结构、援助和债务等等问题。

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首先，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60、70年代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60—197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6.3%，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4.9%。1973—1979年，民族独立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5.2%，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2.8%。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的比重从1955年的20.8%上升为1980年的22.9%；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7.1%上升为1980年的9.4%；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2年的20.6%上升为1982年的26.1%；制成品出口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2年的4.1%上升为1982年的10.9%。

进入80年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总体来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存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民族独立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次从民族独立国家本身来讲，一是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世界经济动荡的冲击；二是在科学技术上的消化创新能力弱，在科学技术上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三是在资金、技术、外贸等方面过于依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发达国家能够利用这种依赖关系转嫁经济危机；四是不少民族独立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建设缺少一个稳定的环境。

民族独立国家的经济虽然取得了不小成就，但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至今仍是世界上比较甚至十分贫穷的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有 80%以上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旧的殖民经济结构在不少国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此外，还存在债务沉重、粮食不足和国际收支恶化等等困难。民族独立国家只有进一步团结起来，加强南南合作，争取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以较快速度发展民族经济。

二、民族独立国家的不平衡发展与类型

战后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都有所发展。但由于各国间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差异，以及各自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70 年代，民族独立国家中，有的国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10%，有的国家却是负增长。80 年代末，民族独立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超过 25000 美元，最低的只有 100 美元左右。经过战后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的发展，民族独立国家逐步形成了以下几种类型：

（一）石油输出国

石油输出国有比较丰富的石油资源，大量开采并出口石油，一般出口石油占本国出口商品出口总额的 50%以上。当前这类国家约有 20 多个，其中 13 个参加了“石油输出国组织”。1980 年，发展中国家的石油产量和石油出口分别占世界石油总产量和世界石油出口总额的 61%和 87%。同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石油储藏量、原油日产量和原油日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石油储藏量、世界原油日产量和原油日出口量的 67%、45%和 74.8%。此后，随着世界石油市场形势的变化，到 1983 年该组织在世界石油生产与出口中的比重分别降为 31.4%和 46.6%。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后，多次迫使西方石油公司提高油价和石油税率，增加产油国的股权。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采取了减产、禁运、收回原油标价权，提高油价及国有化等措施展开斗争，不仅保障了产油国的合理收入，而且第一次以石油为武器沉重地打击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促发了 1973—1974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1973 年石油斗争取得胜利后，大部分输出石油的民族独立国家达到全部或大部地收回了本国石油资源的主权，并且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掌握了确定石油价格的权利。一些石油输出国出口收入激增，从而在民族独立国家中出現了一批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有：

（1）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82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237.8 亿美元，人均 23770 美元，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政府的社会保险法，保证每人每月最低收入为 63 美元，本国石油工人工资最高每人年平均约 42000 美元。全国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

（2）科威特，石油收入约占国内总收入的 90%。1984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212 亿多美元，人均收入 12640 美元。科威特政府利用高额的石油收入发展国民经济，实行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等高福利制度。

（3）沙特阿拉伯，以“石油王国”著称，是世界上石油储量、产量和销售量最多的国家之一。1984 年，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231.51 亿吨，天然气储量为 34885 亿立方米。1981 年石油产量达 4.9 亿吨，收入 1032 亿美元。1983 年以来，受石油价格下跌影响，产量和收入锐减，1985 年产量为 1.65

亿吨，收入 340 亿美元。巨额的石油收入使沙特阿拉伯从传统的落后的农业经济迅速向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转变，到 70 年代已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1982 年国内生产总值 1531 亿美元，人均 15310 美元。

(4) 卡塔尔，1971 年宣布独立，1977 年对外国石油公司全部实行了国有化，1977—1981 年，国家的石油收入从 20 亿美元增加到 53 亿美元。政府的财政收入 95% 以上来自石油。198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79.2 亿美元，人均 29000 美元，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5) 巴林，1971 年宣布独立，1974 年在巴林石油公司中参股 60%，1978 年宣布全部接管外国公司在巴林的股份。巴林出口收入 80% 左右来自石油。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27.7 亿美元，人均 9159 美元。

除上述海湾石油致富国外，东南亚的文莱也因输出石油而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982 年文莱国内生产总值约 45 亿美元，人均约 22000 美元，居东南亚国家之首。

石油输出国的经济特点是单一的石油出口型经济，其工业发展大多以石油开采为中心，发展石油提炼、加工及石油化学工业，并促进其他有关部门的发展，形成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由于石油是非再生性能源，储量有限，近年来，一些石油输出国已开始注意采取措施，保护能源，并根据本国条件，发展多样化经济。

(二)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少数民族独立国家从 60 年代以来，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按照联合国工发组织确定的标准，这类国家 1978 年人均收入超过 1100 美元，制造业净产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20% 以上。目前这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约有 10 个左右，最突出的有亚洲“四小龙”，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小、资源少的岛国。1959 年在英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1963 年成为马来西亚联邦内的一个州。1965 年 8 月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1959 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后，国内最迫切的问题是大量人口失业以及因转口贸易衰退而造成的经济不振。为了改变国家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单一经济，逐步使殖民地型的经济结构转向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道路，新加坡着手进行经济改革。60 年代上半期，重点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以食品、纺织、印刷、木材加工等中小型企业为主，从而吸收了大批劳动力，缓解了失业问题，对发展本国工业，减少进口也起了积极作用。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面对国内市场缩小的形势，经济建设重点转向发展炼油、电子电器等面向出口的新兴工业，执行以发展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政策。1979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第二次经济革命”，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促使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发展，以实现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和多元化。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充分利用原有的商业、金融、海运等设施，继续发展转口贸易和旅游业，为经济建设积累外汇。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5 年的 9.7 亿美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174.7 亿美元，增加了 17 倍，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800 美元增为 7420 美元，增加了约 8.3 倍。1965—1980 年，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10.2%、12.2%、3.1% 和 9.7%。新加坡已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多元化的国家，它的海运业、炼油业、金融

业和船舶修造业均居世界前列。到 1981 年底，71%的居民住进了政府修建的设备齐全、价格低廉的公共住宅，人均住房面积为 15 平方米。但进入 80 年代后，受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工业结构调整不当，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甚至在 1985 年出现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1980 年为 10.2%，1983 年 7.9%，1984 年 8.3%，1985 年 -1.8%，1986 年 1.9%。1987 年经济全面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 8%。到 1990 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 353 亿多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1965 美元。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8.3%。

韩国在 50 年代经济发展缓慢。1960 年韩国人民起义，推翻了李承晚傀儡政权。1961 年朴正熙上台后，推行以“引进外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开发政策，并从 1962 年起实行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6 年）主要是利用外资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7.7%。由于资源匮乏和国内市场狭小，就业机会增加不多，而且国际收支恶化。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7—1976 年），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0.5%和 11%。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出口贸易的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发展，经济严重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7—1981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3%。第五个五年计划（1982—1986 年）改变了 20 年来实行的“高速增长”政策，实行稳定物价，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对外竞争能力的“稳定增长”政策。1987 年起开始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至 1990 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由 1962 年的 23 亿美元和 87 美元增加到 2379 亿美元和 5569 美元，分别增长了 100 倍和 60 倍以上。产业结构也迅速向工业化结构发展。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 1960 年的 13.4%上升到 1985 年的 29.1%。在制造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分别由 1960 年的 71.4%和 28.6%改变为 1985 年的 47%和 53%。

亚洲“四小龙”中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也居于世界前列。1960—1970 年，香港为 10%，台湾为 9.6%，分别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五位。1970—1980 年，香港为 10%，台湾为 9.2%，分别居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1986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香港为 6330 美元，台湾为 3751 美元。

战后巴西进一步推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1951—1960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6.9%，工业增长在 8%以上。但通货膨胀率连年上升，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加上政治动荡，从 1962 年起，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衰退一直延续到 1967 年。1964 年军人接管政权后，采取抑制通货膨胀，鼓励利用外资，努力扩大出口的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1968—1974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 10%以上，工业增长率超过 11.5%，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人称之为“经济奇迹”。1974—1980 年，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和石油提价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年均增长率仍达 7.1%。1981—1983 年出现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 10.6%。1984 年经济缓慢回升。巴西经济实力居拉美首位。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3360 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020 美元。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巴西从一个出口咖啡、棉花之类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逐步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

墨西哥是拉美另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国。战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历届政府推行支持民族资本，鼓励吸收外国资本，大力推进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50 年代为

6.1%，60年代为7.1%，70年代为6.5%。1976—1981年，石油的产量和创汇量逐年激增。198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外汇收入接近110亿美元。但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景气，发生外债支付危机。1982年公、私外债总额达824亿美元，成为拉美地区的第二大债务国。同年爆发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0%，经济增长率从连续四年保持8%以上骤降至—0.5%。此后，墨西哥政府调整经济政策，经济情况有所好转。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2047.58亿美元，居拉美第二位；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44美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墨西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1950—1989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下降至7.7%，而工业则由27.3%上升至32.3%。

拉丁美洲在60—70年代步入经济较发达国家行列的还有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智利等国。委内瑞拉是世界主要石油生产与输出国。战后40多年来，石油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委内瑞拉政府推行进口替代、经济多样化政策，制造业发展较快。1982年制造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同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4.9亿美元，人均4360美元。阿根廷在5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多年，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军人独裁政府和民主选举政府更迭频繁，在对待工人福利、引进美资、发展石油工业等问题上政策反复更易，经济发展受到不利影响。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0—1960年为3.4%，1960—1970年为4.2%，1970—1977年降为2.9%，1978年为3.5%，1979年跃升为7.1%，但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1980年降为1.1%，1981年又进一步降为—5.9%。198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520美元。阿根廷的经济结构因机器制造、化工、钢铁、石油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至70年代中期，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所占比重约为1/3。重工业产值大大超过轻工业产值，但汽车、化工等重要部门多为外资控制。乌拉圭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2.3亿美元，人均3129美元。智利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41亿美元，人均2100美元。

（三）原料生产国

原料生产国在民族独立国家中占大多数。它们主要生产除石油以外的各种农矿原料，并依靠这些原料及其初步加工产品的出口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国内生产总的部门构成中，农业和采矿业占36%以上，在出口贸易中，原料及其他初级产品约占70%以上。由于发达国家压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制品价格，使原料生产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大多数原料生产国1982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500美元以下，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或低收入国家。自70年代以来，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国，而高于西方发达国家。1970—1982年，下中等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3%，低收入国家为3.4%，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2.8%。但按人口平均的年均增长率，1960—1982年，下中等收入国家只有3.2%，低收入国家只有1.1%，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一些原料生产国采取进口替代或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制造业有较大的发展。

（四）最不发达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是民族独立国家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一部分国家，大都是低收入的原料生产国。1971年联合国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美元（1981年改为低于25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例低于10%及

成人识字率低于 20% 三条标准，确定 26 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 年最不发达国家数增加到 39 个，1990 年又增加到 42 个。它们是亚洲 8 国：缅甸、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老挝、阿富汗、马尔代夫、也门；非洲 29 国：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中非、乍得、科摩罗、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利比里亚；拉丁美洲 1 国：海地；大洋洲 4 国：西萨摩亚、瓦努阿图、图瓦卢、基里巴斯。到 1992 年，最不发达国家数目又增加到 46 个。

据联合国统计，这些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仅 47 岁，婴儿死亡率为 32%，而在发达国家中，人均寿命为 73 岁，婴儿死亡率为 18%。最不发达国家总人口约 4.2 亿，占全球人口 8%，而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 0.7%，出口总产值占 0.4%。1988 年，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共为 898.87 亿美元，人均 205 美元。1987 年，这些国家债务总额达 654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0%；年债务偿还额达 34 亿美元，占其出口收入的 27%。

三、印度经济的发展

1947 年印度独立时的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经济命脉都操纵在英国垄断资本手中。“印巴分治”打乱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联系，教派冲突又给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为了尽快结束动乱，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尼赫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加强和完善国家体制，统一国内市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50 年代初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取缔了大地主的包税特权。到 50 年代中期，全国约有 38% 的土地取消了柴明达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51—1956 年，尼赫鲁政府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此期间，对“印巴分治”所造成的经济失调进行了调整，修复了各种基础设施。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 3.6%，工业生产增长了 25.2%，农业生产增长了 22.2%。印度经济恢复时期结束。

1955 年初，尼赫鲁提出把印度建成“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他解释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尼赫鲁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他提出的发展战略，是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实现工业化，形成印度完整的工业体系。在 1956—1966 年的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政府执行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列发展的政策，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生产指数从 1956 年的 136（1951 年为 100）上升到 1966 年的 264.2。但是这一时期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致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每隔两三年出现一次减产。频繁的粮荒和通货膨胀影响了政局的稳定。

1966 年英·甘地接任总理后，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在农村开展以推广高产品种和改进农业技术为中心的“绿色革命”，同时对外国私人投资进一步提供机会，放松工业许可证政策，更多地依赖市场经济以及实行卢比贬值等。为此实行了三年年度计划（1966 年 4 月—1969 年 3 月），对经济进行了初步调整。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1969—1979 年）继续实行重点发展农业、对外有限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放宽了对私营企业的限制。第五个五年计划还加强了能源建设。第六个五年计划强调消灭贫

困。1984 年拉吉夫·甘地接任总理后，强调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放宽进口，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提高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至 1990 年，印度已经实施了 7 个五年计划建设。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印度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按 1970/1971 年度价格，从 1950/1951 年度的 1746.9 亿卢比上升到 1975/1976 年度的 4259 亿卢比，在 25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1.4 倍。至 1988/1989 年度，印度国民生产总值达 18614.3 亿卢比（按 1980/1981 年度不变价格计算），居世界第十二位。独立初，印度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部门结构畸形，主要工业部门是轻纺工业。经过 40 年的发展，印度已建立起一个包括原子能、电子、精密仪器、冶金、机械、飞机、船舶、石油、化工、建材、电力、轻纺等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国营和私营企业产值分别占工业总产值的 30%和 60%。印度工业总产值居发展中国家第四位。从 1950/1951 年度到 1980/1981 年度印度农业生产总指数（1966/1967 年度到 1969/1970 年度三个年度的平均数为 100）从 58.5 增至 135.2，增加了 1.31 倍。进入 80 年代后，印度的农业生产又有新发展。1989/1990 年度粮食总产量达 1.765 亿吨，为独立初期 5000 多万吨的 3.5 倍左右。农业已由严重缺粮到基本自给，农业总产值居世界第四位。

印度独立以来，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发展速度比较缓慢。1950—1980 年，印度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2%下降到 1.4%；在第三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从 10%下降到 5.4%。同期印度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1.2%下降到 0.7%，在第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12%下降到 3%；在世界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11%下降到 9%；在第三世界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 25%下降到 17%。1990 年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340 美元，仍属低收入国家。

印度财政年度从当年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

汇率（1991 年 1 月）：1 美元 = 18.34 卢比。

第二节 民族独立国的政治生活

一、印尼“九·三”事件和伊朗“伊斯兰革命”

1950年印尼共和国成立后，政党林立，主要政党有：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1952年退出马斯友美党）、民族党、共产党、平民党、伊斯兰联盟党和社会党。它们基本上组成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使国内政局动荡不定，内阁更换频繁。50年代中期，在共产党支持下，先后两次组阁的民族党奉行进步的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的内外政策。1956年印尼宣布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在帝国主义策动下，1956—1958年印尼发生了多起地方武装叛乱。在反对地方武装叛乱的斗争中，印尼共产党队伍迅速壮大。党员人数由1951年的近万人，发展到1963年的200多万人。苏加诺总统为了平衡左右政治势力，掌握政局最高控制权，于1959年7月宣布恢复1945年宪法，实行总统内阁制，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简称“纳沙贡”），宣布解散支持地方武装叛乱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和“有领导的经济”。1963年5月1日，收复了西伊里安，实现了印尼国家的统一。

面对这种形势，以纳苏蒂安、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于1965年9月底组织了“将领委员会”，准备在10月5日（建军节）以前发动推翻苏加诺政权的政变，消灭印尼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为了捍卫苏加诺政权，以苏加诺总统的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陆军内部的爱国力量，在9月30日发动了反对“将领委员会”政变的运动。10月1日，苏哈托—纳苏蒂安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权力。军人集团控制政局后，挟持苏加诺，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和清洗异己势力，几十万人头落地，100多万人被投入监狱。1966年3月苏哈托宣布代行总统职权，翌年2月任代理总统，1968年3月正式就任总统，此后多次连选连任。

伊朗巴列维王朝在镇压了50年代初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后，在美国帮助下扩充军备，设立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局，实行独裁统治。1975年3月，宣布取缔一切政党，组成御用的民族复兴党，实行一党专制。

礼萨·巴列维为了巩固其王朝统治，利用石油收入和美国援助，推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60年代初，他提出进行“白色革命”，其内容包括土地改革，工人在企业中入股分红，给妇女选举权，建立卫生队，发展工业、交通和文教事业等。国王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0年代伊朗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25%，农业达3.6%。但由于计划过大等原因，造成经济严重失调。

伊朗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国王的改革触犯了宗教上层僧侣的利益，而他的专制则激起了群众的不满。1978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国王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1979年1月，国王被迫出国。2月1日，因反对国王而流亡国外的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回国。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2月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义为立国的准则；霍梅尼作为终身宗教领袖，在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方面拥有最高权力；总统和议会由普选产生。1981年10月，哈梅内伊就任总统，穆萨维就任总理。霍梅尼逐步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系。霍梅尼宣布：“所有伊斯兰国家应该觉醒，团结起来，在真主的旗帜下，成立一个大伊斯兰政府，征服全世界”，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

翌日，专家会议推举哈梅内伊为领袖。7月28日，议长拉夫桑贾尼当选为总统。

二、非洲国家政治体制的变更

自从50—60年代非洲各国纷纷获得独立以来，其政治体制几乎都经过或大或小的变化，至80年代，一党制成为非洲最普遍的政治体制。1989年，非洲51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实行一党制的就有28个。它们是：贝宁、多哥、刚果、加蓬、马里、乍得、安哥拉、布隆迪、佛得角、吉布提、喀麦隆、肯尼亚、卢旺达、马拉维、尼日尔、塞舌尔、索马里、赞比亚、扎伊尔、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中非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非洲一党制国家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由一个政党掌握国家权力，通过宪法和其他强制性手段压制、取缔其他政党活动；第二，实行所谓“一党民主政治”，吸收群众参加组织，模仿西方国家的普选和议会制度；第三，执政党机构兼有国家机构的职能，行使国家权力。党的领袖一般又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队统帅，个人权力膨胀。

独立以来非洲国家政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军队干预政治，政变频繁，一些国家建立军人政权。据统计，30多年来，非洲有40多个国家发生过军事政变，有的国家甚至发生多次。例如贝宁发生过8次政变，其中成功6次，未遂2次；加纳发生过9次政变，成功5次，未遂4次；尼日利亚也发生过多次政变，有6次成功。有些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往往开始实行政令统治，待政权巩固后遂起草新宪法（一般是一党制宪法）和建立新党。随后以全民投票的形式批准军政府首脑的任职和新宪法，使当政者和新政府具有合法性，然后再通过大选建立议会类型的立法机构。这种通过一系列演变过程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往往同其他一党制国家没有多少区别。至80年代末，基本完成这一演变进程的国家有贝宁、刚果、多哥、马里、乍得、中非、布隆迪、尼日尔、索马里、扎伊尔、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军人政权还有加纳、几内亚、毛里塔尼亚等10国。此外，还有两个无政党国家。实行多党制的只有11个国家。

1989年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非洲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标志是由一党制和军人政权向多党制政治体制过渡，“多党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这次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为非洲民族独立国家成立以来所罕见，有人把它称为“非洲的第二次解放”和“非洲的文艺复兴”。

这次非洲变革始自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1962年独立后一直由民族解放阵线一党执政。1989年2月经公民投票决定修改宪法，解除党禁，7月议会通过允许组建新党的法律。到1990年底已有50多个政党宣布成立，其中34个经内政部批准合法。在1990年6月地方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拯救阵线所得选票超过了民族解放阵线。

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化”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截至1992年中，从一党制转变为或宣布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贝宁、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乍得、刚果、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科摩罗、加蓬、赞比亚、几内亚比绍、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多哥和扎伊尔等23个国家，其中贝宁、赞比亚、

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已通过多党选举方式，由反对党上台执政。从军人政权转变为多党制的国家有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军人政权许诺在一至两年内恢复多党统治的国家有尼日利亚、加纳、几内亚、莱索托、乌干达和塞拉利昂。短短两三年时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实行或即将实行多党制。

导致非洲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从外部原因看，主要是：第一，苏联东欧剧变对非洲，特别是对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黑非洲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第二，在两极格局被打破，新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失衡的形势下，西方国家或利用经援，或直接干预，对非洲国家施加重重压力，迫使它们实行政治多元化。从内部原因看，主要是：第一，经济形势恶化。除少数国家外，非洲国家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极度困苦。80年代是非洲“失去发展机会的10年”。这10年中，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0%以上，最不发达国家从17个增加到29个。债务负担越来越重，1990年全非外债总额已达2780亿美元，偿债率为40%，有的国家甚至高达100%。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10个国家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10个国家中非洲均占有9个；第二，政治腐败。许多非洲国家长期实行家长式统治体制，执政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裙带关系、任人唯亲、贪污贿赂现象十分严重；第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非洲一些国家统治集团贪污腐化，穷奢极欲；劳动群众贫困不堪，食不果腹。全非洲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000万人口严重营养不良或处于饥饿危险之中；第四，部族矛盾和纠纷愈演愈烈，有的国家爆发旷日持久的内战。除埃及、突尼斯等少数国家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里，部族繁多，文化和语言又都各自不同。因此，不少国家独立后政权脆弱，政变频繁，无力对本国实行有效的统治。这些国家的部族势力根深蒂固，不同地域的部族，为了争夺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经常是兵戎相见。面对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非洲人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主要由失意政客和部族势力代表组成的反对党，趁机煽动人民起来打倒现政权，实行多党制。非洲的多党制浪潮就是在这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掀起的。

“多党民主”浪潮给非洲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第一，统治阶级各派政治势力斗争加剧，政局持续动荡；第二，部族矛盾、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与党派矛盾相互交织，危害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第三，多党制难以解决经济困难和人民贫困问题。这场社会动荡除了负面影响外，它对扫除一些国家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势力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非洲国家有可能在社会动荡变革中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促进非洲的发展、进步。

三、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反美、反独裁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德、意战败和英、法削弱的时机，进一步加强了对拉美的扩张。1947年9月，美国与拉美国家缔结《泛美互助条约》，以“共同防御”为名，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之内。1948年，在波哥大举行的第9次泛美会议上，又将美洲共和国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至70年代初，美国利用该组织对拉美各国进行的重大政治干涉和武装颠覆达40多次，扶植了17个亲美独裁者上台。此外，美国加紧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到1957年，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达122.52

亿美元，占外国在拉美总投资的 80%。在中美洲，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拥有 250 万公顷土地，成为中美洲的“国中之国”。

战后初期，拉美人民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掀起了反美、反独裁，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危地马拉革命是这一时期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

1944 年 10 月，危地马拉首都的工人、学生、市民和部分进步军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12 月，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阿雷瓦洛当选总统。翌年 3 月，制宪会议通过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宪法。阿雷瓦洛依据宪法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允许各政党自由活动，颁布进步的劳动法 and 保护民族利益的石油保护法。1951 年 3 月，阿本斯·古斯曼继任总统，推行更加激进的社会改革。1952 年 6 月，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阿本斯·古斯曼政府依据该法征收大庄园和美资联合果品公司的闲置地与出租地，将其分给或长期租给无地与少地农民耕种。为打破美国公司对危地马拉国内运输、港口和供电事业的垄断，阿本斯·古斯曼政府筹资修筑了一条由首都通至大西洋沿岸的公路，并着手建筑新港，建造水电站。1954 年 6 月，美国利用流亡国外的危地马拉反动分子组成雇佣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策动危地马拉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阿本斯·古斯曼政府。

1959 年古巴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权，建立了古巴共和国，接着在 1961 年 4 月粉碎了美国策划的吉隆滩入侵。以古巴革命为起点，拉美国国家掀起了反美反独裁斗争新风暴。

1965 年 4 月，多米尼加爱国军民举行起义，推翻亲美反动政权，成立宪政派政府。美国悍然出兵进行干涉。起义军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干涉军。为了掩盖侵略，美国于 5 月中、下旬，拼凑了以美军为主的“泛美和平部队”，在“维护停火”的幌子下协助多米尼加反动军队进攻起义军民。9 月 3 日，由美国提名的加西亚·戈多伊出任总统，组成临时政府。加西亚·戈多伊政府收缴起义人民的武器，残酷迫害参加起义的爱国军民。

1964 年 1 月，巴拿马爆发反美风暴，要求收回运河和运河区主权，遭到美军残酷镇压，21 人死亡，300 人负伤；巴拿马政府宣布与美国断交。在人民斗争和世界舆论压力下，美国被迫同意与巴拿马重新谈判一项运河条约。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1977 年 9 月 7 日，美国终于与巴拿马签订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营运的条约》。前一条约规定，废除 1903 年的“美巴条约”，美国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将运河和运河区主权移交给巴拿马；后一条约规定，保证运河永久中立，保证运河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安全，向各国和平通过的船只一律平等地开放。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订是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从 60 年代起，尼加拉瓜人民重新举起桑地诺的旗帜，1961 年成立了以桑地诺命名的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桑解阵”），走上了武装反抗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的道路。1979 年 5 月，“桑解阵”发动全国性起义；6 月初尼加拉瓜又爆发了全国总罢工。6 月 16 日，以“桑解阵”为主的各反对派组成民族复兴临时政府。在革命力量的沉重打击下，索摩查·德瓦伊莱于 7 月 17 日被迫辞职。19 日，首都马那瓜解放，统治尼加拉瓜 40 多年的索摩查家族反动独裁政权终于被推翻。7 月 20 日，民族复兴政府内阁宣誓就职。革命胜利后，尼加拉瓜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桑解阵”为主的多元政治；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并存的多种经济。国家把没收的索摩查家

族的财产作为公有制的基础，同时把私人银行、保险公司和矿山收归国有。在农村实行三种类型的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私人大农场占64.5%）、人民所有制（国营农场，占21.5%）、个体和集体所有制（占14%）。

1970年9月智利举行大选，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运动等左翼政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支持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阿连德吸收共产党人入阁，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和社会改革。1971年11月，把美国资本和其他外资占有的铜、铁、硝石等矿业收归国有。接着，又以征收、接管、征用等形式，将数十家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阿连德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他执政的第一年就征收了1328个庄园。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引起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国内保守派的反对，美国伙同其盟国对智利实行经济封锁。1973年9月11日，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政府被推翻。

80年代开始，拉美地区加快了“政治民主化进程”。一些军人执政的拉美国家推行“民主开放”政策，把政权交给文人政府，还政于民。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军人政府不仅承认政党的合法存在，同反对派对话，而且先后举行大选，把政权和平交给民选政府。这是拉美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具有进步性。

第三节 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

一、东盟的建立与发展

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61年7月，马来亚、泰国和菲律宾成立东南亚联盟。1963年，马、菲因领土争执而中断外交关系，东南亚联盟陷于瘫痪。同年9月，马来亚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1966年马、菲关系好转。为了改变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寻求一条联合斗争、互助自强的道路，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曼谷举行外长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同年8月28—29日，东盟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取代东南亚联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了东盟。东盟的宗旨是通过共同努力，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并促进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东盟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外长会议，每年举行正式例会和特别会议各一次。闭会期间由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下设工业、矿业和能源委员会，贸易和旅游委员会，粮食、农业和林业委员会，财政和银行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文化和宣传委员会以及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东盟的合作计划。1976年成立秘书处，设在雅加达。

东盟成立初期，其活动仅限于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合作。1971年以后，各成员国加强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使东盟逐步形成一个区域性组织。1971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东盟外长特别会议，签署《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吉隆坡宣言》），提出了使东南亚成为“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和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为此，东盟国家于1972年拒绝了关于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要求，1973年又拒绝了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1972年7月马尼拉外长会议确定东盟同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1974—1975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与中国建交。1976年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东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和睦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又称《巴厘宣言》）。会议正式将政治合作列入联盟合作范围，并就经济合作制定具体原则，同时加强了组织上的联系。巴厘首脑会议标志着东盟进入切实加强政治协调和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1977年8月，东盟在吉隆坡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会议重申东盟团结合作的方针，批准扩大区域性经济合作的计划，同意加强东盟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话与合作。东盟在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包括：

第一，工业合作。1976年3月，东盟举行第二次经济部长会议，决定共同投资兴办5项大型工业企业——印尼的尿素厂、马来西亚的尿素厂、菲律宾的过磷酸盐厂、新加坡的柴油机厂和泰国的纯碱厂。菲律宾后将过磷酸盐厂改为铜制品厂。除上述由各国政府主持的共同工业建设项目外，还实行工业互补计划，即由各成员国分工生产同一种产品的各种零部件，借以推进东盟内部的联产互助和工业生产专业化。

第二，贸易合作。主要是通过特惠关税贸易制，促进成员国间的商品流通，互通有无，取长补短。1977年2月，东盟五国外长签订了《东盟特惠贸易安排基本协定》。同年6月，五国经济部长就第一批71种商品实行特惠贸易达成协议。此后特惠商品项目不断扩大，截至1983年已扩大到1.8万项以上。但是，由于东盟各国之间产品碰头，互补性差，因此相互贸易额不大。80年代末，东盟各国相互贸易额约占其贸易总额的18%，而享受互惠的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5%。

此外，东盟在财政、金融以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也加强了合作。

在军事方面，东盟各国积极发展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马来西亚分别同印尼、泰国和新加坡签订了“边界协定”或“安全安排”。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共同签订了边界联合巡逻协定。

1979年越南侵略柬埔寨后，东盟多次召开外长会议，协调在柬问题上的立场。东盟国家支持民柬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赞同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和基本原则。东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的国际影响日益提高。

二、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拉美各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国家要求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共同维护各国的民族权益，争取打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拉美市场的垄断，更有效地发展民族经济。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发展主义理论，强调“拉丁美洲需要一个共同市场”，通过在本地区内部订立自由贸易和共同市场协定来扩大拉美各国之间的贸易，并推动拉美各国的工业化。60年代以来，拉美国国家兴起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运动，以相互减免关税、共同开发资源、成立多国联合企业等多种合作形式，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主要一体化组织有：

第一，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1960年2月，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7国签署《蒙得维的亚条约》。1961年6月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立。到1967年，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相继加入，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经济组织。1980年6月，在墨西哥召开第19次特别会议，决定将自由贸易协会改组为一体化协会。同年8月，11个成员国代表签署了新的《蒙得维的亚条约》。翌年3月条约生效，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取代了自由贸易协会而正式成立。

第二，中美洲共同市场。1960年12月，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在马那瓜签订《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1962年7月哥斯达黎加签署该条约，共同市场遂正式成立。1963年巴拿马成为准成员国。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发生边界冲突，两国中断外交与贸易关系，洪都拉斯宣布退出共同市场。1973年洪回到共同市场。同年8月，五国成立“重建共同市场高级委员会”。1993年10月，中美洲国家总统在第14届地区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新的议定书——《危地马拉议定书》。文件涉及了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建立关税联盟、劳动力和资金自由流动以及货币和金融一体化。文件是对1960年在马那瓜签订的旧条约的突破，成为目前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雏形。

第三，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1967年2月成立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成员国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

第四，安第斯条约组织。又称安第斯集团，为拉美安第斯山地区国家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69年5月，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五国签订《安第斯条约》后正式成立。1973年2月委内瑞拉加入，1976年10月智利退出。阿根廷、美国、英国、日本等27个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在该组织派有观察员。

第五，加勒比共同市场。1973年8月成立。成员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巴哈马、伯利兹、多米尼加联邦、格林纳达、圭亚那、圣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蒙特塞拉特。多米尼加、海地和苏里南为观察员。

第六，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为拉美国家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常设机构。1975年10月，拉美25国代表签署了《巴拿马协议》，1976年6月该协议生效，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正式宣告成立。截至1990年底，参加该组织的拉美国家有26个：阿根廷、巴巴多斯、巴拉圭、巴拿马、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古巴、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智利。总部设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第七，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为拉美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各国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1977年3月，巴西向亚马孙地区有关国家正式提出建立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建议。1978年7月3日，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圭亚那、苏里南、委内瑞拉等8国外长在巴西利亚签署《亚马孙合作条约》，1980年8月条约正式生效，亚马孙合作条约组织遂正式宣告成立。

此外还有1981年成立的东加勒比国家经济组织等。

上述这些组织的一体化程度虽有所差异，但宗旨都是在集体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贸易限制，合理利用各国的自然资源、人力和资金。例如，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立后的20年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960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60亿美元，本国货单和特别货单减免关税商品分别达成11238项和7601项协定；达成一批工业合作协议；建立了支付和信贷体系；制定了地区工业发展政策；签署了海运协议、客运议定书、解决争端议定书等。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成立后，进一步促进了成员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会成员国间的贸易额由1980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93亿美元。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后至1969年，地区内部贸易有较快的发展，95%的商品实行关税互免，对进入该地区的98.4%的商品实行了统一关税。此后由于该地区发生战乱，共同市场出现萎缩。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先后制订了金属和机械工业计划、石油和化工计划、汽车工业计划、钢铁和化肥工业计划等，通过这些共同的工业发展计划，推动了各成员国的工业生产，并在开发资源和提供资金等方面加强合作。1992年1月，安第斯条约组织正式建成自由贸易区。加勒比共同市场积极发展地区内部贸易，除个别商品外均实行免税。内部贸易额从1973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10亿美元。从1979年起实施共同对外税率。1990年第11届首脑会议决定在1994年1月建立统一市场。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后，截至1990年底，举行了16次理事例会和7次特别会议，制订了一系列合作计划，并对当时的国际经济问题确定共同立场。1982年底，13个拉美地区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在利

马集会，讨论地区经济安全战略问题，以对付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解决本地区的外债危机。1984年1月，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拉美30国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参加的基多拉美经济会议，通过《基多声明》和《行动计划》，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和一体化，采取共同行动，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1986年7月，两个拉美大国——巴西和阿根廷签署了一体化协议和加强两国关系的12项议定书，从1987年起两国开始实施互免关税议定书。1990年7月，两国宣布在1994年底前建成两国共同市场。同年8月，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智利又签署了在1995年底前建立南锥自由贸易区的协定。1991年3月，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总统正式签署了建立南锥共同市场的《亚松森条约》。1991年12月里约集团首脑会议提出，拉美国家的最终目标是争取在2000年建成美洲共同市场。

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加强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的增长。60年代，拉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它们贸易总额的6—7%，1989年已达到20%。但是，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不平衡，单一产品制现象仍然存在；外债数额巨大，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土地高度集中，一些国家封建大庄园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和影响。这些问题已成为拉美进一步发展的沉重负担，也将使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三、南南合作的发展

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发展中的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发展中的民族独立国家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多位于地球的南半部，故称这一合作为南南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逐步发展民族经济。但是，它们经济基础薄弱，在经济上仍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发达国家，受制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只有联合起来，加强南南合作，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掠夺和剥削，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独立。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以及面临的共同任务，使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了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1973年10月，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团结合作，进行斗争，从国际石油垄断组织手中夺回了相当一部分石油资源主权和石油价格制定权，第一次显示了南南合作的巨大威力，推动了南南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南南合作于1955年亚非会议上首先提出，60年代开始付诸行动，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60年代前后，出现了许多区域性的、次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原料输出国组织，维护了本国民族利益，促进了区域内或跨区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整体性合作的开始，在国际经济领域内走上全面联合斗争的道路。

70年代，南南合作迅速发展，广泛加强。首先，双边的、跨区域的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并已成为吸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加的全球性运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跨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已遍及亚、非、拉各地区。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建立起一些金融合作机构和多国合营企业；其次，七十七国集团会议和不结盟首脑会议，均把南南合作列为会议主题，规定了南南合作的任务和目标，提出了南南合作的行动纲领。1974

年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为会议起草的《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获得了通过。该文件第一次把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联系起来。1979年2月，七十七国集团第4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和《谈判纲要》，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的关键步骤和促进南北谈判的重要手段。这次会议确定把建立发展中国家全球贸易优惠制、国营贸易组织合作和多国销售企业作为南南合作的优先事项。同年9月，不结盟国家第6次首脑会议通过了《加强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的哈瓦那政策性指导原则》。上述文件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指导性纲领，标志着南南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80年代，南南合作继续向前发展。首先，在世界经济继续恶化和南北对话陷入僵局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明确地把加强南南合作同推动南北对话直接联系起来，积极探寻落实南南合作纲领性要求的具体措施。1981年5月，七十七国集团在委内瑞拉召开的高级会议上通过了《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行动纲领》，就贸易、技术、粮食、农业、能源、原料、资金和工业化等方面的合作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措施。1982年2月在印度召开的新德里磋商会议（又称南南会议），有4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就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利用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协调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南北关系的立场。1983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南南合作会议，有26个国家的68名政治家和学者出席，广泛讨论了南方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南南合作和推动南北对话等问题。同年3月召开的第7次不结盟国家首脑通过的《经济宣言》、《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体自力更生宣言》及《经济合作行动纲领》等文件，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而且阐述了南南合作的方向和原则。其次，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和完善，同时又建立了一批新的经济合作组织。截至1984年，发展中国家已建立了3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和20多个原料输出国组织，设立了13个清算安排和信贷安排。

南南合作的领域涉及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方面，其中贸易合作是重点，取得的成绩也最显著，其他领域则进展缓慢。1970—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贸易额由108.7亿美元增加到1455.7亿美元。同期，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不包括矿物和燃料）在它们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9.4%增加到32%；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在其进口总值中的比重则由72%下降为60.8%。而且发展中国家间贸易的商品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上述期间，食品和农业原料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由32.8%下降为15%，工业制成品出口则从34.6亿美元增加到430.8亿美元，其中机器和运输设备从6.3亿美元增加到135.7亿美元。这一变化有利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南南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独立，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国内外政策不同，加上一些边界纠纷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南南合作的实际进展离现有的纲领和规划尚远。南南合作符合历史的潮流，今后必将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提高和取得更大的进展。

四、民族独立国家间的冲突

亚、非、拉国家独立以来，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领土纠纷，以及民族、宗教矛盾和政治、经济矛盾，地区霸权主义者的扩张和超级大国、帝国主义的插手、挑动等多种原因，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随着亚、非、拉大多数国家陆续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及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这类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日益增多。70年代，它占到该时期发生的各种类型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总数的28.6%。影响最大的有印巴战争、两伊战争、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等。

（一）印巴战争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先后发生过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因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而发生的军事冲突。

克什米尔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其中穆斯林占77%，印度教徒占20%。印巴分治前，克什米尔原为一个土邦，按照“蒙巴顿方案”，它可以自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宣布独立。1947年10月，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武装冲突。同年底，印度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裁决。1948年8月，安理会印巴委员会提出分三个阶段——停火、非军事化、公民投票解决争端的建议，当时印巴双方均表示接受，并分别命令各自部队于1949年1月1日停火。1949年7月划定了停火线。印度占有克什米尔面积3/5、人口约400万的地区，巴基斯坦控制了面积2/5、人口约100万的地区。但双方在非军事化和公民投票问题上陷于僵局。后来，印巴两国为解决争端多次举行会谈。1953年，两国总理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表示争端“应该遵照该邦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确定人民愿望的最实际的方法是举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此后，巴基斯坦一直主张举行公民投票，而印度则以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为由，宣布举行公民投票的原则已不适用。1956年11月，印占克什米尔制宪议会通过宪法，宣称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于1965年8—9月。8月5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非正规军渗入克什米尔。8月24日，印军越过1949年7月划定的停火线，向巴占克什米尔地区挺进。9月1日，巴基斯坦军队组织反击。9月6日，印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至9月8日，印巴双方在既定战场上呈现出互有进退的胶着状态。交战持续到9月下旬，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均未取得明显胜利。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促使双方停火。1966年1月，在苏联政府的斡旋下，双方签署《塔什干宣言》，同意将军队撤退到1965年8月5日前各自的驻地，并宣布“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双方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仍未得到解决。

第三次印巴战争是在印度同苏联在1971年8月签订了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之后不久发生的。1971年11月21日，印度在苏联的支持下，利用巴基斯坦内部东西两翼矛盾激化的形势，出兵东巴基斯坦；12月，战争进一步扩大到西巴基斯坦。12月17日，印巴双方全线停火。原东巴地区正式脱离巴基斯坦，建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1972年7月，印巴两国政府签署《双边关系条约》。

（二）两伊战争

1980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边界争端是导致这次战争的直接起因。

两伊边界长达 1280 公里，南端约 100 公里，以阿拉伯河为界。历史上两伊对阿拉伯河的河界一直持有争议。1937 年两伊签订边界条约，规定阿巴丹港附近一段约 4 英里长的河道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其余以伊朗一侧浅水线为界，河流主权属伊拉克。1969 年伊朗宣布 1937 年条约无效。1974 年初两国发生边界武装冲突。1975 年 3 月，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两伊在阿尔及尔达成重新划定边界的协议。同年 6 月，两国正式签订《关于国界和睦邻条约》。条约规定河界全部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定，伊朗则以撤销对伊拉克反政府的库尔德人的支持为交换条件，并以北部边界 400 平方公里土地作为补偿。但伊朗迟迟未交付补偿的土地。伊朗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一个巨大胜利，而伊拉克则把它看作是敌强己弱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此，边界矛盾并未解决。1979 年伊朗国王被推翻后，伊拉克几次要求修改条约。翌年 4 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宣布要以“战斗收复领土”；9 月 17 日正式宣布伊拉克对阿拉伯河拥有全部主权；9 月 22 日，出动 10 万军队发动进攻，两伊战争爆发。

此外，民族、宗教矛盾也是导致两伊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

伊拉克国内主要是阿拉伯人，伊朗国内主要是波斯人，双方在历史上就有宿怨。两伊境内还都存在着民族纠纷。伊朗与伊拉克交界的胡齐斯坦省约有 200 万阿拉伯人，伊拉克支持这里的阿拉伯人要求平等和自治、反对伊朗政府的斗争，而伊朗则支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活动。

伊朗和伊拉克都是穆斯林国家，但分属伊斯兰教的两大派——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朗 90% 以上居民属什叶派。伊拉克 50% 的居民属什叶派，但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都属逊尼派。霍梅尼执政后，提出“把革命输出到一切伊斯兰国家去”的口号，公开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推翻逊尼派政权。伊拉克则针锋相对，支持伊朗境内的逊尼派，牵制霍梅尼输出“革命”。

两伊战争从 1980 年 9 月至 1988 年 8 月，历时 8 年，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80 年 9 月 22 日至 1982 年 7 月 12 日，战争在伊朗境内进行。1980 年 9 月 22 日，伊拉克对伊朗发起全面进攻。它利用突然袭击获得的优势，至 10 月底夺得伊朗北起席林堡、南至阿巴丹，纵深 30 至 90 公里不等的大片土地。此后至 1982 年 2 月，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战场上出现有进有退的局面。从 1982 年 3 月起，伊朗转入全面反攻，伊拉克被迫退却。6 月 10 日，伊拉克宣布单方面停火；6 月 20 日又宣布在 10 天内从伊朗境内撤回全部军队；6 月底，其军队已基本撤出伊朗。

第二阶段从 1982 年 7 月至 1984 年 3 月，战争在伊拉克境内进行。1982 年 7 月以后，伊朗军队越过边界，频频发起进攻，逼近伊拉克重要港口城市巴士拉。由于战斗激烈，双方损失较大，至 1984 年 3 月底，伊朗攻势基本停止。

第三阶段从 1984 年 4 月至 1988 年 8 月，双方在边境地区互有攻守，并进行“袭船战”、“袭城战”，战争转入长期消耗战。1988 年 4 月，伊拉克军队在法奥半岛发动反攻，接着连续发动攻势，几乎收复了 1982 年 7 月以来被伊朗占领的全部领土。

两伊战争爆发后，联合国、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海湾合作组织及其他一些组织和国家都积极呼吁双方停火，努力疏通调解，并提出各种建议和方案。1987 年 7 月 20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598 号决议，要求双

方立即停火，并立即把所有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争端。1988年夏，两伊战争出现和平解决的转机。7月18日，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伊朗接受安理会第598号决议。8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宣布8月20日为两伊停火日。8月9日，两伊前线已经停火，绵延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结束。

两伊战争使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估计，8年战争中双方死亡100多万人，伤15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9000多亿美元。两伊战争引起了阿拉伯国家新的分裂和改组，并加剧了海湾局势的动荡。

（三）海湾危机

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有长约120公里的陆地边界，其中盛产石油的沙漠地带未划定边界。伊指控科在两伊战争期间蚕食伊拉克领土，在属于伊拉克的鲁迈拉油田南部盗采了价值24亿美元的石油。科认为，鲁迈拉油田南部延伸到科境内，科有权在自己领土上开采石油，并要求阿盟组成一个仲裁委员会，根据科伊现有的条约和有关文件划定两国边界。此外，两国在石油政策和债务等问题上也存在矛盾。

随着伊科争端的激化，两国向边界地区不断增兵。1990年8月2日凌晨，伊出动10万大军、350辆坦克，在大批战斗机和武装直升飞机掩护下，入侵科威特，数小时后进入科首都。科军民奋起抗击，双方激烈交火。8月3日科全境沦陷。8日，伊拉克宣布科威特为它的第19个省。

伊拉克的军事侵略行径震怒了全世界，引起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入侵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应科政府请求举行紧急会议，以14票对0票通过第660号决议，要求伊立即无条件地从科撤军。此后近4个月时间里，针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径，安理会又先后通过了11项决议。其中8月6日通过的第661号决议，决定对伊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8月9日通过的第662号决议，宣布伊吞并科非法和无效；8月25日通过的第665号决议，授权在海湾地区有军舰的国家阻止违反禁运令的船只出入伊拉克；9月25日通过的第670号决议，决定对伊实行空中封锁；11月29日通过的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到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678号决议意味着在必要时允许对伊拉克动武，它实质上是对伊拉克的“最后通牒”。中国赞成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但希望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因此对该决议投了弃权票。

在海湾危机升级、战争危险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危机进行了紧张频繁的调解活动，但未取得进展。由于萨达姆坚持侵科立场，海湾危机终于结上了“死扣”，和平的大门随之关死。1991年1月17日，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终于爆发了。海湾战争历时42天，给伊科两国造成的损失分别为3000亿和2000亿美元。战争还导致科威特大量原油外泻，数百个油井起火，给海湾水域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海湾战争对中东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告诉人们，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诉诸战争是没有出路的。

第四节 中东战争与中东和平进程

一、中东战争

以色列国成立后，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向外侵略扩张，从1948年至1982年，先后与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发生5次大规模战争。

第一次中东战争，亦称巴勒斯坦战争或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向巴勒斯坦移民，夺取阿拉伯人土地。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美、苏、法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家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于1948年8月1日结束，在委任统治结束后的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犹太国面积15850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市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犹太人同意分治决议。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同日，美国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始终未建立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埃及、外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军队展开激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阿拉伯军队节节胜利。5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停火4周的提案。6月11日至7月8日停火期间，以色列扩充了兵员，从美、英和捷克斯洛伐克运进包括飞机、坦克和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和弹药，战斗力得到加强；阿拉伯国家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而削弱了战斗力。停战期一过，以色列首先发动攻势，阿拉伯军队败退。联合国干预下的几次停火，均被以色列所破坏。以色列一度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和黎巴嫩。1949年2—7月，以色列先后同埃及、黎巴嫩、外约旦和叙利亚签订停战协定，划定临时停战线。历时15个月的巴勒斯坦战争结束。以色列通过战争控制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5，即2.07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要多4850平方公里，只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由外约旦和埃及军队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有2/3，即100万人左右沦为难民。

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加快发展民族经济，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法令。英、法等国在一系列破坏阴谋破产之后，企图以武装入侵剥夺埃及人民的民族权利。英、法、以三国首脑在伦敦制订了入侵埃及的计划：以军首先侵入西奈半岛，将埃及军队主力吸引到运河以东，然后英、法占领运河区，切断埃军退路，围歼埃军，推翻埃及政府。

10月29日晚，以色列出动4.5万人的兵力在英、法空军的掩护下，向西奈半岛发动全线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翌日，英、法政府向埃及和以色列同时发出最后“通牒”，借口“保卫”苏伊士运河，要求埃及和以色列停火，从运河两岸后撤10英里，让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各重要港口和军事要塞。在遭到埃及拒绝后，31日，英、法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等埃及城市以及机场和交通线。11月5日，英、法空降部队侵入塞得港和富阿德港。6日，英、法海军陆战队在塞得港登陆。埃及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侵略者。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得到阿拉伯国家和许多亚非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同情和支持。苏联政府表示要用军事力量援助埃及。美国企图趁机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因而带头在联合国拆英、法的墙脚。11月1日，美国在联合国紧急大会上抛出了一个立即停火的提案。2日，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这个提案。在埃及人民英勇抵抗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加上美、苏的压力，英、法、以三国政府被迫于11月6日宣布停火。11月7日，联大紧急会议通过亚洲国家提案，要求英、法、以侵略军撤出埃及。12月22日，英、法军队全部撤出；1957年3月，以色列军队撤出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英、法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后，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大大削弱。美国便乘机打入中东，试图填补中东出现的所谓“力量真空”。苏联也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手段不断向中东渗透。1964年6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同年底，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发动了反对以色列的武装斗争。苏联通过提供经费、装备、派遣教官帮助训练等方式支持并插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为对付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发展，美国则进一步武装以色列。美苏在中东争夺的加剧，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国际背景。

以色列不甘心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一直在加紧扩军备战，策划新的侵略。60年代中期，它不断在边界地区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以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面对以色列的战争挑衅，埃及政府于1967年5月22日宣布封锁埃及领海范围以内的蒂朗海峡，不再允许以色列运送战争物资的船只通过。以色列宣称，埃及的行动是“对以色列的侵略”，扬言将用军事力量打开亚喀巴湾。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突然袭击，偷袭开罗、苏伊士运河区和西奈半岛的埃及十几个机场、导弹基地和雷达站。埃及300多架飞机在机场被炸毁，空防能力遭到严重破坏。以色列掌握了制空权后，发动了地面攻势，6天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加沙地带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5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6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双方立即停火的决议。7日和8日，约旦、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同意接受停火。以色列在9日也表示接受停火，但直到10日晚占领了戈兰高地大片土地后才停止进攻。1967年11月，安理会通过第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在这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但以色列拒绝执行。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十月战争。为了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地和打破美苏制造的中东“不战不和”局面，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发动对以色列的进攻。是日下午2时，埃及军队对盘踞在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占领军发起突然袭击，地面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摧毁了被以色列吹嘘为“不可逾越”的“巴列夫防线”，收复运河东岸地带，但未能突破以军第二道防线。以军趁机从大苦湖地区渡过苏伊士运河，占领大苦湖和苏伊士湾西岸地带，对埃及军队形成包抄之势，摧毁了埃及在运河西岸的机场和导弹基地。苏伊士城和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军被以军围

巴列夫防线：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在运河东岸构筑的一个以当时的以军总参谋长名字命名的防御体系。

困，蒙受巨大损失。在戈兰高地战场上，最初叙利亚军队突破以军防线，包围盘踞在库奈特拉的以军。后以军占领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线，将戈兰高地占领区又扩大 600 平方公里。

在十月战争中，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以石油为武器，采用提价、减产、禁运、国有化、增加本国股权等措施，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石油斗争，以配合埃、叙前线国家的战斗。10 月 16 日，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伊拉克、阿联酋以及伊朗等国决定提高原油市场价格 17%。翌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会议又决定，以 9 月份各成员国的产量为基础，每月递减 5%，并依据各石油进口国对这场战争的不同态度，将它们分为“友好”、“中立”、“不友好”三类国家，在石油供应上采取区别对待。10 月下旬，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荷兰实行了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斗争不仅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政治上分化了西欧、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在十月战争中，一些西欧国家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允许美国供应以色列军火的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利用它们的运输设施。西欧共同体和日本还于 11 月相继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退，表示了不同于美国的看法。

1973 年 10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338 号决议，要求双方立即就地停火，停火后立即开始全面执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先后在 22 日和 24 日宣布停火。以色列虽然在 22 日也接受了停火，但在此后几天里继续实行了一连串的进攻。26 日，联合国派遣的国际和平部队到达运河区。根据 1974—1975 年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分别达成的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埃及收复了苏伊士运河东岸 28—30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叙利亚收复了戈兰高地的部分地区，在埃、以和叙、以控制线之间设立了缓冲区，由联合国部队驻扎。但是，以色列仍然霸占着它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所占领的大部分领土。

第五次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有人称其为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 年 6 月 6 日，以色列以“巴解组织”派人刺伤其驻英大使为借口，出动军队 6 万余人，大举入侵黎巴嫩。6 天内，以军深入黎境约 90 公里，占领了黎 1/4 的领土，攻陷了巴解组织 14 个营地，摧毁了叙利亚部署在贝卡谷地的导弹基地。6 月 14 日起，以色列集中兵力围攻巴解组织总部所在地贝鲁特西区，切断巴解组织总部和 1 万多名游击队员同外界的联系。8 月 18 日，黎巴嫩政府通过了里根特使哈比卜提出的“和平解决贝鲁特问题的方案”。巴解组织被迫接受这一方案，于 8 月 21 日至 9 月 1 日分 15 批将 1.2 万名巴解战士撤离贝鲁特，分散到伊拉克、约旦等 8 个阿拉伯国家。在此期间，叙利亚部队的 2500 人也撤离了贝鲁特。9 月 14 日，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暗杀。以色列以此为借口于 9 月 15 日占领贝鲁特西区，并于 9 月 18 日与基督教民兵配合杀害了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 2000 多名无辜平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贝鲁特大屠杀事件。这一事件激起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以军不得不于 9 月 19 日撤离贝鲁特西区。1985 年 1 月，以色列内阁在内外压力下，决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6 月撤军基本完成。

二、中东的和平进程

在长期的阿、以对峙和前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蒙受巨大损失，人民普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继续坚持武力手段，不仅难以恢复失地，而且难于从事经济建设，并会日益陷入依赖苏联的境地。他还认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具有比苏联更大的发言权，因此转而采取与美国靠近，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阿、以冲突的方针。

1974年埃及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1976年3月埃及废除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1977年11月，萨达特提出中东“和平倡议”，并亲自访问耶路撒冷，开始了埃、以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1978年9月，在美国倡议下，美、埃、以三国首脑卡特、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谈。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个文件。在美国的推动下，1979年3月26日，萨达特和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及3个附件，美国总统卡特作为连署人也在和约上签字。和约及附件的主要内容有：埃、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正常的关系，包括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以色列的军队和文职人员在3年内分阶段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对西奈行使全部主权。和约的序言指出：“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在中东建立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表示“邀请中东争端中的其他阿拉伯各方，同以色列讨论在中东建立全面和平的问题”。1980年2月，埃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到1982年4月，以色列军队撤离西奈半岛，但拒绝交还亚喀巴湾南端的塔巴地区。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埃及于9月召回驻以大使。1984年佩雷斯任以色列总理后，埃以关系开始松动。1986年9月佩雷斯访问埃及，埃以双方就塔巴争端提交国际仲裁问题达成协议。1988年9月，国际仲裁委员会宣布，确认“埃及对塔巴的历史、法律权利”。翌年3月，以色列撤离塔巴，埃及收回包括塔巴在内的整个西奈领土。

埃以单独媾和引起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强烈不满。围绕对待埃以和谈和戴维营协议问题，阿拉伯国家分裂为两派：叙利亚、利比亚等组成“阿拉伯拒绝阵线”，反对单独媾和，坚持武力解决的方针，被称为“拒绝派”；沙特阿拉伯等国虽不同意单独媾和，但不反对依靠阿拉伯团结的力量同以色列达成全面公正的政治解决，被称为“温和派”。埃以缔结和约后，埃及遭到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制裁。阿拉伯国家联盟撤销了埃及的会员资格，17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开始策划暗杀萨达特的阴谋。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庆祝十月战争8周年的阅兵式上被枪杀。穆巴拉克总统执政后，主动改善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至1989年底，已同除利比亚外的所有阿拉伯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1989年5月，埃及恢复了阿拉伯联盟成员国资格。穆巴拉克总统主张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积极倡议召开由中东争端有关各方和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中东国际会议，认为这是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最佳途径。

进入90年代，中东和平出现了新的突破。1991年10月，对峙近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各方一起走到马德里谈判桌前，开始进行和谈。中东和谈，形成了大气候。1992年7月，以色列工党上台执政。阿以双方审时度势，各自调整了和谈的方针策略。1993年初，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始进行秘密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就以色列从其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撤军，由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实行自治，以及巴以互

相承认达成协议。1993年8月29日，巴解组织准备修改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权利的宪章。8月30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加沙、杰里科先行自治方案。9月9日，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互致信件。阿拉法特在信中宣布：巴解“承认以色列国在和平安全中生存的权利”，“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拉宾宣布：“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并开始在中东和平进程的范围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9月13日，阿拉法特和拉宾签署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协议——巴勒斯坦有限自治原则宣言。

巴以协议的签订不是偶然的，它是形势所迫和双方的实际需要。首先，由于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使制约中东事态发展的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大气候已经形成。第二，以色列几十年来一直和阿拉伯人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被占领土人民反以斗争此起彼伏，使以色列长期不得安宁，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困难，外交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特别是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猛发展，成为当前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以色列必须调整战略，以土地换和平已成为以色列的最佳选择。况且加沙地带贫瘠落后，放弃这块占领的土地和杰里科城，实际上是丢掉了一个包袱。第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识到以色列的存在已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用战争手段收复被占领土已不可能。同时在黎巴嫩战争，特别在海湾战争后，巴解内部矛盾加重，财源枯竭，实现巴以和解将给巴解带来转机。

巴以协议的签订是中东事态的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发展，是中东和平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它必将对阿以关系和整个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第十五章 7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旧国际格局的瓦解

第一节 旧国际格局的动摇与美苏争霸态势的演变

一、美苏战略地位的变化

世界经历了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的动荡、分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已显著不同于战后初期。

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二战后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特别是自60年代初就开始深陷侵越战争。1961年上台的肯尼迪总统认为，印度支那是“遏制”与战胜共产主义的试验场，因而积极推行侵越政策。美国先是以派遣军事顾问为名进行所谓“特种战争”，继而在1964年8月制造“东京湾事件”，开始对越南北方的狂轰滥炸，并且自1965年3月起开始实现战争“美国化”，将“特种战争”升级为“有限战争”。到1967年底侵越美军超过50万大关。到1970年美国在越南投掷的炸弹数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使用的炸弹数量的总和，耗资达3000亿美元。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越战越败。美国国内民怨沸腾，矛盾尖锐。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构成了美国霸权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挫折。美国国力的鼎盛时期到60年代末终于告一段落，而所面临的是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巨额的战争费用，使财政赤字逐年增大，到1968年已累计达605亿美元，对外贸易状况也开始显露出由盛而衰的迹象。西欧、日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美国对日本、西德、加拿大的贸易已由出超转为入超。美元危机频频发生，地位一落千丈。

西方阵营中原来依赖美国援助和扶持的法国、西德、日本等国，经济发展速度均高于美国。到1970年共同市场6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进而追赶美国。60年代下半期的日本，正处在以急剧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为特征的阶段。相比之下，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由1948年的54.6%降为1970年的37.8%，下降了16.8个百分点。在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西欧、日本与美国展开了日益剧烈的贸易战和货币战，政治方面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强。

在美国国力相对削弱的过程中，苏联加紧发展自己的实力。苏联的经济力量，由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上升到1970年的60%左右，在军事方面，美苏力量对比开始出现明显变化。1969年年中，苏联洲际导弹增至1060枚，赶上了美国。苏联还在60年代末开始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走到了美国前面。长期处于核优势的美国第一次面临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均衡的局面。不仅如此，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还建成了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远洋海军。这一切，使美国日益感到苏联已成为“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美国遇到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组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1976财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军事态势报告》，1975，第12页。

理查德·尼克松1977年7月6日在堪萨斯城的讲话，引自《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第77页。

成了占世界人口近 3/4，占世界面积近 2/3 的第三世界。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控制着战略要地，占据着联合国 3/4 的席位。他们对国际事务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影响，并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力军。

面对整个国际格局及美苏争霸战略地位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大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二、尼克松主义的提出

1969 年 1 月尼克松入主白宫。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保住已有的霸权地位，美国提出了一整套新的对外政策方针。

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松在关岛谈到了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他说：“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是着重强调下列两点的时候了：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外，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

这就是尼克松的“新亚洲政策”，后来很快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

为了进一步澄清尼克松主义的含义，1970 年 2 月 18 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中说：“尼克松主义”的“中心主题是：美国将参加各盟国和朋友的防务和发展活动，但是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制订全部方案，拟订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负起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只有在我们的帮助真正起作用，而且被认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以帮助。”这样，尼克松实际上把对亚洲政策的原则推广为美国的全球政策。他还提出“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作为“新的和平战略”的三大支柱，进一步扩展了尼克松主义的内容，使之成为不仅规定美国的海外义务及其与盟友的关系，而且规定对苏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1971 年 7 月 6 日，尼克松又在堪萨斯发表讲话，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政策考虑。

尼克松在讲话中承认国际战略格局已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而是有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美国的地位与二战结束的初期相比，已不再处于十分突出或完全占支配的地位。美国要在国际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就必须对对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根据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构想，尼克松政府首先急于在保全美国面子的情况下从越南脱身。在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越南化”计划失败后，终于在 1973 年 1 月 27 日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同年 3 月 19 日，美军全部撤出越南。其次，主动采取行动，谋求同中国对话，拿同中国接近这张牌压莫斯科，并使中苏都不得不向美国作

理查德·斯特宾斯与伊莱恩·亚当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8—1969》，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1972，第 333 页。

尼克松：《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争取和平新战略》，南京大学《美国对外关系：二百年美国对外政策文选》，1976，第 199，201 页。

尼克松在 1971 年 7 月 6 日在美国堪萨斯城的讲话。

出让步与妥协。第三，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在保持同苏联激烈争夺的同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谋求与苏“对话”，试图用军控协议限制苏联扩充军备，用满足苏联某些要求的经济协议，换取苏联克制扩张行动。第四，重新调整与西欧、日本的关系，1974年6月，同北约盟国共同发表《大西洋关系宣言》，强调经济合作和美国不再对西欧“共同市场”抱反对态度，强调西方防务不可分割，美国也不再反对英、法独立的核力量，使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日本，则于1969年11月签订美日《归还冲绳协议》，从而开始了被尼克松吹嘘的美日关系的“新纪元”。

三、苏联的全球积极进攻战略

在美国对外战略态势由攻转守的同时，苏联则恰恰相反，由守势转为攻势。1964年上台执政的勃列日涅夫的主要战略目标，已不再是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而是逐渐形成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积极进攻战略。虽然，70年代苏联经济已开始出现“停滞现象”，但苏联领导人盲目乐观，我行我素。

勃列日涅夫的积极进攻战略有两根支柱，一是力争军事优势的军事战略，二是麻痹西方的缓和战略。

在军事战略方面，其指导思想是，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局部常规战争。强调“进攻性”和“先发制人”、“突然打击”。苏联的战略导弹至1975年已达2402枚，超过美国40%。1979年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开支几乎为美国的3倍。苏联还大大增强了常规力量，并进一步加强全球性军事部署，强化华约组织，设立远东战区司令部。在第三世界抢占战略要地和攫取军事基地使用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亚、非、拉共攫取20多个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

在推行“缓和战略”方面，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1971年，他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六点“和平纲领”，宣称要把缓和放在7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他发动和平攻势，竭力软化西方的对苏立场，调动和扩大美国与西欧的矛盾，最后把美国势力排挤出西欧；同时通过缓和，解决战后欧洲的一些遗留问题，打破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的僵局，导致西方对战后东欧现状的承认；此外，利用缓和，引进西方资金技术，获取经济实惠。

70年代，苏联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由于西线欧洲处于一时难以有重大改变的对峙状态，东线押在越南身上的赌注一时也难以收效，苏联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南线，特别是以“欧洲的软腹部”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主要扩张方向，同时进一步打入连结东西两个地区的中心环节——南亚次大陆，控制南下印度洋的战略通道。苏联对外扩张主要采取的手法有：通过军援、经援进行渗透，通过签订各种“友好”、“合作”条约进行控制；通过扶持代理人乃至直接出兵进行侵略。先是重点经营埃及，1971年5月签订苏埃友好合作条约，提供50亿美元经济、军事援助，派遣军事专家顾问达18000多人。继而又把叙利亚选作立足点。在南亚地区，把阿富汗和印度作为其亚太战略和南下战略的两根支柱。1979年入侵阿富汗。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激化后，苏乘机加紧向印度输出军火，至1980年，苏联提供的武器已占印进口

1976年3月埃宣布废约。

武器的 66%。

在非洲地区，70 年代中、后期，在安哥拉民族解放组织间制造分裂，支持“人运”以反对“安盟”和“解阵”，并把大批古巴军队运进安哥拉，扩大安哥拉内战。在非洲之角，大力支持埃塞俄比亚，1978 年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在埃的军事专家顾问达 2000 多人。及至 70 年代末，以苏联出兵阿富汗及支持越南侵柬为标志，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发展到了顶峰。而这恰恰成了苏联进一步陷入内外困境的标志。

四、70 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与欧安会的召开

由于美国的尼克松及其后继者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都在寻求缓和，这就导致了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东西方缓和局面的出现。经过美苏两国首脑的频频互访和举行会谈，特别是欧安会的召开达到高潮。谈判中包含对抗，缓和中不忘争夺，乃是美苏“缓和”外交的特色。到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缓和”告一段落。这在美苏关系史上被称为“第一次缓和”。

从 1969 年 11 月起，美苏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会谈。1972 年 5 月 22 日到 30 日，尼克松到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并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这是战后第一个美国总统对苏联的访问。会谈结果，双方签署了《美苏相互关系原则》等 9 个文件。双方保证尽力避免军事冲突，防止核战争，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会谈中，双方最关心的是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最后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导弹系统协定》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双方战略核力量保持了大体的均衡。同年 10 月，美苏签订了贸易协定。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这次会谈，标志着东西方关系进入缓和 high 潮。197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又在美国举行第二次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农业协定》等 13 个文件。《基本原则》规定，双方进攻性核武器可以“现代化和更新”，给双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核武器留下很大余地。

1974 年 6—7 月间，尼克松再次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等文件。这次会谈后不久，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

福特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尼克松主义”，仍把“缓和”作为对苏政策的首要问题。1974 年 11 月，福特在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工作会谈”。双方发表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共同宣言。1975 年，美苏就苏联购买美国谷物的交易达成协议。第二年又达成美国向苏联进口石油协议，美苏“缓和”的经济色彩逐渐加强。据统计，1969—1976 年美苏贸易额增加了 10 倍。

卡特政府对苏联推行的仍是“缓和战略”，但其策略又有所发展变化。他上台伊始，在就职演说中就为人权外交定下了基调。他曾多次提出“人权已经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主题”，“尊重人权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为扩大影响而进行的和平斗争中最重要的优势。”可见，他是企图在遵循缓和路线的同时给这种外交添加上“人权”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成分，由被

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5，第 167 页。
同上，第 175 页。

动转为主动。

在美苏两国“缓和”外交的推动下，1972年11月，33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的大使在赫尔辛基开始举行“欧安会”筹备会，以后又开了多次会议，最后于1975年7月3日—8月1日，35国首脑在赫尔辛基举行正式会议，签署了《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宣言》。欧洲大陆一度吹起了“缓和”之风。

五、从僵硬对抗到第二次缓和

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担任美国总统，1985年连选连任执政至1988年。里根上台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一套“以实力求和平”的新的“遏制”政策。

里根一再强调，面对苏联“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西方文明”进入了“最危险的10年”，美国在抵御苏联扩张方面是“唯一能够担任领导的国家”，因此要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重新夺取军事优势，使美国具备同苏联打各种形式和各种规模战争的能力。他制定了大规模扩充军备的计划，并于1983年3月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他企图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这一计划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大大提高核威慑力量，又带动美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还可造成对苏联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压力，从而拖垮苏联。

除军事实力外，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还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和情报等各种手段的应用。里根主张同苏联对话、谈判，但谈判原则是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谈判不断对苏联施加压力。里根当局还特别强调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1982年6月，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正如它曾经将其他压抑人民自由、禁止人民表现自我的暴政弃置一样。”里根发表演说后，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一次所谓研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运动的会议。国务卿舒尔茨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说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根本所在，公开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等“共产国家内”的“和平演变”上。

“里根的第一届任期，是美苏关系20年来的谷底。”美苏双方唇枪舌战，关系十分紧张。

但是及至1985年里根第二任期开始，特别是1987年以后，美苏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被认为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即第二次缓和时期。美苏关系由以军事竞赛和对抗为主进入了以综合国力较量和对话为主的新时期。

美苏关系的这一调整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也有其政治思想背景。

苏联由于其与美国的全球争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自70年代中期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和陷于停滞，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同美国的差距出现重新拉大的趋势。特别是1979年底苏联发动的侵阿战争，到1987年，累计伤亡人数达3.5万，耗资达400亿美元之巨。面对严峻的现实，1985年

《中美月刊》第27卷，1982年7月，第4页。

《中国时报》（美国出版），1982年10月20日。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斯特罗伯·塔尔伯特著：《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21页。

3 月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以军控为中心的全球缓和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是要为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创造和保持一个宽松的外部条件，主要内容体现在他的对外战略的“新思维”上。他强调在核对抗时代必须用“新的政治思维”来取代“过时的”传统观念。他提出核时代“人类生存高于一切”；核战争“不会有胜者”，主张“和平共处在今后，特别是在核时代，已经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不把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国人民当作敌人来对待”等等。尽管他提出抛弃勃列日涅夫、否定有限主权论和“革命输出论”等，在实践上为改变过去霸权主义做法和为争取实现缓和做了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他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恰恰迎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需要。

从美国方面来说，80 年代初里根提出“重整国威”后，大规模扩充军备，同苏联紧张对抗。为此也背上了军费开支负担的沉重包袱。从 1981 到 1987 年的 7 年里，美国共花去军费 2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要继续同苏联对抗和扩充军备，显得力不从心。正如美国专栏作家哈施所说，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处于需要从冷战的代价和紧张中缓口气的境地”。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全球缓和战略和“新思维”与美国的需要一拍即合。

美苏关系的新的缓和时期具体表现是，第一，1987 年以后，美国明确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第二，由不愿同苏联达成重大裁军协议，不给苏联喘息时机，变为愿意作重大裁军交易。1985 年 11 月和 1986 年 10 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先后在日内瓦和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军备控制问题举行了两次会晤。1987 年 12 月 8 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签署了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尽管这个经过两国 6 年多艰难谈判而签署的条约，只占美苏两家核武库的 4% 左右，但它终究是自出现核武器以来达成的第一个削减核军备的协议，并且是美苏之间第一次就消除整个一种类型的导弹达成协议。两国还就战略武器削减 50% 举行了多次会议。第三，美国改变了用阿富汗和柬埔寨两场战争消耗和孤立苏联的做法。不断声称，美国无意将苏联拖在阿富汗，愿意与苏联寻找“共同点”，政治解决阿、柬这两个“热点”问题。从 85 到 88 年的 3 年里，美苏两国在扩大双边接触、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签订了 43 个双边协议。总之，1987 年以来，美苏关系以中导协议为契机，进入一个有限缓和时期。

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缓和”也加强了“和平”与人权攻势。1986 年 3 月，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露骨地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1987 年美国等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关于东西方关系》的声明，强调“我们有义务探索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权的社會。”大批美国和西欧的政客文人则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预示 1999 年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更有的向美国当局献计献策，鼓吹美国要利用缓和的条件，抓住机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第二节 美、日、西欧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

一、西欧独立自主倾向的日益加强

西欧 6 国共同体的出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1973 年 1 月 1 日，英国、丹麦、爱尔兰正式成为共同体的新成员国，共同体由 6 国扩大为 9 国。其成员包括了所有西欧大国。继而，1981 年 1 月 1 日希腊、1986 年 1 月 1 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共同体正式成员，共同体增至 12 国，拥有 2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3 亿以上的人口。1986 年共同体的年国民生产总值高达 2.6 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4，近与美国相等，大大超过苏联和日本。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 40%左右，每年出口总值约 6350 亿美元，进口总值年均 6730 亿美元，均为美国的 3 倍多，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实体。

随着欧洲共同体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增强和政治一体化的不断进展，它要求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1981 年 10 月，共同体 10 国外长伦敦会议认为，共同体国家在国际上不但要使别人听到共同体成员国的声音，而且要积极干预事态的发展。1983 年 6 月，斯图加特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言》，表示将加强外交政策合作，在外交上力争用一个声音说话。宣言表示要继续为建立一个“欧洲联盟”而努力。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已经明白，欧洲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欧洲共同体代表西欧，已成为西方世界美、欧、日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并有希望发展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欧对美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在维护美欧联盟的前提下，增强西欧的独立自主。通过北约，通过美国在西欧的驻军和核武器来“保护”西欧安全，40 多年来成为西欧根深蒂固的安全观念。在这方面，西欧十分不愿意看到欧美“脱钩”局面的出现。但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却越来越强烈。1974 年 6 月 26 日由共同体 8 国（爱尔兰除外）和美国在内的北约 15 国首脑签署了《北大西洋关系宣言》。除美国重申对保卫北大西洋地区的义务外，宣言强调了“友好平等和团结的精神”以及“保持密切的磋商、合作和相互信任”，这是共同体国家同美国开始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主要标志。在经济领域，双方既相互依存又激烈竞争，且后者变得越来越突出。1973 年 9 月，由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起在东京开始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第 7 次关税减让谈判（又称“尼克松回合”或“东京回合”），由于各方分歧很大，到 1979 年 4 月才达成协议。1987 年《欧洲一体化文件》正式生效后，美国明确表示这“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认为这将是“拒美国商品于国门之外的欧洲堡垒”。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莫尔说：“如果欧洲共同体的计划成为保护主义的产物，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将危在旦夕。”目前欧美一些人士已在谈论战后美欧关系正出现新的局面。这不仅可能加剧美欧之间由来已久的贸易摩擦，甚至可能对美欧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关系产生某种影响。

共同体在处理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上有别于美国。西欧坚持认为，同苏联相处，不能长期依靠军事力量进行对抗，而是要发挥西欧技术资金的优势，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维持和平局面，减少战争危险。此外，西欧通过与苏联关系的改善，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从 70 年代“缓和”政策中尝到了“甜头”。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占西欧全部出口的 7%，

而美国只占 2%，西欧有 200 多万个工作岗位与对苏联、东欧的出口有关。西欧对苏战略，一句话，就是“防务加缓和（包括经济合作）”，而更侧重缓和。当然，由于西欧与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等方面基本一致，又有联合对付苏联，特别是对苏联东欧各国施加压力、影响的共同需要。

自 70 年代以后，西欧逐渐向第三世界靠拢，重视发展和改善同第三世界的经济与政治联系。1975 年 2 月，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 46 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 37 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多哥的首都洛美签订了为期 5 年的经济、贸易协定，即《洛美协定》。这是西欧推行“对话与合作”政策的一个“典型”。洛美协定规定：共同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条件下，允许 46 国的全部工业品和 94% 农产品免税和不限量化地进入共同市场；共同体提供一笔基金，用以补偿这些发展中国家因原料价格下跌或自然灾害而遭受的损失；5 年内共同体向上述国家提供 39.9 亿欧洲计算单位的经济援助，其中赠予的比重有所增加。第一个《洛美协定》期满前，1979 年 10 月共同体又同非、加、太地区国家签订了第二个《洛美协定》。1984 年又签订了第三个《洛美协定》。

《洛美协定》是世界上范围最广泛的多边经济和贸易协定。从本质上看，西欧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中依然存在着剥削和不平等现象，但这种合作对双方无疑都还是有益的。在第三世界眼中，美国是个称霸的超级大国，日本是个只图赚钱的经济大国。同它们比较起来，欧洲共同体算得上是个比较开明的富国集团，所以愿同西欧发展合作。面对美、日在科技、经济方面的挑战，第三世界对西欧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外交

日本经过 60 年代的高速发展，到 70 年代初，已一跃而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8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10%，相当于美国的 44.6%，1986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 19585 亿美元，海外净资产达 1804 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1987 年，世界最大股票市场也由纽约转移到东京。到 1983 年，日本的汽车、造船、电子计算机、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随着经济力量和国力的增强，日本对外政策思想也发生变化。它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视为其基本方针，一步步走向大国外交。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对日本搞越顶外交，成了日本外交发生转变的直接导火线。7 月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改变了一贯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外交政策，提出了在国际格局出现多极化的情况下，采取“多边自主外交”的方针。除了同美国继续保持密切关系外，还主张同世界上其他战略力量和中苏等进行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交往。1972 年 9 月，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同年 10 月，日本和苏联开始谈判缔结和约问题，但由于北方四岛领土的争端和苏联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双方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1978 年福田内阁提出实行以日美合作为轴心的“全方位外交”，并于 1978 年 8 月同中国签订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

自 80 年代初开始，战后日本外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一转折的总方针体现在 1979 年大平首相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之中。这一战略的含义是，今后世界上构成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包括经济封锁、世界资源、动乱、贸易、货币、债务等综合因素，因之对付威胁的力

量和手段也应是综合的。80年代日本历届内阁均从这一战略思想出发，开展对外活动，从而使之成为日本推行大国政治的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日本在80年代提出了三个口号。第一个是“科技立国”和“文化立国”。不仅把技术作为确立政治大国的手段，同时通过传播日本文化，扩大日本的影响。第二是“战后政治总决算”。其基本思想是要创造一个“日本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鼓吹民族自豪感，使日本“堂堂正正”地走向国际社会。第三是“国际国家”。1983年8月，中曾根首相把“政治大国”改称“国际国家”，实际上是“政治大国”的换一种说法。其实质仍是推行“综合战略”，在全球确立“与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地位”。

80年代以来，日美经济摩擦加剧，进入“综合摩擦”时期。由于日本大量购买美国资产，到80年代末，“美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楼和美国的灵魂——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成为日本囊中之物，洛杉矶城市商业区的1/4也已归日本所有，日本已控制着美国银行资产的10%。这些都深深刺伤美国公众的自尊心。到80年代末，日美商品性对抗在美国上升为国民感情上的对抗和日美国家之争。1989年代表日本统治阶层中“鹰派”观点的《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一书出版，书中竟把战后美国在日本的存在形容为“看家狗简直变成了疯狗”。美国大多数人则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比苏联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威胁”。有的甚至说“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最大的威胁来自另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即日本”。美国还于1988年7月秘密举行了以日本为假想敌人的军事演习。当然，由于日美经济又有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一面，双方战略上也有共同利益，因之整个80年代两国摩擦中也有协调，“日美同盟”关系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轴。

为了推行“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主要精力则放在亚太地区，搞经济扩张、政治渗透。1980年1月，大平首相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正式提出了“环太平洋构想”。1982年6月铃木首相提出了“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五原则，主张太平洋应成为“和平之海”、“自由之海”、“多样之海”、“互惠之海”、“开放之海”。

日本提出这一构想，是同这个地区经济的增长、贸易往来的扩大、相互依赖的加深分不开的，也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尽管80年代这一构想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始终担心“大东亚共荣圈”借尸还魂，担心再受支配和控制，况且日本日益增长的大国主义情绪和经济政策上的“本国中心主义”，均为亚太其他国家所反感，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推行，不可能一帆风顺。

三、美元霸权地位的丧失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

战后初期建立的由美国领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当时美国的绝对优势的经济地位为基础，同时也是因为美国愿意并且能够向其他大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条件和体制。这些条件和体制包括，稳定的美元和国际货币制度，美国为此提供黄金储备保证；开放的美国市场和国际贸易制度；保障廉价的石油供应。

但是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已经成为一明显事实。继1960

该书作者是（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见该书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第24页。

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8，2，25，诺曼·卡曾斯文章：《日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

和 1968 年两次美元危机之后，70 年代初美元地位更加不稳。而且这时又多了一个新的不利因素，即 1971 年出现了美国自 1893 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于是 1971 年 5 月又发生了美元的第三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也无力继续履行它原先在货币、贸易方面承诺的义务，拒绝承担稳定美元的责任并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尼克松政府为了改变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刺激美国产品出口，1971 年 8 月宣布全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 10% 的附加税。1971 年 12 月与 1973 年 2 月，美国政府被迫两次宣布美元贬值。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纷纷采用浮动汇率，不再承担维护本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义务。至此，战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终于瓦解。这是美国经济霸权急剧衰落的重要标志。在这种情况下，西欧、日本不能不各行其是，更加地依靠自身力量和主动性来对付动荡的世界经济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世界不可避免地逐渐形成美国、西欧、日本三个中心。

进入 80 年代，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过程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但趋向仍然是明显的。1981 年里根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和“复兴经济”两大目标。尽管 1989 年里根辞别白宫前一些美国学者赞扬里根政府在加强美国实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事实是，在决定美国国际权力中心盛衰的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和市场控制能力三项关键性经济实力上，在 80 年代都发生了对美国极为不利的变化。

80 年代美国丧失了在高科技领域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强国，但是它的许多高技术已开始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美国五角大楼国防科学局 1989 年 3 月发表的报告承认，在 22 项超先进技术中，美国已有 6 项落后于日本。从 1980 年到 1986 年，美国半导体产品占世界半导体产品市场的比重已从 61% 降到 43%，而日本所占比重则从 26% 上升到 44%。在 80 年代初以前，美国技术产品贸易年年都有巨额顺差，但 1986 年美国第一年出现逆差。

80 年代美国金融实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它在 1985 年从 1914 年以来首次沦为净债务国，而且是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沦为最大的债务国。

至于 80 年代美国市场控制能力也迅速缩小。美国的世界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地位被西德所取代。

上述事实都说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主义地位已进入一个难以逆转的衰落时期。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已由美国独霸局面向美国、西欧、日本三极相互抗争的局面转移。

由 70 年代初开始逐渐形成的美国、西欧、日美三足鼎立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下去。

第三节 第三世界反霸斗争的进一步 增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一、第三世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南北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以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却仍然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方面仍然起着垄断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操纵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国际信贷、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各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支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困难。

针对上述情况，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领域内的反霸斗争，集中在要求改革旧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上。

进入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起了主动进攻。在石油输出国组织 1973 年运用石油武器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的鼓舞下，第三世界国家推动联合国于 1974 年 4 月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三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同年 12 月，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几个纲领性文件，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霸权主义发起有力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宣言》指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体系。”“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宣言》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行动纲领》则确定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目标。主要包括：各国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打破国际商品市场的垄断，确保和稳定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反对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有的货币制度，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商品交换方面的不合理关系，等等。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促使北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一系列对话。1975 年 12 月，“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又称“南北对话”）在巴黎举行。参加会议的有 19 个发展中国家和 8 个工业化国家或集团。经过第三世界的努力，会议决定成立能源、原料、发展和财政 4 个委员会，具体研究双方的合作问题。1977 年 5 月再次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决定建立稳定原料价格共同基金和给最贫穷国家 10 亿美元的特别援助。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南北对话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为了打破“南北僵局”，七十七国集团于 1979 年在第三十四届联大提出将能源、原料、贸易、发展和金融五个领域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根本性国际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大会为此作出决定，在 1981 年底或 1982 年初举行全球谈判。由于发达国家态度僵硬，会谈未能如期举行。1981 年 10 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了有 8 个发达国家和 14 个发展中国家首脑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北对话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谈，为改善南

北关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这场“破旧立新”的斗争触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前进道路必然是艰苦而曲折的。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对发展中国家依赖相对减弱，而发展中国家却在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更有求于发达国家的形势，力图置发展中国家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特别是美国，自恃强大的经济实力，顽固坚持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一贯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合理要求采取僵硬立场。里根政府一方面宣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主要由他们自己负责；另一方面又称，搞好美国经济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所能做的最大贡献。规避它对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应负的责任，根本否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损人利己的经济政策，使第三世界经济陷入严重困境。正如联合国1992年新的人文发展年度报告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要求世界穷国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但是它们接着就发现，由富国经营的全球市场几乎没有自由可言，反而关闭着，无法打进去。富国言行不一，并未按他们宣扬的主张行事。”富国设立的国家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所获外援的10倍。”

事实证明，第三世界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同过去砸碎殖民主义枷锁，争取政治独立一样，将是一个长期、激烈、艰苦的斗争过程。

二、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40多年来联合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联合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的力量对比终于发生了根本变化。到1985年，联合国会员国已增加到159个，其中亚非国家为96个，超过联合国员总数的3/5，整个第三世界国家达130个左右，占联合国会员总数70%以上。一大批过去受压迫、遭奴役、被人瞧不起的小国、穷国，现在终于在联合国内团结起来，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起了挑战。超级大国的表决机器失灵了，它们任意摆布弱小国家的命运和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强烈谴责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他们强烈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1974年第29届联大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恢复民族权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地位，以色列被宣布为“种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还一再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和越南侵略柬埔寨，联大连续几年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和越南分别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军。

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严正谴责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军备竞赛。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推动下，1978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即第10届特别联大，决定成立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由所有会员国参加。特别联大还决定对裁军谈判委员会进行改组，成员由31国增至40国，其中一半以上是不属于东西两大集团的第三世界国家。裁军委员会废除美苏两主席制，改由会员国轮流担任主席，从而冲破了美苏两国控制裁军机

构的局面。第三世界在联合国裁军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1981年至1987年间，联大通过的有关裁军提案中，80%以上的提案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

为了进一步消除强权政治的影响，第三世界还要求在联合国主要机构中享有公平的代表权和决策权。根据1965年开始生效的宪章修正案，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从6国增至10国。1971年，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国由27国增至54国，亚非拉的名额得到显著增加。第三世界国家还要求扩大联合国大会的职权，缩小安理会的职权。1974年第29届联大成立了一个由42国组成的特设委员会，研究各国政府关于审查联合国宪章的意见。1975年，第30届联合国大会又决定将42国委员会改为由47国组成的“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坚持斗争取得的一大胜利。面对这一局面，美国代表竟然咒骂联合国内存在着“多数暴政”。1983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甚至表示愿意看到联合国会址从美国搬走。

三、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中日建交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席位，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1950年起的20年间，由于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这个问题在联合国里始终没有解决。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的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以51票对49票赢得了多数。尽管没有达到2/3多数而未被通过，却在政治道义上给了美国政府及其支持者以沉重打击。他们被迫承认，“最后失败的结局已日益明显”。

1971年7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尼克松将要访华的公报后，美国在联合国中继续排斥中国的政策看来已走到了尽头。可是，美国当局仍不肯善罢甘休。在1971年第26届联大讨论恢复中国席位期间，美国伙同日本抛出了两项提案。一为“驱蒋”系“重要问题”案，要2/3的多数通过；一为“双重代表制”案，即由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安理会席位，而由台湾继续占有联合国大会席位。但是，美国既想恢复美中邦交，又想制造两个中国的自相矛盾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约80个会员国代表作了发言的为时一周的讨论中，令人信服地说明，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再也行不通了。10月25日，美、日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55票赞成（包括蒋介石集团一票），59票反对，15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整个表决过程一再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欢呼、歌唱、有节奏的掌声震动了大厅。美国代表布什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我感到极为失望”。

中国的合法席位在联合国组织的恢复，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国家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是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阴谋的彻底破产，给了美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分割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的阴谋以沉重的打击。

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面对美国长期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和苏联崛起的严重挑战的现实，把改善中美关系作为迫切任务之一。他相继向法

美国总统戴高乐、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直接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采取主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1970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友好人士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他“是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访华邀请。这轰动了整个世界。美国《时代》杂志说，“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乒乓外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接着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7月9日到11日由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他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谈。7月16日，中美同时公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告尼克松将访问中国消息。这使“全世界大吃一惊”。基辛格说公告的发表“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达北京。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第一个美国在职总统来华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同他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公报的发表，是尼克松主义代替杜鲁门主义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的敌对状态，对整个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美公报的发表到1974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27个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3年2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为扩大接触和交流，互设了联络处。但随后两国关系发展缓慢。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时处于10年动乱的后期，另一方面由于水门事件，美国政局动荡，尼克松于1974年8月下台。特别是，美国当局自70年代中期起愈来愈把美苏关系看得高于一切，不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迈出新的步子。直到1978年，由于苏联的攻势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海外利益，美国在战略上更有求于中国，遂改变对华政策。同时，面对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美国经济迫切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在美国人民和一些友好人士的催促下，卡特政府终于下决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美国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美台安全条约以及撤走驻台美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建交结束了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严重障碍。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从而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精神，妨碍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中美建交到里根二任期满这10余年时间，尽管也有风风雨雨，但总的来说，两国的合作关系还是在不断发展。1987年中美贸易额是建交时的8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在华私人投资居外国

在华投资之首。中美之间的人员交流也迅速增加，从而大大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但是，美国不愿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霸道做法，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障碍。

从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初的 20 年里，日本政府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日本自以为与美国配合默契。直到 1972 年 1 月 6 日，尼克松动身访华前一个多月，日本佐藤首相还“确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2 月 28 日，当尼克松访华公报发表时，据说佐藤简直被弄得呆若木鸡。美国在对日本严加保密的情况下，暗中同中国改善关系，被日本人惊呼为“越顶外交”。佐藤政府遭到巨大冲击，在一片谴责声中，于 1972 年 7 月倒台，由田中角荣担任首相。

田中上台后立即宣布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新内阁的首要任务。1972 年 9 月 25 日，首相田中、外相大平正芳等应邀来华访问。29 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两国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决遵循波茨坦公告第 8 条的立场”。声明中还载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方面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两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同一天，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台）条约宣告结束”。随后，日本与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

中日恢复邦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相继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等协定。两国贸易逐年增加，人员往来日益频繁。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两国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在到 1988 年的签约 10 年里，中日贸易增加了 3 倍，人员往来增加了 10 多倍，中日交流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来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影响两国关系的消极因素。日本政府在 1982 年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官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

四、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发展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中日、中美相继建交，中国对外关系在 70 年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截止 1981 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已有 125 个国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很大发展。到 80 年代初，中国已同约 170 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往来，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权。

80 年代初，中国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本国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时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完善。其核心是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在综合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转变了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的看法，作出了和平可以维护的切实判断；二是转变了外交

战略，决定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外交的新局面。

中国积极参加了国际裁军活动，并于1985年6月作出决定，减少军队员额100万，裁减军队总数的1/4。同时把大批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大幅度地削减国防开支，为缓和国际局势作出积极贡献。

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和不与大国结盟的政策，在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中苏两国在1980年终止了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经过双方多次磋商，逐步消除了三大障碍，于1989年使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正常化。

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进入80年代，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总结了过去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四项原则，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为了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巩固政治独立，1983年1月，中国在60年代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积极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

中国的真诚态度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同和好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称作“全天候的可靠朋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中国对外贸易关系日趋活跃。据海关统计，1990年同1980年相比，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81亿美元增至1156亿美元；到1989年底，吸收外商投资189.8亿美元，开办外资企业2万多家；对外承包劳务合同金额累计已达123亿美元，国外开办企业达645个。这不仅加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也促进了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

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大业，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即在香港、澳门收回主权和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按照这一基本构想，中国充分考虑了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状，本着既恢复行使主权，又保持繁荣、稳定和发展的方针，自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两国代表经过22次会谈达成了协议，于12月19日正式签署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3个附件。随后中葡两国代表于1987年4月13日正式签署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两个附件。上述声明和附件分别确定，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先后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些政策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得到包括香港、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好评。

80年代的实践证明，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对外交政策进行的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经过调整，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日臻完善。

第四节 新旧格局交替时期的国际关系

一、两极格局瓦解对世界的影响

战后形成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苏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当时只有它能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力量。1991年12月下旬苏联的骤然消失，两极中的一极自行坍塌，终于导致战后存在40多年的两极格局的最后崩溃。这一重大事件造成的冲击波不仅震撼着欧洲，而且对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首先，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明显地出现缓和与紧张、和平与动荡并存的两种趋势。

由于战后40多年两个超级大国、两大军事集团对抗局面的终止，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世界和平得以维护的可能性增长。和平与发展更突出地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建立在东西方力量平衡之上的世界的格局一旦瓦解，东西方力量失衡，导致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新的失衡、紊乱、矛盾和冲突。原苏联的版图上先后出现了15个主权独立国家；南斯拉夫一再分裂；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东欧一些地区政治、经济危机深重，民族分裂，领土争端加剧，武装冲突迭起，难民潮涌现，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欧洲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受到威胁。从巴尔干半岛到高加索山脉，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一条危险的“地震带”。

可见，两极格局瓦解后，天下仍不太平。只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动荡和冲突尚属局部性质，不会导致国际局势的全面紧张，不会引发世界大战。

第二，大国的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解体，美苏核大战的噩梦已不复存在，西方阵营各国因核战争威胁的消失而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减少，加之9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衰退和由此引起的政治、社会动荡，使美国等大国都把经济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首位，更加重视发展经济，增强经济竞争能力。

第三，两极格局瓦解也使国际上的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以美欧日三极为主体的西方国家间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共同对手消失，也动摇了西方政治联盟的基础，昔日的盟友，变成了在经济竞争和主导权争夺上的主要对手。

当然，西方国家间除了矛盾和斗争的一面，还有协调与合作的一面。但无论如何，两极格局瓦解后西方国家间的矛盾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乃至美国《华盛顿邮报》不无悲观地写道，“美国与其盟国正进入一个永久关系紧张的时代。”

第四，东西力量失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确实使东方即社会主义力量遭到重大挫折，并经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西方。西方国家正进一步介入原苏联和东欧的内部事务，希图使那里的演变变得不可“逆转”。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则正在加强压力，公然以是否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以“推进民主化”、“尊重人权”作为附加条件，竭力干涉这些国家内政，强制改变他们的社会

美国《华盛顿邮报》1992，4，28文章，《使我们的盟友不变成我们的敌人》。

日本《产经新闻》1993，2，22，中泽幸彦：《因冷战结束发达国家在修改援助方针》。

性质。

但是，不管道路多么曲折，社会主义的重新走向高潮并最终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事实上，东欧许多人已开始体会到资本主义是一场灾难。美国《华尔街日报》1991年9月18日以“罢工，衰退和弊端使许多人重新考虑资本主义道路”为题，报道了波兰工人对过去的怀念。

第五，南方战略地位暂时下降，南北矛盾加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中间地带”的地位已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与西方直接对阵。第三世界已无东西方矛盾可以利用。原苏联为扩大自己的影响，曾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经济优惠。苏联解体后，不仅不再提供这类援助，独联体和东欧各国反而在同第三世界国家争要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把“政治民主化”“人权”作为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引起或加剧了一些国家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增无已。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数目也由70年代的36个增至1992年的46个。

但是，第三世界在逆境中团结自强的意识在提高，更加重视南南合作，反对强权政治和不合理的经贸关系。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以比世界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一倍的速度向前发展，给了整个第三世界以鼓舞。认为随着两极格局的结束，第三世界已不复存在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三世界仍然是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主力军。

二、世界多极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

世界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主要体现在由美国独霸局面向美国、西欧、日本三极相互抗争局面的转移。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它力图利用军事实力的优势来弥补经济实力的不足，以便继续维持和加强它的霸权地位，阻止多极化的进程。他们散布这样一种看法：鉴于苏联的衰落和海湾战争的结果，美国已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未来的国际秩序应由美国领导，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但是美国的这种论调被许多国家看作是“不可思议”，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亦处于相对衰落之中；另一方面，在苏联瓦解、对西方军事威胁逐渐减弱的情况下，美国更难用军事保护来换取他国的经济让步；而且军事实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依靠前者来补后者之不足，其结果必然使美国继续承担比西欧、日本更为沉重的军费负担，从而加速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促进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权力结构的多极化与区域集团化，既是互有区别的两种世界经济特征，又是互有联系的两种国际经济关系现象。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美国实力及其相应的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控制能力的削弱，区域集团化的势头有了迅猛的发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某些带有转折性质的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承认它将成为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中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的主要特点是：

（一）欧洲共同体正谋求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化组织。

1991年12月上旬，欧共体12国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决定在12国范围内实现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即建立所谓“欧洲联盟”。《马约》原定生效日

期为 1993 年 1 月 1 日，后由于一些成员国延缓批准条约，生效日期推迟到 1993 年 11 月 1 日。一个囊括欧共体 12 国，人口愈 3.4 亿的欧洲联盟宣告诞生。

（二）美国也着手建立区域集团化组织。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作为倡导与坚持全球性国际经济体制的美国，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加快了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步伐，以作为抗衡欧共体 1992 年底统一大市场建成的重要手段。美、加、墨 3 国政府首脑于 1992 年 12 月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了拥有 3.6 亿消费者，区内生产总值超过 6 万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进一步目标体现在布什总统 1990 年 6 月发出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中，意在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的长期计划。

（三）亚太地区集团化动向更加活跃。

80 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最突出的变化是本地区的相互经济关系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该地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现在日本在该地区的援助、投资、贸易等都占据着主导地位。1989 年日本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援助达 44 亿美元，等于美对这一地区非军事援助的 31.6 倍。近几年日本与东亚地区贸易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它与美国贸易的增长速度。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和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额都已分别超过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额。日本正以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编织无形的“东亚经济圈”。

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联合自强，也在加强各种共同体和一体化组织。1991 年 11 月，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会并加入了这个组织，标志着这个地区经济合作将有进一步的加强和扩大。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不同层次的集团化经济，但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只有美、欧、日 3 家，它们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70%。这些集团化经济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国际结合的一种形式，反映着各成员国垄断资本的国际竞争和联合的利益和要求。它是现阶段垄断资本争夺和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展中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另一种性质的国际经济联合体。其基本职能是加强成员国的集体自力更生能力。由于力量悬殊，它们不可能同大国及其主导下的集团相抗衡，不能不具有一定的依附性。

与集团化加强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所有集团，虽有一定的保护倾向，但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同其他集团的经济联系，加深着集团间的犬牙交错关系和相互渗透。集团间的贸易呈现进一步增长的势头，资金流动更是主要在美欧日之间进行。西方国家生产资本输出逐渐取得了在资本输出中决定性的地位，且把重点转移到发达世界，这是二次战后资本国际化的独特现象。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美日欧发达国家抓紧了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大力增加集团区域内的投资，也更加重视到对方国家或集团进行投资，以便所出产品能够在对方自由流通并享受各项优惠。80 年代末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 80 年代初增加两倍，其中 80% 集中在美欧日，只有 18% 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跨国公司起着主要作用。跨国公司不仅跨国，而且跨集团，力图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它们控制着国

据美国《独立报》1993 年 5 月 15 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同样数量的钱在不同国家所能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来计算各国的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则工业化国家的产值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为 54.4%，明显低于过去一般的估算。但美、欧、日 3 家仍是世界最具影响的经济实体。

际直接投资的 90%，世界生产的 40%，出口总额的 2/3 和技术转让的 1/3。现在它们已越来越重视就地生产和销售。全世界生产和销售有 20%是在国外进行的。

三、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世界新旧格局交替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1）两极格局瓦解，美俄缓和，我国与美、俄、日关系日常化，从根本上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苏联解体，从战略安全角度看，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对我国的威胁，也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之调整。（2）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走向多极化，苏美两霸一个已经解体，一个相对衰落，而其他力量中心的力量却在上升。这就增加了我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比过去更大了。在多极格局中，谁也不能不估计到中国的存在。11 亿多人口的中国对国际战略平衡的影响，已比过去增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国的地位正在提高，要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和战略平衡，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挑战方面看：（1）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保护主义盛行，我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激烈的竞争；（2）当前日益明显的世界经济国际化趋势，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又有不利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研究，不失时机地实事求是地了解和掌握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具体地说，既不能借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盲目崇拜西方，迷信私有制，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虽然本性未改，却面目已非，不能仍然停留在某些传统观念上，而要结合中国国情，去认真地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更不用说去尊重那些在国际交往中被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的国际惯例，以利于我国的对外开放。（3）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正在抬头。它们把矛头针对第三世界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企图压我放弃社会主义。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中国面对国际上新的机遇与挑战，再一次表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指出，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大会同时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坚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3 年 4 月，各国公认的世界经济论坛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了有关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题为《新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排序报告，中国的排序位居印度、俄罗斯等 20 个转轨大国之首，这不仅表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超出其他转轨国家，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引起了世界各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

当然，同其他改革一样，对外开放中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西方资产阶级乘我国对外开放的机会，妄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腐蚀社会

主义机体，国内也有人反对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的腐败社会风气有所滋长，资产阶级自由化观念也会乘虚而入。目前许多国外友人和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均已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国内腐败现象、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不仅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在实际上起着与西方帝国主义谋士“和平演变”中国的鼓噪相呼应的作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目前，全党和全体中国人民正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遵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团结一致，扎实工作。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展现其无限生机。

